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6.12.19
2016年第51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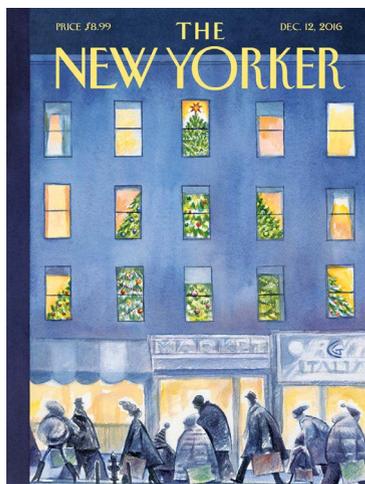
民宿、乡愁与精神之根
到乡村去



917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G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纽约客》(美国) 2016.12.12

无形的威胁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曾在2014年宣布要建立一个“哈里发国”，那一年他们也因战略分歧与“基地”组织分道扬镳。解放摩苏尔和拉卡的战役都已打响，“伊斯兰国”在控制疆域方面的能力被严重打击，但是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败退并不影响其意识形态和“圣战”意图的稳固。中东的乱局是他们调整战略、东山再起的土壤。



1 / 《旁观者》(英国) 2016.12.10

想象中的私人会面

特朗普和普京的第一次私人会面会聊些什么?《旁观者》杂志对此做出了一番想象:2017年2月14日,特朗普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圣安德鲁大厅,那里的金碧辉煌让他倍感亲切。谈话过程中特朗普的话更多,时而会跑题且有些不着边际,普京只是偶尔提问,三言两语。在俄罗斯是否会对北约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两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3 / 《经济学家》(美国) 2016.12.10

特朗普与美国新商业模式

减少企业税、增加基建、放松监管、把工作留在国内,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强硬姿态在短期内为他赢得了欢迎。但他重商主义的思维会让精明的企业把向总统献媚作为头等大事,并避免可能令其不悦的行为。然而损害会逐渐积累:资本错配、竞争力下降,以及对美国体制的信心削弱。受害最深的将是那些特朗普许诺要帮助的工人。

2 / 《新科学家》(英国) 2016.12.10

其实你是一个天才

每个人都是一个大量矛盾的集合体,同时也集聚着惊人的能量,你必须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极限,找出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自身潜能的方法,规避掉一个并不好的自己。本期《新科学家》总结了十个方向去透彻地反观自己,比如惊人的数字敏感度和身体承载能力,又或许你可能并不是无神论者,你有一个迷信的头脑来自我保护。

4 / 《名利场》(美国) 2016.12

“90后”影后的日常

1990年出生的詹妮弗·劳伦斯在22岁时就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短短几年时间,她完成了一个成功的好莱坞女明星应该完成的每一个印记,而且并没有要放慢脚步的迹象。下个月的科幻电影《太空旅客》之后,闲不下来的“大表姐”劳伦斯将开启与斯皮尔伯格和男友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基的合作。



P32

封面故事

民宿、乡愁与精神之根 到乡村去

三联生活周刊

- 40 郝堂：一座乡村的“非主流”复兴
- 58 贵州茅贡：乡村该如何回应“城愁”？
- 74 莫干山：民宿先行者
- 88 艺术再造乡土：越后妻有留下了什么？



P96 意大利公投，“理”与“势”的合流

社会

- 时事：意大利公投，“理”与“势”的合流 96
生态：鄱阳湖水闸争议再起 104
专访：“七环”北京，格局初现 110

经济

- 市场分析：外储大缩水 94
商业：“后梁建章”时代：携程国际化加码 114

文化

- 音乐：《罗密欧与朱丽叶》：法国音乐剧的新浪潮 126
电影：张艺谋的好莱坞之路 132
电影：《塑料王国》，站在全世界的塑料垃圾上 136
电视：《西部世界》：机器和人性的现实思考 142
科技：控烟大会，和烟草业斗争到底 148
思想：民粹主义辨析 156
书评：性别关乎灵魂 158
书与人：在未来的童年里，故事仍然重要吗？ 160

- 书与人：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 164

专栏

- 邢海洋：没有了“妖精” 18
苗千：宇宙中的新物理学 152
张斌：用舞动奇迹去忘记 154
宋晓军：特朗普手里的“烫手山芋”是什么？ 155
朱伟：陈村：那就和自己好好玩一场（5） 166

（本期封面摄影：张雷）

环球要刊速览	4	声音	23
读者来信	10	生活圆桌	24
天下	12	好东西	28
理财与消费	20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22		

2016年第51期，总第917期，2016年12月19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芃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滢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邢宇 Xing Yu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孙名梓 Sun Mingzi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宋洋 Song Yang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张倩娜 Zhang Qianna 周扬 Zhou Yang 陆汉夫 Lu HanFu 牛家欢 Niu Jiahuan 陈璐 Chen Lu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夏青 Xia Qing 李璐 Li Lu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李加贝 Li Jiabei

陈陌阳 Chen Moyang 韩蕾 Han Lei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奥迪

2~3 · 波音

5 · 唯他可可

19 · 风云浙商

87 · 野生救援

93 · 周刊征订

111 · 周刊20年

113 · 宝马软文

118~119 · 潘高寿软文

120~125 · 优酷软文

163 · 书店广告

封三 · WWF

封底 · 力度形象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鼠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今年我们笑什么

生活在北京，熟悉几家民间演艺场所，还常去天津逛街听相声看演出，尤其喜欢喜剧表演，轻松快乐解压。国外的类似表演，也追过一些。还是喜欢咱们自己的喜剧，文化传统决定胃口，自己的哏才最能体会其中的妙。这些年的浸淫，对喜剧的再度兴起早有感觉。这期内容我又看到国内当红喜剧小品、综艺戏剧表演的全貌，是不是能够常青我不敢妄下断言，但至少相比十几年前心里踏实——当年我坐在天桥的茶馆里看郭德纲相声独火，看赵本山小品雄霸春晚那么多年，看小沈阳一年红二年粉三年没颜色，看德云社、辽宁民间艺术团的演员们赶场子似的出入各卫视，就担心全中国若只能指望这几家“庙堂”出戏，那真悲哀了。民间小团体演出培育了一批优秀的梁柱，年轻的他们竟然立住了脚，喜剧有了新的生态，趣味也在提高中。相信前路一定好于昨日。

北京 老梁

前方何时无危桥

几年前，我到城乡接合部检查环境卫生，从我区育红东路港务处宿舍楼东侧一条中心路向南不远，经过一座桥，看到桥南电线杆上挂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危桥，请绕道行驶”，因桥北没有“危桥”的标牌，我们已不经意走过了危桥。这座危桥部分桥栏倒塌，桥面破损。这条路和桥南接益民路，北接育红路，两侧是居民点，每天行人较多，是一条交通要道。

也是几年前，我下乡检查环境卫生，从我区益民路铁塔东一条中心路向南约半里路处，看到树干上也挂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前方危桥，禁止通行”。这座南北向小石桥，桥北是村民的承包田，桥南是泰西村村庄点，桥北路旁有一座垃圾池，不知是不是为了方便桥南村民过桥倒垃圾和桥北的车辆运垃圾？

“危桥”的标牌竖在这两座桥头已经多年，既然是危桥，为什么一直让它屹立在人们眼前？人们不从这两座危桥经过，又能从什么地方进城、上学、回家？我在其他村子，也见到一些村道上竖有“前方危桥，禁止通行”的标牌，但行人和车辆照样通行。我区地处里下河地区，河道星罗棋布，河多路多桥多，桥是交通的纽带，孩子们上学，乡亲们种地、运肥料、运粮食和蔬菜，还有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收割机，都要从桥上经过，桥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来说，太重要了。而我所见的危桥，大多是水泥预制板结构，预制板横跨在桥梁上，桥面只有3米左右宽，大多没有栏杆，有的桥面裂缝，如果机动车装载过重，桥有坍塌的危险。10多年前，某村有座危桥，一辆卡车经过时由于桥板断裂，翻入河中，造成3人死亡。由于没有“危桥”标识，死者家属把所在

地的镇领导告上法庭，该镇进行了赔偿。从这以后，所有村的危桥都竖有“前方危桥，禁止通行”的标牌。难道竖有“危桥”标牌，出了事故，当地领导就不承担责任了吗？

每当我走在危桥上，心里总是不踏实，可不走这座危桥，又能从何处到达前方目的地？前方何时没有危桥呢？由此我想到历史上的赵州桥，想到建桥石匠李春。1400多年来，赵州桥历经8次大地震而不倒，54次大洪水而不垮，无数次战乱而不毁，历久弥坚。如今的桥梁质量为何不如赵州桥？难道造桥技术和条件比不上赵州桥？

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我省每年都下达大量农村公路、桥梁建设资金，农村公路、桥梁有了很大改观，主干道上基本上没有危桥，而次干道上仍有危桥存在。有关部门得把省里下达的公路、桥梁建设资金用在实处，严把建桥质量关，杜绝“豆腐渣”工程，切实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江苏盐城 一读者

闹不闹？

上个月表哥喜得贵子，我陪他一起去派出所办理新生儿入户。出发前表哥特地登录公安局网站搜索查阅了办理新生儿入户所需的材料、证件，备齐手续后我们便赶往派出所。

一路上兴奋的表哥不住赞叹当下网络社会的便利，说过去信息不透明，加上很多机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办个事要跑好几趟，现在有了网络，资料可以提前准备，方便了不少。不过表哥的兴奋并未持续太久，到了派出所，表哥预期中的顺利办理场面并未出现，民警扫了一眼表哥准备的资料，便说资料不全办不了，还需要另行提供房产证。这让本以为不会再

跑冤枉路的表哥和我都十分意外，再说根据公安局网站的公示，办理新生儿入户并不需要房产证呀？不过民警对我们的疑问却是见怪不怪，解释说最近二手房交易量巨大，很多人房子卖了之后，仍然把家里新生儿的户口办理到已经出售给别人的房子上，最近便有好几个“倒霉”的买家为此找到派出所理论，脾气大的还跑到局里去闹。为了杜绝这类现象，派出所便要求所有来办理新生儿入户的家长都要另行提供房产证。民警还进一步解释说，只要不存在已经把房子出售给别人的情形，提供一份房产证有什么为难的吗？

民警的解释倒也合情合理，不过转念一想，却让人觉得十分别扭：办理新生儿入户所需要的资料早已向社会公示，只要我提供的资料齐全，派出所就应该照章办理。即使在生活中出现了民警所说“有人来闹”的情形，也应该依法去解决，怎么能够因为怕“有人来闹”，便随意提高办理门槛，增加社会成本，并把这种社会成本转嫁给无辜的人身上呢？如此一来，行政机关应有的担当又如何体现？现在中央都提倡“不让老实人吃苦”，可为何生活中却又屡屡出现个别人不守规矩全体人陪着吃药的情形？

对于我和表哥的吐槽，民警却不以为然。民警说什么担当不担当的，口号谁不会喊，可工作中的实际情况

却是只要有人来闹，领导才不管什么原因呢，一顿训斥是少不了的，毕竟在很多领导眼里，摆平才是水平。认真的领导事后还要追问针对此类现象有什么整改措施，如果没有，会给领导留下什么印象，你懂的。就以新生儿入户要求提供房产证为例，这也是我们根据领导要求，想了很久才想到的整改措施，为此还得到了上级表扬呢。至于这些整改措施是否增加了其他人的负担，谁去关心呢？反正这些人又不去闹。

听了民警的话，我和表哥面面相觑：我们是回家拿房产证呢，还是去闹呢？

郑州 思源

又遇“强捐”

朋友阿毛，历来乐于助人，但前阵子却有些愤愤不平。在外学习的他接到通知，单位组织捐资助学活动，强制要求捐款且不少于1000元。

相对于每月近9000元的工资，1000元不算很大数目，阿毛为何愤愤不平？原来，阿毛是不折不扣的“农二代”，早些年房价不高时忙着帮家里偿还债务，及至手头略有盈余，房价却早已水涨船高，老婆又没有工作，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要在城里立足，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他兄弟姐妹5个，除他之外全在老家务农，虽然温饱问题早解决了，但手中无钱却是常态。老父亲有心

脏病、高血压，常年需要吃药，合作医疗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大头只能依靠他这个唯一跳出“农门”的儿子；他的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姐夫去年身患重病，他都要给予适当帮扶；就在单位通知捐款前几天，他得知父亲身上长了个瘤子，都好几个月了，因为怕他花钱，一直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去做检查。

阿毛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很想尽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前很多募捐活动也都积极参与了。可是，捐款总该让人量力而行吧？他说他现在银行卡上的数字只有两位数，不哭穷并不代表他没有困难。他没有借钱捐款，只是赌气地让单位从下月工资中直接扣除。因为不在单位，阿毛没有问过这件事的进展，半个月过去他没再收到催交的通知，这个月工资似乎也没被“代扣”。这是莫大的进步啊！他说他很欣慰，但更多的还是顾虑，不知道回去之后领导怎么看他、同事怎么看他，不知道是否从此就要被贴上“吝啬”“不服从”“没荣誉感”等各色标签？

阿毛还说起了他印象最深、金额最大的一次“强捐”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时，那时他的月工资不足2600元，房子也还没买，将近一半工资要用来给他8个月大

的孩子买奶粉，但在单位首次组织不记名、不定额募捐时，他毫不犹豫地捐出了1000元；可是过了没几天，上面一纸通知，要求再次捐款，这次是强制性的，标准是2500元。他说，2008年那么惨烈的灾难，向灾区多捐一些都是应该的，即便是后面的强制捐款，他也一直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不过从那以后，除了在公司群、朋友圈中参加过一些捐款活动外，对所有以“组织”名义进行的募捐活动，他不再积极，甚至有些排斥，担心在自己量力而行的主动捐款之后又遭遇超负荷的“强捐”；而单位似乎也没有再组织过自愿捐款——都是直接定额摊派，标准在100到300元之间——也许在某些领导看来，“强捐”是筹款最多、效率最高的方法吧。

阿毛的经历，我感同身受。我历来十分敬重热心慈善的人，和很多人一样，也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过一些帮助他人的事。但我觉得，公益还是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公开经费开支来提高公众参与度，“强捐”不是也不应该是筹款的最佳方式。“强捐”不仅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剥夺了捐助者本该获得的快乐感受，这种对爱心“涸泽而渔”的募捐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湖南怀化 光明



古巴 | 经济衰退

12月10日，在古巴哈瓦那的一个黑市谋生的当地人。当前古巴经济衰退日益严重，很多贫困者依靠在黑市做零工赚钱。





英国 | 圣露西亚节

(右图) 12月9日, 英国约克大教堂举行“圣露西亚节”庆典活动。每年12月13日是瑞典传统“圣露西亚节”, 用以纪念“光明女神”圣·露西亚。传说中露西亚女神唱着《圣露西亚之歌》, 用天籁之音将人们从清晨唤醒, 告诉人们无需害怕黑暗笼罩, 因为她将以创造光明的神奇力量, 来引导众人走过整个圣诞季节。



英国 | 无双宫

(左页上图) 12月9日,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向媒体展示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无双宫》画像。这幅《无双宫》水彩画由佛兰德画家约瑞斯·霍芬吉尔(Joris Hoefnagel)在1568年绘制完成。1538年,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下令在萨里郡(Surrey)的狩猎场附近建造无双宫, 这座新的宫殿花费数十年才最终建成。1682~1688年, 克利夫兰公爵夫人将宫殿拆除并出售以偿还赌债。十余年后, 无双宫便完全消失, 现在只剩下少量残片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孟加拉 | 尴尬的民族

(左页下图) 12月8日, 生活在孟加拉境内的罗兴亚人。孟加拉境内共有六处罗兴亚人营地, 且人数日益增加。根据非正式统计, 罗兴亚人虽然是少数民族, 但是人数近百万人, 其中很多人住在缅甸与孟加拉的边境。缅甸政府在1982年颁布了新的《缅甸公民法》, 明确拒绝承认罗兴亚人是缅甸公民, 将他们列为孟加拉人。问题是, 孟加拉政府也不承认罗兴亚人是该国的公民, 因此罗兴亚人成为“没有国籍的偷渡客”, 遭到逮捕与驱逐。

黎巴嫩 | 抗议

(右图) 12月6日, 十几名来自人权组织“ABAAD”的女子身穿婚纱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国会大厦前, 抗议黎巴嫩《刑法》第522条。该条法律规定, 如果强奸犯与受害者结婚, 那么强奸犯可免遭起诉。按照黎巴嫩相关法律规定, 强奸者将被处以7年刑法, 如果受害者有生理或心理缺陷, 刑罚将会加重。但是, 《刑法》第522条的相关规定却使罪犯有了一个逃过审判的机会。

土耳其 | 牧羊女

(下图) 12月9日, 土耳其穆什省境内, 一名牧羊女在雪地里放羊。





没有了“妖精”

文 / 邢海洋

因为权力的介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明战”“暗战”，在万科和南玻上得逞的宝能折戟格力。宝能的效法者恒大人寿还失去了买股票的资格。硝烟散尽，网红“董小姐”所斥责的中国制造的罪人，谢罪并承诺离场。没有了“妖精”，A股会更好吗？

姚振华所扮演的野蛮人角色，海外市场上大把大把地存在。《门口的野蛮人》这本书正是来源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一场破纪录的杠杆收购。并购之于行业整合、资源配置以及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且不论，即便是恶意收购，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资本市场的正常发育也有着促进作用。但杠杆收购则另当别论，它就像毒品致幻，令本来没有那么大能力的收购者野心膨胀，同时把债券投资者置于危险之中。至于杠杆收购者渴望挖掘出上市公司“潜在利益”然后一走了之的做法，就更让人不敢恭维了。这些做法具体包括：出售公司资产、拆分高增长业务、削减雇员工资等等。短期内，这样的行为无疑可以推高股价，可长期看，企业或失去了发展的后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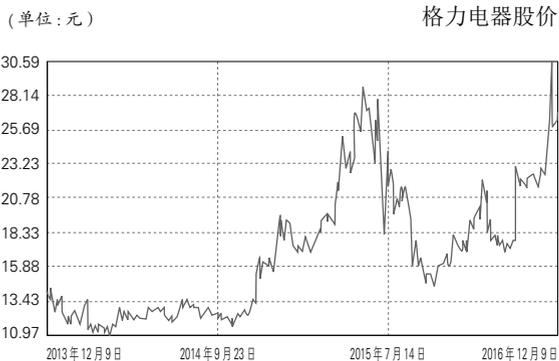
宝能染指万科的时候，宣称要做财务战略投资者，这个说法还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可入股南玻后，逼走了南玻管理层，其短期投机的行为已经引起外界警醒。南玻是一家制造节能玻璃的业绩优良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颇高。保险公司若长期投资这样一家生产企业，并推动企业提高分红，长期而言也可获得稳定的回报。可宝能逼走了管理层，这就使人怀疑它的动机。南玻

的潜在价值很明显，在寸土寸金的深圳，作为一家老牌的制造企业，南玻的工业用地早令外界垂涎。缺乏土地储备的深圳政府鼓励企业盘活闲置土地，更为南玻厂区价值提升提供催化剂。宝能的同盟军恒大人寿在股票市场上快进快出的“短炒”行为更令市场愕然，其凭借恒大地产和足球队的品牌信誉，巧妙地利用了季报发布规则，制造概念洗劫散户。直到事件被披露，监管层却奈何不得。

A股市场并购活动远没有海外那样活跃，“恶意”收购更是少之又少，其实并非好事。此前，国有股一股独大，收购方无从下手；中小板创业板开板后民营企业大量上市，仍是创始人一股独大，收购方还是无从下手。创业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上市前的平均持股比例为53%，上市后的股价虚高，再没有恶意收购的威胁，正可以从容享用上市红利。于是乎，2015年上半年，主板上市公司共减持2280亿元，中小板和创业板共减持2448亿元，远高于同期IPO和定向增发的数额。国家政策引导资金避虚向实，可在证券市场，却是套现减持资本转移。而一股独大其余股权分散的股东结构，也使得相互制约的股权架构形同虚设。

2014年底，沪深两所开闸并购重组私募债，此债券颇为类似《门口的野蛮人》里用于杠杆收购的垃圾债，A股市场上的并购重组热潮由此到来。可当野蛮人来敲门，我们却惊奇地发现，尽管大股东肆意变现，可持股从53%减持下来，减到野蛮人有能力相与抗衡的比例，还有很大的距离。而股权分散值得收购的企业少之又少，其中绩优企业更少。于是，南玻、万科、伊利和格力，这些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成为收购者围猎的对象。企业收购中最难的环节是资金筹措，举债买企业，听起来就很荒唐。可如果是企业管理层收购，似乎就靠谱得多。在美国，当银行家加入到杠杆收购的队伍，他们开始动用的是银行贷款，再辅以发行债券。在当前的A股市场，银行受到严格监管，新兴的保险资金取而代之，围猎起“中国制造”的中坚力量。

A股市场在试错中前行，这一次又错了。☑



特刊号外



东阳光鲜草

东阳光鲜草，
鲜的冬虫夏草。

鲜草
冠名

浙样红

浙江经视



2016
年度

浙商颁奖典礼

浙商资讯

第14期

成立于2003年

8开





栏目插图 | 范薇

制造业回流美国

与特朗普会面后，软银孙正义称将在美投资 500 亿美元，创造 5 万个就业岗位。CNBC 报道中提到，特朗普与软银会面的文件上出现了苹果代工厂商富士康的公司标志，不知富士康在软银投资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富士康曾被爆出考虑转移到美国生产 iPhone。特朗普在 Twitter 上发帖警告，企业将外包的产品卖回美国将被征收 35% 的关税。而“胡萝卜加大棒”的另一端是：美国企业税将降至全球最低的 15%。

整肃万能险

继被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斥为“害人精”后，保监会开始整肃险资，派检查组进驻前海人寿和恒大人寿。保险理财遵循的是资产与负债匹配管理的原则，中小险企以保费搏击高风险资产，犯了大忌。严管后，未来万能险给中小险企带来的高负债成本的新增保费或断流，而为了应对现金流压力和偿付能力充足率压力，其举牌行为短期内将被抑制。

“废钞”重创经济

印度废钞一个月，短期效果显现，11 月，印度综合 PMI 跌至 49.1，陷入萎缩。“废钞令”出台，一夜间使印度的流通货币缩水到七分之一，小微商业企业资金链突然断裂而被迫停业，商铺因缺乏现金周转无法进货，工厂因无法从银行取出现金支付员工薪金而停工。据报道，印度农产品销售下降了五成，耐用品销售下降了七成。据汇丰银行预测，印度 2017 年的 GDP 将因此减少 0.7 至 1 个百分点。





外储逼近“3万亿”

截至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16万亿美元，较10月末下降691亿美元，降2.2%，为今年1月以来最大降幅。经历连续5个月“缩水”，外汇储备正逼近3万亿美元。消失的691亿美元外储中，约300亿美元源于汇率折算因素，而受“双11”“黑五海淘”跨境电商大力促销，以及人民币波动等因素影响，11月个人购汇出现环比增长27%。岁末年初，个人购汇5万美元额度刷新，人民币不确定性大增。

16次变相降准

12月6日，央行对24家金融机构开展共3390亿元的MLF操作，这是央行年内第16次变相降准。进入今年第四季度以来，央行加大了MLF操作的频度和力度，其中10月份和11月份各进行两次，截至11月末，MLF余额为2.7358万亿元。尽管央行不遗余力地弥补外汇占款缩减对流动性的影响，6.5%~7%的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在望后，利率已经稳步上升。央行参事盛松成表示，未来适当的时候，也可考虑加息。

“特朗普行情”

特朗普总统大选意外成功之后，美国股市开启特朗普行情，股指持续攀升，债券下挫。截至12月7日，道指上涨了1363点，高盛上涨了57美元，也就是说高盛贡献了441点。特朗普将放松金融监管，推动利率走高，两个因素都利好银行业绩。道一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股价作为计算权重，高价股对指数的影响尤为明显。“特朗普行情”正好是高价股表现亮眼，而思科、可口可乐以及英特尔等低价股则相对落后。

温州帮

有关“温州帮”盘踞的营业部被查的消息不胫而走。所谓股市“温州帮”，是指江浙一带几个营业部席位共同炒作股票的游资，擅长超短线操作，往往将股票连续几日拉至涨停后获利砸盘，手法彪悍。据统计，相关14个营业部今年来合计现身龙虎榜的次数超过千次，总成交额高达344亿元。“温州帮”吸引监管部门关注的另一焦点是其资金来源，其资金或主要来自于浙江民间配资，集中在温州、杭州、绍兴一带。





医者难自医

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会刊》上的研究分析了全球 183 项与医科学生相关的调查后发现，学医之路上可能要付出巨大的心理代价。在这些研究所涉及的 12.9 万余名医科学生中，27% 的人患有抑郁症或存在抑郁症状，11% 的人在医学院就读期间有过自杀倾向，但却只有 16% 的抑郁症确诊者主动寻求治疗。研究者指出，医学院中的巨大竞争压力和接触生老病死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是导致医科学生心理难以承受的主要原因，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教学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质量。

好消息

越用越来电

智能手机的功能越强大，电能消耗的问题也就越令人头痛。不过，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最新研制出的一款薄膜型纳米发电机或许可以让我们很快和充电宝说再见。只需用手指在发电薄膜上划动和轻触，就可以为基本的显示和输入提供足够的电能。折叠时薄膜的发电能力还会更强。



食肉不如吃豆

肉类所能提供的饱足感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男性——无肉不欢的主要原因，但哥本哈根大学针对 43 名男性志愿者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用烹制得当的豆类和豌豆替换大餐中的猪肉和小牛肉，不仅可以让研究对象获得同样的满足感，而且下一餐摄入的热量还会减少 12%。

坏消息

沉重的众乐乐

美国康奈尔大学食物与品牌实验室日前发现，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出于争强好胜之心而患上“每逢聚餐必吃多综合征”。发表于《营养学前沿》上的论文指出，当一群人比赛吃鸡翅时，实验对象的平均摄入量比平常多 4 倍，而围观者存在时，男性还会再多吃下 30%。

蚊患攻城

过去 50 年中，美国多个发达地区的蚊子种群数量增加了 10 倍，大城市更呈现蚊子又多又爱咬人的趋势。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研究小组指出，这是城市化加速的恶果之一。以往生活在湿地和自然环境中不叮咬人类的蚊子种群萎缩，从而令祸害人类传播病毒的蚊子一支独大。



这种颜色代表着希望，以及我们和自然的关联。它代表着我们平常所说的以 re（一再，重新）为词根的词：regenerate（再生）、refresh（焕然一新）、revitalize（重振）、renew（更新）。每逢春天，我们都会进入一个新循环，新芽都会从泥土中冒出。它是某种令人期待的使人向上的东西。

——全球色彩权威潘通色彩研究所称，2017 年的年度色彩是青草绿

现在再也不存在什么乡间小镇了，现在一切地方都可以瞬间与其他地方取得联系，孤独的感觉只能在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途中才能被体会到。

——卡尔维诺

特朗普将成为 150 年首位没有宠物的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有虎崽，托马斯·杰斐逊和西奥多·罗斯福有熊，柯立芝有倭河马。总统的宠物能软化总统的形象，使白宫获得正面报道。动物能同时提高特朗普的自信和约束他的自负。它们无条件地爱主人，无保留地宽恕主人，总是很诚实。

——白宫交接项目成员劳伦·怀特恳请特朗普为了他自己以及美国的利益而养一只狗



(插图 山羊胡)

我为 5 万人表演过，也为 50 个人表演过。我可以告诉你，给 50 个人表演更难。因为 5 万人会有单一的人格面貌，50 人则不会。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世界。他们对事物的感知更清晰。你的真诚，以及它如何与你天赋的洞察力相关联，都会受到考验。我知道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人数非常少……我从来没时间去想，“我的歌曲是文学吗？”所以我很感谢瑞典学院花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最终提供了一个如此美妙的答案。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



+/-
数字

170
平方米

亚马逊 12 月 5 日展示了它们的第一家实体店，这家超市占地 170 平方米，没有收银台，顾客不用排队结账，超市利用传感器把顾客选购的物品添加到顾客的虚拟购物车上，账单由顾客在亚马逊网站上的账户支付。

30
亿吨

一项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中所有基础设施，所有车辆和机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所有设备和建筑，所有技术产品，以及垃圾填满场中的所有垃圾，估计约总重 30 亿吨，如果均匀分布于地球表面，每平方米的地面上将有 50 公斤的物体。

382
万件

委内瑞拉当局逮捕两家玩具公司负责人，没收了 382 万件玩具，当局表示将会把这些玩具低价分销给穷人当圣诞礼物。委内瑞拉消费者保护组织表示，有玩具经销商囤积玩具，并转手卖出最高可以获得 500 倍的利润。



但得此间清净

文 / 泡泡唐

图 / 谢驭飞



虽然老张戴了橡胶手套，但是每次看到他把手伸进便池里进行清洗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我们对某些用具总是有一种天然的嫌弃，比如便池。老张穿着橘红色的制服，头发花白，大红脸总是怒气冲冲的，他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但又要求自己干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老张和我也算不打不相识，但始终也不是很熟。我们的第一回是，我抽烟，他不让抽。他的语气十分生硬，我开始还柔和些，后来也就不柔和了，反问他：“那你说怎么办？”虽然我们老是自诩文明，但实际上我们寻找别人软肋的时候，往往并不去想这个软肋找的是不是道德。我的潜台词大家都明白：你这个打扫公共厕所的能把我怎么样！事实上，进入这个公厕的人第一眼都能看到正对门的墙上有一个“禁止抽烟”的牌子，上面还写着举报电话。但我从来没有说按照牌子上的提示做，而是一直觉得这个牌子搞笑：怎么举报，你这边刚打完电话，人家那儿就抽走走了。

老张说：“我能怎么办！”他的口音应该在山东、河南之间，即使是这么句软话，也说得挺冲。然后他又说，不是不让我抽，但我应该把烟灰弹到便池里，让人看不出来厕所有抽过烟的痕迹。然后，他的嗓门又放大了些，说前几天上面来检查，看到地上有烟灰、烟头，拍了下来，罚了他300块钱。他说，他一个月2100，罚了300，等于白干了四五天。我说：“那你就让我把烟灰弹

便池里不就行了？”他继续把戴着橡胶手套的手伸进便池里，用铁砂球擦来擦去，不再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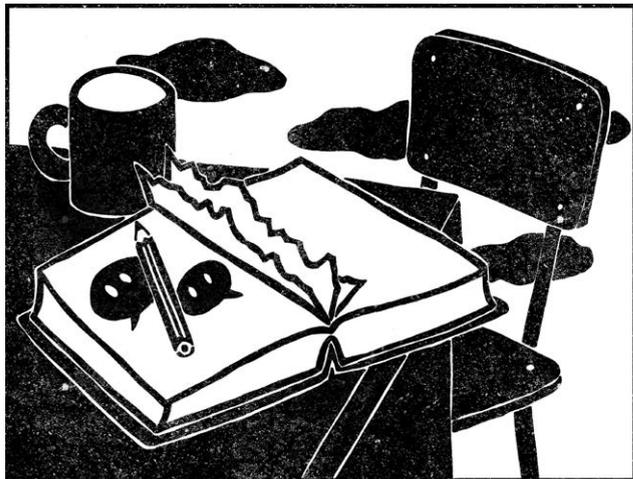
夏天到了。一天晚上我刚走进去，突然看见一个裸体的老男人，肩上搭着毛巾，面前一个塑料盆装满正冒着热气的水。多少有点意外和尴尬，不过这个时候，我和老张已经可以搭几句话了，就问：“擦擦澡呀？”他本来都准备弯腰湿毛巾了，见我问他又站直了，说他住得很远，回去就得差不多得11点了，住的地方又窄，也不是没有办法擦洗，但肯定会影响别人。然后，他还告诉我，他的开水是旁边饭馆送给他的。我的事办完了，他还在那里叹息呢，我走了，他才开始往身上擦水。

最近，老张又被罚了300块钱。我至少3次听见他不准别人抽烟。那天晚上，我在那里抽烟，旁边也一个人抽。他去拖地，对我旁边那个人说：“不准抽烟。”他说话还是那么冲。那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脖子上有金链子，他对老张说：“不抽怎么能行，憋得难受。”老张就又说了一遍自己被罚钱的事，说自己等于这个月每天少挣10块钱。最后又说：“你看人家，人家也抽，我为啥不说呢，因为人家把烟灰都弹到便池里……”老张的表扬让我十分不好意思，所以，抓紧逃了出来。

其实呢，我租的虽然是平房，但也有洗手间，而且味道要好得多。我之所以喜欢到老张主理的那间公厕，怎么说呢，因为反正我可不敢在家里抽烟。☑

手写朋友圈

文 / 阿之
图 / 谢驭飞



高中时，文理分科突如其来，虽然仍在同一幢教学楼，可刚分班时真是见缝插针地找机会叙旧，以至于教过我们的老师路过时都会皱着眉头说：“怎么你们分班之后好像感情还变得更好了呢？”旧同学间的联系密切造就了流畅的传播渠道，后来我们班推出了一款“产品”，不知不觉地也在其他班级间流传开来。

某天早上，班级的讲台桌突然多了一本台历型的活页笔记本，制作者是我们的副班长，在校广播站的工作经历造就了她极强的策划能力和创新意识，笔记本的首页还有一份详细的使用说明书，目的是如果老师和同学有什么事情想说却不好意思当面说的，可以写在上面，每一页都有留言和批注的地方，方便互动与回复。

幸福如我们，并没什么苦难非得在上面倾诉，久而久之，开始有一些脑力过剩的同学在上面写小诗或说说笑话。当时最多人追的班花就曾在上面写过“人就像粉笔，越多人用你书写生命，你却消亡得更快”，于是乎全班都知道她正处于一场多角恋爱中；还有在上面贴大头贴合影和画四格漫画的，现在想想，其实这不就是“自拍+鸡汤和段子”的手写朋友圈吗？

因为课间叙旧聊天的习惯，“手写朋友圈”一传十十传百，许多班级都纷纷效仿。但不是每个班级都像我们那么老实，理科班就有男生从互相调侃演变成谩骂，又从谩骂演变成打架，也有

内心黑暗却性格软弱的人在上面匿名散播谣言，和今天的网络掐架无甚区别。社交媒体上的掐架，掐完之后就秒删，在手作时代，几乎每个班级的“手写朋友圈”都会有几页残缺不全的，据说残缺得最厉害的，残存的页码只有个位数，有种清空社交网络的即视感。

激化的矛盾导致各班的“手写朋友圈”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班的那本，已经是最晚退出的，而退出的理由，是学校不满我们原先的班主任太仁慈，导致我们班成绩下滑、纪律散漫而换了一位班主任。新班主任认为“手写朋友圈”上的那些匿名建议，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找借口。

“手写朋友圈”退出历史舞台后，我们变得没那么浮躁，和大部分要冲刺高考的学生一样，埋头于题海战术中直至毕业。尽管毕业之后有过几次同学聚会，但大家谈论的话题，不外乎择偶、择业，完全没人提到过那本“手写朋友圈”，哪怕是一次。我倒是和副班长聊过一次，对她的创意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惋惜它被大家遗忘，她只是淡淡地说：“岁月不够峥嵘，谁愿忆往昔？”然后就提前告别，说是要备考注册会计师。我突发奇想：如果我当时学《天方夜谭》，在“手写朋友圈”天天更新连载小说，让班主任读得欲罢不能，他会不会就会放它一条生路，而“手写朋友圈”也成为我的第一本书呢？

现实的诱惑

文 / 兔子洞

图 / 谢驭飞



《黑镜》第三季里凯莉·麦克唐纳的角色有一句话，她说我从没指望生活在未来，但是我现在却就已经处在未来了。

W想与迷恋《猜火车》的时代相比，自己也真的是身在未来的人了。然而未来意味着什么？可能当你真正身处其中的时候，就淡化甚至失去了对其的感知与判断能力。或者说任意一种情境，最具吸引力的状态，就是它还只是用无限可能性假定而不是真实存在的时候。W说自己念旧是因为懒惰，人生最远大的理想是不劳而获，但几乎没有可能；未来不可期的时候，只能加深自己对于曾经切实拥有和经历的一切的感情聊以自慰。

在整理物品准备搬离这个因工作需要而暂居的城市时，W终于丢下了那个多年未离身的笔记本。作为日常平淡、习惯在自己不能及的领域寻找生活慰藉的大多数之一，这个自中学时期开始使用的本子上记录的是那些自己无法触及的领域所发生的变革、前人对于世界的复杂多样的解读、突然跳进脑海的不同于主流思想的观点……王朔说，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W曾经执着于结识周边一切但凡和自己有一丝关联的人，消耗大把的时间精力去投其所好。旁观者只道她是在拓展人脉为己所用，不想等到终于有所回报，多数人放下戒心与W以朋友相称

的时候，她却再没有与人交涉的耐性，自此对其淡漠少语。

两年前初至这个城市的时候刚立夏，W经常下班后在街上漫无边际地游荡，钻入每个人烟稀少、狭窄凌乱的街巷里直到无路可走或是再穿行到另一条陌生的路上。不是想体会风土人情也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仅仅是需要在大脑放空的状态下，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快速消耗掉一天中剩余的时间。那几个月W习惯在工作结束后把手机锁在办公室里，整晚无言，日落而息。说不清自己是在抗拒，还是在期盼什么的到来。

后来W生日时朋友送了一只小乌龟，于是她决定每天早起去楼下草地上遛乌龟，为了避免同样早起的狗对它的不友善W只有起得更早，天不亮就带着乌龟下楼。然而这只可能不喜欢早起的乌龟不能理解W的一片苦心，没过几个星期就在她站着打瞌睡的间隙没了踪影。

在这个城市中孤身一人的W还是几乎每天都会翻翻笔记本，但越来越少去在上面做记录，事实上她也越来越少去关注那些离自己过于遥远的东西了，以往对于自己不熟知的一切所持有的认知欲望，渐渐被眼前似乎越来越繁复有趣的生活细节所淹没。所以，当W得知自己将回到过去的城市时，她想：是不是更应该去接受自己所处的未来了；或者，是不是向前看才会更加轻松呢。☑

声音厌倦症

文 / 七里游侠

图 / 谢驭飞



阿桑决定搬到江西乡下住的想法半年前就有了。她不算是个决断之人，自己酝酿半天，还是要找我们扯一扯。大家听了之后先是不信，继而嘲笑，最后夸她说，要给她做锦旗，上书“当代活陶渊明”。当然，夸她的这部分真假难辨，是在嘲笑还未结束时候说出来的。我们都觉得这只是阿桑丫头一时的怪想法，说来说去还不是想王军那头傻驴了。

“不是。”阿桑坚决地否定，为了让我们相信，差点拿把刀搁在自己脖子上。“我就是讨厌城里的喧闹，你们是不知道，我现在得了声音厌倦症，晚上睡觉都感觉窗外公路上的汽车要开到我床上了，失眠是早就有了，抑郁也差不多要过来了，我能不担心吗！”阿桑说得苦口婆心又冠冕堂皇。

“那为啥去江西？想去乡下到处都有，选条路直着走，俩小时指定让你到乡下。”我们挤对她。谁都知道她去江西是为了王军，自从半年前王军带着她去了一次江西老家，这姑娘就成了忠诚的江西歌颂者，山好水好人也好这都是其次，重要的是她说自己住在那晚上一觉到天亮。村里天一黑就寂静无声，当然有那些虫啊鸟啊的叫声，但谁能反驳这些叫声不是安静的一种呢？从乡下回来简直容光焕发，只不过在城里待了几天就又给打回了原形。

“不跟你们说了。”既然我们都反对，那么阿桑就有了自己的决断。阿桑虽然缺乏决断，但性

格执拗。就像当初我们劝她不要跟王军好一样，越劝她，他俩就越亲密，还专门跑到我们面前秀恩爱。气得大伙好好的一次聚众斗酒没个结果就做了鸟兽散。

阿桑真的收拾行囊去了江西。她老板加暗恋者吴哥哥找不到她，气得差点投靠精神病院，电话也吼到了我们这里，先是莫名其妙骂了一通，然后颤巍巍地说阿桑电话关机，也不知道身上钱够不够，会不会遇到危险。我们被骂之后又对他好言相劝，向他再次申明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阿桑是不会有事的。

一周后，阿桑就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怎么？没睡好？”我们打趣她。“没，那里太安静了，静得吓人，感觉地球完蛋了也不会知道，一闭眼就瞎想，还是在城里好，听着外面车来车往就感觉到这个世界真实存在，有种安全感。”阿桑笑着说。

太安静？那当初为啥睡得那么香？我们后来才得知，阿桑真的去了王军的家乡，在那住了两天，实在住不下去，晚上鸡鸣狗叫，整夜整夜睡不着。回到城里之后听了窗外的车响才又重新能安然入睡。声音厌倦症？还是困得轻吧！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裸眼 3D

VisionStation 是一个三维拟真显示系统 (3D immersive viewing system)，其显示器的视野达 160 度，能显示景深，1.5 米的最大尺寸可带来显示冲击。它让用户体验真实的三维感而无须佩戴繁重的眼镜，可用于军事模拟训练、教育、产品设计等各个领域。



氢燃料动力车

Horizon Fuel Cell Technologies 公司开发了一款世界上最小的氢燃料动力车 H-Racer，尺寸仅有 16 厘米 × 7 厘米。配套的太阳能氢气发生器可以为 H-Racer 提供燃料，一次性装载的氢气可使其在直线上行驶 100 米，整个过程无污染气体产生。所采用的氢气不仅普遍存在于大气之中，还可循环利用，便捷又环保。

轻柔性外骨骼

哈佛工程师康纳·沃什 (Conor Walsh) 的轻柔性外骨骼，可让中风患者重新行走，这一技术也被哈佛生物设计实验室应用到其他医疗领域，帮助帕金森症和脑瘫患者。沃什在洛杉矶被授予劳力士雄才伟略大奖 (Rolex award for enterprise)，他计划将这 10 万瑞郎的奖金投入软体机器人技术的研发。



旋转指环

华洛芙采用 18K 黄金打造以蝴蝶为主题的指环，外圈可旋转的设计用桃红色的冷珐琅烘托蝴蝶和花朵雕刻，工匠在内环镌刻了指环的中文名字——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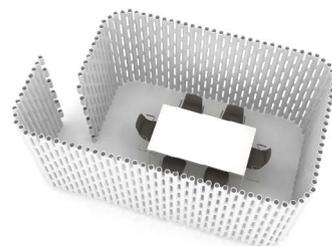


旋转音响

由 Speakercraft 出品的这款名为 Time Five 的旋转音箱，通过远程遥控即可实现任意方向旋转 15 度、30 度、45 度，充分享受超高音质带来的多角度音乐体验。

创意屏风

这款极具创意的室内屏风由 Pearson Lloyd 设计，搭建屏风使用的是外形酷似爆竹筒的模块化产品 Link。它由聚丙烯材料制成，是一种无味、无毒、耐热的材料。在灵活的工作环境中创造了私密性、协作和放松的空间。



拼贴刺绣

古驰 Ace 系列运动鞋的水晶及刺绣箭头图腾来自于创作总监亚力山卓·米开理的美学符号，以超现实主义手法展现创作理念。全新个性化 DIY 定制服务于北京 SKP 旗舰店首次亮相国内。



真空钛杯

日本设计师鹤本晶子设计的真空钛杯，经过处理的表面呈现多种色彩，真空夹层可以保持饮品的温度。虽然是金属杯，却充满了和风意趣。



条纹吊灯

菲利普·尼格罗设计的“条纹”吊灯，一系列具有间隙的金属环由激光切割，构成相互重叠的不锈钢灯罩，吊灯底座也是拉丝不锈钢材质。

芭蕾舞伶

梵克雅宝 Ballet Précieux 高级珠宝系列中的 Fée Dragée 胸针，以白金、黄金、钻石和蓝宝石等塑造了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糖梅仙子形象，仙子渐变蓝宝石镶嵌的舞裙与黄色蓝宝石腰带及皇冠形成对比。

钻石马赛克

帕玛强尼 Tonda 1950 Clarity 全钻腕表的设计着重突显钻石本身的美感，马赛克式的布局产生“视觉的陷阱”，整个表盘看起来似乎呈穹顶状。



圆形咖啡桌

Sakin 咖啡桌以金属材质表现出一种漂浮的轻盈感，两个不同尺寸的圆形桌面由内嵌的磁铁固定，需要时可以移动位置。

家庭宠物

Front 设计的 Anomaly 软垫凳，米色天然皮革和填充泡沫构成一个家庭宠物的形象，模糊的变形又让人产生略微不安的感觉。



艺术滑板

艺术家杰夫·昆斯 (Jeff Koons) 为纽约 The Skateroom 公司设计的“猴子火车”限量版滑板。滑板由 7 层加拿大枫树板制造，再以手工丝网印制图案，背面印有艺术家签名和限量版的编号。

民宿、乡愁与精神之根
到乡村去





贵州黎平地扞侗寨一户人家新居盖瓦仪式上，上百村民前来帮忙传递瓦片。这项工程并非真的需要这么多人，这种仪式感在村民心中似乎更为重要。



主笔 / 贾冬婷

如今投身乡村建设的人都戏称自己为“风口上的猪”——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这股风来自后工业化时代对乡土价值的重新寻找，或许会成为撬动乡村复兴的支点。

到农村去：反思现代性的“新乡村主义”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到农村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总结，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30年代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第二代，40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下乡

运动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第五代。与此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尽管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追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头，要回到20世纪初。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认为，自1850年始，东亚是“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而这一“世界”，是以西方和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作家梁鸿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接受这一世界史的过程中开始了对本国现代性的思考，“乡土中国”也是在此视野下诞生的。当中国和西方被置于同一空间时，“农业的、儒家的、专制的、技术落后的”中国自然落后于“工



(蔡小川 摄)

左图：徽州古村落黟县碧山村。城市中产阶层对于乡村“第三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

右图：碧山村民宿。要抹平城乡之间的鸿沟，民宿是一个支点

业的、宗教的、民主的、技术发达的”西方。于是，自鲁迅开始，“乡土中国”一直是愚昧、落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而它所拥有的“乡土文化特征、道德礼俗、儒家思想”则是停滞的根源。因此，在拥有了新思维的“五四”知识分子“现代化”的视野中，乡土中国始终是异质性的，是与工业文明二元对立的。社会学家王铭铭也认为，知识分子“乡村即为中国的缩影”的观念，其政治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至少可以说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起到关键影响的思想之一。而将传统中国预设为乡村，既可能使国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总是关注乡村，又可能使我们将乡村简单地当作现代社会的前身与“敌人”，使我们总是青睐于“乡村都市化”。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乡土”一直与“现代性”融合、排斥、纠缠，但也在逐渐深入的渗透过程中，它们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以此为起点，也可以反思为什么近百年来“到农村去”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又为什么每一次对于乡村的想象与构建都失效了。

20世纪30年代是“乡村建设运动”最为风起云

涌的时期，其中尤以梁漱溟为代表。他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的乡村建设道路，具体来说，是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他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带领一批青年开辟了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区。但在各地乡村实验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就有人放出了悲观的论调：“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这个不合时宜的人是社会学家吴景超，他在当时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争论中站在了梁漱溟的对立面：梁漱溟主张“农业立国”“从农业引发工业”，吴景超则主张“工业立国”，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应该优先工业化，“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显然，此后被纳入“现代化”路径中的乡村无奈

地服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加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向城市，延续了几代的“到农村去”运动也就此中断了。梁鸿指出，此前即使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批判”和“质疑”，乡土内部的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着一种均衡性和神圣化的意味，但在最近30年的经济驱动力下，整个乡村都被摧枯拉朽般地摧毁，这种摧毁不只是乡土中国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举摧毁了整个民族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老文明的创造力，中国乡村和传统文明所具有的容纳力和包容性，它对美的感受，它的宽阔，因为与政治、与天地之间复杂混合而产生的思想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被抛弃掉了。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张之后，再一次“到农村去”显得尤为迫切。而这轮乡村建设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抛弃以往对现代性的追求，形成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乡村主义”——重新思考乡土，思考农业文明，它们不再只是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是亟待被寻回的精神根源。

“第三空间”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是从传统村落研究开始，“被动地”投身乡建的。他从事了十几年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理论和测绘，最近几年却发现，迫在眉睫的已经不是理论问题了。“90年代，农村是在缓慢地衰败，很多村落还是比较完整的，研究可以不断深入。到了2000年以后，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田撂荒了没人种，‘空心化’严重，谁还会在乎古村落和老房子呢？眼看就都没了，能保一个算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乡村凋敝似乎是后发国家的一个魔咒。罗德胤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是一个成本不断摊薄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特大城市化。比如北京有2000多万人，摊在每个人头上的成本特别小，就能干大事，进而会聚拢更多的人。北京是这样，首尔、东京也是这样。唯独欧洲没走这条路，100万人以上的城市非常少，大多数城市维持在10万人左右，部分原因是欧洲大多是先发国家，获得了技术红利，人均产值高，从而可以投入高成本的基础设施，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小城市聚集的一大好处是乡村得以保留，因为相距不远，一个小城市可以辐射一片乡村。但是后发国家要追赶，只能发挥人口优势，发展大城

市。大城市周边一两百公里之外的农村就辐射不到了，乡村必然会衰败。“日本就是典型，人口95%都集中在以东京为主的大城市，只剩5%的农民，养活那么大片农村很困难。他们也尝试从城市抽出一部分资源给农村，但这是一个很窄的渠道。像越后妻有那样通过大地艺术节来激活乡村，只是一个标本，不可能有100个越后妻有。”

这一轮乡村建设的背景是中国“城市化”增速放缓。罗德胤说：“将近60%人口进入城市，意味着还剩下40%在农村。这对农村来说是好事，有很多人留下来，就能维持这个村子，不至于彻底衰败掉。但同时也是考验，那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怎么能保证他们基本的生活水平、医疗、教育？成本谁来付？”他说，政府每年都从整个大盘子里头切出来一块来扶贫，把底线慢慢地往上抬。但因为基数特别大，所以每抬一点点，负担都会特别重。剩下的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

当以市场的眼光重新审视乡村的时候，古村落和老房子被遮蔽的价值就开始显现出来。这也是罗德胤推动古村落保护的一个机遇。他发现，传统的静态保护思路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鸿沟，就是村民的观念问题——人人都想盖新房子，不愿意住老房子。“保护是一套机制，你想保护，但是政府不给钱，保不了；村民不支持，也保不了。不把整个产业链打通，是保不成的。努力把力呼吁呼吁，让政府拿出一笔钱把房子修好，有可能做到。但之后如果没人住，没人维护，怎么办呢？政府只好再掏一笔钱，请个管理员看门，再请个清洁工搞保洁，时不时还得修修，哪儿漏雨了，哪儿掉瓦了，就成一个负担了。这种负担一多的时候，政府就管不了，就干脆不管了。”

他认为，某种程度上，2005年开始大面积铺开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让保护失效的助推器。“‘新农村建设’在客观上消耗了城市过剩的产能，也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但问题是到了执行层面，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刀切’地建新房子。村民为了拿政策补贴，各处凑钱，把老房子拆了，改成新房子。这个杠杆撬动作用是特别强大的，原本是慢慢加速的变化过程，在这之后突然提速。比如说这个村子一共100个老房子，不干预的情况下，村民每年拆5个，可能20年拆完，但是‘新农村建设’补贴拆房子，一平方米补贴200块钱，那一年就全拆光了。”怎么办呢？罗德胤选择了“先给利益，再转观念”：“要想让村民把资金流向修老房子，只有一个方法——让古村和老房子能挣更多的钱。”

今年6月，我曾去河南省新县西河村采访，惊讶



(蔡小川 摄)

碧山村街道。在后工业化时代，乡村是亟待被寻回的精神根源

于这个位于大别山深处的小村庄因罗德胤推动的乡村改造吸引来络绎不绝的游人，很多人从信阳、武汉等周边城市开车两三个小时赶来。其实西河的资源禀赋并不突出，但罗德胤看中了这里典型的河道景观——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沿河有古树，有祠堂，还有明清时代的古民居群——与城市生活有沟通。看上去，他所做的也很简单，只是把河道景观整理出来，沿岸的一些老房子做了改建，又找来老同学何崑把原来的村粮库改成博物馆，但切中了目前的一个巨大需求——城市中产阶级对乡村“第三空间”的需求。

罗德胤说，工业化、城市化伴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人对于暂时逃离到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乡村显然是更贴近自然的，更贴近人文的，更贴近情感的，而且可以彻底摆脱绑定其精神的物质空间。他告诉我，这样的“第三空间”，其实是要在乡村里找到与城市生活的结合点。对所在距离也有要求，大城市出发3个小时以内是刚需。不过中国大城市很多，在每个大城市周围都画一个3小时半径，就基本上把整个中国都包括进去了，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的。谁能够认识到这种市场需求，将乡

村打造成第三空间，谁就能抢先一步。他认为，乡村只有在后工业社会里找到与现代人生活的联系，先存活下来，才能回头去寻找农业文明的精神价值。

民宿：乡村建设支点

早在这一轮乡村“第三空间”需求发酵之前，杭州周边的莫干山一带已经自成气候。他们回应这一需求的方式很直接，就是做“民宿”。所谓民宿，其实是长期租下村民的房子，改建成符合理想乡村想象的小型度假酒店。实际上，民宿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来自上海等附近大城市，只是把这种“第三空间”产品放在了乡村。而一两千元一晚的价格，也堪比大城市的五星级酒店标准。

莫干山周边的乡村也呈现出一种非城非乡的景象：沿途被几百家民宿占据，村民们纷纷出租多余的住房，或者自己按“民宿”的审美翻版一个。一到周末，莫干山上就人满为患，名气大的民宿更是一房难求。这两年，“莫干山”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向外输出，民宿变成各地乡建的“标配”。

前两天，莫干山民宿联盟发起人、东联设计集团首席设计师朱胜萱的朋友圈被“如家小镇”刷屏。经济酒店连锁品牌如家，也宣布要打造乡村旅游度假区，很多人担心非标准化的中小型民宿火不了多久了，朱胜萱不以为然：“只有毫无操作经验的人才会觉得民宿是巨大的金矿。请问研究过财务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吗？研究过季节性落差带来的难题吗？研究过相关产业巨头进入的可能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可能看到一线希望。否则，即便是巨无霸，也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要么不过是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来。”

朱胜萱认为，真正的大资本还没有进入到乡村。“大家都说警惕‘资本下乡’或‘资本进村’，我认为应该是鼓励它们。我特别想把土豪的钱狠狠砸向农村，但这几年还没见哪个上市公司花几十个亿丢到乡村，也没见哪个地产商开始真正转型做乡村的事情。”

乡建的概念如火如荼，但是真正进入的人还是小众——设计师、学者、文化人，大多是凭“情怀”做事。“乡村需要情怀，但是单凭情怀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转化为商业模式。”朱胜萱说，从商业的视角看，乡村还没有打通资本的通道。“乡村里面的资产——集体用地、农地、宅基地，哪个东西可以进入资本市场？一直到今天，城市跟农村真正的壁垒不是别的，就是所谓价值兑换的可能性。农地不值钱么？肯定值钱，但是能交易么？都说使用权可以拿来，中央也推出‘三权分立经营权’，但是‘三权分立’可以抵押么？可以贷款么？这些不明确，‘三权分立’还是空的。没有打通资本通道，就没有人来。”

莫干山为什么能做出来？朱胜萱说，最关键的，就是莫干山房屋的使用权已经跟资本市场打通了。“从最开始的一年2万块钱租金，到现在的5万块钱，市场上认可。不管银行认不认，反正投资人认，就能够如火如荼地做起来。价值出来了，老百姓收入自然会提高，资本自然就愿意进来。”

朱胜萱说，现在做乡村建设，其实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把乡村的价值做出来，以实现二次转换。“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是从底层到顶层的。乐观地看，或许过5年，能够把集体用地和宅基地银行抵押贷款的通道打通，那就是往前迈了一小步。再迈一大步，就是可以像商业用地一样，进行正常交易，城乡互动和流通就达成了。”

从大的方面说，目前城乡之间的通道都是断裂的，资金、人才、消费，甚至生态的通道都是断的。朱胜萱说，政府从顶层当然看到了这种断裂，也在用各种战略抹平鸿沟。但是无论是新型城镇化、供给侧改革、美丽乡村，

战略上都没问题，战术上出了问题。“用原有的组织机构、原有的推进方法来进入乡村，是不可行的。就相当于在城市里是阵地战，到了农村就是游击战，能用阵地战的方法去做农村吗？比如‘城镇化’这个词，大家的惯性思维就是要修路、做园区、盖写字楼，所以就让规划院先来做一个规划，改一改土地性质，修一修道路，开始建楼。其实，城镇化的内核是怎么进行产业升级，怎么解决教育、医疗、环境、资源节约的问题。”

当然，要抹平城乡之间的鸿沟，民宿只是一个支点。“如果用政府的语言，它是一个‘抓手’。要做乡建，农业、旅游、文化创意、民宿都是最具象的东西，它有形状。拿几间农民房改成酒店，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停留的空间，解决就业，改变乡村的风貌。”

莫干山当然是一个特例，它也是民宿的一个标杆。朱胜萱说：“凭情怀来做乡村复兴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人是冲着商业模式去做的。莫干山活下去了，大家看那么老的房子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入住率，能卖到每晚一千八，才会觉得乡村的事情可以做。而且，在乡村里做小型的、个性的、体验性的、注重生态的民宿，把原生态文化保护住了，也是值得推动的。现在很多人都在观望中。有人等着看，这阵风吹过了，你们这些猪就会掉在地上摔死了。而一旦你成功了，大批的人和资金就会涌进来，推动乡建领域的变革。”

深入与扎根：失败是不算数的

左靖在3年前做了一个乡村建设地图，把各地的乡建实践做了简单的梳理，这些实践在形式、背景、方法上都各有侧重，比如他和欧宁在碧山做的是“文艺乡建”，还有的做农村金融，有的做社区营造。不过，进入他的视野范围的，有一个基本标准，他认为：“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乡村服务，为村民服务。到底是解决城市人的‘乡愁’，还是解决村里人的‘乡愁’，我觉得这是一个分野。”

不过有的时候，这条界限也很难划得那么清晰。比如对于民宿这种商业力量的介入，他的态度就有些矛盾。“如果是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把原住民迁走，然后做一些开发，客人住一晚，付完账就走了，这不是有主人居住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宿’，跟这个乡村也是没有多少交集的。”他承认，商业介入从客观上是可以带来多赢的。“对于村落来说，利用政府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让老房子重新焕发新生；对于村民来说，得到一定的租金补偿；对于城市人来说，找到一个寄托乡愁的地方；对于经营者来说，获得一定的

经营收入,或者一种生活方式。只是,这块利益的蛋糕,村民能分多少呢?恐怕不是大头。村民被排斥在经营之外,主体性丧失了。”

有意味的是,左靖中学时期一起写诗的几个同学老师,30多年的老朋友,这几年都开始投身乡村。他最早动了去乡村的念头,就是因为偶然去到中学老师郑小光夫妇改造的徽州老宅做客,让他怀念起在皖南的少年时代,于是2011年和当年的诗友欧宁一起去了碧山。而在浙江莫干山第一个开民宿的夏雨清,也是他的诗友之一。几个人将80年代写诗的那种理想主义延续到乡村,路径却不大一样,郑小光和寒玉夫妇的猪栏酒吧是做乡村客栈,夏雨清的颐园是从自住转了民宿,而左靖和欧宁则在碧山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文艺乡建”实验。

但是,左靖、欧宁那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式的乡村想象,在碧山屡屡遭遇村民的利益诉求和乡村的粗粝现实,几年过去,很多设想都停摆了。左靖如今更愿意自省:“‘文艺乡建’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排斥商业,其实还是有种知识分子的洁癖。碧山村民对于附近西递、宏村的商业开发模式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这点我们之前考虑得不是很充分。现在想想,其实任何东西想要持续的话,都必须要有商业的介入。只要不是那种为了短期利益的掠夺性破坏,良性的商业是可以反哺村民的。”

左靖并没有放弃碧山。他从2011年开始做的歙县百工调研仍在继续,他希望将其作为乡村公共文化价值的激活点,目前一位投资人王勇愿意把承载这个产业的“工销社”在碧山做起来,方向也更务实了。“其实是民宿+百工,我们要植入文化的内容,但要用民宿来养活自己。”

他把最近在贵州茅贡镇的实践看作碧山的一个升级版。左靖告诉我,这其实不是一个“乡村计划”,而是“乡镇计划”。位于黔东南的茅贡镇有15个行政村,有10个是传统村落,是国家级传统村落最密集的一个地区。但是这个镇没有任何特点,大都是新建筑,也没有农耕场景,乱糟糟的,但他们就要跟政府合作,把镇做成一个大家都想去的地方,做成抵挡不良资本入侵村落的屏障。左靖看重当地的文化价值,包括一个已经在村里存活12年的生态博物馆,但与碧山不同的是,他不再排斥商业。“我规避了当初犯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幼稚病’。怎么更加务实,怎么跟当地发生关系,贵州是一个起点。”

商业作为手段,但乡村最终要实现的还是文化重建。有些地方已经在这一点上有了主体意识,比如浙江

松阳。左靖告诉我,松阳县政府提的口号就是“文化引领乡村建设”,找了一批建筑师和文化人去参与,包括罗德胤、朱胜萱、夏雨清、黄永松、马可和他本人,不只停留在盖房子上,而是把松阳各个乡镇的特色挖掘出来。比如当地一个客家村石仓,是康熙年间从福建长汀搬过来的,这几年在村里发现了大量的契约文书,于是找建筑师徐甜甜设计了石仓契约博物馆,想找左靖来运营。“怎么运营呢?也是‘民宿+’模式。这个契约博物馆边上有些农民房,政府征收过来要改造成民宿。我正在跟政府谈,希望用民宿经营所得的钱,来给博物馆输血,一年完成两个展览、两场研讨会、两个活动。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民宿,而是有文化内容了。”

乡村文化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村民的主体性和参与度也是。某种程度上这是个“政治正确”的说法,其实要靠潜移默化,总会有影响。左靖举例:“比如我们在碧山的经验,第一年我们叫村民搬一个桌子,村民要收我们10块钱。第二年我们做百工展的时候,村民主动把自己家的东西拿给我们,让我们去展览。这些变化都在慢慢地呈现出来。关键看你到这个地方来,是捞一把就走,还是真正为村民做事。”

左靖理想中的乡建模式,是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他认为,艺术节对于激活当地的文化,带动当地的产业,都有相当大的作用。“越后妻有已经做了十几年,我们民宿热的兴起也就几年的时间。乡村复兴不要指望立竿见影,必须放在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段来看。”

他又想起自己的安徽同乡,那个已经被遗忘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的论断。“如吴景超所预言,中国后来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而且一条路走到黑,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左靖说,如果让他来想象一个理想乡村图景的话,应该是“农耕文明为体,工业文明为用”。工业化是挡不住的,但要谨慎而克制地利用工业文明的成果。

具体到这一代人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否仍会重蹈先行者的覆辙?在城乡关系依旧紧张的今天,乡村建设在一边倒的利益诉求下究竟还有多少改良的空间?左靖也没有答案。但他认为,这一代人要做事,要发声,而且要做深入式、扎根式地投身乡村的准备。他还记得4年前,台湾宜兰的田中央建筑事务所创始人黄声远在展示他们的乡建成果时所说的话:“今天之所以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成果,是因为我们坚持了18年。刚开始几年我们的经验全都是失败。而只要坚持下去,失败是不算数的。”

(实习记者向文虎、刘梦秋对本文亦有贡献)



雪中的郝堂村更有一种原汁原味的乡愁。郝堂村距离河南省信阳市区 20 公里，曾经是一座“即将消失的村庄”

郝堂：一座乡村的“非主流”复兴

主笔 / 徐菁菁 摄影 © 黄宇





从“即将消失的村庄”，到跻身全国第一批美丽乡村，郝堂的复兴是一场政府、社会力量和村民三方协作，重寻乡村价值的系统工程。

盛名之下

到郝堂的第三天，村里落下鹅毛大雪时，我正要从三号院出来。三号院是三间土房，由从郑州搬来村里的董先生一家租下，既自住，也辟作茶社。我站在土屋的屋檐下出神。院子里有一排疏竹，一张石桌，几盘石凳。院子的木门敞开着，旧木头粗粝的质感在飞雪中影影绰绰。门檐上的积雪眼见厚起来。门边还有秀颀的两棵树，一株腊梅，一株枇杷，叶子依旧绿着，

也一并没有在雪里。我心里冒出句古诗：“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不大恰当，味道却也贴切。

选择来郝堂，是因为画家孙君。孙君是安徽人，当过兵，做过采石化肥厂的烧炉工，从事过12年的美术教育。1999年，他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入了乡建的门，2003年，干脆创建了自己的非政府组织(NGO)“北京绿十字”。2011到2013年，孙君给郝堂村做了规划设计，他说郝堂是自己做的第一个系统性的项目，也是10余年乡村建设经验的收官之作，“值得一看”。

这些年，艺术家和文化人下乡做乡建是股潮流，我想看看郝堂有什么不一样。初来乍到的第一天，一种感受已经很明显：艺术家和文化人做乡建大多选在两种地方，一者有奇山奇水，像莫干山的一些村庄本身就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二者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左图：郝堂三号院是改造中“抢救”下来的土坯房

右图：做了四十余年郝堂村干部的胡静（右）和村民寒暄

比如安徽碧山，“山高田广，阡陌如绣，白墙黑瓦，鳞次栉比”，村庄里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和祠堂就有百余座。

郝堂并无这样的资源禀赋。村子坐落在大别山的怀抱里，2004年才有“村村通”，几乎是个被遗忘的村落。村里小山包毫不奇峻，一条小河从村里流过，也不显妩媚。孙君给郝堂做规划时，设计了上百亩荷塘，盛夏莲叶田田，算是村庄最重要的景观。村里的建筑，除了公共设施，无论餐馆、客栈，几乎都是村民自家的宅院。不过细细看来，郝堂下了功夫。村庄的面貌和谐规整，蜿蜒的石板路、质朴的石桥、一水的清水墙、整齐的小布瓦，传统样式的狗头门楼马头墙。荷塘凝霜、柴门犬吠，郝堂有一派令人舒展自在的乡野气息。

这“乡野气息”来得并不容易。从北京坐高铁4个小时能到信阳市。信阳市是河南省的农业大市，全市近800万人口中农村人口有540万，人均耕地仅1.2亩。郝堂村隶属信阳市平桥区，距离市中心只有20公里。全村2000出头的人口，村域面积虽有20平方公里之广，耕地面积摊到人头只有0.9亩。传统上，

郝堂人靠山吃山，山上有茶树，产清明一季的毛尖，还有板栗。不过，郝堂还是穷。2009年，郝堂村人均年收入不到4000元，低于全国水平20%，其中打工收入占70%，全村一半劳力外出务工。

郝堂协作者中心主管姜佳佳2008年在平桥区邢集镇邢集村做大学生村官，郝堂启动建设后，她被抽调到郝堂来，任务之一就是记录整个建设过程。2011年3月，姜佳佳对郝堂的第一印象就是“荒凉”。“路边杂草丛生，啥也没有。”姜佳佳老家在南阳农村，尽管老家村里也有破败的房屋，但由于大家聚居在一起，村庄整体上是比较规整的。而郝堂地处豫南，村庄的格局是散居，“一个土坯房破败之后，感觉就是荒无人烟”。

在村民张厚健家，郝堂的过去给了我直观的冲击。张家是孙君改造的第一栋民居，被称为“郝堂一号院”。现在的一号院正面是栋两层小楼，清水墙、木花窗、青瓦拼接的装饰花格，右手边是一溜整齐的白墙瓦房。院子没有围墙，以砖铺地，栽种竹子、芭蕉。外院的一角还有个不规则形状的小水池。驳岸是用山石堆砌成的，水池中有水生植物，水里还游弋着几尾



(王思华 摄)

金灿灿的鱼。

老张一直把孙君手绘的设计图纸和家里过去的照片一道挂在屋里。站在房子的旧照前，他眉梢掩不住得意：“那是不能比。”照片上的家是两层平顶的砖房——你能在全国各地农村看到许多这样的房子：铝合金蓝色玻璃窗，外墙贴满长方形的白色瓷砖。院子用红砖砌了高高的围墙，院门更高，同样贴满了白瓷砖。这个家是老张1997年建的，算是村里最早一代的新房子。2011年，村里动员村民进行房屋改造时，老张并不积极，原因很简单：“我这房子在村里已经算是好房子了。”

62岁的胡静在郝堂改造时是村长（当地人仍习惯将村主任称作村长），她说郝堂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老张也有同感。这倒不完全是因为穷。张厚健记得很清楚，1997年左右，政府搞农村经济普查，他负责统计了村里的8个村民组。“你不统计倒不觉得，一统计吓一跳。我们村2200人，每年在外面打工的接近800人，800人里只要600人纯收入达到1万元，那郝堂村就有600万。你想不到有几十万跑

到郝堂来了。从收入上讲，那肯定是比以前好。”但村庄的破败却似乎刹不住车，原因也简单。“你在外面的收入，不会顾及到村里来，山上的树，村里的房，人们不考虑，他的生活和村里没关系了。你比方说，垃圾确实不像样子，各家只管自己的眉毛眼睛，外面打工回来的人，随手在村里扔垃圾，他是不讲究的。”

多年来，张厚健手底下带着十几号人做室内外的装修工程，这是家里的主要生计。不同的是，他的生活依然在村里。他在平桥区城里也买了房，但从不去住。“老农民的习惯”，只要离家不超过50公里，不回家就睡不着觉。同样因为是“老农民的习惯”，老张有次从外面回家，一拐弯走到离家500米的地方，看到田里都长了草，心里咯噔一下“不舒服”了。张厚健所在的窑湾组，那时候135个人，“实际在家的都是老弱病残，连一半的人都没有，有的甚至举家都迁到外面去了”。

张厚健一口气把村组里荒下的30亩地都拾掇起来，买了犁田机、打稻机，“基本上是全套设备”。他



2



3

1. 画家孙君从事乡村建设十余年，他把郝堂称作自己的收官之作

2.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

3. 河南信阳平桥区明港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禹明善

决心再试试，看看在村里到底能不能过活。他心里盘算：“水稻的生长周期一百来天，如果一年能赚万把块钱就做得下去。”“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人累得不行，还要请人帮忙。最多一年打过将近3万斤水稻。可那时候，稻子才卖7毛钱一斤。到年底一算账，啥也没落到。”搞了3年，老张断了念想，2010年开始，家里的5亩地也撂荒了。

2013年，郝堂改造收尾时，村里80%的年轻人已经重新回到村庄。“在外面买房的一半都回来住了。”原因说简单也简单：村子漂亮了，外面来的人就多了。2012年初，张厚健的房子改造完，乡里五里店办事处书记提示他，家里可以备下点鸡鸭鱼肉豆腐粉条，外面人来郝堂，中午没地方吃饭，也是一笔生意。老张最开始只辟了平房的一间屋子做餐厅，后来一间不够了，又清出一间。一开始一间摆两桌，后来变四桌，还是坐不下。2012年底，他把厨房挪了地方，又扩张了空间。他这个曾经“连饭都不会做”的人，变成了“做饭给别人吃”的大厨，那两年，他在家里就赚十万八万的，占家庭收入的60%~70%，“顾不得再去

外面搞装修了”。

2013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第一批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总共12个，曾经的贫困村郝堂赫然在列。刚刚大专毕业，在村里协作者中心上班的朱凯向我感慨了两回：“我在信阳上初中的时候，从没人听说过郝堂，上高中的时候，也没人听说郝堂，等我到上大学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一下子都知道郝堂了。”去年，有70万城里人跑到郝堂来旅游。

如今的郝堂盛名在外。在村里溜达的这几天，我在村图书馆碰上了带人来考察的乡干部，在村礼堂围观了省广播台巨大的直播车。冬季里显得有些萧索的村庄一点儿也不平静。

“现在都说郝堂是画家画出来的村庄，但孙君老师来我们这儿的时候，他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画家，他是一个乡建者。”姜佳佳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省广播台正在拜访她，想请她上节目谈谈郝堂的经验。姜佳佳和他们聊完，转身向我抛出了问题：“郝堂好在哪儿？郝堂的价值是什么？郝堂的好就是房子建得漂亮吗？”



航拍郝堂村(局部),可见大片荷塘

激活

2011年,孙君和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联合发起建立了中国乡建院。乡建院就在郝堂村委会边上租下了一块地,孙君用从各地搜集来的旧木料和旧砖头设计了一栋漂亮的两层总部楼,在二楼的阳台上就能欣赏到开阔的荷塘。每个月,乡建院要举行一次交流论坛,身为院长的李昌平总要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为此,我得以在郝堂和他见了面。

李昌平和郝堂的渊源比孙君更早。事实上,2010年,孙君尚在湖北宜昌枝江县的问安镇做示范村镇建设,这年秋天,问安镇项目做旅游推广活动,孙君邀请李昌平去剪彩,提出希望李昌平在问安镇推广他提倡的内置金融。谁料李昌平反客为主,他“忽悠”孙君:“你花10年建成堰河村,在郝堂搞两年就会超过堰河村。”堰河村在湖北襄樊市谷城县五山镇,2003年起,孙君在当地以环境治理为切入点带动生态经济,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李昌平对孙君夸下海口,是因为他已经在郝堂做了两年内置金融实验,沉睡的郝堂已被“激活”。

李昌平回郝堂的这天,平桥区明港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禹明善也来村子见他。2009年,禹明善是平桥区科技局长和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是郝堂建设的直接推手之一。

“平桥政府当时组织了一个讲座叫作现代思想论坛,请各种专家来讲,好听听学界对三农问题最前沿的看法。”禹明善说。2009年8月,李昌平到平桥区党校的讲课题目是《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他提出,要在村社内部建立合作互助性质的金融,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后,小农的承包地、村社集体成员权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农民手上就有活钱,村庄就可能发展。

禹明善告诉我,当时平桥政府正在苦恼于乡村的逐渐凋敝和瓦解,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政府主导的农

村发展，无论是发动农民进行生产合作，引导农民从事各种养殖种植活动，还是组织消费合作，设立供销社，都没有产生效果，一个新的思路是培养村庄的自我造血机制。

当时，信阳及平桥区是河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区最主要的课题之一是土地重新确权后发给农民承包地70年的产权证，规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解决农村自我发展中缺钱的问题。但试验的顶层设计者没有预料到，银行实际上并不接受农民的土地产权证抵押贷款。于是，李昌平的观点让时任平桥区长王继军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下决心做个试验，第二天，禹明善就带着李昌平下乡选点去了。

最后去的一个村就是郝堂。按禹明善的说法，选郝堂就是因为它的一个特点：“村支两委（指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两个机构）班子的人靠谱本分。”“中国的农村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政府用权力来影响资本，影响项目，结果基层干部大都习惯于等靠要。”禹明善说，“郝堂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这么多年没有得到过什么政策项目的支持，也没有建过面子工程，民风相对淳朴，能把钱当钱。”

禹明善记得，他和李昌平转到郝堂时，村长胡静就坐村委会门口打瞌睡。禹明善叫她起来：“李老师来了，知道李老师是谁吗？就是当年给总理写信的人。”胡静说：“我知道，你这封信把全中国农民的农业税费都免了，你是个功臣。”

李昌平的到来让胡静有些意外，但她并没有抱什么期望。1977年，胡静嫁到郝堂，不久就开始在村支两委工作。干了几十年，她觉得越干越没劲：“70年代大集体时期，没有穷富之分，好在孤寡老人有人管，孩子也有人管；80年代以后，分田到户，集体经济垮了，人心都散了。虽然大家出去打工赚了点钱，但是离乡背井，也不富裕，村子里面看着就凄凉。”

李昌平问胡静：“你想救活你的村庄，你缺啥？”“我说：‘缺钱呗！’”李老师说：“这是人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胡静忆及当初乐不可支，“当时我们两个说话说不到一块儿，他说人的问题，我就说钱的问题，我就是没钱啊！”胡静也直率，她向李昌平和禹明善摊牌：“谈啥聊谈，这个村庄就这样了，我也该回去了，不想干了，没啥干头。”

李昌平问她：“我看你身体还好，你村庄里老人那么可怜，孩子那么可怜，你就不想为他们做点事？”“想啊，可我无能为力啊，我做不了啊。”胡静

回答。她记得和李昌平自嘲：村干部只会干两件事——“不是要钱就是要命”“要钱三提五统（指向农民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等各种款项），要命计划生育。”李昌平听完“笑得不行”。

但李昌平的话还是戳中了胡静的心事，她放不下村子里的老人。当时，郝堂村常有老人因病怕连累儿女而自杀的惨剧发生。胡静特别记得一个老党员：“1977年我刚嫁过来的时候就是队长，我们一块儿干了那么多年工作。零几年，他老了，生病，上吊死了。哎呀，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我觉得太凄凉。”

李昌平告诉胡静，他愿意帮助胡静实现“为老人做点事”的愿望。他提出，由他带5万元种子资金、政府提供15万元种子资金，村里老人以2000元入社，组建一个养老资金合作社。合作社的钱由老人给年轻人发放贷款，“利息收入敬老人”。他同时给胡静提了一个条件，希望本村包括胡静在内，要有5~7个乡贤每人出资2万元，3年不要利息，胡静找好了人，他就来村里帮助筹建养老资金互助社。

从养老合作社开始做内置金融，盘活农村资产，是李昌平农村工作多年的经验所得。“第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里是百善孝为先，从孝入手可以四两拨千斤。”他向我解释，“第二个，政府出点钱，乡贤出点钱，老人自己出点钱，筹钱相对简单。而且乡贤在村里总归有点面子，容易动员起来，也为合作社积累了社会资本。再有一个，合作社的受益者是老人。在乡村社会，乡贤为老人做好事，其他人不可能拉下脸来借钱不还。”

令李昌平意想不到的，他离开郝堂仅4天，胡静就给他打电话，说找到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7个乡贤，14万元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了。

李昌平走后，胡静下了决心，她的目的很简单：一是给老人发点钱，二是挽回一下村干部多年来的颜面。胡静给村里在外面打工、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几个人打电话。村长的头衔虽然没什么威望，但作为村民的胡静人缘不错。每年过年，胡静都请这些人到家里吃饭，“有的人见我我就喊二嫂，还有的干脆喊哥们儿”。电话里，她只说自己要借钱。“你要是以村委名义去借，村委穷得要命，你一个钱也借不来。”“我说：兄弟们，借我点钱吧，我想给村里老人们干点事，你们都献点爱心。”胡静回忆，“有些人害怕这些钱被我弄丢了。我就说：‘我们家在平桥市区买有房子，要是我把你们这两万块钱弄丢了，我把房子卖了还给你。’”

李昌平赶到郝堂村，胡静催促他尽快让合作社开

业。李昌平告诉她，急不来，还得先制定资金互助社章程、召开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登记。胡静问：制定章程需要多长时间？李昌平估计要30多个小时。胡静吓了一跳。满山的板栗都没有人采摘，她怎么把大伙召集起来开30多个小时的会？胡静要求李昌平做一套现成的章程给她。“李老师说：‘这不行，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要操心，你还不知道农民么，农民自己弄的东西他们承认，你给他安排的东西他就不接受。’我想也是，这么多年，只要农民签字同意的东西，都会照办。”胡静挨个给在外面打工的乡贤打电话，硬是把他们全叫了回来。

乡贤、村组干部、老人代表，禹明善、李昌平以及信阳市委主要领导的秘书在村委会二楼吃了两天的盒饭，夜以继日“吵”出来了一个章程。章程草案打印出来，参与者人手一份，休息一晚上，想想清楚，次日早上在章程原稿上签字画押盖手印。参与者再拿着章程去发动社员。

2009年10月中旬，郝堂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正式开业，开业时的资金总额是34万元，其中政府10万元，李昌平拿出课题费5万元，乡贤14万元，15个老人社员3万元，村集体2万元。我到郝堂的时候，夕阳红资金的总量是两百七八十万，全村有大约260个老人入社。根据章程，村民找两个老人担保，拿林权证做抵押，一次最多能贷款10万元，当天钱能到手。贷款月息一分三，年息一分五厘六，最长一年连本带息要还完。胡静告诉我，夕阳红的账上除了风险基金没有多余的钱，除了风险基金，有钱就贷得出去，迄今为止，从未出现过欠账不还的情况。

机遇

在李昌平的叙述里，夕阳红为郝堂的乡建提供了契机。腊月二十三的小年是养老资金互助社结算分配的日子。分红的时候，平桥的一位副区长吴本玉边给老人发红包边感动得直哭。李昌平后来回忆，分红会议结束后，吴本玉突然问，可不可以就在这个村搞新农村建设。李昌平跟吴本玉说：“你慎重地跟王继军同志（时任平桥区长）商量商量，如果你们决定了，我和明善找人一起来干。”他强调了一点，他找人做的新农村建设可能跟河南省里推行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小村并大村、迁村腾地、大拆大建、集中上楼、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的做法不一样，市区领导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李昌平要找的人就是孙君。事实上，平桥区观察孙君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2010年初，禹明善就拉着胡静去成都参加了绿十字的年会。为了打消胡静耽误过年的顾虑，禹明善还让胡静第一次坐了飞机。那个时候，孙君已经提出了自己明确的乡建主张：“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他反对对农村进行盲目的城市化建设，强调以村民为核心，修复乡村的文化和礼俗，使村民实现安居乐业。禹明善告诉我，区委书记王继军在平桥的工作一直围绕一个主线来做，就是社会建设。当时在区委班子看来，农村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传统社会和乡村文明的崩溃。显然，孙君的理念与之颇有契合之处。

孙君告诉我，平桥区政府接触他前后应该有3年时间，而真正让他下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胡静。“一个项目，村干部的决心和态度、威信和手段，70%决定着项目是否能成功。”孙君看胡静，一有情怀，不甘心，愿意在村子里干些事，二有手腕，够泼辣，有“匪气”，驾驭得了村庄。

孙君到郝堂走了一圈，“像老中医望闻问切”，他心里有了底。他注意到，郝堂的大树基本都保留下来了。“这在农村当中不常见了，许多地方，村民为了卖个高价将树砍下或是挖走卖掉。”孙君认为树的保留说明两点：一是村庄的民风依然质朴，保留了传统上对大树的敬畏之心，二是村里的领导能够制止农民无意识地砍树。孙君留意到，郝堂虽然破败，但并没有农村普遍存在的严重的乱搭乱建，道路也畅通，这说明在村庄的规划和自治管理上，村干部有绝对的权力。他还发现，“中国农村的村委会一般都比农民家更穷”，但郝堂村委会的账目上还留有几十万存款，“说明村委会是过日子的人”。胡静告诉我那是2004年一个发电厂在村里建煤灰处理池占地赔的一笔钱，一直都没有花掉。最后，孙君给胡静出了道测试题：“我正好要召集开会。她当时一个通知下去，半个小时不到，村里主要的干部和村民代表都来了。”

走之前，孙君给胡静留了作业，要她3个月内解决郝堂的垃圾问题，每家每户发两个桶，实现垃圾分类，搞好了，他就回来给郝堂做规划。

那个时候，胡静对孙君要怎么建乡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她看中的是一点，孙君的建设不搞招商引资，不会让资本买下村庄。“我当时承诺老百姓的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每家每户都当老板，不再出去给人家打工，不再低三下四地给别人干活。”

胡静召集村支两委开会，有人提议，清垃圾工作



郝堂协作者中心主管姜佳佳见证了郝堂的裂变

量这么大，不如找老百姓收点钱。胡静不同意：“农民你收他一分钱，他就会觉得你必须把这个事情弄好，责任在你。”她提出：“号召全民动手，房前屋后，屋里屋外自己做。集体的地方，村民组长组织大家一起做。公共的地方，我们几个村干部做。”在村民大会上，胡静“把搞垃圾分类的事情给老百姓一说，大家都跟听天书一样，说这个村庄都这样了，你吹啥吹？你还能自豪？”这个时候，夕阳红合作社救了胡静。“有些老人是向着我的。他们说，胡静是想做事的，这些年给咱们发的钱总是真的吧。我们就听她一回呗。这些老人来做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实际上，胡静在做垃圾整理的时候，孙君已经决心在郝堂做项目了，他只是在等一点。2011年4月份，王继军就任平桥区书记，孙君“第二天就签了合同”。孙君不但要给村干部打分，也要给区干部打分。他的原则是：一般政府来找他做乡建，对方至少邀请三次才会同意：第一次，政府可能只是一时兴起；第二次证明对方真有想做的愿望；第三次才能确定对方有足够的诚意，不是赶政绩工程。平桥区和孙君接触了多

年，但孙君还有一点不确定：万一主要领导在项目期间调走了怎么办？

村民、村干部、上级领导，缺一不可，这是孙君最重要的经验。他很坦率，乡建十余年，成功项目少，失败的项目多。正是这些失败让他积累了宝贵的教训。

1999年，非政府组织地球村在北京延庆碓白石村建立了生态教育基地，开始生态保护、环境教育、农户环保、民俗旅游一体的乡村建设实验。孙君是实验的负责人，那也是他第一次与农民打交道。

那时候，他绕开了村干部，直接指导农民。“觉得农民知道的东西太少，知识少，智慧太少，我成了村里的中心。村里人叫我村长。”1999到2001年，碓白石村人均年收入从1600元增长到了3000~5000元，村里的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化都做得很好，一时间很风光。然而，2002年10月，孙君结束项目离开村庄，等他再回来看看时，短短7个月，河岸的垃圾又回来了，几个垃圾池变成了农民的鸡窝。整个村庄都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又倒退回3年前。这次令他痛心的失败让孙君意识到，村干部才是村庄的核心，乡建者

只是过路人，再好的想法和理念，没有传达给村干部，一切白搭。

2006年在浙江安吉县，孙君第一次做把生态系统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项目。然而因为县委书记和环保局长的调离，项目无疾而终。

2008年“5·12”大地震后，绿十字接受基金会的支持，做乡村合作社，以绝对民主的形式在村庄搞经济发展，结果，事事有人反对，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村里乱了套。“那是我们第一次被村干部赶出村庄。”这让孙君明白，村组是一个熟人社会，村庄的运作就像一个家庭，用西方的民主来治理中国的乡村水土不服。

各司其职

进入郝堂做乡建时，孙君对自己的角色和权力边界有很明确界定。对政府他强势：“在规划设计这个领域，我的权力必须大于县委书记，我可以否定他，他不能否定我，这是有协议的。”孙君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郝堂的项目不进行招投标，施工队伍由他组建。他认为，招投标招来的施工队施工质量不能保证，资质可能作假，标的还可能被转卖。再者，有资质的施工队伍往往从来没有修建传统建筑的经验，真正有经验的是生活在乡村、没文凭、没资质的民间工匠，这些人“没有出过国，没有见过外国建筑，一闭眼就是中国，一出手就是乡愁”。

郝堂村委会边上有一间整齐的砖房，门前庭院开放，种了花草树木。房屋是村民的财产，但门边挂了木牌，上书“李开良建筑工作室”几个字。李开良是河南省罗山县彭新镇倒座村东畝人，孙君给郝堂的建筑画样子，把样子变成房子的干将就是他。李开良就是孙君在给郝堂规划做前期调研采风时寻来的。“碰到一个农民在采茶，我就到他家喝口水，谁知这个农民家居然有高脚杯。他家的厕所也像模像样，那是我在农村第一次看到家庭有分开的男女厕所，而且搞得很干净。我还发现他收了很多旧砖头旧材料，觉得他有点情怀，有可能做成事。”果然，李开良后来成了建郝堂的功臣。

第二，孙君不允许政府改他的设计图。为此，他拒绝专家评审，因为“专家往往没有原则，给出的是政府意见而不是专业意见”。他也拒绝领导参观，因为“省长讲一句话，市长不敢不听”。郝堂的建设与当时河南省“统一让农民上楼”的建设精神不相符，

风险更大，为此，他和区里达成一致，两年不准宣传报道。

在郝堂，我从姜佳佳那里借来了厚厚两大本记录，那里面记下了郝堂村改造过程中的每一次会议和每一件大事。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村里动工的第一个项目是资源分类中心，也就是处理垃圾的地方，而这个垃圾池，前后返工了三次。郝堂的改造，什么样的工程算合格，也是孙君说了算。资源分类中心是孙君树立的一个标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心里默认农村的工程就可以做得粗糙不讲究。三次返工下来，施工队心里就有了数，知道郝堂到底要什么质量。同样一个材料，因为态度不同，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孙君在村里小河上设计了好几个水堰，一方面是为了造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村民生产用水。水堰是水利部门负责施工的。第一个水堰完工，孙君叫人拿锤子砸开外面来给他看，不出所料，里面是空的，于是又返工。

郝堂的建设，最忙的还是村干部。胡静回想郝堂建设的那三年，觉得自己“真是不要命，疯了”。“早上7点就开工，晚上10点以后回家。孙老师来开会一开开半夜。晚上回家脱了衣服倒头就睡，衣服都是老伴儿洗。”胡静说，“我的亲戚朋友都说我老了得了精神病，也不知道赚多少钱——村长一个月拿980元。老百姓说啥子呢？无利不起早，她肯定得了很多好处，总之，里外不是人。”

胡静的辛苦在于，整个村庄的改造，她得是冲在最前线的那个人。在村干部面前，孙君对自己的定位是“村长助理”：“他们的家乡，哪里能动，哪里不能动，应该是什么样，他们心里有数。”他坚信，只要村干部愿意干，没人比他们对村庄更尽心。“村干部和政府官员不一样。政府官员人能调走，村干部的家族和血缘关系都在农村，干不好，他丢不起这人。”郝堂村建设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负责将交通、水利等公共设施服务延伸到村庄，但村庄自己的建设要充分调动村里的力量。所有这些，涉及观念的，说服工作以村干部为主，触及利益的，由村干部协调。

胡静做工作靠的是乡约民规和“一张老脸、一张嘴”。郝堂修路，村民没有因为土地占用要一分钱。胡静告诉我，这是因为“村里从2003年开始就有公约，凡是修路占田占地占山占树，占所有的东西都不赔钱，都由村民小组内部自行调整。这是我们自己讨论出来的。”也有村民不乐意，把前来做思想工作的村委手臂抓出血。胡静二话没说，马上跑到那户人家跟前，对

着扬起来的巴掌说：“你今天敢挠我的脸，我一巴掌给你拍死！”接着她开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家，你的孩子以后不走路吗？……”最后，这条“修不通”的路还是让胡静给“说”通了。

村里要建污水处理池，有一户的老坟不愿迁走，胡静去做工作。“我说，一是要建污水处理池，坟得迁，二则，这老坟对着你家门口，你看家里老有人生病，肯定是对你家不利。要不你去找个风水先生看看？他说好，我就赶紧给村里的风水先生打电话。半夜村民就来我家找我，说风水先生看过了，明天早上6点前要迁坟，不能到天亮。我说：那你就迁呗，有啥问题啊？他说：迁坟得要挖掘机。我说：没问题，我给你调，我5点保证挖掘机到场！”

村里不仅出力，更要“出钱”。考虑到制造景观、增加种植收入，以及未来村庄的污水净化，孙君给郝堂设计了160亩荷塘。建荷塘的土地都是从村民手里流转来的，村委会组织村民开大会，协商讨论出了租期60年、每年400斤稻谷的租价。而这批土地流转的最初资金就来自夕阳红资金互助社。村里成立绿园公司，从互助社贷款160万元，用于最初的征地补偿。绿园公司还先后以每亩1.8万元、2.4万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征用300多亩耕地，用于学校、养老中心、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的建设。

带头人

对于今天来郝堂参观的人来说，郝堂的门面就是村民的房子，但民房改造也是郝堂建设中最敏感的部分。根据规定，政府除了给每户改造的人家3万块钱补助外，旧房改造还享受每平方米130元的补贴，但这依然意味着村民必须出大头。当时，郝堂村不少人已经打算在平桥区市里买房子，怎么说服他们把手里的钱投到看上去已经没什么希望的村里，让他们相信改造能够使村子变好，这让胡静伤透了脑筋。有一次，胡静开村民大会，她在台上做动员，一个村民噌地站起来：“你们都别听她洗脑。”

一个办法是带村民走出去参观。用胡静的话说：“这段工作推不动了，我们就组织人出去看。”区里出了钱，最早的时候，村民去过“王宝强拍《举起手来》”的河南新乡郭亮村，也去过孙君建设过的堰河村。参观回来，村民被组织到村委会二楼会议室举办外出考察人员座谈会。有人说，郭亮村的自然条件比郝堂更差，但是他们坚持做完了以后，现在游客多了，群众

收益高了，所以要把目光放长远。也有人说，看到当地小孩扔垃圾不管多远都送到垃圾箱的做法，觉得很惭愧。但看到别人的好，不意味着真敢自己做起来，还得有人带头。

郝堂第一批同意改造的有10户，这10户大多属于一种情况：家里有党员，在村里有任职，像一号院主人张厚健当时就是窑湾组的队长。

被老张挂在墙上的图纸上有几行字，是李昌平写的：“要以主人家意见为主，是他的家改房，我们只是帮忙，不可添乱。”

房屋改造，设计者是孙君本人。改民居，孙君不像对政府那样大包大揽了。他问张厚健对老房子有什么不满意，老张提了几点，厕所和楼梯都在外面不方便，屋顶渗水。这些后来都遵照他意思改造了。但更多时候，双方需要“谈判”。什么样的房子好看？村民往往和孙君想的不一样。孙君想用当地的石头做房屋的外立面，塑造乡土气息，老张不同意，觉得丑。于是孙君提议用当地的免烧砖，老张还是看不上。孙君画了好几张不同的图给他看，老张最终还是接受了。

来郝堂的第一天，在乡建院，工程师方洪军跟我说：“乡村的改造，你要想一步到位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什么地方能改，先做上再说。”从这个角度说，一号院就是郝堂的缩影。

和我提起孙君，张厚健呵呵地笑：“孙老师这家伙，说实话我对他很服气，不过我也和他说，你一是劝，二是骗。我当时问他：你画的房子确实是漂亮，可是要多少钱呢？他说：有三四万块钱足够了，政府再给你补一点，花不了多少钱。”

老张抱着花不了多少钱，一个多月就完工的想法开了工，结果呢？老张想省钱，让自己手下的施工队做，“当地的泥巴匠，一个会做清水墙的都没有”。一号院一楼窗户下面设计了石墙，窗棂是红砖码的，是一个亮点。“做完了，这个人来看了说别扭，那个人来了也说别扭，没有那个韵味了。怎么办？扒了重来！”当时，孙君在村里留了位监工李如道。按规定，房子改造完，他不验收签字，农民是拿不到改造补贴的。就是这堵墙，张厚健就“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窗棂的红砖还是李如道做的。

“扒了”的东西不只这一样。老张给院子铺的水泥硬化地面扒掉了。院角漂亮的小水池其实是设计的污水处理池，厨房的生活污水通过净化系统排到这里，不会污染村庄环境。在孙君看来，污水池不只是基础设施问题，也是引导农民形成环保理念的问题。但开



始施工的时候，张厚健并不知道这个池子要铺设管道和过滤系统。院子地面已经修好，发现没处引水，只得又把地面掀开。老张心里急，但也认了。“我当时和五里乡办事处的书记说，这挖出来的大块废料没办法处理。结果大热天里，办事处来了二十几个干部帮我搬了。我觉得领导确实比较重视。”

房子拾掇得差不多的时候，孙君提出来，得把围墙门楼扒掉。在他看来，除了为景观考虑，更重要的是“农村特点是有温度的”，“围墙把人和人的距离拉远了”。但老张不乐意，一则围墙门楼修建花了不少钱，二则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围墙，没有围墙不像个家。胡静告诉我，村里砌围墙是从90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小偷横行，围墙越修越高”；“其实有围墙有门楼并不安全，小偷跳进去去邻里都不知道”。

这一回，孙君和老张说了四点：第一，房子是脸面，修好了就得给别人看；第二，原来开门见厕所，

拆掉以后开门见山，风水大好；第三，围墙里面一个人是“囚”，寓意不好；第四，没围墙通风好，视野开阔，还能做点小生意。老张心想：“搞都搞到这一步了，还能咋办，总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不过，围墙一扒，老张的心情倒是好了。“当时我的房子在我们村里算很好的，老农民看笑话，说这房子好好的要扒掉，你这脑子里进了水。我连门都不敢出，一出门就觉得人家心说傻子来了。院墙一扒倒，人家一看，觉得效果还真是好。”

一号院施工最终用了半年，花掉了十多万元。“花得我头都大了。”张厚健说，“最后我说，孙老师啊，你不是孙老师，你是孙骗子！他笑。他说，我要不說三四万，你们谁干？”

做了十余年乡建，孙君深知一号院的重要性：“中国农民的创新能力强，模仿能力强。”一号院还没完工，已经有六七户找到他，想让他画房子。等到村里以村



左图：郝村小学校长杨文平（左二）正在组织孩子们排“路队”放学

右图：郝堂村红星组只有一条百余米街道，但建设最整齐，也最享有荷塘美景之利

委会所在的红星组作为核心组进行改造后，乡村的房子应该长什么样，大家已经有了共识。现在郝堂的房子有许多是改造后村民自己建的，但白瓷砖再也看不到了。尽管大家都知道李开良造房子的工费贵，同样一个项目，别人十来万能拿下，他要二十万，但现在李开良还是会被村民请回来建房子。

我在远离红星组的曹湾组溜达，被一座客栈吸引。客栈前面是小鱼塘，院中有棵桂花树，凹字形的房子有素净扎实的清水墙和相得益彰的旧木柱子。一问，果然也是李开良设计建造的。女主人孙亚芳告诉我，房子是2014年才借钱开始盖的。“这个屋顶，他想用小布瓦，但我当时想用大瓦，小布瓦以后一旦漏水，修理起来麻烦。”孙亚芳说，“但后来还是用了小布瓦。”“为啥呢？”我问她。“看看就知道，小布瓦确实是好看呀！”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校长

从一号院老张家沿着小河一直往北走，远远能看

见钟楼。钟楼建在郝堂村里最高的一块“风水宝地”上，属于村里的小学。这所乡村小学不仅有普通教室，还有音乐室、多媒体教室、图书馆和科技室。用家长的话说：“除了没空调，其他都不差。”郝堂改造，村里的小学也坐着快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是下午3点到小学大门口的，校长杨文平透过大门口边的一间空教室的窗子向我招手。和她在一块儿没多久，我就明白她为啥坐在这里了。3点多，下课音乐一响，她立刻站起来，走向教室放着的音响设备。“同学们，现在是眼保健操时间。”她透过窗子望向教学楼，口吻严厉起来，“四年级的同学，为什么还在乱跑？回去做操！四年级的老师呢？为什么让孩子出来乱跑？”眼保健操做完了，课间时间，她还不放下话筒：“同学们，操场上有很多积水，请大家不要在积水里踩，弄湿了衣服和鞋子容易感冒。”没过多久，放学了，杨文平又回到话筒前，她要组织孩子们组“路队”回家：“各个路队排好了！有家长来接的同学，请叮嘱你们的爸爸妈妈，开车的话，要开慢一点，注意安全。”除此之外，杨文平还需要在这

间教室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任何走到学校边上来的到访者，她推开窗子就能搭上话。而任何进入学校的人，都得路过教室靠操场一侧的窗边。一位家长来给孩子送东西，杨文平拦下他，告诉他很快就下课了，让他耐心等等。她还火眼金睛地叫住了一个正要溜过去的男孩。男孩揣着三包“辣条”，试图蒙混过关，他知道，校长不让他们买这些来历不明的三无零食。

孙君告诉我，2011年郝堂建设初期，对于是否要建学校是存在分歧的。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郝堂小学只有不到50个学生，应该把学校撤掉，并入其他学校。但一些人则坚持，村庄必须有自己的学校。孙君认为，对于乡村的老人，世代同堂是最重要的生活追求；而且，“建学校不仅仅事关教育，在农村，只要孩子在，父母就有可能回来，孩子走了，父母就可能从此不再回来，村庄就真的会很快消亡”。

幸运的是，郝堂的建设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建房子，在这个系统工程里，“硬件的规划建设只占40%”。当时，郝堂除了孙君在做的土壤改良、资源分类，李昌平做的内置金融，还有一些别的社会力量也在进行软件建设，比如翁永凯的爱心基金会在郝堂推进农村妇女和卫生健康项目。正是因为这种“系统性”的导向，加之一位名叫“宏伟”的企业家的慷慨捐助，郝堂得以建成了自己的“宏伟小学”。现在，郝堂小学有200多名学生。我在村里遇到好几位年轻的家长，谈到为什么要从打工的都市回到村里建房居住，答案基本一致：“孩子要上学了，离不了。”

2012年小学落成，杨文平成了校长。来郝堂之前，杨文平曾是市里最好的学校平桥区第二小学的副校长。孙君和李昌平将郝堂看作自己的实验场，杨文平也有同样的实验想法。“如果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做主做你想要的那种教育，为什么不去呢？”杨文平说，“在这个村庄发生巨变的时候，能够和一群人共同把一个村庄的完整体系建立起来，你一生有多少这样的机会？有了机会，你要抓住。”

郝堂小学有一样东西最有名——厕所。厕所是台湾设计家谢英俊设计的。这个卫生间由上下二层组成，上层是旱厕，干湿分开。小便经碎石子过滤后通过塑料管流入下层的封闭储尿桶，大便直接掉到下层的粪堆上，要如厕人自己用小铲将预备好的土壤将其适当覆盖，无须冲水。发酵成肥的粪土清理出来，被老师同学们用在了学校的菜地里。

这个旱厕被当作郝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典范介绍给前来考察的各路人马。乡建院的人告诉我，其实

当时谢英俊设计的旱厕是想在全村推广的，但是没有成功。一是豫南地区气候潮湿，不是很适合；二是旱厕需要使用者具有良好的使用习惯，村民们根本做不到，但在学校里，孩子们可以。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自从2011年孙君给胡静布置下整理村庄卫生环境的考题，郝堂一直做卫生评比。村干部发现，他们在村民面前拉不下脸，于是评比是由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各家各户打分的。

这是学校之于郝堂的寓意。杨文平是把村庄的未来寄托在这个学校身上的。但对于乡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人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郝堂小学的最大短板是学习成绩上不去。有一次，全区的小学文化测试，学校倒数第一，这让胡静都很着急。家长们也无奈。孙亚芳的两个孩子都在学校上学：“老师们都尽力了，但学习就是不行。”

学习成绩的压力落到老师们身上，被杨文平顶了起来。学校有一个班考试成绩倒数第一，“因为师资不稳定，这个班一个学期没有固定的老师”。杨文平让一个老师接手，老师不愿意，担心班里成绩差，评比的时候得台上发言，承认错误，写检讨。杨文平告诉他：“如果领导有这要求的话，我去替你念检讨。”

一部分是出于无奈，乡村小学留下老师不容易，“你得要做到让别人心甘情愿想留下来”。今年学校有位老师应聘上了城里的外国语小学，但最终没走。“我们能做的是给老师减轻压力，让他们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杨文平有自己的主意。她告诉我，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有一个课题，“针对农村的学生，它分了三个层次，后三分之一才是我们乡村留下来的建设者，真正成绩好考出去的人，你让他们回来建设这个村庄，那是一句空话。他可以给你一些金钱、一些物质，但是真正的建设者一定是出自我们郝堂内部的，是内生动力”。杨文平考虑的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你要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只是分数吗？我们要给他的是做人做事的方法和道理。不懂这些，怎么在郝堂搞经营，做服务业，外面的人谁愿意来帮你做乡村建设？”

“生活即教育，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杨文平说，“吃饭、睡觉、走路、活动，在家里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教育的内容，包括那个旱厕的使用。”

杨文平坐着的这间教室是艺术教室，教室的桌上放着些玻璃瓶，瓶里插着孩子们在村里采的野草，“他们高兴了，就换换”。瓶子旁边放着大把漂亮的银杏叶。

前阵子有一天起风了，杨文平走到村委会那边去开会，“看到阳光下面银杏特别美”。第二天早上，她就把手里的跑操活动换成了来这里拾落叶。

杨文平希望她的教育能够与这个村庄的一草一木、生息劳作发生切实的关系。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菜地，但家长不让孩子摸，她觉得很可惜，于是学校有了种植课。在学校的菜园，学生必须自己动手。杨文平觉得，这样孩子们才能理解家庭，“明白田里的苗不是白长的”。杨文平感到：“乡村里面很多人不愿意交流，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会表达，所以不爱表达。”于是她给学校安排阅读课，要教会孩子说出内心的想法。

刚来郝堂的时候，杨文平发现清明时节的20来天，家长天不亮就上山采茶，孩子们四五点就被送到学校来。她干脆宣布学校同步开放，年纪小没有人照顾的孩子学校管吃管住。但小孩子需要在这段时间回家，在家里给家人做饭，承担家庭义务。“只要家里有比他更小的孩子，他就有义务在这个阶段照顾弟弟妹妹。”

也是因为采茶这件事，杨文平在学校里设了茶艺课。有人不理解，觉得是花架子，但她坚信这事关“幸福”。“家长含辛茹苦地去劳作，孩子们还不能得到照顾，这个劳动过程中有幸福感吗？”她觉得，“苦兮兮的生活，那不是农民想要的。”茶艺课上讲茶的发展、历史、文化和传承，她想让孩子们在经济价值之外，对自己的村庄和劳动价值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

我在和村民孙亚芳聊天的时候，她主动提起来，女儿在学校里上了“食育”课，回家叫她不要老吃“大油”（猪油），“大油吃多了会积累在血管里，要生病”。第二天，学校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联欢会，几百位家长和孩子们把村礼堂挤得满满当当，联欢会就是为了庆祝郝堂小学进行了三年的“食育”教育。

“食育”最初并不是杨文平的主意。禹明善告诉我，当初政府在郝堂推进健康服务进家庭，“无非就是给村里边的农民做一些讲座培训”，结果，“一阵风来了，一阵风走了”，扎不下根，没效果，于是，他想到从教育孩子做起，反过来用孩子来影响家庭。禹明善跟杨文平把想法一说，两人一拍即合。但这事学校自己的力量做不来。禹明善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了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时任秘书长王旭峰，当时学会已经在关注西部地区留守儿童健康问题，但采取的行动并不系统，老师一年也就去村里两次，禹明善邀请王旭峰来郝堂，把郝堂小学建成全国第一所食育试点校。

过去3年里，“食育”推动计划项目负责人刘璐和她的伙伴每个月都要在郝堂待上一周，她们给每个年级的孩子准备不同的课程。她们讲理论课，传达健康知识，也上实操课，带孩子们在学校食堂自己动手做吃的。有时候她们会做实验，现场用食品添加剂勾兑出来一瓶甜饮料，让孩子们知道里面并没有果汁牛奶。

第一年来郝堂的时候，刘璐进行过一次健康调查，郝堂的贫血率是30%左右，全国水平是9%。今年的调查里，郝堂的贫血率下降到了百分之十几。她并不敢居功，因为这也可能是因为郝堂年轻人回流，父母重新进入家庭，也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的增长。不过她还是很有成就感，因为这两天，她们发现孩子们记得过去3年的每一次实操课。更重要的是，她们已经制定出了一套针对1~6年级，一学年12节课的教材。虽然这是她们在郝堂服务的最后一个星期，但是学校的老师已经能够胜任教学了。

在郝堂做校长，杨文平有个心得，“等靠要”是行不通的。像“食育”这样的资源，她得自己去找。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一位从开封来的老先生谈话。老先生是研究果树的，想在郝堂试着培育200棵果树苗，苦于没有栽种的地方。杨文平二话没说，把学校的一大块空地交给了他。“他给我当志愿者，吃住我给他包了。树种在我这儿，能美化校园环境，能教给孩子们知识，他老伴儿是个医生，还能给孩子们看个小病，解决了我多少事儿！”

十字路口

荷塘青瓦、小桥流水、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些年，郝堂总是被描绘成一个理想乡建的样本。但在村里待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这是一种对乡村的误读。郝堂的乡建并没有画上休止符，它将往哪儿走，比它做过什么可能更有价值。

2009年，李昌平选择衰败的郝堂进行他的内置金融实验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村庄的资源价值各有不同。中国大约有10%的村庄会最终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大约有60%的村庄会成为空心村，这些村庄的价值在农业，最终会演化为大农机作业的农区 and 专业化养殖牧区；而剩下的大约30%的村庄会发展成中心村或中心镇，走农业服务化道路。他判断郝堂有成为第三种村庄的可能，因为它距离城市只有20公里，而且山有水，有作为乡村的各种要素。在他的设想里，郝堂能够成为城市居民养老的空间，提供养老服务可

以为村庄提供稳定持续的经济来源。

但现在的郝堂，还在享受乡村建设的初级红利，用郝堂人喜欢用的词说：“被旅游”。每年从4月到10月是郝堂的旅游旺季，人多的时候，车辆把入村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在“风景独好”的红星组，游客要等到下午两三点才吃得上午饭。和我最初的简单想象不一样的是，这种热潮并没有让胡静感到满意，她更多谈到的是村庄的超负载。这些年，处理旅游带来的各种问题让她忙得不可开交。村里的污水处理系统从2012年就不够用了，她“每次开会都和领导提”，2014年村里换成了50吨污水处理系统，多建了一个污水厂，今年才完工。农家乐一多，空调也多了，原来的电路带不动。电力今年2月份终于开工。日常的时候，村委会忙于维护秩序。她要劝说各家各户不要在路边摆摊搭伞，有损村容妨碍交通；她也得阻止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村民们看不惯城里人在村庄随手乱扔垃圾，把特意栽种在路边的格桑花连根拔起。

旅游确实给村里带来了看得见的财富。“乡里湘味”菜馆的老板袁德宏以前在湖南株洲做餐饮，他看过长沙周边的一些村庄，心里有数，2011年8月份就回郝堂了。他的日子比过去在外头舒服，“一年轻轻松松也能净赚20万元”。

但是也很显然，这种财富的分配极为不均。作为当时改造的核心组，红星组的建设最整齐，也最享有荷塘美景之利。乡建院的人笑称它是郝堂的富人区，但是红星组只是一条短短百余米的街道。郝堂一共有18个村组，一号院老张家所在的窑湾组距离红星组不过两三百米，村民们说，生意就已经不能比了。一天下午，我从郝堂小学一直往南走，2公里外是曹湾组。一路上公路夹在小山包中央，再没有开阔的土地。住在曹湾的孙亚芳说，自家的餐馆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也就千儿八百的账面收入。她有些为难，一方面，自己的手艺并不出众，难有回头客，另一方面，她实在请不起厨师。这是郝堂农家乐的普遍难题。张厚健给我算了笔账：他家里年收入10万元，请一个厨师每个月5000元，一个服务员每个月两三千，一年到头手里落不到多少钱，所以无论多忙，都只有家里人自己干。事实上，除了红星组，其他村组开农家乐、客栈的农家并不多，许多家庭的收入依然主要靠打散工。

郝堂乡建者的一个共识是，郝堂实验的价值之一在于还权村支两委，以村民为主导，激发村庄的内生动力。但现在，郝堂似乎后继乏力。

姜佳佳深有感触的是，郝堂改造时大片开辟荷塘，想引导农民做一些景观农业或者替代种植，为了让村民明白荷塘是能赚钱的，姜佳佳和几个人头两年把荷塘承包下来，摘了莲蓬自己拉到城里去买，一个莲蓬2块钱，一亩荷塘能产3000个。

她发现，正如荷塘一样，村民每往前走一步都需要有人去引导和刺激。“去年郝堂人流量有70万人次，一个人来这消费1块钱也有70万元。但很多村民不知道这些人来来去去跟他有啥关系，他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为什么不能拿到人多的地方卖？”

胡静也头疼。以前村里来过一个背包客，租了村民的房子开咖啡馆。“老百姓看人家生意做得好，非要把人家撵走，自己做。”为此，胡静被区委书记王继军批了一通，说村民不遵守合同，是她没管好。“最后呢，他也没做起来。理念达不到，他搞不清游客的需求，不知道人家要啥情调。”

“现在硬件已经有了，农业服务业化，首先一个障碍就是农民文化没有脱贫。”姜佳佳说，郝堂现在的主力是“70后”这一代人，这批人初中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最初，她想在村里培训讲解员，发现很多人拼音都不认识，“必须口口相传”。她也尝试教村民做电商，发现和她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不会用电子邮箱，因为他们在打工时只用聊天工具，根本没有办法以创业的姿态和跟社会发生更深度交流。

郝堂村拥有2万亩茶山，1万亩板栗树，这笔资源并没有在郝堂建设后被开发出来，集体所有的茶山依然以简单出租的形式租了出去，村民们依旧每天上山采一季茶，或者卖给收购人，或者给游客消费。在这种简单的生产模式下，村民得不到多少利。村民徐大秀告诉我，毛尖必须靠人工摘采，人工采一斤青叶60块钱，4斤青叶才能炒1斤干茶，劳动力成本太高。而板栗基本是“谁来打谁要，不管了”。张厚健告诉我：“板栗很怪，它要长得好，周围这一块一棵杂树都没有。郝堂村搞建设以后，林业部门不叫上山砍树了。现在杂树长那么粗，板栗就不行了。”

郝堂的旅游红利能吃多久，村民们也是有疑问的。大家都知道郝堂的山水魅力还留不住人，外面的新农村建设也越来越多。张厚健说：“今天我赚了200块钱，但不知道明天还赚不赚。这种心态的人很多。”

袁德宏在湖南做餐饮多年，脑子活络。前些年，他给村里提过建议，说郝堂的农家乐要长久，不能宰客，游客来了讨杯水喝，不能管人家要钱。当时村里开了会，开农家乐的都参加，大家一个菜一个菜地讨

论，成本多少，定价应该是多少，村里统一给菜单，盖公章。他也意识到村子的一些扩张是有问题的：开饭馆的越来越多，但绝大多数的生意明显不如早些年了。“盖一个房子几十万，亏掉了，怎么搞？”袁德宏曾经试过建餐饮协会，提出协会要有个约束力，“一个餐馆有几张桌子，谁来做菜，菜的水平、种类和价格，不能达标的不能做餐饮，但可以做民宿，分开经营”。但协会一直没有这个权力，渐渐也没人提了。

省广播台来邀请姜佳佳去做直播，谈谈郝堂近两年的发展经验，姜佳佳很坦率：“2013年建设完成后，郝堂实际上就没有进步了。”

郝堂的合作社依然还是夕阳红一种形式。在李昌平的计划里，内置金融应该发展出很多种形式：“比如茶叶，一家一户卖，互相之间竞争，你卖100块，我卖90，都赚不了钱。我们可以开个茶叶银行，农民的茶园就当存款存在合作社，每年分红，由合作社来和一些产业公司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形成品牌统一管理。”这些年，李昌平在湖北梁子湖和广东珠海的乡村做了类似的实验，“都走在了郝堂的前面”。

村民们都说，今年一年，村庄的管理没以前好了，

垃圾多了，公共设施没人维护，从前每个月总要开一次的大会也不开了。一些村民还不知道，胡静已经从村支书的位置上下来了。一种说法是，她要回家照顾身体不好的老伴儿；另一种说法是，她被气走了。

胡静确实对许多事情感到生气。“今年6、7月份，国土资源的卫星一照，包括大礼堂、老年中心，郝堂13处违章建筑，说要罚款，一个地方几万。我说我没钱，我建的是公共服务，又不是个人建房。当时建的时候，各个部门全程参与，但是会后没把建设指标批给我啊。”更重要的是，去年，所有的村财政收归乡镇管理，村里建设几年来的财权没有了，“现在村庄是没有一点自主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郝堂走在前面，政策落在后面。你多走三分之一步还可以，如果多走一步，政策就会拦住你。”

对于孙君这样的乡建者来说，郝堂就像孩子，“孩子长大了，应该让他自然成长，顺其自然吧”。他尚不敢对自己的这份作品下一个论断：“三年建设，三年临床，还得再有三年的观察。”“郝堂确实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他提醒我，“但村民能对当下有所反思和不满，不也是乡村的进步吗？”



松果
一万个生活家

QR Code

我是康威凯，
我鉴赏过 10000 只腕表。
来松果，
和我一起鉴表。

贵州茅贡： 乡村该如何回应“城愁”？

文 / 吴琪 摄影 / 张雷

贵州省黎平茅贡乡地扞生态博物馆
的厨房，房屋与山野相融





在漫长的岁月里，贵州黎平县的茅贡乡一直不太引人注目。中国人习惯把目光放在高能量的城市和富裕农村里，茅贡以及它包含的村庄，不过是整体画面中的阴影部分。直到今年，当地政府引入城市文化人包装自己，他们试图借助外来者的眼光，重新唤起乡民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

城里人有“乡愁”要寻觅，乡下人有“城愁”要去实现，这两者如何通过了解对方进而更好地认知自我，在茅贡这样一个未经工业化的黔东南小镇上，开始了尝试。

乡镇上的艺术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这句形容贵州的俗语，在我到达黔东南的第一刻，便对前两句有了直观感受。天色阴冷、山路弯弯、树木葱茏，珍贵的平地上挤满收割过的稻田和灰瓦铺盖的木结构房屋。

黔东南的黎平县，至今不通火车。2006年黎平县的机场通航时，作为贵州开通的第四个民用支线机场，不少老百姓特意跑来看飞机。茅贡镇的现任党委书记杨胜雄向我形容当时的场面，一些人看到飞机后打趣道：“我还以为飞机多大，这不就是没出月子的黄壳鸡吗？”支线飞机小，如今从长沙飞往黎平的飞机，腾云驾雾一个半小时，却一次只能搭载50人左右。

在外出便利的地区，人们对改变生活的期望，很多时候得寄托在个人无力改变的事情上——比如交通。2014年底



左图：地扞村的侗族村民生活很大程度上为自给自足，这户人家的老人正在晾晒自己染的布

右图：禾仓是地扞村民存放粮食的地方，村里有560多个禾仓

通行的贵广高铁，终于让黎平与铁路搭上了关系，黎平人只需坐车到邻近的从江县，就能快捷到达贵阳和广州等地，这对不少当地人意味着，出外打工方便了许多。

吸引我从北京来到黎平的，是一个叫作茅贡的乡镇。今年夏天，茅贡推出了“创意小镇”的计划，镇上废弃的国营粮站被打造成了文艺腔调十足的“粮库艺术中心”。粮库艺术中心运用灰瓦、原色木头柱子、红砖或水泥外墙、铺满小碎石的地面，在乡村中营造出了一个艺术空间。按照策展人的表达，他们希望探索茅贡作为乡镇的另一种可能。

艺术中心里空间开阔，四白落地的墙面上精细地挂着与物件相关的照片。比如摄影家李玉祥的“上世纪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百里侗寨风物志等。策展人左靖等在前言里记述了这批照片体现的价值——现代建筑需要巨量的自然界不存在的异质材料，并且它们通常都建立在一个区域内最好的土地之上。事实上，它们与土地的破坏关系是不可逆转的。与此截然不同是木结构建筑……我们对木结构建筑的推崇旨

在表明，在面临现代性危机时，我们必须躬身向传统学习。

这里也展出了命名“禾仓”的艺术，禾仓指的是当地老百姓储存粮食的木头建筑，相当于各家各户小小的粮仓。为了防止鼠吃虫爬，它们搭建在离地1米高的小木屋里，一个四四方方的身体，加上一顶斗篷式的“帽子”。有的建在河道边，有的夹杂在村里紧紧挨挨的木屋当中，好似一座座固化的丰收庆典，让人看了安心。艺术中心里的“禾仓研究团队”，借“禾仓”之名，展出了各种当地人与农耕工具、木头手工艺有关的图片。操习这些手工艺的工匠师傅，也被郑重地框在一幅幅单独的照片里。

不过按照我以往在乡村采访的经验，村庄对艺术有很强的消解能力。比村庄行政级别高一个层级的乡镇，也不例外。农民坚守自己朴实的实用哲学，往往也精于计算每一分收支。艺术如果不与生活实惠产生关联，我很难想象它的处境。茅贡镇处在贵州东南部的大山里，农民除了种茶、种粮等劳作，再就是向外输出劳力，使家庭变得宽裕点儿。要想吸引外地人来



地扞村传统侗族民居



到这个偏僻之所，带来人口的反向流动，一定不容易。茅贡计划打造出来的粮库艺术中心，充满城市青年人周末闲逛之处的气息。不知道这样一个类似乡村行为艺术的举动，能给当地带来怎样的变化？

“乡村不是游乐场，我不去助长你们的乡村想象”

不管怎么说，我这样一个之前没有听说过“茅贡”的外来人，此刻拖着行李箱、手提大挎包站在“粮库艺术中心”门口，在当地人的眼里，这已经是打造艺术氛围后带来的一种变化。这里的冬天一般鲜有人光临。我给当地一个叫任和听的文化人打电话，约他见面聊聊，他是地扞村生态博物馆馆长。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任和听被形容为扎根地扞十来年的文化人，他通过“隐居”在乡村里的生态博物馆，既记录乡村的变化，又在探究乡村的发展道路。

任和听个头不高，头发有些蓬乱，戴着眼镜，年纪在50岁左右。听说我所在的北京媒体要了解茅贡计划，以及这几年发生的乡村建设，他推了推眼镜，皱着眉头，表现出不愉快：“我不愿意用‘乡村建设’这样的词语，我所做的不是乡村运动，不是策展人的个人作秀，他们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品牌，到处做宣传。”

听上去，任和听的话语是在对外来策展人表示不满。茅贡计划于今年3月启动，当地政府委托任和听来联络，一批安徽、上海等高校的研究者和文化人参与其中，共同打造了我所看到的艺术空间与展览。这些策展者在今年8月粮仓艺术中心的开幕式举办之后，他们的参与工作暂告一段落。策展人中有人熟悉媒体语言，将茅贡计划看作自己乡村建设的又一作品，任和听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我不同意那些文化人把乡村当成一个游乐场。这样的乡村容易死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我们不去助长一种所谓的乡村想象，不想让舆论有不合理的期待。”

任和听的说法听上去并非没有道理。不过他在此10年之久的生态博物馆，如果不愿套上“乡村建设”这样的词，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任和听说，他当初是作为一个咨询机构人员，为茅贡政府做顾问。村庄的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他的顾问角色有30年。“现代人太想把乡村文化快餐化，旅游者和开发者恨不得一口把乡村吃掉，我们要防止他们乱作为。”

他认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是影响当地官员，因为官

员才是能决定当地发展的人。我们在谈话的时候，黎平县的一位官员刚好进来与我们聊了一会儿，这位之前担任过县旅游局局长的官员，向我介绍了黎平的特点，表现出经济落后地区希望发展旅游的渴望。但是等他一离开，任和听说：“我都懒得与他说话，我与他说有什么用，他又不是县委书记，跟他说了他也决定不了什么！浪费我的时间而已。我觉得乡村甚至不需要发展，不发展也许就是最好的状态。”

他又很快把话题转到不接受采访。他说自己拒绝任何记者的探访，不需要传播，也不希望被了解。“我也做过记者，我不相信记者，中国记者都太糟糕了。我不愿意做你文字里的道具。比记者更糟糕的是大学研究者，来乡村只是做学术观光。”

他的话语让我感到吃惊，任和听表示自己不希望外来者破坏乡村，这种观念听上去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但是他对初来乍到的人，表现出对话语权的强烈控制愿望。如果控制不了对方看问题的角度，他显然有不安和排斥。他出言贬低学者，可他担任馆长的生态博物馆，是很多高校驻点的一个研究机构，这个博物馆从经济运作上来说，实际上非常依靠接待学者盈利。

与任和听的谈话并不愉快，这让我更加好奇，一个“扎根”地扞村10年的人，如果没有与当地人的谦虚心态，只是希望用不发展的思维去影响官员，这种难度恐怕不异于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吧。

好在乡村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生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和任和听都是平等的外来者。他可以从他的角度对此地有所解读，我也可以从我的记者角度，走进村子，感受一下乡村里的真实变化和 demand。

谁的乡村？以谁的感受来发展乡村？

地扞村距离茅贡乡只有5公里，但这5公里都是并不宽敞的山路。道路像丝带一样，漂浮在一座座山之间。坐着顺风车，当我又一次感觉到山势变低时，错落有致的侗族房屋便出现在山坳的平地上。

“茅贡计划”里比较突出的一个想法是，以茅贡镇的建设为中心，带动周围十几个传统侗族村落的发展，地扞村就是其中一个村落。这个理念中，一是强调不把游人的关注力放在某一个具体的村庄。因为游人的蜂拥而至，可能会以摧毁村民本身的生活为代价，而换来经济的发展。另一个出发点，是为了避免现在

一些乡村中出现的不平衡，某一两个村落经济受益，周围的村庄却毫无起色。

所以“茅贡计划”希望在镇上建成“百村百工市集”“创客中心”这样的聚落，吸引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到镇上与“创客”一起，用文化视角包装他们的手工产品和农产品。这样村民们白天到镇上“工作”，晚上回到各自安静的乡村居住，村子里的生活不会被旅游彻底改变。茅贡镇希望与贵州省打造的“百里侗寨”的思路一致，推出茅贡乡所辖的一系列传统村落，让它们尽可能平均地享受到今后旅游发展的好处。

这种发展思路的背后，其实也体现出黎平旅游的一个困境——村庄之间的差别不太明显，因此单个特色不算突出。黎平境内大多数人口是侗族，侗族村落的风情是最大的特色。但不同寨子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游客们来之前怎么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寨子？当游客游玩一个寨子之后，为什么还要去其他侗族村庄？“百里侗寨”背后其实需要对各个村落更加细化的特点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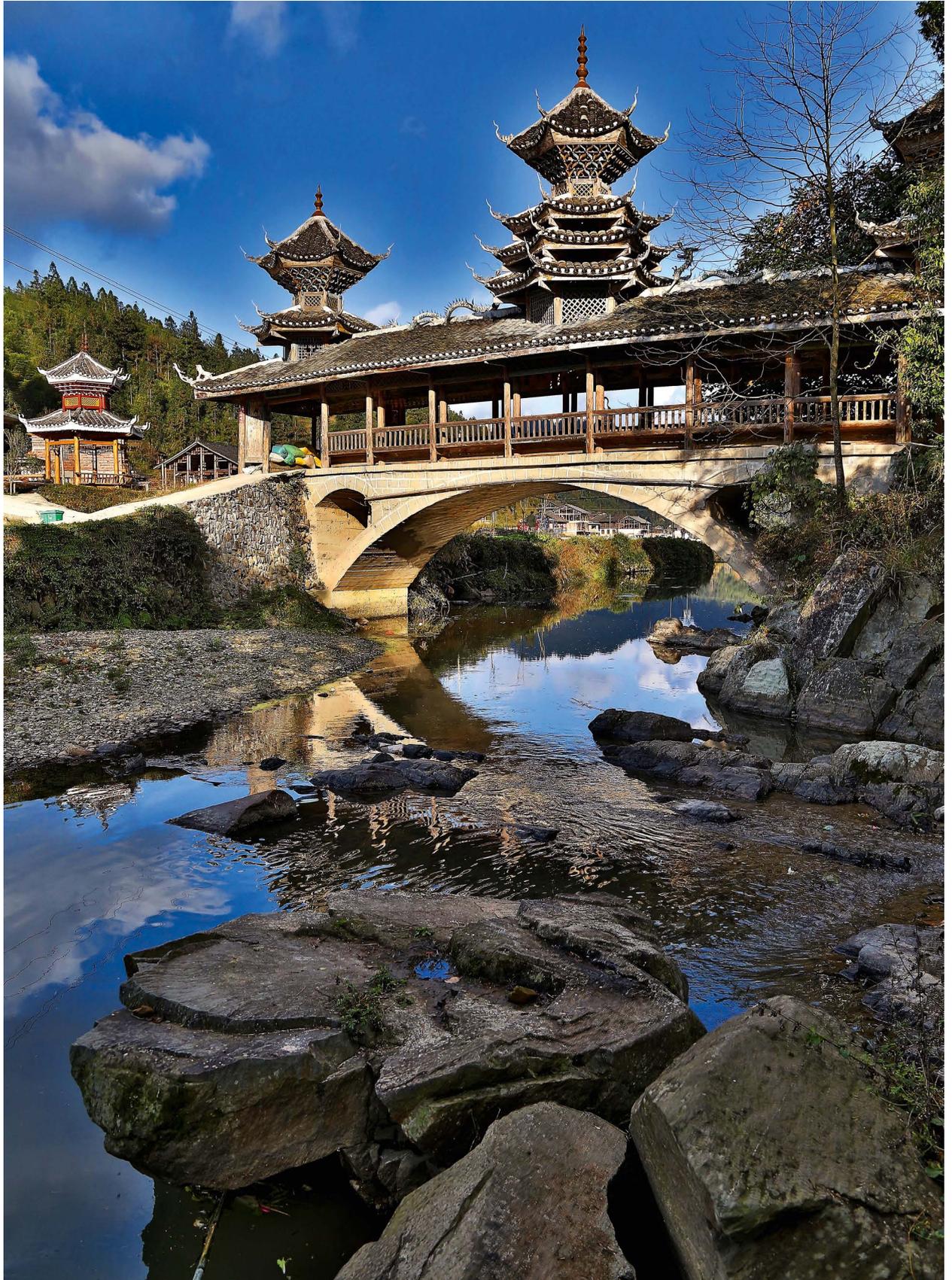
黎平县打造的“侗乡第一寨”肇兴，距离茅贡镇不足100公里。肇兴代表着眼下盛行的模式，将整个侗寨圈起来向游客收费，商业意味较浓。茅贡希望它所辖的侗族村庄体现不一样的特色，但这个特色如何寻找，实际上需要他们对自己的乡村文化，重新做一遍梳理。

任和听在谈到他的乡村尝试时，提到一些现实，比如粮库艺术中心里的展览，也许外来策展人做的时候，认为是吸引城市人的，但是，“如果游客千年不来，最后这些展览是面对谁的？还是村民看得多嘛”。

他提到粮库艺术中心对面的一座日式风格的公共厕所，用大量原木和水泥地面，修得宽敞又有风格。当时他主张一定把厕所修好，让村民们每5天过来赶集的时候，体验一下干净的公共厕所是什么样的，“这是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

这样的用心，到底对村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几天后茅贡镇党委书记杨胜雄又带着我细细地看了一遍展览时，他谈到自己的理解。“茅贡计划”不仅包括艺术展览，在粮仓艺术中心对面，还有更详细的规划展览，记载着茅贡镇为了打造“文化创意小镇”，从组织架构到场地修建、物流准备等各方面的构想。

“你看这张祭祀的照片，就是20年前摄影师在地扞村里拍摄的。”杨胜雄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前段有村民来看照片，吃惊地指着里边的一个小孩，说是当年的自己。她还指出照片中做法事的寨老，哪些已



地扞村风雨桥上的传统侗族建筑，有着超越日常生活的隆重感



经去世了，哪些还在。

杨胜雄说，村民们刚刚看到照片时，往往会很吃惊。不明白自己平时种田、做木匠活、祭祀这些日常生活，为什么会被当作艺术来对待。“但是很快的，他们就会感受到，原来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文化，在城市人眼里具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实际上是让村民通过外来者的眼光，找到对自我文化的自信心。”慢慢地，小镇上的人，或是村子里的人，有些会带客人来这里看看，把这个艺术中心看作了当地的一个骄傲。

外来的策展人，也希望向村民传递一种理念：你们的田园生活是城市人向往的，或者说是工业化反思后追寻的稀缺资源，它很好地承载了城市人的乡愁。他们希望村民不要自我贬低，也不要为了物质利益而损坏传统文化，以及生态环境。这里边有一种无言的告诫：如果你们丢失了自己的传统，你们在城市文化

里，将失去价值。你们习以为常的主流习俗，正是城市人开始苦苦找寻的异质文化。这里边包含一种“现代性”对“未开发”的劝说，充满了“过来人”的姿态。

任和听说，他觉得自己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告诉政府拒绝不良资本。但是从政府和村民的角度，脱贫致富是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在这样一个资本几乎没有到达的地方，村民们觉得经济发育不良，希望能“吃得胖些”。外来文化人似乎有些像健身教练，想着教导大家如何减肥，两者看上去有些错位。对村民来说，文化与生态的保存，需要找到与这个目标的一致利益，才能真实地打动他们。

毕竟，这是农民的乡村。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外来人告诉他们不做什么，而是希望有人智慧地引导他们——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

地扞：村约民俗下的传统社会

刚刚进入地扞村时，它的热闹气息有些超出我的预料。地扞虽然偏僻，但是绝不荒凉，绿树良田、流水潺潺、木头房屋一栋栋紧挨着，村头中心小学里的孩子们放学出来，嬉笑打闹。贵州平地少，所以村庄里的人们住得密集，与平原地区的村子大不相同。人



1. 80 岁的地扞村民吴世熙和他的棺材，当地人以这种方式对死亡有所准备

2. 地扞村每有婚丧嫁娶就开办流水席，是几乎全村人都要参与的大事

3. 地扞村的“总寨老”吴世德

们在四周的山上见缝插针地开辟梯田，村里偶有菜田和鱼塘，倒是刚好缓解了房屋过于集中造成的拥挤感受。

茅贡并不希望打造“明星村庄”，不过比较之下，地扞村的知名度相对高。10年前，任和昕所在的香港咨询机构来建博物馆时，看中的是这里保存较好的侗族建筑和人们的传统习俗。200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和拍摄了地扞村，给予它“时光边缘的村落”的雅号。我所看到的村庄，很能满足一个人对田园生活的想象：房屋就地取材，人们勤于耕种，村庄的四周则是巨大的沉默的大自然，绿意盎然。这种农耕生活，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来处。

29岁的代国友来自黔东南州的首府凯里，他今年作为州图书馆的第一书记到地扞村挂职。代国友对地扞的第一感受是，村庄几乎未经开发，自然风光和侗族习俗都保存得好，所以他在地扞这大半年见到的外来者，以大学老师和学生居多。地扞村全是侗族人，90%姓吴，是侗戏鼻祖吴文彩的故乡。村里保留着古老的风雨桥、鼓楼、戏台，每年还有不少传统节日，一些人类学、社会学和建筑学的学者会来做调查。

“地扞”两字在侗话里，指的是源源不断流水的源头，也指村寨发祥之地。这里处在长江水系与珠江

水系的分水岭地带，气候温润。700多年前，吴姓祖先从江西等地迁往地扞，后来发展成为1300户，称为“千三地扞”。为了生存，这1300户人家又分散到附近居住，但是地扞仍然被称为“千三总根”，每到重大节日，附近村落聚集到地扞来庆祝。

从外观上看，村落里不同用处的空间，共同组成了地扞的别致之处。风雨桥、鼓楼上层层错位的翘檐木头建筑，显示出高于日常生活的隆重感。民居房屋一般是两三层高的木屋，为了保持传统村落外观的一致性，村里对新建的房屋，要求第二层即使是水泥建筑，也必须在外包上木头，第三层则是全木质结构。大量的禾仓沿着河道和房屋而建，地扞村700多栋民居，有560多处禾仓。禾仓群构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

我进入地扞村是个傍晚，第二天一早起来，气温骤降到零摄氏度，山里湿冷的天气让人瑟瑟发抖。人们拿出备好的木炭，开始围着处处可见的火塘取暖。村庄里的公共空间很多，好几座鼓楼与多处“卡屋”，是祖辈留下来议事和举办仪式的地方。一到冬天，赋闲的老人们围炉而聚，边烤火边聊天。

我刚好赶上一户村民的新房上梁，按照习俗，他家举办了一套需要法师主持的上梁仪式，并且特意请来在黎平县上班的年轻亲戚，帮忙收礼。两位年轻人

坐在一间空屋子内，在一个册子上，详细记下每人送来的礼物，这本小册子成了村民生活里重要的人情记载。有的乡亲挑来两担谷子，有的挑来一二十斤自家烧的米酒，有的送来钱或烟。这天中午和傍晚，建房的人家在村委会门口的空地上开设流水席，送礼的人家一拨拨来吃饭，前后能有两三百人。

地扞村民的生活，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死亡，都罩在这一张密集的人情网络中。村子里哪户人家小孩满月、哪户青年人要嫁娶、哪户老年人过世，是几乎全村人都要参与的大事。大家会说，“我们村里90%的人彼此间都是亲戚朋友，肯定是要人情往来的”。如今茅贡乡希望村民提前告知自家举办大事的日子，这样如果有外地游客要体验当地人生活，乡政府可以帮助双方“配对”。游客出点钱参加村民家的酒席，体验风俗，村民也乐于多接待几位客人。如今到达地扞的游客非常零星，被当地政府称为“深度游”。对于交通不便利的地区来说，当地人觉得，成为大众旅游目的地是个奢望。

地扞吴姓有五个大房族，每个大房族集中居住，有自己的寨名，大房族内不能通婚。这五大寨子至今还保存着传统的“寨老”角色，维系着行政权力之外的乡规民俗。

73岁的吴世德是地扞的“总寨老”，他早年做过村会计，后来在茅贡信用社工作，给村民们养猪养牛、买肥料建房等发放贷款。2008年，退休后回到地扞村的吴世德被选为“总寨老”，统领各个房族的寨老，在协调村民纠纷、祭祀等方面发挥作用。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维护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使得村庄的社区感浓厚，他们也影响着年轻人的行为做派。

村里的习俗也包括对待死亡的态度。村子里禾仓多，我和摄影记者张雷注意到，禾仓下边竟然放着不少棺材。一开始我们以为只是少数老人为自己备好了棺材，但是绕着村子转转，却发现绝大多数禾仓下面都是一副副挨着的棺材。这样的场景让人觉得惊讶，如此简单的一个画面，却默默承载着一个人生与死。禾仓上满载的稻米是生的喜庆，禾仓下的棺木是死后的处所。

“总寨老”吴世德说，地扞的村民有着“30为木、60为棺”的习俗。人到了30岁，便到山上自家的林子里选好一根直径1米左右的木头，画上标记。等待这根木头再长30年，自己到了60岁，就要砍下来做棺材了。一副粗木甚至可以给夫妻俩做棺材。木头砍下来之后，并不马上制作，主人家需要挑选一个吉日，



在棺材做好这天宴请亲朋好友，庆祝自己死后的房子建好了。

吴世德带着我们穿过村民的房屋，在一个空地旁的禾仓下，指给我们看他的禾仓与棺材。他提到自



地扞村的戏台依旧是传统的木结构，地面有个很大的火塘，大家聚在一起边烤火边看侗戏

己老伴的棺材还在等待中，“本来她的也做好了，结果族里一个40多岁的年轻人意外病逝，他与我家关系很亲，我老伴这才舍得借给他。等他的那根木头长得足够粗了，他家会砍下来做好棺材，还给我老伴”。

吴世德老人说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五六前年，“应该再等不了多久就会还我们了，两三年吧”。山里老人的时光，以年来标记，缓慢悠长。

而挨着吴世德房屋的一户人家，将一副棺材放在

屋旁的木头架子上，侧面有个醒目的符号。吴世德说，这是邻居吴世熙的棺材。20年前，吴世熙27岁的儿子因肺结核病逝，老人把自己备好的棺木给了儿子用。前两年，老人认为属于儿子的那根木头终于长得足够粗了，这才砍下来为自己做好了棺材。吴世熙的儿子早逝，3个女儿都已经出嫁，现在只有老两口相依为命。好在女儿嫁到旁边的村子，离得不远，按照当地习俗，没有儿子的人家由女婿来尽孝。因此每年女婿会把自己种的稻谷送来，保证老人的温饱。村子的人住得紧密，吴世熙这样的老人并不觉得孤单，在他烧着木炭的暖烘烘的小屋子里，常常有人来串门聊天。

当我们向80岁的吴世熙聊起棺材的故事，老人眼中已经没有了儿子病逝的悲伤。我们问他愿意与自己的棺材合影吗？老人家很乐意。在他的棺材前，吴世熙尽力挺直有些佝偻的身板，整理了好几下帽子，表现出一种庄重的神情。地扞的老人们并不惧怕死亡，在每年正月的“萨玛节”，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会穿着备好的寿衣出游，与众人一起祭祀。棺木或寿衣，成了他们接受生命枯萎、亲近死亡的一种独特方式。

资本尚未到达

在地扞村，标志性的建筑是“千三鼓楼”。历史上，村里若有大事商议，寨老将敲响一面大大的羊皮鼓，聚拢村民。如今羊皮鼓早已不见，修复后的鼓楼依旧是传统的木结构，地面上有个很大的火塘，木质长凳围拢一圈，它同时是老人们聚在一起烤火的地方。在鼓楼的墙面上，贴着“村规民约”。从民约来看，防火是村里的头等大事。传统侗寨都是木头建筑，一旦失火，后果严重。村里的格局也体现了这一点，不少房屋围着或大或小的水塘，最大的功能就是防火。

地扞村规民约的第一条即写道：“凡发生火警的，处罚当事人500元；发生火灾且给其他群众造成严重损失的，当事人要请全寨人吃一顿饭，且3年内不得在本寨内建房，永远不能在发生火灾的基地上建房。”

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在今天也被人们严格遵守着。村里人向我讲起2006年发生的一场火灾，失火人家住在鼓楼旁，大火殃及了鼓楼。寨子里很多人帮忙灭火，失火的人家操办了一场酒席来表示答谢，但是他们全家人只能在山坡上搭棚子住3年，3年后才能回到村子建房，以示惩罚。而失火的地方永远不能再建私宅，“是给所有人一种警示，这里曾经失过火”。寨子里的人平时关系融洽，遇到失火这样的意外，

既有温厚的援助，又有严格的惩戒。

有意思的是，这户山坡上的人家，颇有些因祸得福的命运。因为无法在村里建房，这家的年轻人便到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刚好遇到市政建设征了他的地，在村民看来，他总算发了一笔财。而这家老人，据说习惯了山坡上的安静舒适，3年后也不肯搬下来建房。

由于地扞几乎未经开发，村集体谈不上有多少收入，它没有体现出富裕村落出现的问题——有些村因为有了较大的集体经济利益，村民们总觉得自家占得不够多，因而彼此埋怨。地扞人情味仍旧浓厚，颇有夜不闭户的风气。

地扞人的传统观念里还有一样不可缺少，即老人和田地都需要年轻人的看护，所以家庭内部的年轻人会轮流出去打工，有些人如果觉得家庭需要照顾，会尽量打短工，出去十天半个月，很快又回家。5公里外的308省道正在升级改造，它使地扞人进出村寨更加方便了。

虽说地扞村不富裕，可是人们对家的眷念和对老人的责任，并没有因为打工的经济利益而完全动摇。走在村落中，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闲散舒心的气息，村民也许钱不多，但对生活并不怎么焦虑。或许是村里保持较好的价值观，实际上给了人们一种依靠，每一样事情该怎么做，都有先例和民俗可寻，带给人一种安全感。

总寨老吴世德说，对于违反公共利益的人，大家会集体谴责，因此很少有人去挑战这种集体权威。这种集体约束包括对坟地的选择，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地扞附近有三座大山是不可以建坟墓的。但偶有村民会根据八字，认为自己死后应该埋在其中的某座大山里，这样的村民死后，家人只敢偷偷埋葬他。而村里有一套占卜的方法，80岁的吴学珍被公认为村里最有地位的法师，他会带领一些男性村民，通过占卜找到偷葬的坟墓，然后迁坟。被发现的村民往往会非常不好意思，知道自家破坏了寨子里的规矩，对待所有处罚也老实接受。

如果仅按经济收入来说，政府统计的地扞村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元出头，是典型的贫困村。不过这里年轻人外出打工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虽说政府有一套衡量打工收入的办法，但人均年收入3000多元的数据，应该少于实际的打工收入。

村干部告诉我说，村里60%的村民外出打工，去广东和浙江比较多，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居多。很多打工者生产汽车坐垫，但是随着近几年制造业不



刚刚卸任的地扞村前支书吴胜华，在村里当了21年村干部，梦想着出去闯世界

景气，一些40多岁的村民开始返乡，回家带带孙子外孙，也希望村里能发展一些产业，这样不离家就能赚些钱。村里人说，作为干体力活的人，四五十岁已经不年轻了，可是一旦歇下来，又会衰老得很快。好在田地一直有，种种田，养些稻田鱼，种些青菜，日常生活无须担心。

由于山路偏远，又不具备矿产资源，地扞村与工业社会发生联系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外出。村庄里维持着农业社会的所有要素，人们自己耕种，自己织布做民族服装，村里没什么人种果树，因此吃水果要去镇里买。近年来没什么人家养猪了，所以大家需要花钱买些猪肉，其他生活基本自给自足。地扞的土地适合种水稻，山坡上人们习惯种杉树，哪怕收益很低，人们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向村民提到他们身处的美丽风景，村里人无法产生共鸣：“这有什么美的，一直是这样。”风景换不

来生活的实际利益，所以年轻人仍旧羡慕地说：“还是城里好，就是我们待不下去，打打工，还得回家生孩子养孩子。”如果村里的风景能带动外来人真正到来，并且产生收益，人们才能开始亲见这种价值。

村庄、博物馆与发展渴望

由于位置闭塞，资本一直没有对地扞产生兴趣。当1999年任和昕所在的香港咨询机构来到地扞村时，引起村里很大的轰动。如果能够不离家就能赚到钱，太符合村里人的期望了。

“我们这么偏的地方，有老板看中啦？”当时的村支书吴胜华向我回忆说，“我组织了全村在家的男女老少，夹道欢迎他们，拼命鼓掌啊。”任和昕也向我提到这种误解：“政府和村民都理解不了什么是咨询公司，听说我们愿意在地扞建一个博物馆，就认为

我们是投资者。”

这家香港咨询公司，之前是因为几位工作人员音乐采风，而找到了地扞。地扞的侗歌侗戏仍然有着广泛的人群基础，这家香港机构希望借着当时国家提倡“西部大开发”的趋势，立足地扞获得发展。吴胜华和村民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认为外来人会带来致富的办法。于是村里从2003年开始征地给博物馆，2005年地扞生态博物馆开馆。

从建筑上来看，博物馆确实充分融入了当地的环境。全木结构的长廊和高大房屋沿河展开，掩映在竹林之中，占地十来亩，低调又有些奢华。村民们一开始对博物馆充满好奇，但它的定位似乎与村民关系不大。村民对长廊里几百本书籍几无兴趣，也不明白空旷的博物馆和几架织布机有什么作用。

博物馆也在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他们慢慢接受着村庄里缓慢的时光。香港机构不再投钱，博物馆需要自负盈亏。它将自己定位成为学者服务的机构，收取研究者和学生一定费用，为他们在地扞做研究提供方便。而对于像我这样的记者，博物馆每天收取300元的床位费，包一日三餐。博物馆雇用的管理人员还几次强调，这300元是一个床的费用，而不是一个房间（好几张床）的费用，“你是有熟人介绍我们才接待你的，不然你根本住不进来”。

对于村民年收入才3000多元的村庄来说，博物馆一天收取食宿费300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村民看来，博物馆在搞“高端游”，但是村民没有获得好处，反而给游客带来一种此地消费较高的错觉。在头些年，由于村里连饭馆也没有，博物馆成了来访者最现实的选择。直到最近这两年，村里开了两三家私人客栈，虽然条件比较简单，游客也算多了一点选择。

博物馆在村里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它处在村民和外来者之间。在村民眼里，它是接待外来者的；在外来者眼里，它是扎根当地的，虽然事实上它与两者的联系都不算深厚。

曾经热情欢迎博物馆的地扞村，如今对博物馆早已是一副冷漠态度。村里的合作社号召大家做手工艺品，在网店售卖，有些村民问道：“这事和博物馆没有关系吧，有关系我就不参加了。”在政府与博物馆协商后，博物馆每年给村里几万块钱，用这些钱负担村里一半的卫生费用，也算是为村里做了一点贡献。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我问起一位村干部，大家怎样看待博物馆，他想了一会儿说：“主要使村里卫生好了一点吧。”

馆长任和昕平时出入村庄，与大家并不打招呼，村民也不理他。在一个友善而亲密的村庄，博物馆与他的代言人，成了一个虚幻的存在。但是博物馆掌握着村庄所不掌握的现代话语权，这使它看上去似乎代表了村庄。在地扞越来越与外部世界产生连接的今天，村庄也开始意识到，最终他们必须依靠自己，去与外部世界对话。

53岁的吴胜华，上个月刚刚卸任村支书。在他接待朋友的家宴上，吴胜华说，他已经做了21年村干部，现在终于放下了责任，该出去闯闯世界了。地扞这样的村庄，村集体实在没有多少经济利益，做村干部成了一件做慈善一样的事情。当村干部一个月只有1000元出头的收入，而他们如果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能够增长好几倍。吴胜华高中毕业后，由于父亲去世，他失去了离家的机会，后来一直在村里当干部。他向我指指房屋内的四周，“你看看我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不出去打工就得受穷，我家里种着十几亩地，平时主要靠这些地过活”。所以除了处理村里事务，吴胜华还得经常骑着摩托车，去几公里外的山坡上种田。

村民有着发展经济的需求，他们需要致富带头人为村庄找到一条道路。但是对于地扞来说，外出的人也算不上多么成功。如果城市的旅游消费到达不了这里，村民觉得致富有些无能为力。村委会号召过大家种优质稻米、茶叶、果树，但是产量都不高，直到最近，有几个40多岁的返乡者联合起来，开始试种中药材。

外出的四五十岁村民开始返乡，而吴胜华这样从未外出生活过的卸任村干部，充满了去外面看世界的渴望。平时他在村里更像个文化人，拜侗戏创作大师吴胜章为师，业余时间创作侗戏。他会古建手艺，期望着马上出去打工挣钱。对于他所生活的村庄该如何发展，吴胜华向我历数他们尝试过的道路，都不成功，“地太少，做不了成规模的生产”。博物馆这个外来者没有使他们致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村庄通过外来者反观到了自我——没有人是救世主，怎么发展得靠自己慢慢尝试。

茅贡镇上新推出的“茅贡计划”，对村民来说，似乎与博物馆一样，目前还有些遥远。但是茅贡今天的发展前景，比10多年前博物馆到来时乐观得多。地扞的自然生态适合吸引对工业社会产生厌倦的城市人。这种发展的期望，促使大家进一步梳理自我，“如果要吸引人们来到地扞，如果要把自己的农产品打出去，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1



2



3

不过村民们对于经济的追求，看上去并不十分执着，他们有着金钱难以衡量的真实而自在的情感。我在吴胜华家吃饭的这天，刚好赶上他孙子的7岁生日。吴胜华的亲家从30公里外赶来给孩子过生日。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并不避讳地告诉我，孩子的爸妈已经离婚了，爸爸在广东打工，妈妈再嫁到了邻村。孩子的外公与吴胜华干杯。“我们两家子女的缘分已尽，没有办法。但我要来看看我的外孙，以后我老了，他能认出我是他的外公。”这位朴实的农民有些激动，又略带羞涩地说，这些年打工存了些钱，去年开始回家养猪，经济收益还不错。吴胜华两口子端起酒杯，说不管大家过得怎样，“我们永远是亲家，你今天就住在这里了，不准走”。

喝着自家烧的十几度的米酒，吃着自家稻田里产出的腌鱼，嚼着自己种的稻米，吴胜华掏出一张自己

创作的侗戏，开始念念有词。他兴致很高，打着手势，读一会儿唱一会儿。他又说起，地扪吴家如何在700多年前从江西一路迁徙而来，在哪里留下了总祠堂，人们在族谱里怎样看到自己的历史。

暖烘烘的炭火烤红了我们每个人的脸庞，我想，这些村民们与城市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族谱的记载），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山后的祖坟）。眼前的这一世，他们有自己感知冷暖的方式。城市人看似是足够自由的个体，却越来越寻求社区般的归属感。村子里的人虽不富裕，可是他们能够谈论和决定与自我休戚相关的大事：选举、土地、经济模式，人际间的温暖交往。

乡村的发展如果能够不冲淡这种维系，或许才算得上成功。我想，这是比优美风景更能打动我的、城市里很难寻觅的归属感。☑

1. 茅贡镇上改建的粮库艺术中心

2. 粮库艺术中心内部设施。乡村人的手工艺，希望制作出符合城市人审美的产品

3. 茅贡镇党委书记杨胜雄



“一座莫干山，半部民国史。”位于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上至今保留着很多民国时期的传奇老别墅



莫干山：民宿先行者

主笔 / 贾冬婷 摄影 © 于楚众



凭借特殊的历史地理，避暑胜地莫干山周边的乡村一直蕴含着价值二次转换的可能性。当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乡村，这种可能性开始变现了。

被激活的避暑胜地

我们初入莫干山是11月底的一个晚上，天黑得早，又下着雨，车在仅容两车交错的蜿蜒山路上越往上盘，雾气就越深重。导航终于提示到达目的地“颐园”，一幢石屋的剪影在茫茫雾海中浮现。想起在附近隐居的黄郛1928年带着家人第一次上山时，6岁的小女儿熙洽见山头和屋宇都在眼下，还以为“与天已近”了。

第二天早晨推门出去，发现院子里已经铺上了厚厚一层金黄和绯红的枫叶，把这幢三层老别墅的白色外墙和连廊衬托得更加干净。夏雨清2000年秋天来到这里时，也是被这样的枫叶图景所吸引，尽管当时院子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草，雨水从屋顶一直漏到一楼地板，他还是动了心，想把它租下来。莫干山景区管委会的领导一听说高兴坏了，每次一到了杭州就请他吃饭，催他下决心。他告诉我，那时候莫干山景区的门票收入很少，维修都得靠财政拨款。但他当时还没买车，从杭州过来，要先坐城际大巴从杭州到德清，再从德清县城租辆小面包车到镇中心所在地庾村，得等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在村里找到一辆车带他上山，全程几乎要花一天时间。在犹豫中又过了两年，房租从一年5000元涨到了2.5万元，他才租了下来，一租就是10年。他和家人平时住在杭州，周末到颐园度周末。



左图：1930年
宜兴富商潘梓
彝建造的颐园，
后成为莫干山
第一家“民宿”

右图：莫干山
民宿“法国山
居”创办人司
徒夫

“女儿小学时的各种假期，基本上都是在山上度过的。她喜欢小动物，养过狗，养过翠鸟，养过小鸡，还养过刺猬，在杭州是不可能的，在山上就可以。”

如今女儿长大，夏雨清一家来得少了，但颐园还留着很多他们生活的痕迹——楼梯拐角处挂着女儿小时候的画像，一位负责打扫房间、烧饭做饭的阿姨已经在这里十几年，见人就热情地扑上来的大狗“小白”也俨然是这里的主人了。因为一开始要自住，偶尔招待朋友，夏雨清精心装修了五个卧室，每个都带空调和独立卫生间。“一开始租下来时根本没想要要开‘民宿’，当时也没有‘民宿’这个概念，就是拿来自己住的。后来发现，我们一家人最多只需要一两间屋子，其他房间空在那里没有任何价值，时间长了还容易坏，就把这些房间分享出去了。”

颐园成为莫干山的第一家“民宿”，起因是2006年附近搬来了一个新邻居马克。马克是英国人，之前在上海做一本英文杂志的主编。他第一次来到莫干山时下着小雨，空气湿冷，他觉得“眼前出现的不是上海郊区那种假模假样的西班牙式别墅，而是一个欧洲

小村庄，好像是从阿尔卑斯、普罗旺斯搬过来的。这里很像北威尔士，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于是他带着夫人和两个小孩来山上开了一家咖啡馆，并把自己在上海认识的那些外国人都吸引了过来。那时候国庆节一过，所有旅馆就都关门了，“老外”们找不到地方住，马克就领他们来颐园借宿。“那时候的颐园是莫干山住得最舒适的地方，每晚房价1800元，还是供不应求。于是马克咖啡厅里的几个‘老外’也开始自己找房子开民宿，高天成开了‘裸心谷’，司徒夫开了‘法国山居’，莫干山逐渐热闹起来了。”

这不是莫干山第一次被发现。莫干山的历史始于春秋末年，传说吴王阖闾派干将、莫邪夫妇在此铸剑，这座山也因这举世无双的雌雄双剑而得名。剑锋要清湛如水，剑气要纯粹明澈，必须借助上乘的山林、泉流环境，莫干之景色可见一斑。而它真正声名鹊起，是在20年代开始成为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最初是在1891年，美国浸礼会教士佛利甲从杭州沿运河“游猎”至莫干山，当时正值盛夏，而莫干山上竹木遍地，清泉竞流，清凉幽静，他认为这里是天然“消夏湾”，将

所见所闻刊发在英文报纸上，吸引来大批传教士，白鼎、伊文思、洪慈恩等开始在山中购地建屋。莫干山上现在还留有英国商人贝勒在1896年建造的别墅，也是山上第一幢别墅。据说贝勒不惜重金，所有的建筑材料都从英国进口，水路送至山下，再由人力搬到山上。当时，莫干山与上海、杭州之间虽然没有开通公路，但水路能够通达，算是比较方便，沪宁杭一带传教士、洋商等纷纷在此聚集。据《莫干山志》记载，1896年之前，从沪宁杭去莫干山，“需乘大船至塘溪，易浆舟，过德清，抵三桥埠，再雇挑夫、轿舆，经杨梅岭、新凉亭、乌程桥至庾村，经老路，登山至荫山街，历七日方达”。到1898年，外国人的“莫干山避暑会”成立，制定了详细严谨的管理章程，并大举建设山中道路和公共设施，后来山上礼拜堂、公葬所、网球场、游泳池、银行、旅行社、旅馆、商店、西餐馆、幼儿园、邮局、电报局一应俱全，连商务印书馆都来开了两家书店。夏雨清描述莫干山当年的盛况：“那时候莫干山被称为浙江的‘上海滩’，杭州还是‘乡下’。当年的外文报纸上曾刊登过一条消息，说有5000个老外同时在山上避暑，上海的老外基本上都来了。山坞坞那里有个杀牛场，每天杀两三口牛，因为老外要吃牛排。”

避暑地是近代亚洲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的四大避暑地——北戴河、庐山、鸡公山和莫干山，一开始均有西方传教士开辟、管理，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纬度较高地区居住的欧美人对亚洲夏季炎热、潮湿气候的不适应。莫干山在20世纪初迅速发展成避暑胜地，也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它位于天目山余脉，天目山山势西南高，东北低，从杭州湾来的南风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杭嘉湖平原进入莫干山，来自太湖方向的风也可沿莫干山的斜坡飘然直上，这就使莫干山“时时皆有风，处处有凉意”，温度比山下低十几摄氏度。而且，它距杭州45公里，距上海190公里，距南京280公里，是人口稠密的沪宁杭三角地带难得的清凉地带。但是，从19世纪末传教士购地筑屋起，尤其是自“莫干山避暑会”成立，莫干山的部分主权长期被外国人占据，华洋之间的经济纠纷越来越激烈。一直到1928年，“莫干山管理局”成立，莫干山的行政管理权才被正式收回。外国业主纷纷转卖房屋，民国要员、富豪、买办、社会名流相继上山修建别墅。

夏雨清的“颐园”就建于莫干山被收归后，原主人是宜兴富商潘梓彝，那段时间也是莫干山的建设鼎盛期。夏雨清告诉我，其实一开始来莫干山的传教士

没什么钱，建成的房屋也大多比较简陋，留存至今的不多。现存的200多幢老别墅，大多是1928到1937年间由中国人兴建，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色。比如颐园，位于景区中心荫山街边上，顺着竹林掩映的长长台阶走下去，才能看到它的主体建筑。这幢西式别墅带有避暑地建筑的标志性外廊，能避开直射日光，获得良好通风，当时的流行观点认为，在这里可以“吃便餐、喝茶、吸烟、谈笑、编织、读书、下棋，以至享受午睡之乐”。而从别墅经过荫山洞，穿过小红桥，则是潘梓彝几年后建造的中式华厅，走廊上围绕着朱红色栏杆，四面落地长窗，屋梁、门窗上绘有各色花卉图案。华厅旁的水潭边，还建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个网球场，堪称民国“两大时尚”。夏雨清曾见过颐园的设计师郑生孝，当年他是郑远记营造厂的少东家。他告诉夏雨清，颐园是他负责的第一幢别墅，潘梓彝带着他到上海去看最时髦的样板，回到山上翻建出来。1928到1937年建别墅最鼎盛的时期，山上的建筑工匠就有2000人。郑远记营造厂虽然不是最大，也有100多人。一批传奇性别墅也建于此时，比如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民国元老黄郛的“白云山馆”，据说蒋介石和宋美龄新婚后会在这里的露天圆厅共舞，现在舞池边还有一棵两人亲手种植的美人山茶；还有“皇后饭店”，曾是陈毅、彭德怀、张云逸等多位将军的下榻处，毛泽东1954年也来过。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别墅的产权被收为国有，避暑地莫干山也沉寂下来。

其实，整个莫干山区域分“山上”和“山下”两部分。作为避暑地的莫干山，“山上”的部分，是国家4A级景区。自1928年起，景区一直归“莫干山管理局”管辖，管理局直属于浙江省。莫干山管理局局长助理刘建林告诉我，景区面积尽管只有3平方公里，但包括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200多幢老别墅，其中43幢是国家级保护建筑。他认为，景区一直由浙江省直属管理，才为整个莫干山区域保留下一个“老底子”。不过，也是因为“山上”的景区和“山下”村庄的行政割裂，发展不平衡，矛盾重重。最突出的是因为德清县的工业都放在东部，莫干山所在的西部山区作为水源地，所有产生污染的畜牧业、加工业都被清退，村里又享受不到景区的任何门票收入，以至于以前经常有游客上山的车辆被堵在村口。而没有“山下”的带动，景区经营也很萧条，季节性特别明显。刘建林形容说：“叶子一落，人走了；叶子一长，人来了。”他告诉我，这一轮民宿热带来了莫干山的“逆增长”。“民宿大都开在山下村子里，现在山下比山上热闹多了。”



莫干山民宿“西坡”合伙人钱继良（右）和刘杰

洋家乐：更像“中国乡村”

如果从民宿经营的角度看，山上的老别墅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很多别墅是文物建筑，出租受限；即便租下来，也不能随意改造。于是，在夏雨清之后要开民宿的人，在山上找了一圈之后，纷纷决定下山。

第一拨是常来马克咖啡馆的“老外”们。法国人司徒夫行动最早，他2007年找到一个叫“仙人坑”的废弃茶厂，买下了茶园所在的120亩地。他此前已经在上海成功经营了复兴西里的项目，对于老房子的修复和重生有着独到见解。他告诉我，欧洲经历过从“旅游”到“度假”的转变，他认为这一转变也必将在中国发生，所以不惜重金在浙江乡村建造了这么一座“法国山居”。他强调，建筑外立面完全参照了当地民居样式，黄墙、黑瓦，内里却是原汁原味的法式风格。随后是南非人高天成，他在莫干山西侧劳岭村一个叫山坞坞的地方租下几栋房子，

建成“裸心乡”，位置很偏，但很快爆满。其实装修没花多少钱，但带来了不一样的理念。“房间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煤气。夏天靠电风扇，冬天靠每个房间安装的火炉，烧的是本地废木料、木屑压缩制成的柴火。门前有蓄水池承接雨水，须得循环使用。垃圾要分类，树叶、苹果皮会埋在地下。”更开创了一种“乡村美学”，把村里拆房剩下的雕花木梁、石礅、马槽回收上来，用作装修材料。最具创意的是对马槽的使用，下面凿个下水孔，成了一个双人洗手盆。夏雨清告诉我，这些老外开的民宿单价特别高，“法国山居”要卖到6000元一晚，裸心系列的升级版“裸心谷”均价要3000元。其实民宿的入住率达到30%就可以保本，而实际入住率一般都能到70%，所以莫干山的民宿在2013年开始全面爆发。

因为最初几家民宿是外国人开的，莫干山打出了“洋家乐”的品牌，以示与以往农民自建的“农家乐”拉开距离。其实，后来涌入的都是中国人，他们也很



左图：“大乐之野”创办人之一吉晓祥。民宿名字源自《山海经》，本意为“被遗忘的美好之地”

右图：“颐园”主人夏雨清



快更新了自己在农村建房的标准——“更像中国乡村的样子。”之前在上海做珠宝生意的德清人钱继良几年前到莫干山，跑去高天成的“裸心乡”取经，发现自己原来的审美完全被颠覆了。“老高那里是怎么回事？房子都是旧的，梁都歪歪扭扭的。去多了，眼光就不一样了。以前我去木材市场买老木头，都是挑那种粗的直的；现在我一去，他们就已经帮我留出了最弯的那根。”钱继良告诉我。他在“裸心乡”附近租了10栋老房子，看上去都破破烂烂的，他却保留下原来的外观，只在内部做改造，每一栋也沿用了原房东的名字，“玉芳家”“玉宝家”“老康家”。钱继良穿一件古着毛衣，告诉我民宿“西坡”一些不被注意的细节：“那几把餐椅后背上包了羊毛靠垫，是从摩洛哥集市上淘来的毯子拼起来的；吊灯是上海和平饭店改造时收购来的，落地灯是与一个艺术家合作款，用铁皮一片片敲出来的。”这种审美也影响了周围村民自建的民宿，“有一个村民儿子结婚，在村里盖了簇新的‘西洋房’，结果儿子打工回来不满意，把外面瓷砖都敲掉，内部也重新装修一遍，总共花了近100万元，又改成‘老房子’了”。所以，如今在这片民宿集中的村子里走，已经有点分不清哪栋是新房子、哪栋是老房子，哪栋是“农家乐”、哪栋是“洋家乐”了。

严格意义上说，城市人到村里来租房改造，找人来代为经营，并不是真正的民宿。参与莫干山庾村改造的台湾人林彦良告诉我，台湾对“民宿”就有政策限定，其中包括：必须是自有物业，而且主人自己也住在里面；经营房屋不能超过五间。这是为了保证客人有家一样的温暖体验，另外经营不超过五间房的话，房租收入有限，房东就不得不拓展辅助产业，比如农耕或者餐饮。不过，回头看台湾民宿的开端，是在80年代，一对原本在新竹科技园有高薪工作的夫妻被裁员，他们回到祖辈在山上的一栋三合院老宅，老公做木工，老婆编织、画画，同时招待朋友，这种模式慢慢传开，如今传到大陆了。照这个标准，无论莫干山的“洋家乐”看上去有多美，要在民宿里同时有真实的农村和农耕生活体验，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被改变的乡村

当吉晓祥和杨默涵2012年到碧坞村找房子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群略有戒心的村民。那个时候还是民宿全面爆发之前，有影响力的就那么几家，都聚集在莫干山西侧的后坞一带，渐成小气候。他们俩绕到莫干山后山，发现尽端的路边有块代表景区的黄褐色标



识牌，“江南碧坞”，发现那里面有一个溪水穿流穿过的小村，溯溪而上，有飞瀑倾泻而出，形成龙潭。这样的景观当然不会被埋没，事实上，之前这里曾作为景区，被承包给一个开发商，有42户人家划在里面。但后来开发商和村民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开发商要把村子圈起来收门票，但有的村民家开了农家乐，就会带客人逃过门票；还有些不开农家乐的村民，分不到收入，也反对这种景区模式。再加上碧坞村地方偏僻，游客稀少，开发商在2007年就经营不下去，撤走了，村庄也陷入沉寂。吉晓祥他们来的时候，村民们和这个开发商之间这笔糊涂账还没算清楚，对外来者本能地不信任。

吉晓祥和杨默涵并不了解这其中的利益纠葛，就是看中了这个村庄的风景和聚落，想多谈几家，打造成心目中的“大乐之野”——这个名字源自《山海经》，本意是“被遗忘的美好之地”。他们两人原来都在上海做城市规划，“规划师都有一种‘上帝视角’，看什么都是自上而下的，进入村庄发现完全不一样。以前在上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清晰，有一说一，土地房屋也有规范红线，属于谁的清清楚楚，而村里不讲规则，是个人情社会。记得我来的时候，有个阿姨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小吉啊，在我们这里，我跟你感情好呢，你做错了事情，我们也是帮你的；如果

我们感情不好，你虽然做啥事情都是对的，但我也不一定会帮你的。’”吉晓祥告诉我，对于外来的开发者，村民们一方面很期待，因为景区在2007年关闭之后，之前的那些农家乐也都开不下去了，一直没有挣钱渠道。房子租出去开民宿的话，每年租金两三万元，一租20年，一次性可以拿到五六十万元，是很好的机会。但他们又有很强的自尊心。“很多做民宿的人本人经常不出面，村里面就很反感。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到我这里做生意，侵占了我的利益，不能随便找一个什么职业经理过来，必须老板来。好在我们都是亲力亲为地去跟他们打交道，关系处得还比较好。”

就这么一家一家去谈，好不容易谈下了七栋房子，过程中不断遭遇各种意外。“3号楼盖到一半的时候，有个村民跑过来说：‘这个房子是我的，不是你们签约那个人的。’我们很意外，之前租房的时候土地证、产权证都在啊。后来一问，原来他是曾经住在里面的，30年前房东说把房子给他，但是只有口头协议，没有过户。他现在一看房子租出去赚钱了，不干了。跟他讲法律没用，这里最忌讳的就是讲法律。还得请租房给我的房东去协调。”

如今“大乐之野”几栋外观简约的白色楼房分散在碧坞村里，和溪流、竹林、村民的住房、新开出的农家乐，交织穿插在一起。尽管不像“裸心谷”“法国山居”那样圈成一个封闭的区域，几栋楼之间也有距离，但丰富性和乐趣也在于此。“大乐之野”和村民之间也因各种区域交叉、产权勾连，结成一张密切的关系网。吉晓祥告诉我，他们刚来时，经常跟村长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想跟他搞好关系，没想到第二年他就被民主选举给选下去了。而他们租下的其中一栋楼的房东是前任村支书，退休之后给他们做管家，他自己家的农家乐明年也马上要开了，还请他们帮忙设计。更巧合的是，他们在村里遇见之前上海修车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拉他们去德清县城里开餐馆的哥哥沈蒋荣那里吃饭，几个人一聊，沈蒋荣决定把自己在村里的房子也改成民宿，请来“裸心乡”的设计师做成了“莫梵”，自己也回到村里打理，又包下附近几亩菜地，做山野菜，酿蓝莓酒。很多人都说，别的民宿是“店”，老沈这儿是“家”。

杨默涵认为，碧坞村最大的变化，是能看到年轻人了。以往那种以景点为目的地的老年团模式正在被淘汰，现在的主力消费者在30岁到40岁，大多有房、有车、有孩子，他们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寻求差异化、非标准体验的，所以聚集一批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很重

要。“大乐之野”现在的店长就是隔壁村的，他在杭州读了大学，发现老家有这么个工作，就过来应聘管家。过了一两年，就升任店长了。吉晓祥告诉我，在民宿工作收入不低，工作节奏不是特别强，还兼顾体面性，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返乡。碧坞村的“茶二代”沈婵樱在毕业后也回到莫干山，因为这里有她们家世代种植的黄茶的生产、加工、销售和终端的整个产业链条，她家在山上有200多亩茶园，和大乐之野、西坡等民宿合作售卖，还在庾村开出了黄茶体验店“云鹤山房”。严格来说，她已经是第三代茶人了，爷爷是国有茶厂的厂长，爸爸沈云鹤后来自己承包茶山，做名优茶，成为黄茶国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她想往前走一步，传播茶道和茶的生活方式。她告诉我：“黄茶是在绿茶加工杀青揉捏后加了一道‘闷黄’的工序，使原来的绿茶变得更纯。由于‘闷黄’的工艺复杂，现在做黄茶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黄茶在‘闷黄’时，最难掌握的主要是发酵程度，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酵过头，对口感和香气的影响会非常大。这些工艺目前只能靠老师傅的经验，花时间去感觉、摸索和把控，最长的一种‘闷黄’要72小时。”尽管制茶过程奥妙无穷，但她并不想把茶道仪式搞得特别繁复，拒人于千里之外，茶坊空间和器具也十分简洁。她觉得，茶就是一种日常生活，而且来莫干山的人也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莫干山走了一条独特的乡村复兴路径。吉晓祥说：“传统思维是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莫干山则是自下而上地由无数小业主做起来，像各路武林高手会聚的江湖。政府并不介入这些‘新村民’和‘老村民’之间的交易，无为而治。”尽管现在如火如荼，但吉晓祥有些担心莫干山的民宿市场会被稀释。“城里人每两三个月到乡村来释放一下，呼吸新鲜空气，吃淳朴的有机菜，这是还在扩大的刚性需求，但是以前是莫干山一个点，现在长三角正在遍地开花，今后分配到莫干山的量有可能会变小。”吉晓祥说，现在很多村民看到民宿赚钱就要进来，一投就是几百万元设计改造，比如他们的房东、前任村支书就投入300多万元，但他们可能并没有理解这样改造的真正内涵。而且都将房间定位在1000块钱以上，但如果硬件做不好，服务理念跟不上，定1000块的用户体验也是很差的。所以他和朱胜萱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莫干山民宿联盟，之后又成立了民宿学院，并和“开始众筹”旗下的民宿服务平台“借宿”合作，就是为了抱团取暖，形成合力，抬高“非标准化、去中心化”民宿的标准。“最早是‘裸山谷’成为一种现象，把莫干山的名气打出

来了，但它和村庄没什么关联。真正把村庄带动起来，还得靠这些乡村民宿结成共同体。”

“莫干乡村改进”的遗产：超越民宿

每次来到莫干山，朱胜萱总要去拜祭一下黄郛墓。墓地其实就在镇中心所在地庾村，但是如果不经指点，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里。朱胜萱带我们绕过当年的藏书楼、蚕种厂所在地，一个石头垒成的简易半圆坟墓就隐藏在后面的林子里。他说，这只是个衣冠冢，真正的墓已经在“文革”时被毁了。墓前的石碑显然是断成两截后重新拼起来的，“黄郛、沈景英之墓”字样也是被凿去后重新刻上的。朱胜萱扶起墓前供的花瓶，默默站了一会儿。

我们在莫干山的这几天，“黄郛”就像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莫干山的很多历史都跟他有关联，但这个名字总是被寥寥几句带过。这个被遮蔽的人物曾是民国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之一，早年和蒋介石义结金兰，还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上海市长、外交部长等重要职位，却因1928年“济南惨案”处置过程中被免职顶罪，后在1933年“塘沽协定”处置中再次替人受过，从此身负“亲日派”“卖国贼”等污名。他在“济南惨案”后退出政坛，人生的后半段就与莫干山紧紧联系在一起了。1928年，黄郛带着夫人沈亦云隐居莫干山，全身心投入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直至1936年病歿，葬在了庾村。此后沈亦云将“莫干乡村改进”又苦心孤诣地继续了十几年，直至1950年。

黄郛和沈亦云的“莫干乡村改进”是以上莫干山的必经之地——庾村为基地的，如今这里是镇中心所在地。一开始他们购得了山上的“白云山馆”，作为退隐之所，但和周围村民渐渐熟悉后，决定要为村里做点什么。据德清县教育学者罗永昌考证，上世纪30年代初，庾村方圆十里，有6个自然村，共120余户，分布在莫干山两翼的环抱中。他们之中，只有一人读过“四书五经”，三个人描花押，八九个人会写名字。全村仅有千余亩耕地，村民大多属于佃农，靠不到200元的年收入要维持五口之家的日子，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在黄郛心中，农村事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数千年来养国家者农村，而国家尚无暇谋所以养农村者”，而理想的农村，当有“习于农村、了解农村”的基本人才，所以他决定先从办学入手，创办了以“耕读并重、勤俭忠慎”为宗旨的莫干小学，主张“以学校为中心，谋农村之改进”。依托小学，开办了蚕种场、奶



上图：上海东联设计集团首席设计师朱胜萱在莫干山民宿学院讲课

下图：朱胜萱打造的庾村文化市集，包括茶坊、萱草书屋、餐厅等，成为城乡互动的空间节点





1

牛场，以场养校，教育与生产实践结合。之后又建造了一批乡村公益设施，例如膺白图书馆、白云池水库等。解放后，沈亦云经香港去美国，将莫干小学、庾村蚕种场、奶牛场、农场、林场等资产，悉数捐给政府管理。他们的“莫干乡村改进”颇有成效：经过战乱，庾村并无失学儿童，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是莫干小学毕业生，一些毕业生至今尚在；莫干蚕种场的“天竺”牌蚕种成了方圆百里叫得响的牌子；对于村民风俗与习惯的改进、社会及生产的观念，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朱胜萱是上海东联设计集团首席设计师，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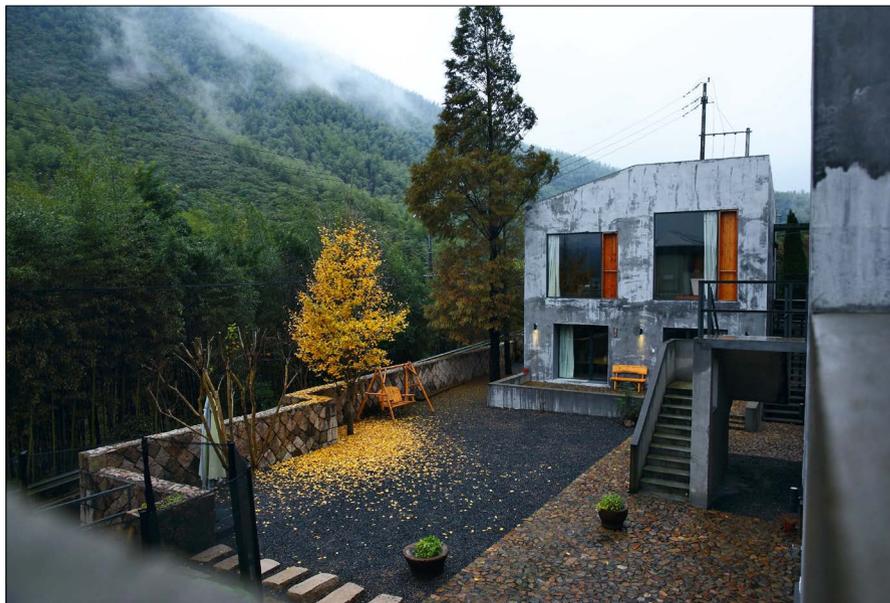
做完世博会景观工程项目之后，生了一场大病，决定去离上海最近的山脉莫干山休养。“我老家云南是山区，有各种各样的大山，在上海看不到山，就很想念山的感觉。”他来到莫干山时，黄郛和沈亦云乡村改进的各种痕迹仍在，冥冥中似乎有一种精神联系。“黄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时候开始做乡建，也是从上海来到莫干山。他的乡村试验虽然被历史尘封了，我能不能延续下去？”他的一个朋友听说，给他打了个电话劝阻，“这就像给一个快病死的病人身上贴一块创可贴。”朱胜萱很受触动，“我们现在做乡建，到底能为乡村带来些



2



3



1/2. “大乐之野”和村庄交织在一起，带来了居住的丰富性和趣味性
3. 由废弃小学改造成的民宿“清境原舍”二期，看上去很质朴，墙面就是水泥砂浆

什么？用‘创可贴’的方式解决不了现在面临的问题。城镇化的步伐是抵挡不住的，高效、便捷、医疗、交通、教育，我们迟早要帮乡村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非城镇化的一条路可走？”

朱胜萱告诉我，乡村建设单凭情怀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转化为商业模式。乡村需要资金和资本，而资本也需要有一个通道进入乡村，关键是乡建者能不能把这个城乡二元断裂的通道打开。他决定沿着黄郛当年的路径，继续在莫干山做乡村改造的实验。他了解到，这里除了竹笋业，残存的小耕作只够自给自足。

很多土地空闲着，也未改善该区域的生态，不少耕地和房屋被废弃。算上被清空的苗圃、破败的村公所、养鸡场等，共计60亩农地和一些茶地，于是向乡政府提出打包租下，租期20年，试图在莫干山建立一个乡居、农园加市集的乡村生态圈。

乡居在山间，将村里的一个废弃小学改造成民宿“清境原舍”。小学位于莫干后山的村道旁，已经被废弃了5年，此前多次换主，还做过养猪场，这样的资源不被村里看好。但朱胜萱觉得，这块建设用地面青山、背茶园，旁边是一大片尚未开垦的农田，有独特的地理

优势。“当时村支书说让我们出点钱买了算了，我坚持没买，因为这对集体经济是致命性的破坏。我租下来的话，这房子这产权还是村集体的，村里可以拿这块土地去抵押贷款。如果我买下来，盖成别墅卖掉，有村民能去那里上班吗？能跟村里的产业发生关联吗？”改造好的“清境原舍”看上去比农民房还质朴，没有油漆，没有涂料，没有夹板，没有用任何合成的材料，连洗漱台都是混凝土的。刚建好的二期更是让人产生错觉，墙面就是水泥砂浆，总觉得还有一层没刷。这正是朱胜萱追求的，他说：“很多农民房就是这样的啊。水泥砂浆就是水泥砂浆，不需要用昂贵的素混凝土来模仿它。”

60亩农园就在“清境原舍”下面的村子里。“这里原来被承包种植了一片香樟林，香樟挖走后，整片土地像被地雷炸开过，留下大大小小的坑，养分全流失了。雨天积洼，干旱时干裂，根本无法进行种植。我们让土地休耕，通过种植固氮的牧草、毛豆这类植物，让土地依靠植物自身恢复肥力，还对周边崩溃的水系做了处理。直到两年多后的夏天，才首次有了玉米、秋葵、红薯等产出。”朱胜萱设想，复耕后的农园不只种菜，还可以做本地物种的复原，同时也吸引城市人来烧烤野炊、下地采摘等，目前正在跟一家户外俱乐部谈合作，拿出一部分让他们开辟为活动基地。农园请了两名本地村民来管理，其中一位崔建平是原来的村支书，他家的产业转换也是村庄的一个缩影。“这里是水源地，原来的拉丝厂关闭了，也不鼓励种田，最好种树，因为以前种田要打农药，有污染。以前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毛竹，90年代初我们一车一车地拉毛竹去上海卖，当时城市大开发，脚手架都用毛竹搭，供不应求。一个工地开起来，就需要几十车、上百万斤毛竹。那时候毛竹价格也高，40多块钱100斤，现在一半的价格也没人要了，脚手架都用钢管了，人工成本也高了。所以很多人砍了毛竹，改种茶。也有不少人想把自己的房子改造一下，开民宿。”

市集就放在了莫干山镇中心的庾村。“当年莫干山何其热闹，所谓‘一座莫干山，半部民国史’，而现在仅留下一些老建筑，历史记忆都没落了。整个镇区比较萧条，传统手工艺逐渐流失，饮食文化、乡村布局等也在没落。如何植入新业态来激活乡村文脉？”朱胜萱提出在庾村做文化市集，包括自行车餐厅、民宿学院、茶坊、萱草书屋等，以此作为城乡互动的空间节点、物资集散的商业节点以及邻里关系的社区节点。市集所在地，正是被废弃的蚕种场，黄郛做农村改造的生产基地。蚕种厂出租后，搬家到原来的奶牛

场所在地，改成青少年拓展训练和自然教育的“蚕乐谷”，只把蚕育种环节保留了下来。蚕乐谷经理蔡永良告诉我，这里的蚕种非常有名，最早是黄郛办厂时从日本引进的杂交种，因为是莫干山小学的产业，所以叫“学堂种”，蚕种厂就是靠这个发展起来的。他说，蚕是冷血动物，对温度比较敏感，所以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严格的温控。现在还可以看到蚕种厂旧址有地火龙，墙壁也是中空的，都是为了让温度更加均匀。厂房外墙上大小高低错落的窗户，则是为了控制不同蚕期的通风。现在丝绸的销量不好，人力成本又高，所以他们只保留了育种环节，供给民间养殖户，但现在很多人家也不愿意养蚕了，觉得养蚕麻烦，又不好清理，所谓“盖一座新洋房，就毁一个养蚕户”，这一湖州的传统产业也在没落。他说，我国虽然是丝绸原产地，但销量并不高。相比之下，丝绸在日本的人均年消费量是280克，而我国只有8克。他们之所以还在周边坚持做蚕乐谷，培育蚕种，也是期待莫干山民宿的兴旺，能把丝绸的产业链打通。

朱胜萱形容，乡村升级现在是一艘巨型航母，承载的东西特别多，可能性也特别多。“民宿就是抛下去的锚，让这艘航母可以停靠和补给。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民宿，它提高了租金，解决了就业，并且保护了传统村落。莫干山的老房子就真的有人要，新房子则被拆了重建。政府不用花一分钱，‘美丽乡村’就做完了。未来民宿的相关产业会延伸出来，还会成为文化的出口。”

“下一步要做的是村集体经济的复苏。”朱胜萱说，现在开民宿是跟村民分成，开民宿的人拿很多钱，村民拿很少钱，因为风险都在一方。“未来可以尝试跟村集体联营和合股，村集体出台统一的公司，租老百姓的地，我们跟政府租，跟村民不发生关系。村集体可以用另外一只手调控，过程中会形成新的产业经济。民宿和土地值钱了，还是村集体的，我们也拿不走。这就是集体经济的再次复苏，只不过集体的概念转换了。再进一步的话，政府可以成立一个民宿旅投公司，注册资金一个亿，让所有的小股东进去各占部分股份。莫干山有30多个民宿的品牌，这家公司两年内能上市。如果把所有的民宿放在一起，一家每年有400万元的现金流，200万元的净利润，10家民宿就4000万元，100家就有4个亿。按10%一年4000多万的净利润，随便比哪家上市公司净利润都好。民宿这一小微产业也可以聚合很多的能量。”

（实习记者项文虎对本文亦有贡献）



请 拒 绝 购 买 虎 制 品

虎 种 群 已 极 度 濒 危

野生救援
WILDAID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when the buying stops, the killing can too



艺术再造乡土：越后妻有留下了什么？

主笔 / 贾冬婷 供图 /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执行委员会

在农业人口只剩 5% 的日本，越后妻有是一个乡土再生的标本。创办 16 年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并不能阻止这里的年轻人离开，但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一两件艺术品，更是为了找寻关于土地和自然的原生记忆。

1. 伊利亚·卡巴科夫作品《梯田》
2. 木村崇人作品《太阳 + 足迹》
3. 大成哲雄、竹内美纪子作品《上虾池名画馆》
4. 手塚贵晴、手塚由比作品《越后松之山“森林学校”KYORORO》
5. 大岩 Oskar 作品《稻草人项目》
6. 大成哲雄、竹内美纪子作品《上虾池名画馆》



〔Osamu Nakamura 攝〕



〔Tetsuo Onari, Mikiko Takeuchi 攝〕

3



〔Osamu Nakamura 攝〕

里日本，找回“原风景”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川端康成《雪国》的开头，鲜明地勾勒出古越后国的典型场景。越后有便是这片区域的入口，覆盖着新潟县南端十日町和津南町 760 平方公里的土地。“妻有”在日语里有“死角”之意，事实上这里也确实是不进不便的死角——一年当中有一半时间都被埋在大雪里。

我们在 11 月初来到越后妻有，黄叶正在一场秋雨中飘落，雪季也不远了。新干线从东京到新潟，两小时的距离，明显感觉到气温骤降了七八度，高楼林立的都市景观也一下子变成开阔的田园风光。从地理上看，日本本州被中央横贯的脊梁山脉分为两部分，东京等大都市都在靠近

太平洋的一侧，新潟所在的山阴地方和北陆地方则靠近日本海。西伯利亚来的寒流与温暖的日本海提供的热气和水分相遇后，在脊梁山脉前方大量降雪。越后有妻有降雪量尤其多，平均降雪 2.4 米，海拔最高的村子甚至常出现深达 4 米的积雪。雪季之外的日子里，全年仅能保证 100 天的日照天数，但千岛寒流与黑潮暖流交汇，大陆的季风越过日本海，正是适合水稻种植的气候。再加上日本第一大河信浓川带来肥沃的泥沙，在经年累月中形成“河阶台地”地貌，农民在此耕作水稻，出产的“越光米”在日本首屈一指。据 1827 年的人口统计，新潟县地区人口为 145 万，是东京府 78 万人口的近两倍。如今农田间仍散布着许多农舍、住房和碾米厂，还有各村中心设置的中小学校，昔日农业的繁盛可见一斑。但是，自 18 世纪起，日本为了实现“脱亚入欧”等近代化目标，开始侧重于在太平洋一侧的大城市发展工业，包括越后有妻有在内的日本海一侧则逐渐变成向工商业城市提供粮食的边陲市镇，沦为“里日本”。甚至连信浓川唯一的宫中水坝所产生的水力发电，也专供东京都市圈山手线与中央线的电车运转。“二战”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爆发性的增长，“工业一边倒”带来首都都市快速扩张与新潟农业持续低迷的双重效应，城乡差距再度拉大，越后有妻有等山区农业地带的衰退首当其冲。

在位于十日町中心的里山现代美术馆，我们见到了北川富朗，越后有妻有大地艺术节由他一手创办。自 2000 年开始，这个三年一度的艺术节已经举办了六届。里山美术馆由建筑师原广司设计，他用清水混凝土构筑了这个规则正方体，营造出一个凝聚周边芜杂村庄的精神空间。里面展示的作品也是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包括暴雪、信浓川、越后的泥土、河岸阶地、绳文遗迹、山毛榉林、隧道等。北川富朗说，希望人们在这里体会到一方土地里嵌套着世界，而越后有妻有里嵌套着整个日本。他认为，日本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失去的东西，最显著地体现在这个大雪覆盖、人口稀疏的山区农业地带，那恰恰是最珍贵的“原风景”——蕴含日本人传统的心灵归宿和文化原乡的风景。

出生在新潟的北川富朗告诉我们，他真正深入这片区域是在 1996 年，那时候日本要推动市町村合并，目标是把当时的 3229 个市町村，10 年后合并为 1000 个。但越后有妻有的 200 多个村庄半年里都在下雪，要合并没有那么容易。为了从社区营造角度推动合并，新潟县就邀请策展人北川富朗去越后有妻有的一些村庄调研。他发现，每一个村庄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风俗习惯，如果把多元性的现代艺术放进这些村庄里，或许会很有意思。“一开始大家对由市中心带动的招商引资有过期待和幻



(Junya Ikeda 摄)

越后有大地艺术节创办人北川富朗

想。但是后来发现，艺术节获得的支持大都来自老年人，因为这一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可以说是一个逐渐被抛弃的地方。如果还坚持经济优先的话，人口将继续减少，村庄会最终消失。”更让北川富朗震惊的，是因无法维持生计而导致的对自身认同的丧失。“不时听到‘停止农业’‘奖励减少农耕’，甚至‘种田回报太差，还是到城里去吧’之类的劝诱，年轻人纷纷离开土地，只剩下老年人。虽然年事已高，老爷爷还是要在山野间来回走动采摘野菜，老奶奶要刨开积雪拔出萝卜和牛蒡，经常有被大雪掩埋的意外发生。住在山里的老人家们，至少有两成告诉我，‘等下次孩子回来，恐怕就是我葬礼的时候吧’。”

北川富朗把大地艺术节称作“地域特定艺术”。在这里，艺术不是目的，而只是表达自然、文明和人类关系的一种方法。所以，与各国的艺术家初次见面时，

北川富朗并不去介绍这里“风景很美”“野菜很好吃”，而是告诉他们这个地区衰退的过程。“我把视线聚焦在梯田、挖渠引水的山沟、拦截弯曲河流后变成水田的冲击地等当地人的生存创造上，也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用杉树做成的屋梁、用弯曲的杉树板拼出的墙壁、因人口减少而逐年增加的空屋与废弃的学校，于是让艺术家们把这些过去人们会聚的公共场所，或者包含着一家人喜怒哀乐的居住空间变成作品，重新唤起当地人的自豪感。”他说，越后有大地艺术节之所以能够延续16年，也是因为这种与乡土共生的初衷——“农家正一户户消失的村庄里，如果能为这些老爷爷老奶奶创造出开心的回忆就好了，哪怕只是短暂的也好。”

学校：不灭的灯塔

里山现代美术馆也是越后有大地艺术节的起点。连接多条铁路线的十日町车站就在步行距离内，各地赶来的游客们先看到这个多样性地区的“缩影”，再去深入整个区域。大地艺术节的导游羽鸟惠子带我们从这里出发，去看几处代表作品。作品之间距离都不近，开车也得至少半个小时。我们有些疑惑，如果在艺术节举办期间，乘穿梭大巴前往，耗费时间肯定更多，为什么不集中起来展示呢？羽鸟惠子告诉我们，这也是大地艺术节一开始被诟病的一个方面。最初几届展期集中在夏天，游客们参观后都觉得很热、很累，很不方便，但也很有意思。在小鸟和昆虫的飞舞和青草味道的热气中汗流浹背地行走，梯田里绿油油的水稻在风中摇摆，这是若非亲身体验就无从知晓的越后有真正面貌。

事实上，整个越后有区域面积达760平方公里，有200多个村庄。在没有除雪设施的年代，一到冬天，村庄便处于孤立状态，村里的人必须相互帮助度日。北川富朗认为，每个村庄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人们把作品当作路标，在相距甚远的作品与作品之间移动，这种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在城市里，所有的事物都朝着均质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越后有，大地艺术节就是要彻底地把作品分散在这个村庄，这与‘最短时间、最大限度地获取最新信息’的城市价值观正好相反。”

我们的第一站是一所废弃的小学。小学在十日町群山之间一个叫“钵”的小村子里，像它的名字一样，小村的地形像个茶碗，住宅和菜地在山坡上排列，“茶碗”的底部就是这所真田小学。2005年4月，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离开了，生源越来越少，小学要废弃了。最后只剩三个学生——四年级的由纪、由香，还有三年级的健太，他们不得不转到别的学校。羽鸟惠子告

诉我们，真田小学也是全村人的母校，他们都不希望学校被拆除，询问大地艺术节应该怎么做。于是，北川富朗找来了绘本大师田岛征三，在第四届大地艺术节上，这所废弃小学变成了由树木和果实搭建的立体绘本。来之前，我们对这个名叫“绘本美术馆”的地方并无太多期待，想着无非是借学校的外壳，里面展出一些绘本作品，那其实还是一个静态的“白盒子”式展览。但一走进去，就被迎面而来的场景震撼了：挑高空间里悬挂着些巨大的彩色雕塑，仔细看是用弯曲树枝搭成的人形，原来他们就是最后的三个学生——由纪、由香和健太的化身。在这个原来的体育馆里，地面上还留着篮球场的划线和球架，墙上贴着学校全年活动安排，中央放着一架三角钢琴，仿佛这里的一切都仍在生机勃勃地运转着。回头看这三个悬挂的人形，似乎也有了魂灵，但在信奉“万物有灵”的日本乡野也不突兀，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从孩子们的想象世界中飞升出来的。

这所学校其实变成了田岛征三和最后的三个学生共同创作的“立体绘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三个学生和他们最喜欢的女老师，以及一直生活在这里的鬼怪——鬼怪们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脾气，有可怕的，也有可爱的。看到真田小学的田岛征三觉得，只把学校当成美术馆用太可惜了，应该让它本身成为一件作品，他从伊豆半岛搜集了漂流木、树枝和坚果，造出各种形象，让这个绘本故事立体地再现在学校中。我们走进教室，看到黑板上用粉笔画着一个小人，那是热心又可爱的美咲老师，她面对着讲台下的三个学生，希望他们像其他有上百人学校的学生一样，能感受到学校的乐趣。突然有只大妖怪多拉跳了出来——我们在地下室碰上了他，他乐此不疲地把大家的梦和希望变成小精灵，但是学校一个人也没有了，他也很苦恼，追着最后的三个孩子跑。我们来到二楼的音乐教室，看到三个孩子和一只兔子正在里面敲鼓，因为声音像兔子一样的美咲老师说，妖怪多拉害怕鼓声，当它发威时，可以敲鼓赶走它。教室外面有个联动装置，游客们可以骑自行车带动敲鼓，骑得越快，鼓声越密集，多拉就被赶回地下室去了。学校里还能遇到一个圆滚滚的妖怪陶培拉，是专门吃回忆的，他和孩子们一起吃蔬菜咖喱饭、蔬菜活力沙拉、蔬菜浓汤，吃得肚子鼓鼓的，一疏忽就被多拉抓走了。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教室里，三副孩子的身体冲破了天花板。我们走到室外发现，那是由纪、由香，还有健太，学校要关闭了，他们飞出了学校。故事的最后，吃回忆的妖怪陶培拉又飞回了学校，他的肚子吃撑了，回忆纷纷跑了出来。由香很开心地说：“啊，那是爸爸

的回忆！小时候的奶奶也在！”更多以前的回忆飞了出来，学校终究不会空荡荡。

尽管并没有在同一所学校的回忆，但真田小学还是激起我们强烈的共鸣，这些关于童话、童年和故乡的情感是共通的。北川富朗告诉我们，像真田小学这样的废校再生项目已经列入越后妻有的区域规划。之前也有过其他一些失败的尝试，大多是因为过于关注校舍物理空间的修缮，而没有理解学校在一个地区的精神象征。他说，村庄往往以学校为中心聚集，学校就好比夜晚照亮海面的灯塔，被村民守护，也守护着村民。由于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少，有些学校不可避免地遭到废弃。对当地人来说，学校的消失就像是灯塔的灯光熄灭，如何将这种精神性延续下来才是关键。他认为，废校项目要将精神性延续下来，关键是将时间形象化。“现代社会，无法用钱进行换算的，不就剩时间或者记忆了吗？”

梯田：永续农耕

北川富朗在新潟出生长大，在他眼里，新潟之所以有趣，正是因为人们必须花费相当大的功夫，才能在这大半年被大雪封闭的地方生存下来。2011年，越后妻有地区遭受大雪袭击，导致信浓川水系六条河流溃堤，附近长野县北部又发生地震，频发的自然灾害正是新潟的特征。但人们仍在这里创造了梯田耕作技术：先要花很长时间改变地形，把山地变成梯田，再借助信浓川带来的肥沃土壤，配合不足100天日照条件，才孕育出了美味的稻米，还有山地、河流和大雪交织而成的文化。这些在当地人眼中司空见惯的风景，外来的艺术家们重新发现了背后历史、产业、环境、文化资源的美，并且尽量让当地人参与进来，重拾他们的文化自豪感，这也是大地艺术节的生命力所在。

我问北川富朗，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已经创办了将近20年，当地年轻人有多少因此留了下来？他直言，并没有太多，这里的雪季太长了，农业衰败了，年轻人依然要去城市里寻找机会。但是，如同在废弃的真田小学里做出立体绘本的田岛征三所说，应该让孩子们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把他们的心锁起来。“如果他们出去了，还感觉到这里的好，终究还是会回来。让孩子们认识到这里的美，才是教育的成功。”

另一方面，艺术节将越来越多的游客带进越后妻有。“去年是第六届，50天展期，来了50万人，相当于每天1万人，而当地居民总共才有7万人。很可怕，像真田小学只是一座两层的木质小楼，这么多人上去，

当时真的很担心这座楼会不会塌下来。”北川富朗说，这些人当然是为了看艺术品而来，但如果只是为了艺术，那东京有很多美术馆可看，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艺术是一个起因，来了之后发现风景不错，历史深厚，才是这里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原因。他认为，比起用土木工程、大型商业设施等方式，艺术依然是唯一能够尊重当地文化的活化手段，转变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发生。

俄罗斯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的梯田展示就是这样——一个与村民和土地共同生长的作品。从大地艺术节的区域中心“农舞台”上望去，对面梯田上的一系列农耕者形象的彩色剪影十分鲜明——犁田、播种、插秧、割草、割稻、运到城里贩卖，这一连串的过程都被凝固下来，和几个正在田里忙碌的真正的农夫融合在一起。北川富朗说，这是第一届大地艺术节的作品，一直被保留成为越后妻有的代表作，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梯田的象征。卡巴科夫是在1999年春天残雪尚存时来到越后妻有的，他在考察中发现，为了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种植水稻，即便收成不佳，人们仍不辞辛劳地开垦山林，修建狭窄的梯田，却不得不面对后继无人的困境，于是想要吸引更多人关注这种状况。有一次在站台上等火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车站对面遍布山麓的梯田与头脑里想象的场景正好契合，这将是一幅随风雨、光影和四季变幻的立体农耕画。不过，要在私有的梯田里创作，他必须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这块梯田的主人福岛先生因为大腿骨折，已经很久不种田了，但即便土地已经荒芜，也仍是祖辈辛苦劳作传下来的土地，他一开始对这样的艺术创作并不理解。在卡巴科夫和艺术节组织者一次次的沟通下，福岛先生才点头同意了。北川富朗告诉我们，令人吃惊的是，福岛先生从此又开始种地——这个过程只能用“协作”来解释。直到2006年第三届艺术节结束，考虑到福岛夫人的身体情况，福岛先生站在田埂上对他说，“过了今年就撑不下去啦”。后来，这块梯田由大地艺术节接手，和福岛先生的外甥一起打理。

因为要在别人的土地上创作，在第一届艺术节开始之前的3年多，北川富朗开了2000多场宣讲会，争取当地人支持。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像福岛先生一样参与到大地艺术节中来。我们的导游羽鸟惠子就是本地人，第一届艺术节举办时她还在读高中，她当时就被深深吸引，毕业回来后加入了志愿者组织“小蛇队”。她告诉我们，“小蛇队”本是跨越地域和年龄的团队，队员们参与到艺术节的方方面面，不仅协助搭建和维护艺术品，接待艺术节的参观者，还会在农忙时节为农民做帮手，与当地村民的感情与日俱增。十几年过去，“小蛇们”蜕去青涩的外皮，当地人的比例也逐渐加大。村民们成

为志愿者，也成为艺术作品本身，比如在上虾池村碾米厂改建的名画馆，展出照片都是对蒙克、达·芬奇、米勒等名画的模仿：画中人物由村民扮演，《倒牛奶的女孩》倒的是烧酒，《最后的晚餐》是村里集会时的聚餐场景，背景也是与名画“不谋而合”的村庄某地，让人忍俊不禁。碾米厂一楼变成“美术馆商店”，只不过售卖的是本地蔬菜和手工艺品，售卖者的面孔也似曾相识，“那张照片拍的就是我！”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越后妻有沿途遇到很多装置，已经分辨不出是不是艺术家刻意所为。比如河边一排各有动作和表情的木头小人，看上去是专门雕刻出的艺术品，但奇怪的是，他们身上还穿上了衣服，有点像是被供奉的民间佛像。我们去问北川富朗，他说，一开始的确是艺术家的作品，但因为是村里出的钱，完成后就归村民所有了，村民们给他们穿衣戴帽，当成小佛供着了，变成艺术家和村民的共同创造。

对北川富朗来说，越后妻有艺术节已经是个成功的品牌，每一届可以为新潟县创造出大约50亿日元的经济效益，他之后面临的是地区下一步发展的问题，找到村庄通往资本、网络和市场的路径。比如，卡巴科夫的梯田展催生了“梯田银行”。北川富朗告诉我们，深入当地的梯田现状发现，福岛先生的梯田不是个例，实际上他的梯田所在的松代町已有超过500公顷的农地废耕，只剩下全盛期的一半左右。于是大地艺术节制定了梯田认养制度，认养人加入松代梯田银行，可以出资支持梯田农作，也可以亲自投入耕作。梯田的日常管理由当地的农家负责，每年秋天收割的稻米依照认养面积分配。这一制度吸引了很多想要回归乡村的都市人，还有很多喜爱越光米的人。还有一种尝试是设立“故乡税”，即从居民所得税中扣除一部分，捐给想以越后妻有为第二故乡的人，促使都市民间力量投入乡村，让农耕得以延续。

北川富朗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覆盖大半年的大雪变成朋友。“以前，这里的人们不断地与大雪造成的意外事故做斗争，大雪也让稻米的产量特别低，生活的困窘和贫穷可想而知。然而，这片土地背负的宿命难道只有苦难和悲伤吗？”他想起以前人们忍受风雪、等待春天的时候，也是他们进行思考的时候，艺术节何不尝试进行“夏耕冬读”呢？他们逐渐将艺术节延伸到雪季，比如在3月初沿着大雪覆盖的信浓川燃放烟花，举行赏雪酒会。大雪不再是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的障碍，甚至可以视为一种精神象征——如同这里严峻自然条件下的人们必须互相帮助才能存活，大地艺术节也依靠人与人的协作才得以实现。☑（感谢北京艺术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实习记者项文虎对本文亦有贡献）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绘画：阿梗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外储大缩水

主笔 / 谢九

外汇储备缩水和人民币贬值形成了彼此强化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如果不能有效消除，外汇储备缩水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尽管市场对于当前外汇储备缩水已有心理准备，但实际缩水的速度之快还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12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30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16万亿美元，较10月底下降691亿美元，降幅为2.2%，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如果以绝对数量来看，中国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依然算得上相当丰厚，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外储余额大约为1.2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比第二名高出两倍还多。但真正值得担忧的是缩水速度，我国的外汇储备从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到现在缩水至3万亿美元附近，缩水幅度还是相当惊人，如果按照现在单月缩水600多亿美元的速度来看，到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就将跌破3万亿美元。

按照IMF的标准，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充足，绝对数量并非最重要的指标，一国的外储应该至少覆盖30%的短期债务，5%~10%的进出口支付等等，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应该拥有的外汇储备的底线大约为2.6万亿美元。如果外汇储备缩水的趋势不能得到逆转，我国的外汇储备距离底线或许已经并不太远。

我国外汇储备的下降主要来自三大因素：一是估值因素，由于我国外汇储备的构成并非全是美元，还有大约三成由欧元、英镑和日元等资产构成，在美元升值的大背景下，这些非美资产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缩水，这构成了我国外储缩水的估值因素。二是央行干预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外汇储备消耗。这一轮人民币贬值主要由美元升值所致，贬值的幅度主要遵循了美元升值的趋势，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央行完全放任人民币的走势，为了避免人民币过度贬值，央行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这也对外汇储备形成了消耗。第三个因素是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之下，很多外贸企业都

倾向于持有美元，而不是选择结汇。我国每年还有3000多亿美元贸易顺差，这些外汇收入原本应该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但是因为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很多外贸企业选择持有美元，使得我国外汇储备失去了重要的增长来源。另外，随着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从去年开始，我国已经从过去的国际资本流入的热土，变为资本净输出国，大量资本在海外进行投资并购，今年前10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接近1500亿美元，这些都是对外汇储备的巨大消耗。

一个国家拥有的外汇储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带来问题。大概在两三年前，我国外汇储备逼近4万亿美元，达到历史顶峰，当时国内还在为外汇储备过多而烦恼。2014年，李克强总理出访非洲时还表示“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负担”。当时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带来的麻烦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央行为收购外汇投放了过多的基础货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其次，大量外汇储备购买低收益的美国国债，使得外汇储备的回报率很低，尤其在美国量化宽松的背景下，外汇储备其实处于被稀释的状态。

在当时过多的外汇储备成为负担的背景之下，国内开始试图放开资本管制，寻求藏汇于民等等，为外汇资产寻找更多的出口。不过，随着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外汇储备快速缩水，资本开放改革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过去几年，我国已经将封闭已久的资本账户开放提上了改革议程。2014年10月生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大幅放宽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自主权，企业境外投资实行“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只有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时，才需提交商务部审批。按照当时商务部提供的数据，2013年商务部核准的境外投资事项是6608项，而在新的投资管理办法下，需要核准的大概只要100项。得益于过去几年政策上的宽松，我国企业“走出去”迎来一轮高潮，在去年开始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不过，随着企业对外投资消耗掉大量的外汇储备，近期有关部门对于

资本外流开始有所收紧，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强调坚持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对外投资管理方式的同时，也表示要“把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规范市场秩序，按有关规定对一些企业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核实”。

个人境外投资在去年一度有放松的迹象，但随着外汇储备带来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个人境外投资的放松现在看来似乎也遥遥无期。国务院去年批复同意的《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择机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也就是业内所称的QDII2，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内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证券类投资业务，这将大幅突破现有的个人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限制。去年国内很多媒体一度报道称QDII2将很快发布，首批试点城市共有6个，分别为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深圳和温州。但是随着外管局开始增强对5万美元购汇额度的管理，QDII2的推出预计短期内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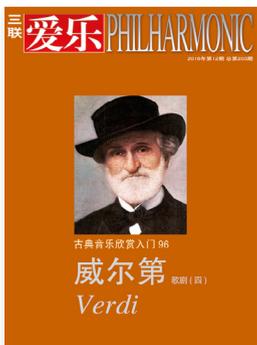
过去几年，国内对于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基本上已成共识，不过当时的背景是外汇储备高速增长，随着外汇储备在短短几年间快速缩水，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被重新审视，开放的进度可能会再度放缓。前几年，国内在对资本开放展开热烈讨论之际，央行曾经发布

过一份《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将资本账户开放步骤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央行在报告中认为，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贸易国，若要等待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或者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完全成熟，资本账户开放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关于资本管制的负面效应在国内已有充分讨论。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在资本管制的背景下，境内居民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产，只能投资于国内有限的投资渠道，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成为居民配资资产的最主要方式，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房价高居全球前列，和资本无法自由流动不无关系，如果资本管制迟迟不能打开，不排除未来房价还有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大量资金无法自由流动，最终导致国内的资产价格高企，形成一个高耸的堰塞湖，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通过资本管制来避免外汇储备的缩水，最多只能在时间上放缓缩水的节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人民币单边贬值的预期得以减轻甚至消失，外汇储备缩水的趋势才可能真正逆转。如果因为外汇储备缩水而延缓资本开放的改革，可能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成本。☑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十二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6

- 威尔第颂
- 王立彬、雷苗苗、秦子超、任海杰对威尔第的《麦克白》、《命运之力》、《阿伊达》的精彩解读

逝者 纪念英国指挥家、小提琴家内维尔·马里纳爵士

专访 青年钢琴家郑吟访谈

话题 指挥艺术历史中的继承关系梳理(三)

意大利歌剧的历史到底有多长?

爱乐笔记 舒伯特 D.960 的四个版本

乐史空间 莱茵河岸边盛开的花朵——曼海姆乐派

作曲家档案 被遗忘的作曲大师泰勒曼

演奏家档案 记伟大的匈牙利音乐家科奇什

唱片说明书 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变形》

作品 弗朗克的《前奏曲、圣咏与赋格》

听片、购片与收藏 琴键上的波兰之肖邦大赛冠军唱片记

我的爱乐往事 凯尔特竖琴

《爱乐》2017年订阅须知

2017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7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意大利公投， “理”与“势”的合流

文 / 刘怡

对政坛走马灯式换将已成常态的意大利来说，公投失败的结果并非出人意料。但在整个欧盟正为其前途焦虑不安的背景下，平民主义的新一轮胜利将为拯救负债累累的银行业增加困难，继而加剧欧元汇率的波动。

这一回，市场和舆论都提前做好了准备。

在不到半年里相继发生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赢得大选这两起“黑天鹅”事件之后，基金交易员们对12月4日的意大利修宪公投可能遭遇惨败已经有了心理预期。尽管41岁的伦齐（Matteo Renzi）总理描绘了一幅听上去颇具吸引力的蓝图——通过将参议院的议席削减2/3以上来达到提升立法效率、削减巨额政府开支和加速经济复兴的目的——并且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但投资界显然更愿意相信一些实打实的

数字，比如意大利高达17.97%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欧洲整体比例约为6%），比如预期不超过1.2%的全年GDP增长率，又比如自10月初以来从未出现逆转的反修宪派获胜的民调结果。6月底英国公投结果揭晓之后，分析家相当精准地判断意大利将是接下来的“最弱一环”；从8月到11月，意大利前12大银行的股价累计下跌10%，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攀升至16个月以来的最高点，明白地显示证券市场正在做规避风险、应对波动的准备。而公投结果揭晓之后的反应，印证了未雨绸缪确有其效果：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在跌



左图：2013年2月意大利国会大选投票前夕，五星运动党创始人格里洛来到拉古萨市声援本党候选人。五星运动党创建于2009年，它公开号召颠覆腐败的旧政治，获得相当一批国民的追随

右图：2016年10月7日，罗马上千名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伦齐政府推动的“良好学校”教育改革，要求恢复公立大学的免收费制度并保障移民的入学权利

至一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之后，于48小时内出现了回升，西欧股市的反弹也在短短一天之后到来。正在布鲁塞尔参加欧元区财长会议的德国财部长朔伊布勒甚至不无揶揄地表示：“意大利人在处理这类情况方面经验丰富，所以我并不担心。”

是的，意大利人在更换总理方面的经验的确足够丰富：过去25年里，他们累计经历16次内阁更迭，换遍了从中左翼的民主党、中右翼的意大利前进党到无党派人士在内的10位阁揆人选，根本不在乎多来一次。伦齐把修宪方案标榜为改善现状的唯一希望，

但在重建制派政党“五星运动”（M5S）的支持者眼中，这位民主党总理与他那些颀顽腐化的前辈毫无区别：一样的言过其实，一样的冷漠自私，还多了一项“妄图集权”的罪名——“上一个想修宪的总理是谁？墨索里尼！”在全国第三大商业银行锡耶纳银行（BMPS）的股价于11个月内暴跌83%、530万客户的储蓄款随时可能化为乌有的情况下，伦齐依然坚持“政治先行”，将复杂的修宪方案的优先度置于50亿欧元的注资计划之前。考虑到锡耶纳银行的最大股东正是意大利财政部，此举无异于宣告普通民众的担忧在政府眼中远



12月5日，在公投结果揭晓之后，意大利总理伦齐在基吉宫官邸发表演讲，宣布他将辞职且不会参与过渡政府的运作

不及行政权力的强化来得重要，从而把整场公投变成了对伦齐内阁的不信任投票：意大利人依然需要一项银行业纾困方案，需要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计划，但他们不想要伦齐。

在伦齐以40.9%对59.1%的悬殊劣势输掉公投之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于12月7日接受了他的辞呈，并在5天后授权外交部长真洛蒂尼（Paolo Gentiloni）组建过渡内阁，最晚可以执政至2017年7月下旬；而涉及众议院630个议席和参议院315个议席的新一届大选，将在明年3月到5月之间的某个时间节点举行。以目前的情形论，在参众两院分别占据第二、第三多数席位的五星运动党极有可能赢得大胜，从而使退出欧元区甚至“脱欧”成为解决债务问题的选项之一。届时欧元汇率乃至整个一体化事业遭受的打击，将远远超过此前的希腊债务危机和英国“脱欧”。无论如何，全民投票的结果正越来越为“理”与“势”的合流所左右；而国际政治的加速内部化，在欧美主要国家也凸显得越来越昭彰。在2017年举行的德、法、意三国大选，将决定欧元区GDP排名前三的中心国家的前途；是彻底否定过去1/4个世纪的

努力，还是下定决心继续负重前行，悉数取决于此。

为什么是意大利

1960年8月罗马举办第17届夏季奥运会之时，维吉尼亚·拉吉（Virginia Raggi）的父母还没有相识；但当这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2016年6月就任首都市长之时，却发现财政部门仍在为自己出生之前18年就已经闭幕的那届奥运会还债，利率是5%——三倍于当下发行的10年期国债的平均年息率。类似的支出还包括偿付1955年为建设全市第一条地铁线而发行的多年期债券的利息，结算上世纪60年代为扩建医院和街道而征用的土地的未清偿尾款，运营亏空严重的公立药店网络，以及支付打输的上百起违约案的诉讼费。仅仅一个罗马市积累的公共债务就达到了136亿欧元，涉及1.2万名债权人，这还是建立在首都的偿债能力足够坚挺的前提下。而整个意大利的公共债务总额是2.2万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33倍，近年来一直在继续膨胀。

拉吉的发现部分证实了一项判断：长期以来，意

大利政府和本国银行以及金融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银行鼓励政府推进激进的赤字政策并盲目举债，政府则授权本国乃至本地区商业银行作为债权的承销者，通过透支未来的支付能力以达成维持表面繁荣的目标。开支的无限制增长引发了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拉吉的前任马里诺曾经伪造过一份虚假的公务日程表，宣称他曾经和越南大使共进晚餐，试图用公款报销来路不明的高级餐厅账单，最终因此下台。在2016年初的选战中，拉吉公开宣称：“意大利的许多公共债务根本就不应当偿还，因为它们建立在不道德的基础之上——举债者未经民众监督和批准，以不合理的高利率从银行获得融资，却让大众为其买单。”对过去多届政府举债财政的不满，对本国银行业稳定状况的忧虑，乃至对欧洲一体化造成意大利救市手段受限的不满，构成了反建制派抵制修宪提案的直接原因。

纸面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根据2015年度统计结果，意大利GDP总量约为2.18万亿美元，位居欧盟第四位、全球前十，与英法两国的差距在20%以内，占整个欧盟GDP总量的11.9%。意大利对欧盟全年的财政贡献为142.31亿欧元，仅次于德、法、英三国，占欧元区财政总预算的14.18%，超过欧盟在该国境内的财政总支出，属于净贡献国。若从财政规模上看，尽管意大利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超过除希腊以外的所有欧盟国家，但和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猪”国家相比还是远为乐观。这也构成今年早些时候伦齐拒绝削减预算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刺激政策的意义远大过紧缩财政，单靠减少开支并不能提升偿债能力。

问题在于，所谓“刺激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支点，而债务负担的累积已经使整个银行业处在了悬崖边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入高潮之后，意大利年均GDP增长率迅速由前一年的5.02%暴跌至-2.48%，此后名义GDP增长率长期徘徊在2%以下。2012年爆发的第三波欧债危机使GDP增长再度探底，外国资本接连撤出，有限的预算仅能勉强维持已经出台的公共开支，政府不得不继续通过发债来弥补预算缺口。从截止到2016年10月的意大利银行不良贷款构成情况看，恰恰是在欧债危机和全球萧条中受冲击最大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事业，构成了坏账的主要来源——总额达2087亿欧元的制造业贷款坏账率达到15%，其中又以金属加工业、服装和纺织业、食品烟草业、木材及木制品业以及化工行业成为大头，建筑业贷款的坏账率更是高达30.39%。而在全部银行

贷款中，有57%系由政府部门借入，其中一年内急需偿还的短期贷款已经占到总额的近三成，清晰地勾勒出了背后的逻辑：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政府通过举债勉强维持了物价稳定和基本工资的低速增长，但远未达到可称为“复苏”的程度。全民失业率达到2015年初为止依旧徘徊在13%以上的高点，其中25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更是有40%需要领取失业补助，足以令人怀疑伦齐政府关于刺激政策的一切承诺。始于2015年的GDP增长率表面回升，托庇于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QE）的襄助显然更多些。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意大利银行业正处在大举扩张的活跃期。2007年4月，国民联盟银行与伦巴第一皮埃蒙特银行宣布合组UBI银行集团；7个月后，锡耶纳银行以90亿美元的高价并购全国第九大银行集团安东文内塔，创下到那时为止的行业收购纪录。但在三轮欧债危机于短期内连续爆发之后，猝不及防的银行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坏账率急剧上升，很快被归入“欧猪”之列。与更具国际色彩的英、德等国金融业不同，意大利银行长期以来与本土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关联极为密切，故其资产状况的走势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应对。而在单一货币模式下，无论是中左翼的伦齐内阁还是中右翼的贝卢斯科尼内阁，能用于救市的手段都极为有限：不能通过贬值本币来刺激出口，不能保护其国债免遭风险市场的攻击（因欧洲央行不能直接购买欧元区各国的国债），甚至由于国际资本争相撤往美国、德国、瑞士等“安全港”，除本国财政资金外几乎没有其他纾困渠道。而欧洲央行除去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为意大利政府提供了若干流动性外，在财政开支和降低风险方面并不能为后者提供任何帮助；束手无策的罗马当局只能一边空喊口号，一边坐视银行业不良贷款总额迅速累积至3610亿欧元（占欧元区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总额的1/4以上）。今天意大利金融业高达17.97%的不良贷款率，是2008年危机高潮期的美国的3.6倍，这反过来又给经济复苏进程背上了巨大的包袱。

若无今年夏天英国脱欧这一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伦齐政府或许还不至于过早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但在伦敦点燃导火索之后，机构投资者迅速将关注目标转向千疮百孔的意大利市场。而欧洲央行在7月29日公布的对成员国51家主要银行的新一轮压力测试结果，成为意大利主要银行股价暴跌的直接诱因：被判定资本遭高估达42.46亿欧元、脆弱程度位居欧洲之冠的锡耶纳银行首当其冲，股价在4个月内暴跌48%，账面价值已经滑落至12个月前的1/4。UBI、国民、



裕信、米兰国民等主要银行的股价普遍缩水 35% 以上，已经形成遍及全国的恐慌。而在 2015 年通过的欧盟《银行复苏与处置指令》的限制下，意大利政府既不能通过大规模直接注资减轻银行业的债务负担，又不能将不良资产剥离打包，进退彻底失据。而伦齐坚持在此时进行修宪公投，无异于引火烧身，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找到了发泄渠道，最终被迫黯然下台。

“朝”与“野”的算盘

当 39 岁的马泰奥·伦齐在 2014 年 2 月成为意大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时，中右翼的人民自由党 (Pdl) 已经退出了执政联盟，从而使本届内阁成为纯粹的中左翼政府。与汲汲于推进激进的经济复兴计划、最终却壮志难酬的前任总理恩里科·莱塔不同，伦齐把经济问题首先视为政治问题：年轻人就业率低迷被归咎于工会权力过大和企业在解雇老员工时面临的羁绊太多，为此应当颁布新的就业法，减轻私营企业的法

律和财务负担。内阁的关键政策难以持续推行的源头则被追溯到国会：伦齐认为，参众两院过多的议席和党派力量高度分散的状况使得反对派随时可以通过信任投票来撬动政府的地位，甚至强制解散内阁，从而使任重道远的经济改革计划变成方向不定的“滚木”。因此，通过变更经济立法和选举制度，最大限度地强化行政机关的权力，就成为这位年轻总理汲汲以求的目标，也是他将修宪公投置于银行纾困方案之先的深层动因。

新总理的改革事业至少在一开始显得颇为有声有色：2014 年 4 月，伦齐一口气解除了埃尼油气、恩内尔电力、意大利邮政等多家大型国有企业的 CEO 的职务，同时提名多位女性高管进入管理层，从而巩固了中左翼的基本盘。紧接着，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 9 月底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由劳工部长波莱蒂主持起草的新《就业法》草案。根据此前的旧《劳动法》第 18 条，雇主在无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员工若对被解雇的决定不满，可向仲裁法庭提出申诉，在



左图：2016年11月26日，罗马市长维吉尼亚·拉吉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就即将举行的修宪公投发表讲话。这位五星运动党重要领袖是意大利第一位女性市长

右图：2010年7月5日，大批求职者在罗马的失业人口服务中心等待呈递简历。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意大利全国失业率长期高于11%，25岁以下青年有40%处于待业状态

判决结果产生之前雇主仍须向其支付薪酬。另外，企业雇用临时工也须经历与正式工相同的法律报备和批准程序，并且每延长一次合同都必须重新登记。而新《就业法》对这些规定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宣布企业只须一次性支付相当于15到27个月工资的赔偿金，就可以合法解雇已签下长期合同的员工；同时与临时工的短期雇用合同时长上限被放宽到36个月，在此时限内，双方签署合同不必再经历复杂的申请和报备。同时针对意大利女性就业率长期偏低、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象，新法案还出台了保障女员工权益、鼓励和促进学徒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培训和实习机会的内容，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构建覆盖面更广、救助金额更高的失业保险制度。尽管全国总工会（CGIL）组织了参加人数接近100万人的抗议游行，《就业法》还是在当年秋天由参众两院表决通过，从而完成了第一阶段布局。

而在最具争议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伦齐采取了两步走、“每月一前进”的策略，首先通过变更选举制度来巩固主要大党的议席优势，随后再进行修宪、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力。2015年春天，新《选举法》在

参众两院过关，于2016年7月1日正式生效；该法案纳入了“多数奖励”原则，并对小党派的议会准入门槛做出了降低。按照新《选举法》，在第一轮单选区制投票中得票率达到40%的政党或政党同盟，将自动获得众议院630个议席中的340个议席，组成多数派政府。如果在首轮投票中任一政党或政党同盟的得票率均未达四成，则由得票率位居前二的两大党进行第二轮票决。未加入任何大党同盟的独立党派，在首轮选举中只须获得3%以上的得票率便有资格参与议席分配，这一标准比2005年《选举法》的规定降低了1%，有利于小党派的复兴。

与1948、1993和2005年的前三部《选举法》相比，2015年通过的这部新法案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折中：它接受了意大利主导性政党（尤其是中左翼党派）选民基础薄弱、无法形成类似德国和法国那样的大党中心制的现实，企图通过“多数奖励”的手段为执政联盟的稳定创造条件，并通过降低小党门槛的方式为传统上向心力更弱的中左翼同盟扶植盟友。以2013年大选时的情形论，由民主党联合3个小党组建的中左翼“意大利共同利益”同盟在众议院拿下345席，

获得组阁权；但由于中左翼在实行大区选举制的参议院（共315席）仅拿下123席，与中右翼同盟（由自由人民党联合两个小党组建）的117席相差无几，中左翼不得不接受与中右翼组成妥协式的联合政府，从而为日后莱塔的下台埋下了伏笔。而在进一步落实“多数奖励”原则并为小党派进入国会创造机会以后，公众形象相对较好的民主党极有可能在2017年大选中仅用一轮投票就建立起多数优势，从而彻底排除中右翼的阻碍、继续推进改革路线，这无疑近水楼台的算盘。

但在2013年大选中，偏偏还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由不修边幅、蓄着大胡子的喜剧演员毕普·格里洛（Beppe Grillo）创建的反建制派政党“五星运动”在众议院拿下109席，成为仅次于民主党的国会第二大单一政党。“五星”代表水、环境、交通、发展和能源，似乎与绿党等小规模独立党派观点较为接近；但格里洛无意与左右两派中的任意一党结盟，而是坚持以运动式的平民主义战略和示威、集会等广场游行宣传自己的主张。BBC记者曾经光顾五星运动党在西西里岛巴勒莫举办的全国代表大会，发现那俨然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占领华尔街”的混合：乐队和调音师在舞台上纵情表演，观众排着队从小贩手里购买比萨饼、咖啡和炸饭团；关于重大政策的讨论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进行，人们鼓掌、吵闹，兴奋不已。许多与会者认为他们参加的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盟——失业青年、南部农民、因新《就业法》丢掉饭碗的职员，以及被传统政党嗤之以鼻的激进人士是五星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未必具有清晰的政治理念，但显然厌恶伦齐试图推进的自上而下的集权式改革。而新《选举法》的出炉，恰恰有利于壮大五星运动的声势。

某种意义上，五星运动和英国的独立党、法国的国民阵线以及美国的“特朗普共和党人”一样，是全球化的阴暗面催生出的副产品。他们不愿为扩大的一体化图景或者日益趋同的行为方式、消费习惯和经济哲学牺牲自己的民族性，从而使亢奋而混乱的反建制运动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文化战争。另外，意大利为推进欧洲一体化而承受的经济和制度代价，乃至对跨国公司、旧政党等精英阶层的憎恨，还使五星运动的崛起具有了经济和阶级内涵。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为了弱者和边缘阶层的利益、抵制富人集团的煊赫权势的平等主义政治浪潮，依然有其生命力，并且已在卷土重来。”而格里洛在今年初发表的对伦齐政府的批评意见，正是这种生命力的写照：“伦齐及其追随者

用公款维持奢华的特权生活，是对那些勉强糊口的普通人的侮辱。”

如果说在2016年以前，五星运动党由于其不结盟、不合作的姿态，在政坛的实际影响力还比较有限，那么在相继赢得罗马、都灵两市的市长选举，特别是维吉尼亚·拉吉公开在首都与执政党发生对立之后，预防反建制派在2017年大选中获胜已经成为伦齐的当务之急。他在新《选举法》出炉之后立即着手推动修宪法案的通过，显然是出于实用主义动机：按照他的计划，目前拥有315个议席的参议院将被缩减到100席的规模，议员不再领取薪水，并且并非在所有法律和政策问题上都享有投票审议权。立法主导权被集中到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参议院的角色被弱化为协商机构。由于2017年大选将会适用新《选举法》，只要民主党及其小党派盟友能稳固住现有的支持者、在第一轮投票中取得40%的票数，就可以直接获得组阁权；而五星运动党即使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对立法和政策的延宕能力也已经被弱化，无法阻挡经济改革法案的继续推行。

但总理的急中生智并没能实现预期效果。在涉险通过参众两院投票之后，修宪法案最终还是在全民复决中败下阵来。反修宪派高达59.1%的得票率不仅直接终结了伦齐内阁的生命，也为明年春天的大选埋下了令人不安的伏笔。尽管现在就断言五星运动党可以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40%的选票还为时过早，但民主党遭遇挫败，同样意味着组成稳固的多数派执政同盟的概率大大降低。倘若五星运动党选择与中右翼联手，或者中左翼在经历两轮投票后仍只能取得相对优势，民主党在伦齐任内的一系列调整政策将被逐渐搁置和抛弃。而五星运动党的崛起还在暗示另一种风险：意大利脱离欧元区甚至离开欧盟。

悬而未决的答案

若是单从“理”的角度出发，伦齐的《就业法》《选举法》和修宪提案皆有可取之处；问题在于，他过早地把自己置于“势”的反面——对《劳动法》第18条被废之后的受害者来说，现任政府根本就是大企业和传统工商业权贵的同路人，已经大大背离了其传统的左派主张；而伦齐在银行业救助问题上对欧洲央行的反复妥协，他在中东难民收容问题上与默克尔的一致立场，乃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对现行宪政体制动大手术的计划，又使反建制派和一般平民对其深恶痛绝。或许真的只有墨索里尼能做到这一切，但2016

年的世界是特朗普、奈杰尔·法拉奇和马琳·勒庞的世界，马泰奥·伦齐的形象已经被符号化了——他以为修宪法案可以在现任政府和中右翼之间做出区隔，未曾想五星运动党却要把传统的“左”和“右”连根拔起、彻底抛弃。

继承了不讨喜的总理职务的真洛蒂尼依然要面对一串老问题：除去新通过的 2.2 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计划外，欧洲央行并不打算为拯救意大利银行业做出其他努力。假使意大利政府依然打算在欧盟框架内为本国银行业提供纾困选择，他们必须设立一支基于本国力量的保障基金，变相地由政府向银行业注资；并向欧盟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 1500 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项目，并对中小型银行进行破产重组。无论哪种方案成行，肆无忌惮借债的时代都将迅速结束，罗马当局必须接受一年前希腊的处境，承诺削减开支，甚至交出对部分高价值的公共资产的控制权。首当其冲的便是锡耶纳银行的救助和重组计划。而对欧洲央行的让步还会进一步助长五星运动党的“关门主义”主张：既然条件苛刻，不如干脆“脱欧”实施自救？

从纸面上推断，影响最小的一种“脱欧”方案——只退出欧元区，但保持在欧洲经济区、自由贸易联盟和申根集团中的席位——将使意大利重新获得汇率问

题上的自主权，从而通过降低出口成本、刺激出口来实现经济复苏。但罗马当局必须说服其债权人接受以新货币偿还的债务，并且很难获得法德两国的许可。毕竟，一旦意大利以如此机会主义的策略将欧元区一脚踢开，必将彻底暴露缺乏税收和开支约束的单一货币政策的缺陷，从而使爱尔兰、葡萄牙等国步其后尘。而在欧元区的声望和稳定性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整个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基础将彻底崩溃，最终导致一场经济、贸易乃至政治领域的“内战”。但由欧盟对意大利提供个别援助，其额度和时效同样无法简单确定：意大利毕竟是欧盟第四大经济体，全面“输血”需要的资本总量与希腊不可同日而语。在西欧各国政府皆倾向于闭门自保的背景下，对意大利的救助能否达成同样疑窦重重。

更重要的是，修宪动议的天折，正在为明年的意大利甚至法、德两国的大选提供预警：对立或许尚未激化，但裂痕正在扩大。反全球化势力的复兴和反建制派政党的崛起，正在挑战过去 1/4 个世纪里全世界最成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典范的基础。2017 年 3 月，欧盟领导人将在罗马聚首，庆祝 1957 年《罗马条约》签署 60 周年。现在看来，那不像是一场重逢的庆典，倒更像是葬礼前夜的守灵。☒



我是豆包儿，
我做的纸艺花比真花还漂亮。
来松果，
和我一起做手工。

松果
一万个人生答案



11月3日，今年由于鄱阳湖水量提前退至低水位，湖区湿地被万亩蓼子花覆盖。图为一名儿童在鄱阳湖都昌湿地花海玩耍

鄱阳湖水闸争议再起

记者 刘敏

枯水期延长原因，对鸟类、鱼类生态影响，在人工控湖外是否还有其他解决方式……种种争议都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季节性湖泊

11月23日，江西省环保厅发布信息公示，江西省拟在鄱阳湖入江水道上，建造一座3公里长的泄水闸，利用这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解决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枯水期持续时间延长等问题。这不是鄱阳湖水

闸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围绕鄱阳湖拦水建闸（坝）的问题，十几年来一直争议不断。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滕王阁序》中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等句描写的就是鄱阳湖上渔歌互答、湖面浩渺的意象。整个鄱阳湖都在江西省境内，75.4%的水源来自上游的修水、赣江、抚河、信江和饶河五条入湖河流，鄱阳湖湖口在正北面，经由40公里长的八里江水道与长江干流相连。鄱阳湖水量占长江流域的15%，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河、淮河、海河水量的总和，是长江的重要水源。

长江、五河、鄱阳湖之间，形成了一种联动的江、



（图：新华社）

10月22日，在重庆市云阳县“阳凤山庄”远眺长江与县城。当天云阳水域水位达到172米，三峡蓄水正在向“最后3米”冲刺。三峡大坝从9月10日开始蓄水导致下游水量减少，鄱阳湖比往年正常的枯水期提前了30多天

河、湖关系，这让鄱阳湖成为一个过水型、吞吐型、季节性的湖泊。

每年4~6月，上游五河河水注入，让鄱阳湖水位从4月开始抬升。到7~9月，长江洪水出现，鄱阳湖作为“长江之肾”，长江洪水顶托或倒灌，大量江水涌入鄱阳湖，湖区水位大幅上涨。因为鄱阳湖整个湖面较浅，水位变化会导致湖面范围剧烈的变化，冬季的浅水滩、泥滩、草洲会随着夏季涨水迅速变成湖面。从10月份开始，湖中水位逐渐下降，直至次年3月为枯水期。地势高的湖面此时会变成一片草原，地势低的地区会在枯水期脱离主湖区，形成相对独立、大小深浅不一的子湖。

这样枯水期/汛期交替的节律，如今因为三峡大坝等一系列上游水库的影响，开始发生明显的人工干预后的变化。

按照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的说法，近十年来，鄱阳湖连续出现枯水时间提前、枯水期延长、水位超低等情况。“鄱阳湖枯水常态化和趋势化的新变化，造成枯水期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对湖区民生、生态、经济等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难于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周边城市群

迅速崛起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一种解决方法是，在湖口建造一座2993.6米长，有64个泄水孔的水闸。这个水闸在汛期闸门全开，江湖连通，不干预长江向鄱阳湖泄洪。在汛末开始逐步控制水位，拦住要倾泻回长江的洪水，从9月至次年3月，用动态管理的方式，控制鄱阳湖枯水期水位，以保持鄱阳湖湖区面积。初步估算，这座枢纽工程需要总投资128.85亿元，每年运行费用约1.21亿元。

这一次，江西省为水闸提出的新理念是：建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拦水不发电；建管不调度；江湖两利、动态调控。

生态争议

11月23日公示一发出，立刻引起了环保界的大规模反应。实际上，近几年来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正反意见一致有激烈冲突，除了水利问题，最核心的争议是围绕候鸟、江豚等生态保护问题。

根据水文记录，鄱阳湖在洪水位21.69米时，湖泊面积达2933平方公里；在多年平均最低水位10.20米时，湖泊面积仅为146平方公里。湖泊水位大幅度



上图：2016年11月29日，大批白鹤陆续飞抵鄱阳湖越冬

下图：2014年1月19日，江西余干县康山大堤鄱阳湖区內戏水的江豚



的季节变化为鄱阳湖洲滩湿地生态系统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使得鄱阳湖成为国际上重要的鸟类越冬场所，平均每年有34万多只候鸟在此越冬，最多的年份达到73万只。世界上95%以上的白鹤和75%以上的东方白鹳在此越冬。

水闸支持者认为，控制枯水期水位，能减缓湖区湿地的提前出露，避免过早形成一片荒滩。水位下降意味着食物减少，与此同时，水位下降也给受珍禽价格飙升诱惑的盗猎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按照南昌大学胡振鹏等人所作《越冬候鸟对鄱阳湖水文过程的响应》的研究结论，无论丰水期还是枯水期，高水位反而会导致候鸟取食困难，有可能使候鸟数量减少。当枯水期水位较低时，“如果科学管理碟形湖的水位，对候鸟越冬不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但主湖区水位太低，对候鸟越冬不利”。

对于鱼类、江豚等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公示中提到，水利枢纽工程在枯水期保持湖泊一定的水位，水域面积扩大，水深增加，将增加湖区鱼类的生活空间，可降低被捕捞的概率，并有利于鱼类越冬。

中科院南京地湖所研究员姜加虎反对这种说法：“湖泊经过建闸控制后，原江湖间的水力直接联系被隔断，湖泊丧失了自然吞吐江河的能力，鱼类资源得不到来自江河的适时补充，重要产卵场地随之消失。湖泊建闸控制后，水位起涨与水稳回升不同步，严重影响渔业资源的自然繁殖。”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水闸对江豚的影响。鄱阳湖被视为江豚的最后避难所，现在长江江豚总数不足600头，鄱阳湖江豚种群数量最多。如果枯水期水位抬高，湖区水面扩大，按照水闸推动者的说法，湖区内渔业资源增加，江豚的食物更加充足，而且降低了船舶航行和“斩秋湖”“电捕鱼”对江豚的伤害，也减少江豚因为水位急降搁浅的危险，但江豚是否会因水位急降而搁浅，这还是一种令人存疑的说法。江豚经常在鄱阳湖与八里江河段洄游，鄱建办承认修水闸会让江豚的迁移受阻，解决办法是在水闸上留出了4孔60米宽的大闸，让江豚过闸。

鄱建办认为，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60米宽的大闸是足够能让江豚自由过闸的。一是江豚依靠自身声纳导航，能顺畅游弋实验室2米宽的水道；二是历史上江豚能自由通过20米宽的桥孔。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认为，这4个桥孔能否真正使用还是个问题：“60米的孔让江豚巡游，是没太大问题，问题是60米水闸全打开，过水能力很强，

就不可能控制上游的水位了。”

“今后真正运行起来，很可能闸门是部分关上的，实际只是下面给江豚留一个60米长的缝。这条缝的水流流速会达到每秒6米以上，江豚是不可能顺利钻过去的。”周建军说。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持反对意见，WWF认为，拟建的鱼类洄游通道、豚类迁移通道建设方案在国内并无十分成功的先例，无法确保消除巨大的生态风险。

争议 30 年

人力控湖，在江西省是一个老话题。最早1980年提出时，还是为了防洪，当时上游省市采取新的防洪方案，导致下游鄱阳湖水抬高。江西省提出修一座高25米、蓄洪量达到100多亿立方米的水坝来削减洪峰。

此时反对的还是长江中游相邻省份，这些省份担心如果遇到洪水，鄱阳湖不分洪，上游平原地区就有水患的危险。

到了90年代，防洪的思路变成了防枯水，江西省就提出了《鄱阳湖控制工程规划设想》，即计划建造一个可供发电的、蓄水高程为16米以上的大坝将湖水彻底阻截。

最近十几年的新思路，是把大坝换成水闸，去掉了发电功能，增加江西省内可利用的水资源。江西省前水利厅厅长孙晓山接受采访时曾介绍，建闸的目的是让分洪进来的水不白白流掉：江西该走多少水，照走多少水。只是把夏天的洪水，留到秋天、冬天慢慢利用。按照这个方案，受影响最大的又变成了长江下游的相邻省份。

30多年来的种种人工控湖方案，都因为阻断了鄱阳湖与长江的江湖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国家的批准。

反对者认为，江河湖泊是由一系列存在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子系统所构成的巨系统，具有十分复杂的系统结构特征和相互关联机制，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如水力、生物空间洄游等密切的生态联系。任何一个子系统受到干扰或破坏，都将危及整个系统的良性循环。

即便在水闸的公示中，也提到：“长江，已不再是天然的长江。”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长江上游已建和拟建水库群总调节库容79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达530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工程。

这次公示，不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引发的第一次争议，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鄱阳湖水利工程，应从长江整体通盘考虑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

三联生活周刊：鄱阳湖枯水严重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吗？

周建军：现在都在说鄱阳湖水位低了，实际上严格说起来，枯水期的最低水位并没有变低，而是由于上游三峡蓄水，现在枯水期提前了——这两个表述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于三峡大坝从9月10日开始蓄水，导致下游水量减少，鄱阳湖正常的枯水期提前了30多天，长江水位一低，鄱阳湖的湖面立刻就跟着缩小了。

整个鄱阳湖都很浅，像一个盘子一样，水位从10米升到15米时，整个湖面就会从150平方公里左右延展到25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旱涝急转”这个说法，常常一到枯水期，很多区域就变成草原了，长江的水位对鄱阳湖的面积起到了很大作用。

枯水期变长的原因因此也很简单，就是上游蓄水的时间提前，长江水位降低造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是三峡工程的蓄水改变了下游的水文规律？

周建军：鄱阳湖肯定是受影响的。

由于长江上游这些年的人为开发利用，现在整个长江的径流季节都提前了，枯水期开始时间比过去都要早。

但同时真正到了鄱阳湖春灌的时候，三峡正在消落，需要腾出库存来防洪，鄱阳湖涨水的时间反而也提前了。按现有资料看，现在鄱阳湖春天的水位是要比历史同期高的，所以鄱阳湖区的用水条件并不比过去要差。

我觉得比枯水期提前影响更大的是，上游水库改变了流量的波动：三峡设计时原本理念非常好，只保荆江的防洪安全，不改变下游的水文节律。也就是说只管大洪水，中小洪水由下面的堤防、分蓄洪区来解决。但现在三峡把每年的中小洪水也拦截掉了，这样就把下游的流量波动都给调平了。

不管是鄱阳湖还是洞庭湖，受这一点影响都很大。鄱阳湖很多湿地位置较高，中小洪水一来就被淹没掉，就能形成季节性连通。但现在不发水了，没有了正常的水位波动，很多湿地的生产力就慢慢退化掉了，失去了原来的生态价值。

对于这些地域，最主要的生产力还是在夏季，冬季水位是否维持其实并不重要：进入秋冬季，气温一低，很多藻类、鱼类就进入冬眠了。现在都在说鄱阳湖鱼类减少，很大程度是因为夏季的生产力降低了，而要修的水闸主要是控制冬季水位，不是一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枯水期提前、水文节律变化，对整个鄱阳湖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

周建军：到底对湖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需要全面的研究才能下结论，现在就是因为说不清楚才吵得很厉害。

现在要建水闸来改变枯水期的问题，把一切都归结于枯水期水位太低。按照我的观点，现在鄱阳湖的生态变动，不一定是枯水期变化的原因。从整体来看，这些年整个长江的生态情况都在变化：比如洞庭湖，鱼类减少的比例要比鄱阳湖大得多。长江干流的鱼类、江豚总量也下降很快，像现在四大家鱼就减少了90%，相比之下鄱阳湖的情况可能还算好的。

现在想靠修水闸来提高水位，认为再不提高水位，以后生态环境会更恶化，但生态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原因是什么，目前都还没调查清楚。我觉得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

三联生活周刊：修水闸会改善鄱阳湖水质吗？

周建军：鄱阳湖区自己污染情况很严重，原来鄱阳湖水质很好，都是I、II类水，但这些年基本上III类水很普遍。鄱阳湖水一直是向长江流的，除非汛期会有些倒灌，那现在水闸是拦着湖水不向外流，也稀释不了污染。

三联生活周刊：采砂和鄱阳湖枯水期水位变化有没有直接联系？很多人提到采砂改变了河床的形状，导致湖水更容易流失。

周建军：采砂，特别是没规划的乱采乱挖，确实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了很大影响，挖砂破坏了湿地，对水质、水下微生物、底栖的生物，都有极大破坏。

但就这个工程而言，不能把采砂的影响说得太大，是否因为采砂导致水位降低过快，以至于要修水闸？这两者还无法建立起直接的因果联系。

但是反过来说，一旦修了水闸，人为改变自然规律，把枯水期水位提高，湖区水面变大了，通航、挖砂就都容易了，因为在水面下挖砂比在干的河床上容易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鄱阳湖之外，洞庭湖和其他湖泊是否也有建闸的声音？上游湖泊建闸，会对下游产生什么影响？

周建军：实际上洞庭湖也在说建闸的事。李克强总理以前就提过：“要把鄱阳湖生态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放在整个长江水系大格局当中，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考虑。”但现在地方和长江委都没有做到，各个省都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如果鄱阳湖这次要建水闸，也应该把上游洞庭湖的情况纳入考虑，一条长江把两个湖连起来，不能下游建完了上游再跟着建，频繁改变水文条件。最后来回协调，就变成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一样的和面逻辑了嘛。

而且现在两个湖区向外补水，还起到缓解三峡蓄水影响的作用，一旦两个湖都建了水闸，都尽量不让水出来，可能长江下游的水位降落会更大。今后长江的流量继续变小，到入海口会不会海水倒灌就不好说了。

我一直觉得应该把长江中下游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如果鄱阳湖非要建，也应该等整体布局做好了再建，把它当作整个长江水调配中的一环。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每年长江水的调配是由谁在管理，管理效果如何？

周建军：从行政上看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来管，长江委就是要对长江的水资源做统一管理、节约、配置和保护。

但现在长江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一方面管水资源调配，另一个方面自己也在参与一些开发项目。像长江委有一个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实际上是公司，所以他们的可信度是受到质疑的。

而且按照已有的经验，这种管理实施起来并不顺畅。像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就应该管理三峡水库的调度，但实际上现在三峡也不是按照原来人大确定的规划在运行。

如果现在国内有一个有能力全盘统筹的机构来管理长江水资源调度，我倒是觉得鄱阳湖建一个闸也没太大问题。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工程建完之后，如果不按规划走，改变运行目标，是没人管得住的。

三联生活周刊：鄱阳湖上游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这五大江河上都已经有了水库了，能不能通过控制上游的水库来解决枯水问题？

周建军：这五条江河的水库跟改变水位这件事联系不大，通过五条河来改变鄱阳湖湖面水位不太可能，鄱阳湖的主要控制还是来自长江这边。但上游这些水库如果调度好，其实也可以用下来的一些水做一些引水工程，帮助鄱阳湖地区解决农业用水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不建水闸，现在鄱阳湖居民用水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以前的媒体报道称，因为缺水，沿岸很多城市都不能引进大量用水的工厂，已经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周建军：高耗水的工厂本来就不能在鄱阳湖边办。2007年温家宝总理到鄱阳湖视察的时候就说，要“保护好鄱阳湖这一湖清水”，“一湖清水”是江西的生态发展定位。高耗水的工厂耗水量大、排出来的污水也多，本来就不能在鄱阳湖范围内建设。

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生活和灌溉用水，解决民生问题。我觉得目前不像江西省自己说的，研究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这些民生问题。第一，鄱阳湖地区整体来看是不缺水的；第二，当地居民人数和农耕范围都不算很大。在这两个条件下解决老百姓用水问题，方法很多。

过去当地就是从湖区里抽水来解决周边居民的用水问题，现在看也没什么问题。像那些大范围的农田，我认为应该改变漫灌的灌溉方式，建设保存率高的灌溉设施。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控制上游五河的水库来解决这部分用水需求，还可以在当地多打机井，因为湖区周边的地下水位是很高的。

现在当地重点应该解决老百姓的用水，而且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就应该把老百姓的用水设施按高标准建设好。至于水位抬高或降低，跟老百姓切身用水的情况关系不大，因为本身用水量也不大。■

（感谢实习生项文虎对本文的贡献）

“七环”北京，格局初现

记者 / 付晓英

密涿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建成通车，北京段也将于明年贯通，届时“七环”即可成环。

12月6日，河北省交通厅发布消息称，起自北京市密云区、终至河北省涿州市的密涿高速公路河北段建成通车。而密涿高速北京段也将于明年贯通，届时北京“七环”即可成环。

所谓“七环”其实是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的民间俗称。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全长约942公里，其中河北境内约850公里，由12条段高速公路组成，除承平高速公路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外，其他路段已全部建成通车。为尽快实现区域互联互通，交通运输部提出，先期通过替代路线来实现首都地区环线的高速功能，即由河北省的长深、京哈高速公路代替承平高速公路，形成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替代路线。替代路线在河北境内由大广、长深、京哈、廊涿、张涿、京新、张石、京藏、张承、密涿等高速公路组成。而密涿高速公路河北段的通车也标志着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河北段全线贯通。

密涿高速公路河北段全长50.46公里，总投资约为60亿元，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该路段起自河北省三河市东北、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处，自北向南经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进入北京通州区，于北京大兴区采育北再次进入廊坊市区，经广阳区与现有廊涿高速公路相接，自北向南连接京平、京秦、京哈、京津、京沪、京台、廊涿等七条高速公路，呈“C”字形环绕北京城区。该路线的建成通车将承德、廊坊等节点城市一一串联起来，结束了廊坊三河、大厂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使廊坊市区与北三县的联系更加密切，两地通往廊坊市区的行程由以前的1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通往省会石家庄更是从以前的4个多小时缩短至3.5个小时。

密涿高速河北段通车后，北京市交通委称，密涿高速北京段也将于明年通车。“七环”即将贯通，对于京津冀区域内的交通建设与经济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就此，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段进宇和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

院现代交通运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柱庭。

三联生活周刊：密涿高速河北段通车的消息一发布，“北京七环”即将贯通的消息就在网络上此起彼伏，但这条高速公路线只有很短的一段经过北京，大部分路段是在河北，这能对北京的交通起到什么作用？

张柱庭：老百姓愿意把这条路叫作“七环”，其实这个说法有点“语言噱头”，并不准确，实际上，这条高速公路只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一个项目工程而已，它拉近了北京和河北的距离，人们把它叫作北京“七环”，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大家的一种愿望和期待。

密涿高速公路除了连接河北县市，它的建成通车也能大大缓解北京市的交通压力。北京一直以来都是华北地区的交通要地，河北南部、东部与北部联系均需穿过北京，数量庞大的过境车辆对北京造成了巨大的交通压力和空气污染。这条高速公路通车，能使北京东南部现有的过境交通，尤其是货运过境交通，逐渐转移到北京外围地区，北京不用过度承担这种交通中转的功能。比如，以前河北南部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的货运车辆要往东北或者内蒙古运输，需要穿过北京的六环、五环，但现在它可以不用绕进北京，直接从“七环”这条路通过，不在北京停留，能够有效疏解北京交通，缓解车辆过境压力以及汽车尾气对北京城区的空气污染。此外，它还是首都东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北京新机场建成后，这条高速路将成为沟通新老机场的陆路干线，成为两座机场间最便捷的走廊。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货运车辆不经过六环、五环，直接从“七环”绕出去的话，运输距离和交通成本是不是会更高？

张柱庭：这就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了，并不是说“七环”通车，就会强制要求汽车从这条高速路上绕行，车主可以自愿选择。从运输距离看，绕行“七环”的路程确实会更长，但是，如果货运车辆通过六环、五环进京，一旦碰上大规模拥堵，花费的时间成本非常高，整体的运输成本也会远远高于绕“七环”出城。

三联生活周刊：所谓“七环”的规划和修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条路线的主要线路都在河北省，建成通车之后对河北来说会有哪些影响？

段进宇：关于修建“七环”的说法很早就已经开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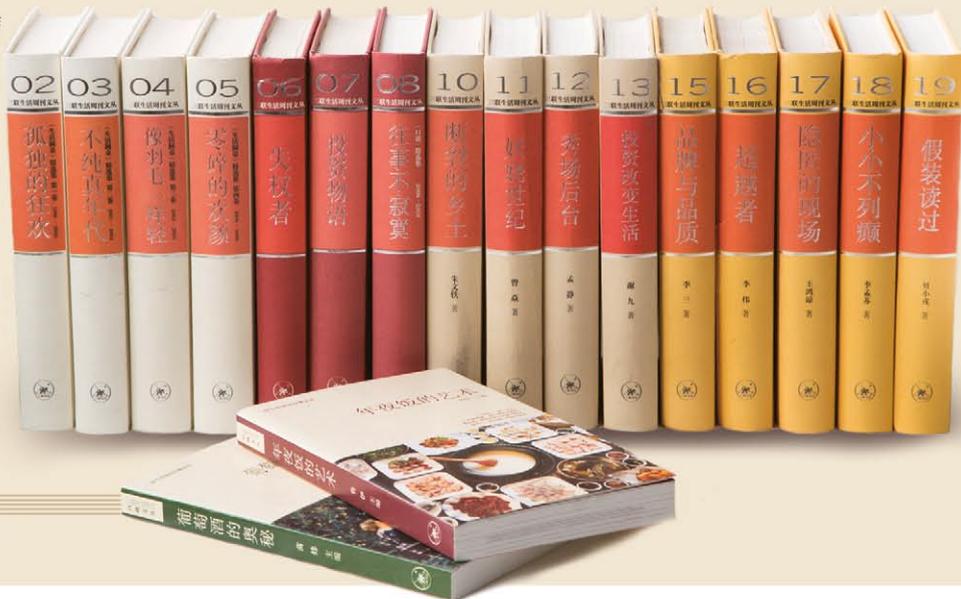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投资物语	往事不寂寞	有关品质	断裂的乡土	妖娆世纪	秀场后台	投资改变生活	生命八卦	品牌与品质	超越者	隐匿的现场	小小不列颠	假装读过	廿年「精装版」	廿年「精装版」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10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78元	88元	48元	49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始了。2006年，吴良镛院士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对于京津冀地区交通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新七环”的设想，将北京规划七环向外扩大到京冀交界处，自西南向东北依次连接涿州、固安、廊坊、香河、大厂、三河，直至平谷，将这些城镇作为新城镇发展点，调整产业结构，缓解中心的发展压力，加强与外围城市的交通联系。

真正开工建设是在近几年，其实“七环”有点像中国古代城市外围的巡城道，在城市外围的一圈，把城市保护起来。它其实对北京市内的交通影响不大，主要解决的是紧邻北京、依托北京发展的县市之间的交通问题，需要有这样一条路把这些地方串联起来。整条路线只有一部分通过北京市内，其余的都在河北省内，所以这条高速公路主要是河北省修建的，当然体现更多的也是河北省的意愿。

从河北省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条路的作用还是很重大的，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项目。以前河北省主要寄希望于沿海发展，比如唐山、秦皇岛等，但是后来世界经济形势逆转，出现产能过剩，唐山市从先进模范成了产能过剩的落后典型，秦皇岛的旅游度假经济潜力也并不是很大，沿海战略很难继续挖掘，所以这个环北京发展带就格外重要。北京计划将低端产业向外迁出，这些产业能够聚集到哪里呢？当然是北京市域的边缘，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选择。大外环的高速公路修建通车，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土地价值会提升，产业聚集之后，税收也会增加，慢慢地形成河北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人口、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这些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效应。所以，这条路的建成通车，对于河北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好的题材。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七环”的消息发出第二天，发改委、工信部、国土局、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林业局等七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加强京津冀交界地区规划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严格管控措施”，严格产业准入管理，严控房地产开发建设，强化房地产市场管控，严控人口规模。这是否也会对高速公路环线区域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张柱庭：北京到燕郊过去没有高速公路的时候，从北京到燕郊开车要4到5个小时，而高速公路通车以后，从燕郊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国贸了。你看现在燕郊住了多少北京人，交通更便利，房价也就会随之拉升。现在也是一样的道理，大外环通车之后，河北进出北京更加方便，人口、产业的集聚是不可避免的。

段进宇：这种政策上的口号作用其实有限。你可以看看过去修路的影响，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

环路修好之后，周边的房价地价飞速上涨。“七环”虽然不在北京市，但规律是一样的，这一带的发展也是可以预见的，对于河北省的经济带动作用也会比较大，有利于带动河北省环北京小城镇的发展，促进沿线城市和重要城镇的发展，

但是，光是数量上的好处还不够，产业和经济结构也要协调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条路被称为“北京七环”，也就意味着整个这一带都要围绕北京来发展，而从京津冀整体区域规划和发展来看，肯定不希望都围绕着北京这一个中心来发展。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北京、天津、河北各有分工而又相互协作，通过多个副中心将整个区域带动起来，如果单纯依托北京，在空间结构上相当于又加剧了京津冀区域内发展的不平衡，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在京津冀一体化项目里，关于交通的整体布局是怎样的？京津冀要协同发展，区域内理想的交通模式应该是什么状态？

张柱庭：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规划项目很多，有干线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地铁等等，它是一整个系统。干线铁路将依托国家铁路网络，加强京津冀主要城市之间的沟通。目前以北京为中心排进计划的包括京张、京沈、京九、京唐客专等。城际铁路主要用于加强北京和京津冀城市群间的相互沟通，现在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已初步完成。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负责城市内的短途出行，目前，北京地铁里程在不断扩大，石家庄的地铁也正在建设当中。在这几层网络里，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解决30公里范围内的短途通勤需求，市郊铁路负责30至70公里的交通出行，70至150公里出行由城际铁路承担，更远范围出行将依托国家干线铁路。

在公路运输上，京津冀地区的公路网有一定基础，但是三地之间的“瓶颈路”较多，不是互相贯通的，而且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形态，不利于三地间的互联互通。未来要促进区域路网格局由“单中心、放射状”向“多中心、网格状、全覆盖”转变，有些道路要加快修通，有些道路则要绕开北京。

未来，在京津冀城市群间，理想的状态是城市之间互相贯通，从北京六环一小时可达唐山，从北京往北一小时抵达张家口，往东南一小时到达天津，从天津一小时到石家庄。京津冀区域主要城市之间形成“一小时交通圈”，主要城市与周边卫星城市间形成“半小时生活圈”。现在京津冀一体化的交通规划还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推进，就像最近通车的密涿高速河北段，它环绕北京，促进了京津冀公路网的对接与完善，也使得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形成新的格局。■

清晰远瞩，宝马造就中国跑步运动推广典范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背景下，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跑步，这一“零门槛”的运动方式，已逐渐成为人们首选的运动之一。仅2011至2015年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马拉松赛事便已从22场发展至近100场；在北京、上海、成都以及其他东部沿海城市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马拉松和跑步运动更受青睐；仅北京地区，跑步爱好者总量已接近100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20人中就有1人每天坚持跑步。数字增长的背后，也离不开如宝马等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商业品牌的推广和助力。从44年前宝马首次牵手慕尼黑奥运会到2016年第四次携手上海马拉松，宝马基于对品牌运动精神的传承，以清晰远瞩的前瞻性和行动力，成为公认的中国推广跑步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也是豪华汽车品牌中在中国推广跑步运动的典范与标杆。

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身心之“悦”

城市中的跑者急速增长，对跑者而言，跑步不仅仅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隐含着他们对身体和精神两种层面上的挑战和追求；而身体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愉悦，也正是跑步之于跑者的魅力所在。精神层面上，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做出了非常精练的总结：“跑步无疑有巨大的魅力：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从生理层面来看，许多跑者爱上跑步，是因为跑步为其带来的生理快感。美国的研究者发现，人们在跑步的过程中，大脑会分泌以内啡肽、多巴胺为代表的神经化学物质，它们可帮助人们消除疲劳感与疼痛感，从而感到身心愉悦。其中，内啡肽（endorphin）是由脑下垂体和脊椎动物的丘脑下部所分泌的氨基化合物（肽）。通常，我们自身分泌的内啡肽浓度很低，而在跑步等高强度运动的过程中，肌肉拉伸或撕裂会引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系统的激素升高，促使人体加速分泌这两种物质，使跑步者从生理上感到愉悦和满足。

“悦·创造奇迹”， 宝马是中国跑步运动的倡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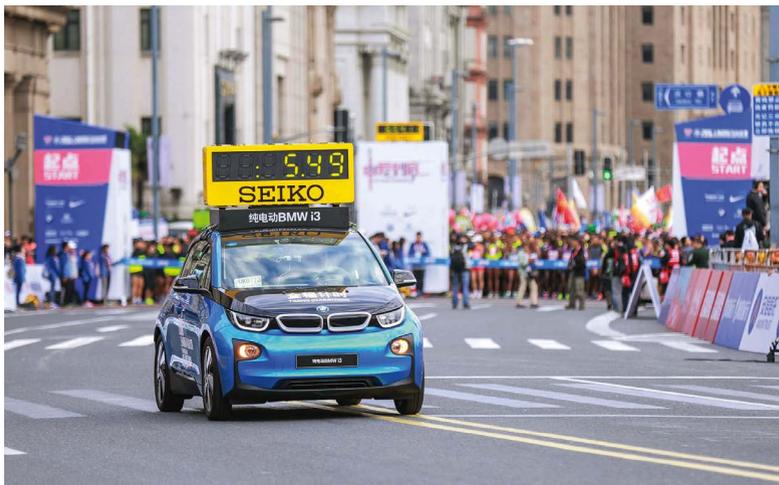
尽管马拉松和跑步运动，被视作是一项“零门槛”的运动。但根据尼尔森与中国田径协会共同发布的《2015年中国跑步人群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跑步爱好者主要由30~45岁的精英阶层人群组成，他们的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万元，比一般家庭高出36%；36%的核心

跑者具有中高层管理人员身份；54%的核心跑者拥有私家车；42%的核心跑者拥有银行VIP卡；他们的视野更为广阔，除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外，也注重精神层面的修养；68%的人认为会更易从跑步运动或马拉松赛事赞助中了解一个品牌或提升对该品牌的好感度。

因为这些人特征，跑步运动也无形中衍生出巨大的商业价值，成为商业品牌与目标消费群体匹配的一条通路。马拉松和跑步运动所代表的“创造奇迹、超越极限、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与宝马的品牌精神内涵不谋而合。基于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承诺，宝马不断深化和拓展其在跑步和马拉松运动项目上的积极推动作用，并已成为中国跑步运动最主要的赞助商及推广者。2016年，宝马再度牵手上海国际马拉松，不仅是宝马在品牌百年历史基础上的全新出发，也是宝马马拉松和跑步运动推广的进一步深化，这正是宝马通过不断推广马拉松和跑步运动，向社会和人们所分享的品牌核心价值——“悦”高度重合，也成为宝马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纽带。

“悦·创造奇迹”是行动、超越自我的过程，是成就，也是宝马对于品牌核心价值——“悦”的创新诠释，它使得宝马品牌更加贴近中国文化的内涵，也使其与中国社会建立情感层面更深的共鸣。

站在百年历史的基点上，宝马展望下个百年，与中国精英阶层为代表的跑步爱好者一样，宝马将自己视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包括马拉松在内的多项运动，推进人们对于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生活方式的追求。我们相信，宝马将把超越自我、超越极限的品牌之“悦”传递给更多的人，创造新的百年奇迹。





(视觉中国 供图)

中国游客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旧城广场附近游玩（摄于2015年）

“后梁建章”时代：携程国际化加码

记者 王丹阳

11月16日晚间，携程突然宣布换帅，梁建章在断断续续带领携程16年后将CEO之位传给他的得力干将孙洁，自己将退居董事会主席一职。

这是携程今年的又一重磅消息，围绕着这个当口，这家仅17年历史的民营互联网旅游公司已完成诸多国际收、并购，市值达200多亿美元。所以最近的携程相当引人注目，一周后，当孙洁对我们解释这次“换血”时，很平淡地说公司发展到目前的阶段，“James（梁建章）想现在是到了去幕后进行更高层面的决策和指挥的时候”。

这位经历丰富的前COO之前一直非常低调，鲜

见于媒体，可搜到的采访中也是讲些女性话题，给人以家庭事业兼顾的女强人印象。孙洁有一份相当漂亮和顺当的职业经理人履历，她于2005年加入携程，自2012年任公司首席运营官，在2015年起兼任公司联合总裁。中间做过7年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她在在线旅游的运营和管理、投资并购以及财务运营管理方面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且备受推崇。

携程新总部位于上海金钟路的凌空SOHO，一片玻璃幕墙式的集群化办公区，携程有万把员工占据了六个子弹头般的建筑，从一端到另一端要经过凌空的透明廊桥，占地面积之大让分区足矣分到字母“H”。孙洁的办公室在一道不起眼的走廊上，走廊一白到底，简陋素净得像是在一个现代化工厂里。

当我在一个雾霾浓重的周五晚高峰时分走近她的

办公室，她满脸堆笑地在办公室门外站着，夹杂在一些秘书和工作人员中，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差点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新任 CEO。孙洁的时间珍贵到以分秒来记的，从条分缕析的时间安排里她游走于各种事务，却没有让人觉得是在“复制”笑容，这点让人钦佩。她正完成一家时尚媒体的拍摄，换下了礼服，改穿一套红绸裙装，“她已经连轴转工作 10 个小时，不过她的体力非常好。”她的同事之前跟我解释。

“哎，身体一定要好。”寒暄过后，我们在办公桌前坐下，她这样感叹道。随和、谦虚、饱浸职业的风范却不给人以压迫感，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她的语速停匀温雅，言间却充满职场的果敢和锐利，一切让人感到是一位不失和蔼可敬的女强人，在被“塞”满一天后，依然拥有良好的自持和分寸感。

事实上，她是一个十年如一日早上 7 点多就到办公室的高管，是继梁建章后公司第二位最早到的人，两人在 8 点前就拟定了一天要开的会。整个上午不例外是各种会议，下午处理各自的事，“她一般 6 点下班，回到家 7 点，陪两个孩子到 9 点，因为他们 9 点睡觉，她才开始上网跟国外各种投资人视频谈案子，那时他们刚刚早晨……有时一两点我们还看到她在发工作邮件，但第二天她一定是 6 点起床……”她的同事已尽数掌握她刻度般的日常生活。“即使这样，她还坚持跑步，她跑过半马。”5 年前，她完成了一次 42 公里的全马。

“James 善于看准大的方向，把握技术，我比较开放和随和，处理各种关系，他就在那里想问题。”她说起公司事犹如说家务般，丝毫不生疏见外。聊天间她频繁谈到自己对于做决策的看法，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的前首席财务官，留给她前思后想的时间并不多，“我每次都问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做的话我们就一、二、三……”于是一个大型融资或并购案在她的手里，从有意向到最终签完也就一个来月，携程每笔国际性交易的账簿上都显示着她的果敢和机智。

她的国际化视野可以从她夹杂的英文术语看出，也是一口洋腔洋调的国语让她看起来随意而开放，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她自 1997 年起供职于美国 Applied Materials Inc.，担任向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外部报告的部门负责人。在此之前，她曾在加州的硅谷工作了 5 年，担任毕马威公司的审计经理。她是美国注册公共会计师协会的注册会计师，同时也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注册会计师。在这之前，孙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而后就去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留学，一直到 2005 年回国。

携程这次换帅也让人揣测是跟它近年来瞄准的

国际化道路有关。今年，它已经屡屡有所铺展，包括 14 亿英镑收购英国最大在线机票订购系统天巡 (Skyscanner)、投资印度最大旅游在线企业 Make My Trip，以及美国华人旅行社海鸥和纵横。由此，携程的国际化布局自大中华区、亚洲，伸展到大洋彼岸，成为覆盖全球一半人口的极少数电商之一。

而内部合并之路也在并举，去年购得艺龙最大股东 Expedia 的股权，接掌艺龙，又宣布投资去哪儿网，今年 11 月携程旅游板块刚合并了去哪儿网度假板块……在经历了在线旅游代理平台的恶性价格战之后，携程已无疑成为 OTA（在线旅游代理）大家长，而烧钱模式也已经翻页，携程的眼光彻底从 OTA 产品定价的生死追赶中挣脱，面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最近，刚出炉的今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旅游度假业务营业收入为 8.13 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 72%，同比增长 37%。营业利润率为 8%，相比上季度的 -9% 实现了大幅增长。财报显示，近年来携程旅游业务持续保持快速增长，2015 年连续 4 个季度实现了 50% 以上的快速增长。在业内，有种说法是，中国旅游市场潜力之强大足以让境内竞争胜出者的交易额、净利规模走向亚洲前列，携程就是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并最终成为那个整合者。

孙洁每次在东西半球间飞行时，更坚定了旅游这项事业长盛不衰的见解。“中国人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这是他们今后的方向。如果十几年前她回国是因为国内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那么今天她更相信当初的选择。随着 GDP 的增长，中国人“走出去”的欲望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在跟我谈起旅游这项事业时，她是更把旅游看成一桩文化事业来做，如此它就



携程 CEO 孙洁

值得长久付出和推进。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发现携程今年的国际化步伐非常大，分别收购了英国的天巡、印度的 Make My Trip 和美国的三个旅行社，这是为什么？

孙洁：这些虽然是基于不同的目的，但是我们的战略视野是一样的，美国那三个都是东岸、西岸数一数二的地接社，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去美国的趋势非常明显，那边的地接社的产品质量就保证了我们客户的满意度，所以把他们放在我们旗下的话，对客人的满意度、产品的丰富性都是有很大的保障。

第二块是印度的 Make My Trip，因为我们是觉得中国有老龄化的危险，但是印度的人口还是不断在上升的，而且它现在的人均 GDP 就相当于 10 年前的中国。你看我们 10 年前还是比较弱小的，那今天已经发展得很好，所以我们等于是布了一个棋。只要印度的收入水平不断上升的话，我们觉得它未来的旅游也会像中国一样蓬勃的。而且印度这个市场跟中国非常相像，一定要当地人来做，别人做不来。

三联生活周刊：在收购印度公司的时候会有些独特性吗？

孙洁：Make My Trip 上市时它说它是印度的 Ctrip，所以它叫 Make My Trip，我们两个团队也是蛮多共同点的。它也是一个提供预订的 OTA，但印度的线上预订频度（frequency）、可预订的酒店数（availability）都比较弱。中国政府对商业非常支持，然而印度政府对商业的支持没有中国政府那么高效，他们还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机制，政府的管控能力很弱。我们的合作方式是给它一些建议，靠自己的力量推进。它之所以也欢迎我们，就是它看到中国那时候的价格战和拼打跟印度非常相像，很多人要投它，它没有接受，但它觉得携程在中国领先地位的发展，对它有借鉴作用。我们的投资都不是乱投的，可以说都带有策略性目的，也经过深思熟虑。

三联生活周刊：撇开印度不说，跟英美这样一些国家洽谈并购和收购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文化门槛吗？英国市场的准入门槛相对比较高。

孙洁：跟欧美的合作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工作效率很高的，我不希望带二十个人，一大堆助理过去谈，我会很不习惯。我谈判就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律师，一个是财务。他们飞过来二十几个人，西装笔挺都是男的，“哗”坐在我们三个很娇小的东方女孩子面前。我们的态度还是温和的，但也很坚定，要谈判我们就得把战线推到对方的前沿去，我们一点都不会示弱，

效率会很高。

我通常和 James（梁建章）想好大的方向，我接手后一个月就做掉，我不喜欢拖泥带水想不清楚的。我们每笔生意都是想得很清楚，底线在哪里、最好是在哪里、折中方案是怎么样的，干干净净，所以我做交易速度是非常快的。西方很多国家因为商业非常成熟，很多时候都是律师做决定，而我们这边法务是来支持商业决策，来保驾护航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公司为什么发展那么快的原因。美国的公司有时候谈来谈去的风险考量是一辈子都不会发生的，我不允许我们这样，我一个方案出来已经差不多是折中的了，不需要多方再协商确认。

就像 Skyscanner 这笔，我们从有了投资条款清单到最后买卖合同签掉，也就一个多月做掉。我们一个 26 亿美元的融资，也就是一个晚上 6 小时就把它融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英国的天巡本来就有 16 亿英镑的市值，在欧洲市场占有率很高，他们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答应收购的呢？

孙洁：Skyscanner 是一个技术型的公司，跟去哪儿网以前的模式挺像的，做价格比较的功能。但是它是跳转，你点了以后它就跳转到 OTA、跳转到航空公司，客人不在它这边下单的，它完全是广告模式。那我们可以帮它的是，当客人想订产品的时候，携程有机票库存，客人可以直接下单下在里面，这样对它的营收能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相当于它是导流，在前端做搜索，我们在后端形成一个带订单系统的闭环，携程的预订系统是比较复杂的。

某种程度上，因为 Skyscanner 是个全球化的公司，它能够为我们带来国外的认知度，在欧美市场大家对这样的品牌的认知度要比携程高，所以在做国际机票的时候它可能比我们会更加有优势。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跟其他项目不一样，这个公司是非常有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大家目标一致就合作，这点跟我们公司很像，效益驱动下效率是一切。所以他们团队还是保持独立运营，互联网公司人人都是 Owner（所有者），你不能把管理者和所有者放在对峙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可不可以说比较密集的国际性合作是从今年开始的？

孙洁：其实一直在进行当中。我们是跟着中国人的人均 GDP 水平来走的，我们第一步肯定是把国内地区做得很好，第二步就是大中华地区。其实携程是很有眼光的，2006 年我进公司第二年，两岸三通还没有开通，我们已经第一个抢先投资了易游网。那个时候

非常辛苦，我早晨4点就起来了，然后要到香港转机，下午4点才能到台湾。开董事会开到晚上12点，第二天再赶回公司。然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又收购了香港的永安旅游。

所以内地和港台还没有联通的时候，携程的触角已经伸到了那里。有时候我感觉旅游这项事业是相当促进和平和文化交流的。把人民的心声、文化、历史、友谊传递出去。但我们还是跟着客户走，客户需要的产品我们就会来开发，说到日韩旅游的需求量在增长，但特别是日本比较保守，你看它酒店不够，酒店不够就是要造嘛，它这个法律法规又没有打开，日本又不像中国人会想办法尽力解决问题。

现在国外合作方都注重要雇双语背景的人，我们也会通过携程大数据为他们提供帮助。比如说酒店，我们说你这个酒店如果早晨可以有中国人吃的粥、咸蛋，每个房间有一个热水壶，这样的小细节对中国人就比较友好，我们在网站上标注“华人礼遇”，这个对双方都有利。因为携程的容量比较大，所以就会跟酒店协商有些早餐可以免费，针对一些高端客户，我们会让酒店送个香槟或者水果盘。

三联生活周刊：携程在战略投资艺龙和去哪儿之后，后两者的运行团队会做些改变吗？

孙洁：去哪儿和艺龙都保留相对独立的经营和财务团队，因为去哪儿的品牌跟携程品牌的目标客户不一样。去哪儿是针对年轻人，价格敏感，要挑性价比高的产品，对服务要求是基本要求满足。携程都是高端的商务客，需要更值得信赖的服务。你看携程头等舱跟商务舱客人对服务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稍微有一点不好就不得了。

你要改我们的模型去做去哪儿，商务客人其实更在乎服务可靠性和便利性；你让去哪儿的团队去涉入那些很高端的业务，去哪儿的产品形象就会改变。所以两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创造性，只要把各自的客人服务好，我们会仍然独立地去运作。虽然仍然有更多自主性定价，但是不再是你降一块，我降两块，不再是恶性竞争。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很多场合说过携程正在做数字化精准营销，这个主要是在哪个方面发力？

孙洁：客户的信息我们是知道的，一年出行几次，每次的信息是什么，住的酒店和坐的舱位。坐商务舱和头等舱的客人，我们就自然而然推五星级的酒店，推一个豪华的接送车给他；如果是家庭式的机票预订，我们就推家庭旅游的东西。

本来你要做很多攻略研究，那现在我们帮客人都

想好了。最容易出问题的是航班，所以机票很难做，有时候航班取消我们就立即推火车给你，那么酒店的入住时间不对了，我们再马上通知酒店，这一系列联动机制是由我们强大的后台来做的，要衔接得上。关键就是基于大数据之上的营销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能不能说在中国，小型OTA竞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基本上现在已经定型了？

孙洁：我们自己还是很有危机感的，因为携程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的，如果你没有一种危机感，就会被新的来代替。所以我们对二、三线城市的拓展会快马加鞭，因为携程整个加在一起，大概占整个中国旅游业10%还不到，对中国市场还没有完全吃透。

中国市场的增长是最快的，国内还有很大的增量。小旅行社在二、三线城市还是很有市场力量的，所以我们投资的百事通，它有3000个门店，我们会跟他们合作把一些品牌沉下去。还有一块国际化，它的特征是基数小，成长率高，但难度也大，因为我们的团队还是比较本土的。

中国人太会打擦边球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携程在当中就要充当一个客户捍卫者，保护客人对行业来说也是树立一个标杆。你做得不好，我们就下架你，直到产品服务整治到位；客人的评分高，你的排名就能上去，量也会起来。为什么携程当初定位要年收入10万块以上呢，因为这些客人有真正的消费能力，必须使得客户的收入与你员工的收入间有一个差，你才有盈利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我发现携程APP上的主菜单下面有些小的官格推出了比如机场接送车、金融换汇等服务，这些小型业务也是携程旅游生态体系的衍生吗？

孙洁：有一些小型业务我们当作尝试，量比较小，没有放在首页。比如汽车票业务，当时是6个“90后”小朋友跟我们提出能不能试做6个月，携程定位比较高端，汽车票能盈利吗？第三个月他们又来了，我们决定给200万让他们用6个月时间冲一冲，如果每天冲破1万张那我们就做下去，结果他们一个月不到就日均售出1万张。

我们现在非常像大象跳舞，内部有个促进团队创新的“Baby tiger小老虎计划”，他们每天虎视眈眈地盯着市场一些没有覆盖到的领域，或者新的需求。比如说机场停车服务，都是小朋友说要做的，我们想一级入口不能给他们，但二级入口都可以让他们自己测试。还有同城行李托运，因为中国人喜欢一路购物，有车跟着会方便，我跟James就没有这种需求，有些细微的需求我们高层是不能面面俱到都想到的。☑



老字号在互联网时代转型的探索：品牌 + 社交化电商

老字号，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其动辄上百年的生命见证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历史的记录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然而在市场经济主导的今天，那些无法紧跟人们生活方式或理念而转变的老字号，脱离了对市场的研究和把握，在一轮轮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曾被称为“中国胶卷王”的乐凯告别了彩色胶卷行业；曾家喻户晓的百年品牌“泊头火柴”也随着打火机的普及而彻底成为历史……推陈出新是历史的必然，即便是幸存下来的老字号要在新品牌竞出的当下稳住其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也需要不断变革思路，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新时代，如何紧随市场，革新产品，研究出自己的互联网营销规律，是当下老字号能否拥抱春天的重中之重。

市场遭遇瓶颈，老字号暗藏危机

据相关资料显示，50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共有老字号 1.6 万多家，到 1990 年这一数字减至 1600 余家，1996 年经商务部重新认定的仅有 434 家。在目前国内 2000 多家老字号里，有品牌、有规模且效益良好的仅有 10% 左右；勉强维持现状的占 70% 左右，亏损甚至有倒闭破产危险的占 20% 左右。

老字号云南白药近几年的发展也不容乐观。笔者查询了云南白药 2015 和 2014 年财报，发现除了中药资源事业部外，其他子公司相较于上一年的营业收入增速均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情况，健康产品事业部在 2014 年的增速是 32.66%，在 2015 年是 21.84%；省医药有限公司 2014 年显示是 17.33%，2015 年则为 9.24%；药品事业部 2014 年为 12.58%，2015 年仅为 2.38%，几近停滞。

老字号的销量受到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主打产品单一，本身缺乏创新。据天津同仁堂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的主营产品血府逐瘀胶囊、肾炎康复片在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 1~6 月的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81.06%、78.81%、75.24%，脉管康复片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7.39%，同期公司其他药品的销售收入占比均小于 5%。公司的收入依赖此两种药品，产品存在销售集中度较高风险。此外，无数价廉的同类商品纷纷进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与老字号抢占市场份额，这对于老字号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

另一方面老字号的销售渠道相对比较保守，大都主抓线下渠道，以传统模式稳打市场，通过口碑效应发散传播，辅之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来稳固市场份额。而消费者的消

费渠道已不再是单一的线下，是线上线下的多样化。相当大的消费群体持续流失到线上，越年轻的消费群体越偏向选择在线上消费，而他们将会是未来消费经济的主力。

消费群体的流失，同类商品的打压，老字号寻求变革、改良产品、开拓销售新思路迫在眉睫。

逐鹿大健康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寻求变革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产品改良，使其适应市场需求。在大健康产业当道的现状下，诸多老字号也触及了这个行业的热度，纷纷试水，投入大量成本进行研发。天津同仁堂研制出了草本热敷蒸汽眼罩，既对眼部进行美容，也起着预防近视和缓解疲劳的作用；云南白药也推出了自己的热敷蒸汽眼罩；作为中国本土化妆品的代表老字号百雀羚，则推出了“紫芝芯肌焕颜原液面膜”，其中六胜肽和玻尿酸的成分引人关注。

传统医药行业的老字号潘高寿也在寻求变革，在转投大健康产业时似乎更有底气。潘高寿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为广东人潘百世、潘应世兄弟所创，迄今已有126年的历史。潘氏兄弟起初设药铺店号“长春洞”，后经潘百世四子潘郁生发扬光大，独创“潘高寿川贝枇杷露”，成为止咳、治咳领域中成药的杰出代表。

潘高寿见证了百年间中国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其意义非同一般。但近年来，与老字号“王老吉”相比，潘高寿显得较为落寞。王老吉赶上了新时代养生市场的契机，与碳酸饮料相比，王老吉具有有益于健康的天然成分，且抓准了“凉茶去火”的理念，主打“怕上火喝王老吉”的广告语，经过多年运营，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凉茶市场，坐稳了民族饮料的第一把交椅。潘高寿旗下的产品多为药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难以与定位于快消市场的王老吉相匹配。对此，潘高寿研发团队决定来一次大胆探索，将目光对准大健康领域。经过实践验证，研发出了国内第一款红参姜茶速溶饮料。这款产品主要原料采用长白山5年以上小红参以及云南小黄姜，驱寒补虚。而且与王老吉主推的红罐凉茶不同的是，潘高寿并没有推出液态的红参姜茶，而是以冲剂的形式，一次一袋，一袋一杯，速溶、方便冲泡、健康养生，这是潘高寿红参姜茶主要特点，与目前市场主打的韩国参茶相比，国内老字号潘高寿倍有信心。

品牌 + 社交化电商，老字号转型尝试

老字号在实现产品的研发改良后，如何结合互联网，寻求销售渠道的拓宽或转变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上个月，潘高寿在义乌举办了“百年品牌，预见未来”的新品红参姜茶发布会，提出打造“老字号 + 社交化电商”这一新模式。

回顾老字号旧产品的传统营销模式，多为企业对超市、

餐饮业、单位的销售推广及电视广播纸媒等广告的投放配合宣传等。这种模式特点是稳扎稳打，注重线下，缓慢积累口碑及用户，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但在信息传播迅猛的当下，酒香也怕巷子深，因此，老字号 + 社交化电商为老字号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即品牌 + 社交化电商。这一模式有其独到的优势：拥有良好的品牌影响力。无论是潘高寿还是云南白药、同仁堂。这些老字号经历了历史的沉淀，百年品牌有其独特的灵魂和民族性，在消费者中的口碑良好，质量过硬，这是老字号的品牌优势。

社交化电商平台的优势。社交化电商产生于微信、QQ、微博等社交平台，社交平台基于自身强大的社交属性换来了精准的流量，在流量变现的过程中形成了圈子经济：女生的社交圈子大都会讨论化妆品、服饰、衣帽；学生的社交圈大都会讨论游戏方面的点卡、道具；成功人士的圈子则侧重于企业课程的培训。圈子经济的存在极大减少了企业投入营销的成本，且用户成交率远远高于非圈子经济。此外，大型的社交化电商本身是具备强大的资本运作和专业的培训，比如潘高寿新品红参姜茶便有大量资金的注入，为潘高寿新品的运营做了保障。微谷中国作为红参姜茶的合作方，为社交化电商团队提供专业的营销培训。

品牌 + 社交化电商模式虽为老字号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但仍然有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社交化电商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这将影响和制约社交化电商的发展。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形象代表着行业的形象，如果不设立门槛，势必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口碑。二是社交化电商主要通过广告的形式进行营销，目前来说，社交化电商广告的方案与设计不够专业，而且发布频率过高，很容易引起用户的不适甚至反感，提升广告质量，优化发布次数，这也是社交化电商需要考虑的细节。（文 / 得一观察）





一个爆款的背后 《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热播秘笈

作为 2016 年全网成绩最好的热播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创下了多项纪录，该剧目前于优酷的总播放量已经达到 159 亿，在各社交媒体上也成功掀起多轮热潮：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 300 亿，微信微博文章总阅读数超过 3500 万。作为畅销校园小说衍生出的一部青春偶像电视剧，优酷的市场团队、版权团队、营销团队对这部剧做了精心的包装和策划，使之成为网络传播平台上一部现象级的作品。大优酷事业群高级副总裁杨振以及优酷

营销团队、版权团队，为大家解答爆款背后的秘诀。

如何挑中爆款：内容竞争本质上是洞察竞争

《微微一笑很倾城》同步在卫视播出，但是网络平台上，只有优酷独家播放。那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部剧作为平台的独家推出呢？

优酷版权团队的负责人介绍，这是考虑了顾漫高质量的原創作品，杨洋、郑爽的偶像效应，以及该剧制作

团队本身就是一个很酷的制作团队而综合决定的。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大优酷事业群的高级副总裁杨振则做了更为透彻的阐述：“首先，我们的内容版权团队确实很有眼光。如何挑选内容，不同行业、不同玩家，都会有自己的手法。大家也知道在文化娱乐行业，不可能每次都是百发百中。前段时间，我在读一本叫作《爆款》（Blockbusters）的书，其作者 Anita Elberse 研究了美国文娱行业的不少案例，发现行业都想追求爆款，但究竟怎么做出来呢？答案却是‘不知道’，全靠猜。这确实是文娱行业一个特点。可是，细究一下，对 IP 和内容的分析、对人群心态的分析以及整个平台的力量，这些方方面面又使得爆款在一定程度上有律可循。”

“《微微一笑很倾城》出现的时间点很有意思。在此之前，中国的大部分的青春剧，其实都是略微‘狗血’一点的。一些不那么愉悦的桥段，都会出现。但我们发现，观众其实很希望看到一些正能量、甜甜的、给人一种很好体验的、唯美的青春爱情剧。所以该剧在这个时间点出来，是发现了市场的一个契机，抓得很准。我们是在挑内容，但内容背后是在判断社会的趋势、在挑用户的洞察。所以，内容竞争本质上是一个洞察竞争。”杨振说。

据杨振介绍，最初决定签下这部剧作为网络平台的独家运营，也是团队决定的结果。“我们会有一个‘内容委员会’，包括内容团队、市场团队、财务团队等。我们会从方方面面来评估，包括内容的评估、业务的评估等等，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样一个集体的决策。”

《微微一笑很倾城》是一部校园爱情剧，已经结婚生子拥有一个幸福家庭的杨振坦言，这部剧最打动他的，就是那种纯纯的校园情怀。“我和我太太也是在大学校园认识的，一直到今天十几年了，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都已经6岁多了。其实，这也是这部剧的一个魔力。它会唤起你当时的那种感觉。当时微博有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当时优酷团队策划的，叫作‘大学欠你一个肖奈’。这个话题在微博上非常火，很多姑娘都有共鸣。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说：‘大学欠你一个肖奈么？’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感受，希望自己的大学有这么一段唯美的体验。我作为观众，当时也是被这种情感所打动。”

网络热过电视：年轻跨次元题材是一次里程碑

在以往的电视剧领域，卫视具有极强势的地位。好的内容往往都会选择在卫视首先播出，网络平台大多属于跟播或者甚至晚一段时间再播放。而这一两年来，视频网站却开始呈现出一种越来越积极的姿态。视频网站包括优酷在内，都会推出自己自制或合制的“超级网剧”，从内容制作的源头就下手，让视频网站在剧的制作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更有意思的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在电视和网络都有播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网剧，但网络上的热度大大超过了传统电视。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杨振分析，这有可能是今后中国文娱行业的一个重要趋势，《微微一笑很倾城》网络热播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里程碑事件。“随着年轻人群越来越多地生活在移动媒体、数字媒体上，电视媒体老龄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越来越明显；而网络主导的年轻娱乐题材，将越来越充满活力。”他的言语间透露出一种自信，“就这部剧具体分析，它的内容也更适合在网上传播。它本身是青春剧，或者说是爱情浪漫剧；是一个有意思的二次元、三次元、二点五次元的跨次元剧。剧中，有真实生活场景，也有游戏世界的情节，这种题材其实对网络上的原住民，‘90后’‘95后’等，有天然的吸引力。因为电视剧里描述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代入更容易。比如，现实生活中的肖奈，在游戏世界里是‘一笑奈何’；他在真实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和他在游戏世界侠侣的生活，这两个故事互有穿插，很有意思。”

与以往的青春剧套路深、情节狗血不同，《微微一笑很倾城》显然有着一些更深的东西。该剧的原著小说，有一种很深很纯的校园情结贯穿于全书，浪漫笔触微凉，却又用这微凉的笔触，勾勒一种令人向往的大学生活。而类似的气质，不得不说此次电视剧制作方很好地将其搬运到电视剧。这也使得看过电视剧的“原著粉”感叹，他们觉得这部剧是最符合原著的电视剧了，剧中杨洋、郑爽，就是他们之前想象的小说中主角的样子。

“大团队”的概念：做内容宣推的小二

“80后”杨振给人一种精力充沛、活力满满的印象，而整个优酷公司的现场办公氛围，也有一种轻松活泼的感觉。与其他一些市场团队负责人更强调公司本身的团队是怎样运作，从而成就一部作品不同，杨振在采访中经常透露出一种“大团队”的概念，就是整个市场大家一起玩，甚至可以达到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

“我不认为我们的团队，只是坐在公司办公楼里的团队。我所说的‘团队’是一个更大范围、更有想象空间的团队。阿里有个词叫‘小二’，是专门来服务各个行业的；放在文娱行业，我希望整个大优酷、大文娱的市场团队，就是做内容宣推行业的‘小二’。让大家一起来玩，是我最为乐见的工作状态。”

“譬如与外部内容方的合作——内容方是我们合作非常紧密的一方，他们的工作是内容、创意、制作。在和他们的合作中，这中间会有很多讨论、共创以及产生的化学反应。比如，在制定推广计划之前，我们就要首先弄清楚，这个内容的精髓是什么？”杨振介绍道。

在这种思路下，优酷市场团队分析得知，《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内容有三个角度可以讲，一个是青春剧，青春题材的，有非常好的明星，青春洋溢；第二个，它是一个次元剧；第三，这部剧是充满了少女心的浪漫爱情剧。

“这三个方面，具体主打哪个方面，我们会会有一个判断。”杨振说这也是需要和内容方一起聊，“最后得出，这部剧是从女孩子的角度去拍的，是从郑爽扮演的贝微微的角度来看的，它从女性的角度呈现了一个最好的世界。我们还意识到，一个人，无论她是5岁还是50岁，其实都会有少女心。而这部剧就特别有少女心。这样，我们概括这部剧为‘一部让少女心原地炸裂的甜宠苏剧’。最终，也得到了内容方的合力。”

这种“内容方的合力”，具体到电视剧，就是剧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微微一笑很倾城》在播放时，内容方剧酷文化植入了一个肖奈的电话号码，观众只要拨打这个号码，就会发现真的有人接听。这个电话被打了800万次。

“这个细节的成功，也需要艺人的大力配合。”杨振介绍道，“比如杨洋就为这个电话专门录了一段音。而如果观众试图在微信等账号添加这个手机号码，则会真的发现这个账号附有一个肖奈的头像照片；添加完毕可以与账号互动。这一个细节，不得不说内容方确实很用心。”

优酷市场团队除了这种与内容方的良好合作，与媒体方、品牌方、艺人方、“粉丝”方，包括他们自己的大阿里，都要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杨振坦言：“如果这些人的力量都聚集到一起，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团队就要厉害得多。比如，大家都会认为品牌方就是商业客户，他们买硬广，或者赞助电视剧，但同时他们也是我们联合造势的一个非常好的宣推伙伴。比如说我们这次和味全果汁的合作。味全是内容的赞助商，于是他们直接用各种台词在果汁的包装瓶上做了非常好的有氛围的推广。比如最热的一句对话就是：‘肖师兄，好巧。’‘不巧，我在等你。’他们分别放在两个瓶子上，在货架上就会有那种甜甜的、酥酥的少女心的感觉。”

对此，优酷营销团队表示，《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广告合作在常规贴片的基础上推出了更多与内容结合的、更加紧密的互动广告合作形式。比如推出了定制压屏条广告，客户可以在剧情中选择植入点，这样广告在与内容紧密结合的同时充分传达了品牌理念；还推出了品牌互动专区广告，在用户观看剧集的过程中即可轻松点击进入产品购买环节或品牌互动环节，极大地提高了客户的广告转化率；同时还为客户建立了专属的剧集专题页，集中展现客户的品牌产品元素，并利用全站优势资源如首页超级入口、频道海报等为专题页面引入海量用户。

同时，艺人的配合也是这部剧成为爆款的一个重要

原因。“我们这次运气特别好，这真的是缘分。《微微一笑很倾城》开播的那天是郑爽的生日，收官的那天是杨洋的生日。我们用优酷的自媒体来展示该剧，开播时祝福郑爽生日快乐，收官时祝福杨洋生日快乐。”说到一个细节时，杨振眼前一亮，“郑爽、杨洋在这部剧里表现得非常棒，帮我们做了很多联动。也包括毛晓彤、郑业成等一系列的一线艺人。他们配合我们做发布会，联合的宣推以及宣推中间需要的素材互动。而这样的团队合作方式，跟阿里的DNA也是一致的。阿里巴巴不是一个电商网站，它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我们能够触动大家一起来玩。而我们，就是要做内容宣推的小二，把大家服务好。”

除去艺人的配合，“粉丝”的自发宣传也是这部剧成为爆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除去“原著粉”在此剧萌芽时期就进行的一些探讨式宣传，艺人带来的“粉丝”也做了高程度配合。该剧的发布会，“‘粉丝’搭的比我们搭的还棒，我真的要感谢‘粉丝’。他们把整个发布会的现场做得美轮美奂，真的是国际级的执行水平”。杨振说：“这个剧上线的时候，网络上基本没有负评，‘粉丝’真的帮忙讲了很多的好话。”

《微微一笑很倾城》成功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其背后有扎实的数据支撑。在该剧策划初期，优酷策划团队集中将该剧的“粉丝”细分为“原著粉”“明星粉”“路人粉”。并进行精准的策略分析。电视剧开播后，随着电视剧自身的传播效应——“原著粉”、电视台宣传、明星的吸“粉”，又使得这部剧本身的自发传播就很多。再加上优酷渠道的大力配合——APP首页的广告以及网站本身的大图位露出、自频道推广、自制综艺推广以及电视剧在网站上的自频道等，更是为这部剧如虎添翼。而随着电视剧播出，每一集又可以衍生出跟剧集相关的话题讨论，持续推热此剧。同时，播放后所形成的“粉丝”口碑相传，也是这部剧最终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优酷市场团队内部而言，我们团队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团队成员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成员都是年轻人。如果我们只是用传统的架构，无论是金字塔，还是别的传统结构，都不是当下年轻人最热衷的工作方式，这样也会限制年轻人的创造力。于是，优酷市场的做法可能更像打德州扑克、打麻将一样，位置有轮换，用一个个项目来安排不同却适合的团队成员来做。比如，负责《青云志》地铁宣推的同事，我也会请她去支持阿里音乐张艺兴地铁包车的项目。因为这两个项目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同事会很会玩地铁的包车，很会设计与‘粉丝’的交流互动。她可以把一个普通的地铁变成‘粉丝’的朝圣圣地，把地铁的体验做得特别棒，让‘粉丝’都愿意在地铁里拍照。这样我们就会按照不同团队成员的兴趣、特长，把他们

youku 独播

跨元爱情 今夏倾城

对的
你
等等
我

郑爽
饰
贝微微

杨洋
饰
肖奈



微微一笑
很倾城

YOUKU 优酷

youku 独播

郑爽
饰
贝微微

微微一笑
很倾城



0822
等你倾城
LOVED 820



根据 顾漫 原著小说
《微微一笑很倾城》改编

导演 林玉芬

出品/发行 剧酷传播

Z H E N G S H U A N

YOUKU 优酷 天猫魔盒



杨 振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
大优酷事业群高级副总裁

安排在不同的项目中服务，而不仅仅拘泥于某一具体职位。”杨振说起手下的爱将，欣赏有加，“有时甚至两三个年轻人，就可以承担起一个很大的项目。每个人都有兴趣、有热情，非常精干。”

除去线上的运作，此次的线下推广也做得非常成功。尤为值得推荐的便是其色彩粉嫩、跳脱的宣传公交，一度引起众多“粉丝”和公交合影。据杨振介绍，在正式推出这款宣传画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做过很多版本。最终选取这款颜色不那么艳但又很清新的版本，还是因为其“少女心”。

“一般户外广告牌，为了抢眼，大都用大块纯色。但这次我们比较突破一点，是采用这种粉红、粉蓝的配色。因为这个剧是少女心，所以我觉得用户相应地也是更少少女心……当你一脉相承地做透一个情绪的时候，它会出来一个化学反应的效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杨振介绍。

市场团队就是“用户服务团队”

担任过VML IM2.0中国资深副总裁、百事（中国）市场总监的杨振，对于“如何市场推广”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市场根本就不应该只是‘推’，不应该把用户放在对面，而应该和用户玩在一起。举个例子，这部剧播放的第一天，晚上零点，我和两个同事在一起加班值守——我们要跟第一批用户看第一时间的弹幕。通过看弹幕，我们知道用户看这个剧的第一反馈是什么，以及他们对我们后期市场推广的启示。所以，我觉得，市场团队就应该把自己当成‘用户服务团队’。我们应该是最贴近用户、了解用户、倾听用户的一个团队。同时，在不同的场景里，在弹幕、贴吧、微信朋友圈、微博，在不同的语境，我们要跟小伙伴们用不同的方式聊天，也用不同的方式吸收营养，从而真正做到了解用户、尊重用户。”杨振分析道。

除去针对此剧本身的推广，优酷此次还进行了不少跨界、跨领域的合作。譬如墨迹天气、天气通以及苏宁易购。“为什么当时想到墨迹天气、天气通，实际上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从用户和内容来的。”杨振说，“在电视剧里面有一句话：‘你一来，天气都变好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段，大家听到这句话都酥掉了。于是我

们就想，把这句话的情绪放大，那么就找天气的APP合作吧。于是我们找到了墨迹天气和天气通，他们都很支持。墨迹帮我们做了有郑爽和杨洋动漫人物的天气提醒：天气变凉，注意加衣服哦。我在优酷有《微微一笑很倾城》，请你有空的时候一起来看哦。觉得好贴心。我觉得，目前的市场，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只往外推、打广告的时代了，重要的是我们用心为用户营造一个体验，营造一种情绪。忘记内容、忽视用户，单纯自己去推是没用的，孤掌难鸣，大家也只会抛弃你了。”

国产剧领域的IP迷思：文娱的本质是创造惊喜

近年来，细数国产剧领域的很多作品——《琅琊榜》《甄嬛传》《盗墓笔记》《余罪》《花千骨》……似乎很多都是在某个领域特别是网络文学领域业已成型、流传已久的IP，再被翻拍成电视剧。如今，热门畅销网络小说的改编权大部分已被卖出，连一些半红不红的作品也被早早签下。同时，很多早已成名的原创小说作家也被电视剧制作方认为是IP利用的一大招牌，纷纷打其名号制作电视剧。

相应的，很多明星，特别是青春偶像明星也因为自身足够的IP效应，被电视剧制作方疯狂追捧，从而形成天价片酬。这两种情况下相应造成的结果是，真正用于电视剧本身的制作费用被缩减了。这使得国产剧领域已形成了一种非常浮躁的风气：大家都疯狂抢IP、捧IP，却根本没有时间去磨一部电视剧真正重要的东西——台词的精练、剧本逻辑的精巧、演员演技的信服与精细度。对于这一现象，优酷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优酷版权团队的高级总监许志敏认为如今“唯IP论”的风气很不健康。“好的项目是综合因素组合而成的。IP不等于精品好项目，好的项目应该多维度来分析判断。”他说。

杨振则具体分析：“IP是个烂大街的词，我必须得这么说。而现在也有很多成功的作品，是压根没有什么IP的。比如《火星情报局》可以说就是一个我们打造出来的全新‘IP’。关键还是那句话：文娱节目是不是真的给用户带来惊喜？你有一个好的IP，可以借用IP本身带给用户的惊喜。你没有IP，就要想办法创造出新的惊喜。IP可以让人有一定的安全感，但他不会保证那个作品一定就会非常成功。”

目前，很多视频网站包括优酷在内，都会尝试一些自制剧。杨振觉得这样也挺好。但本质上，他觉得优酷还是一个视频网站，还是希望更多的内容方跟他们一起来玩。“自制当然我们也会做，但我们希望有更多好的精品内容，不要为了数量而制。用户越来越成熟，市场越来越成熟，大家都希望看到更好的东西。”他说。

未来的大优酷：一半的好戏在戏外

如今，依托阿里平台的大优酷，无论是在资源整合、纵向传播还是管理思维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独家优势。《微微一笑很倾城》可以说是在这个大平台整体运作上第一次成功的试验，未来，这样的项目也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跟其他平台不太一样的玩法。”杨振说，“今后我们在整个阿里的联动也会越来越多，会更精彩、更有意思。这是我们的独家优势。联动阿里大文娱的整个生态一起来做，把我们剧中的情绪打透、做好。只要把这个工作做到了，我们倒真不在乎要去跟谁比。我们只在乎用户是否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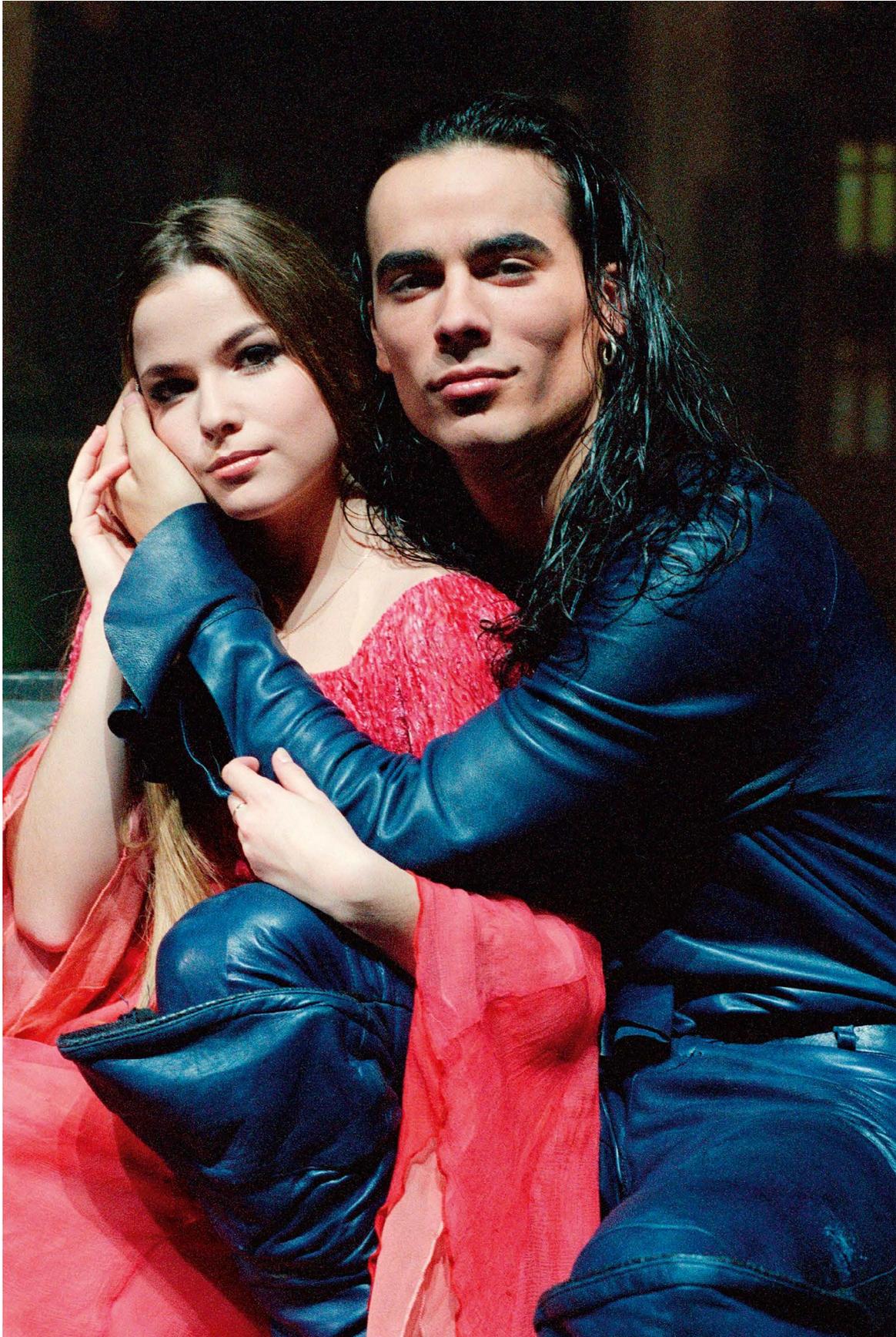
“联动具体指哪些方面？”笔者反问道。

“比如说淘宝、天猫、支付宝；包括优酷、阿里音乐等，其实我们可以联合做一些事情。这次《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开播发布会，阿里鱼也跟我们一起做。阿里鱼是阿里旗下面专门做娱乐IP的一个业务单位。淘宝拍卖也有参与。今后这种联动会越来越多。比如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剧《咱们相爱吧》，里面有三位大明星，他们的服

饰、造型非常时尚，淘宝就联动做了一个跟着明星学穿搭的主题，教你怎么穿衣服。这种联动，在这个时代将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件事。它已经不单指内容领域了。内容会形成一个流行文化方向，这是很重要的。阿里在这个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它本身就是看、买、玩、聊全覆盖的一个综合性平台。”

对于今后爆款的预测，杨振介绍，在优酷，爆款一般分为大众爆款和垂直爆款。具体到电视剧领域，优酷对于今后有潜质成为爆款剧的分析为3+X：欢乐喜剧、燃血青春、纯美绝恋和超级热剧。“燃血青春”和“纯美绝恋”也许乍一听上去是同一种类型剧，但后者会更倾向于女性观众。“欢乐喜剧无须多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大家太需要一起哈哈哈哈哈放松快乐一下了。燃血青春，因为我们的受众，其实就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年轻受众，青春题材一定是我们持续去做的。纯美绝恋是因为女性也是我们平台的一个长期的受众，这个方面是可以不断地玩出好东西的。”杨振介绍道，“一半的好戏在戏外，好的内容来源于生活洞察，也会延展成为社会流行文化；相信新优酷，会不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惊喜。”





法国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2001年首演时的主角达米安·萨格（饰罗密欧）和希西莉亚·卡拉（饰朱丽叶），其中萨格扮演罗密欧直到2013年

《罗密欧与朱丽叶》：法国音乐剧的新浪潮

文 / 驳静

尽管受语言所限，无法像英文歌那样流传广泛，但在那几首全世界人民都听过一耳朵的法文歌当中，大概只有《爱》是出自一部音乐剧。

早在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et Juliette*)正式首演之前，它的同名专辑就已经在法国传唱，其中《爱》(*Aimer*)和《世界之王》(*Les Rois du Monde*)一度在音乐榜前十名的榜单上停留。

一年后的2001年，杰拉德·普莱斯居尔维科(Gérard Presgurvic)带着他创作的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巴黎会议宫(Palais des Congrès de Paris)举行了首演，当年的观众数量就有200万人次，随后几年的世界巡演使这个数字达到了500万。《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为一部少见的能够风靡到非法语世界的法国音乐剧。

当然，它并不是第一个。对许多人而言，提起法国音乐剧，《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仍然是第一个跳入脑海的名字。法国媒体普遍将该剧认作法国“大音乐剧”的某种新开端，而随后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小王子》等几部大制作，称得上近20年前开始的一波“法国音乐剧新浪潮”。

不过，当《巴黎圣母院》试图走入伦敦时，却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理想效果。它有一点水土不服，票房失利，评论也受挫。例如在《卫报》剧评人迈克尔·比林顿(Michael Billington)看来，这是一部“似是而非的音乐剧”，并认为，“这个秀最让人沮丧的部分是它忽略叙事和情感之间的逻辑”。

随后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全面收获赞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同样没能拿下伦敦观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曲杰拉德·普莱斯居尔维科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伦敦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十几年的世界巡演中唯一失败的城市”。他自己分析说这其实也挺正常，因为对方制作公司虽然保留舞台和舞蹈这些设计，但是歌词翻译成的英文质感，目标观众群体是青少年，这使得歌曲与其他所有元素之间的关联性大大减弱。

不过，倘若说这种失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那么对于开始时在巴黎获得的成功，这八个字同样适用。有趣的是，创作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听上去有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意味，但听普莱斯居尔维科自己的叙述，倒像一桩偶然事件。

突发的命题作文

《巴黎圣母院》首演是在1998年，它的票房成绩尤令业内许多人振奋。一时间，巴黎所有的制作人都在琢磨同一件事，那就是能不能也找个音乐剧来做一个。

当时的普莱斯居尔维科四十出头，在音乐领域也算小有成就。早在80年代，他就有了自己的代表作，随后要么是为著名歌星写歌，要么为电影配乐，但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名堂。所以他也琢磨音乐剧的事儿，不过他当时头脑里的想法是做一个呈现在电视上的音乐剧。他跟著名的电视制作人杰拉德·卢万(Gérard Louvin)约好了见面。

出门前，他跟妻子伊芙琳讨论了一嘴关于音乐剧的事。伊芙琳跟他说，她喜欢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要说做音乐剧，这个故事就挺合适。普莱斯居尔维科听完后撇了撇嘴，觉得不太行吧，莎士比亚的戏，未免太不新鲜了。

到了卢万的办公室，普莱斯居尔维科开始跟他兜售自己那个电视音乐剧的想法。卢万跟那会儿所有的电视大佬一样，对上门来兜售想法的人，一律摆出威严而不可亲近的派头。他就坐在他舒服的大号办公椅里，闭着眼睛听人讲，等面前的人把整个想法都说完了，卢万连眼睛都没睁一睁。

普莱斯居尔维科现在完全记不得他自己那个电视音乐剧，具体是讲什么，但他记得卢万的反应。因为那种毫无反应的反应，一看就知道他这个主意没什么戏。他正准备收拾收拾走人，只听卢万又追问了一句，只有简单的两个词，“quoi d'autre”(还有别的吗)。普莱斯居尔维科本来觉得自己的主意挺好，来之前就信心满满，完全没准备第二个想法。所以他下意识丢出伊芙琳说的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发现，这位大佬“啾”地睁开了其中一只眼睛。

随后眼睛又闭上了。大佬问他：“有写好了的歌儿了？”他回答说：“当然有啊。”这回卢万两只眼睛全睁开了，人也坐直了，他让普莱斯居尔维科赶紧把写好的歌儿拿给他听听。

就这样，他莫名其妙地用一个本来被他丢到垃圾桶的想法，获得了制作人的青睐。他手里自然是没什么已经写好的歌，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办法拖延了时间，一个礼拜后，他拿出了三四首歌，最著名的《爱》就是其中之一。

他还记得，卢万的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一幅画，上面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说到现在为止还会想，或许是因为这幅画钻入了卢万的潜意识，让对方觉得《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个好题目，或许是这个题材天生就有他最初不能理解的改编潜力。无论如何，普莱斯居尔维科的音乐剧生涯就这样在他妻子的加持下，于一个糊里糊涂的早晨开启。

作曲家的戏剧野心

如今 63 岁的普莱斯居尔维科，语速挺快，跟我谈到这个当年无意中获得的机会时，总有一些充满画面感的表达，尤其是制作人从“睁开一只眼”到“坐直”的过程，我听的时候，就已经脑补完这个喜剧感十足的一幕。普莱斯居尔维科科学电影出身，毕业后的一年，在纽约偶遇成名前的帕特里克·布鲁尔（Patrick Bruel），开始为后者写歌，就这样留在了音乐领域。音乐剧算是融合了他早年对电影的兴趣。

所以《罗密欧与朱丽叶》舞台的电影感挺强烈。这是部前后花费 500 万欧元的大制作，舞蹈和舞台设计的部分都十分华丽。舞台的每个角落都在发生剧情，有时，即便有朱丽叶或罗密欧在场的场景，重心也有可能在其他人的身上。我看的时候位置格外靠前，发现自己一度需要选择关注的重点。

普莱斯居尔维科说他当年去看法国音乐剧《星幻》（*Starmania*），以及后来的《巴黎圣母院》，发现它们

普莱斯居尔维科选择用女性视角来掌控这种戏剧感，并认为，男性视角，会是另一套价值观，而女性视角，则会更温柔，也会遭遇更多的冲突。



（陈办璐摄 / 天梯艺术中心供图）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音乐与戏剧的黏合度很低。《巴黎圣母院》的音乐非常棒，其中有几首甚至是他的最爱，但是因为戏剧性的薄弱，仍然会造成观众的不适。“大家可能说不上来为什么，只是感到不连贯。”所以他在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就十分注意这一点。

于是他选择用女性视角来掌控这种戏剧感，并认为，男性视角，会是另一套价值观，而女性视角，则会更温柔，也会遭遇更多的冲突。

例如，相对而言，朱丽叶这个人物更有深度。罗密欧不过是个花花公子，他在维罗纳到处勾搭姑娘，干些蠢事，然后遇到了朱丽叶，傻了眼，对这姑娘一见钟情。而朱丽叶，她本来是深藏闺中的年轻姑娘，被父母保护得很好，未经世事，对爱情和婚姻都有少女的纯真幻想。她从这样一个少女，成长为一个为爱而死的女人，这条成长曲线，借助几首歌的表现，人物形象就容易丰满。

再如，除了开场诗，该剧的第一首歌是《仇恨》（*La haine*），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二人各自母亲之间的对唱。用两个对男性世界毫无发言权的女人，来述说她们的无能为力，就显得意味深长。

第一幕中有一首歌叫《你该嫁人了》（*Tu dois te marier*），这是一位母亲在告诉女儿，你该按照父



（陈亦璐摄/天梯艺术中心供图）

法国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北京演出剧照

亲说的做，即便她感到难受，还是强迫女儿按照一家之长的意愿行事。普莱斯居尔维科说他觉得“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莎士比亚也是这么想的”。

在2006年的复排版中，他又往剧里新添了四五首歌，这样一来，整部音乐剧就有将近40首歌，但是仔细去看，会发现其实专门由罗密欧或朱丽叶演唱的并不太多。例如，光是朱丽叶所在的凯普莱特家族的提伯特（Tybalt），他主唱的就只有三首，而罗密欧所在的蒙太古家族的迈丘西奥（Mercutio）也有他专门的一首。拥有自己独唱曲目的角色还不在少数。

普莱斯居尔维科认为，如果一个音乐剧，只是一系列没有紧密关联的歌曲的组合，它们不仅没有叙述性，也不呈现人物，这就一定是部差劲的音乐剧。所以按照他的说法，音乐剧中的歌曲，要么服务于角色，要么服务于剧情。

不过他刚严肃地总结出上面两点，立马又扔给我一个有趣的细节。原本提伯特的“戏份”只有两首歌，2006年复排时扮演他的小伙子汤姆老是缠着他，说写首给他，写首给他，所以普莱斯居尔维科就专门给他写了这首，并直接用他的名字命名。但到头来，这首提伯特的自述，仍然在讲述自己是一怎么样一个人，

仍然服务于表现角色的性格特点。

穷人的歌剧

光是2016年一年，法国就首演了17部新的音乐剧，普莱斯居里维科觉得这个数字太惊人了，“仅在5年前，就不可想象”。这也意味着，音乐世界里有若干音乐剧专辑在打榜。

首演之前，先发行专辑，这是法国音乐剧的一个特有现象。尽管唱片这种载体不再流行，法国的音乐剧制作人，仍然会通过一些方式，把其中若干首歌传播出去。更坏的是，如果音乐剧本身的吸引力不够，先行一步的音乐专辑，就得更卖力才行。

《罗密欧与朱丽叶》当年就是这种专辑先行方式的受益者。普莱斯居里维科甚至坚称，至少在法国，如果不提前六个月甚至一年发布相关歌曲，一部新的音乐剧就很难获得成功。“为了让观众们能够买票进入剧院，得让他们先喜欢这些歌。”

在音乐剧之前，法国与欧洲许多国家一样，曾流行过一种“operette”（轻歌剧）。现在去看这些剧和其中的人物形象，就会觉得挺傻。不只剧情单一，人物也单薄，总是一个漂亮的公主，一个俊俏的男人，



法国乐坛教父级大师杰拉德·普莱斯居尔维科

一个小丑，一个神，这些人物排列组合一下，就扔到舞台上让观众去笑。整体而言，就是一种“华丽且非理性的娱乐”。

今天的音乐剧，胜在它们的主题是严肃的，就像《巴黎圣母院》或百老汇的《悲惨世界》，它们有深厚的文学根源。

而法国的歌剧传统严肃且悠久，普莱斯居尔维科说直到今天，一些年长的法国人仍然认为音乐剧是“穷人的歌剧”。但是当百老汇的音乐剧到法国表演时，观众的反响却非常高，尤其是剧评。“他们总是认为，百老汇的音乐剧比法国本土的好上十倍。本来是看不太上音乐剧的，可一旦来自百老汇，好像又是另一回事。”

从这个角度说，《罗密欧与朱丽叶》首先过了挑剔的本国观众一关，就挺不容易。

到目前为止，伦敦这一关，《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巴黎圣母院》都还未能闯过去。后者2018年会卷土重来，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英文版，也在几周前改编完毕。对于在伦敦遭遇的水土不服，普莱

斯居尔维科觉得问题就在于他们既想突显“法国特色”，又要去适应当地观众改编为英文版，“两种文化糅在一起，出现问题在所难免”。

另一个在所难免的事实是，每个做音乐剧的人，总想带着作品去闯荡百老汇。这也是法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再次改编英文版的原因。普莱斯居尔维科说，别看人们总说法国人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总是抱着一副不太情意接受的态度，但在音乐剧这个圈子，英语才是强势的、自以为是的那个语言，要想吸引伦敦西区的观众，其他语言是行不通的。所以尽管人们如今也会谈起所谓的“法国三大音乐剧”，但整体而言，法国音乐剧与纽约百老汇或伦敦西区之间，几乎还差着三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距离。

三联生活周刊：一口气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三四十首歌，难吗？

普莱斯居尔维科：并不。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饱含深情的故事，一旦沉浸其中，到处都是灵感。70年代，意大利导演泽菲雷里（Franco Zeffirelli）拍过一部同名电影，那是我觉得改编最好的一个电影版本。那会儿我20多岁，但是30年后，我仍能记得起这部电影中的情绪激荡。所以我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浮现出来电影中的画面，或者反过来，我会去重看这部电影。比如看到阳台那段，我就会灵感突至，要不写一段这个吧，就跑去写了。所以，对我来说，还真没那么难。更难的是写真正原创的音乐剧，没有故事基础，一切都要从零构想起的作品，相比而言，基于伟大作品的音乐剧，毕竟就简单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1首演时，副标题是“由恨至爱”（De la haine à l'amour），到了2006年的版本，副标题改为“维罗纳的孩子们”（Les enfants de Vérone），这是为什么？

普莱斯居尔维科：这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仇恨》和《爱》是最早创作出来的两首，也算是第一幕的首尾两首，第一个副标题是基于剧情。到了第二版，我加重了除罗密欧和朱丽叶之外的人物比重，整体来看，整部剧更有一种维罗纳的众生相，而不仅仅是罗密欧和朱丽叶两个人，第二个副标题，就是基于人物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这样一来，《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有了整整40首歌，好像有点太多了？

普莱斯居尔维科：一般的曲目数量是25首左右。百老汇的音乐剧也就20首。我也知道似乎有点多，但好在每一首都有它的用处，服务于剧情或角色，观

众也没有因为时长而显得厌倦。但《罗密欧与朱丽叶》明年可能还会再来中国，那时我应该有时间缩短第二幕中的两首。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为自己的音乐剧挑选演员的？

普莱斯居尔维科：一个作曲家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演绎者，就好比一个演员不会演戏。音乐剧的演员，既要会唱歌，又要会跳舞，并且要有戏剧感，符合这么多标准的演员，的确非常难找。我非常喜欢最初那个罗密欧的扮演者达米安（Damien Sargue），我觉得他就是活生生的罗密欧。三年前，他跟我说，他没法儿再演了，我就很伤心。但也没办法，不能要求同一个人十几年持续扮演罗密欧，演员是会老的，舞台形象却要求他永远是30岁。这令人伤感。而且我写的歌曲，好些都难度很高，我有点太随性，总是忘记实操性。

三联生活周刊：这可不小善良。如果从《巴黎圣母院》走红开始算起，法国现代音乐剧的流行也不过20年，在法国本土找这样的演员难度大吗？

普莱斯居尔维科：没错，我偶尔也会想，自己有点残忍。我知道我写的歌不太容易实现，所以找到声音好又能唱的演员，尤其是年轻演员，我只能说

我运气好。这回扮演朱丽叶的克雷芒斯（Clémence Illiaquer）才19岁，她毕业于AICOM，这是一所2004年创办的专门用于培养音乐剧演员的学校，也是法国第一所这样的学校。

三联生活周刊：法语为什么没有阻碍它的流行？

普莱斯居尔维科：首先它有字幕，其次，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情节的故事。但我觉得它的流行，与它是什么语言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对于一部音乐剧来说，排在歌词前面的，至少有音乐、戏剧、舞蹈和舞台设计这几项。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法国音乐剧，或者你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跟百老汇或伦敦西区的音乐剧，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普莱斯居尔维科：我觉得《罗密欧与朱丽叶》几乎是另一种类型，尽管我们没有用其他名字去称呼它。他不像百老汇的音乐剧那么规整和横平竖直，也不像它们那样有一种程式化的精确。它更自由。它也更会渲染情绪，观众会看哭。它还有一个别的音乐剧都没有的部分，我们叫作“rappelle”（返场表演），表演结束后，演员也谢完幕，演员们会集体上台再唱三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给了观众以演唱会的体验。☑

（实习记者孙大卫对本文亦有贡献）

《新知》2016年第6期上市

（总第18期）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新知

微信公众号: 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 智识生活的乐趣, 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2016 年第 6 期要目]

Entrée

彩色的孤岛

献给艾米莉的红玫瑰

永恒的观者

古典学教授眼中的鲍勃·迪伦

Main

红色的荣耀：从天国到凡间

黑、白、红

夺福

哲学与羞愧

诅咒, 鲜血, 红色的黄金

绣花针与土耳其木偶：作为隐喻的风格

龙脑香、红豆与唐代的眼镜：一个老故事的孔隙

问世间“红”为何物

Fusion

那一抹鲜红：红旗简史

保险箱和腹语术

《正义的慈悲》和美国带色的司法公正

“跑火车”：特朗普、铁路与美国公共语言的复兴

大英帝国的红衣服

被遗忘的汉堡中国城

Dessert

先有光, 再有红

科学革命：从天文学到物理学

山顶洞人：用红色埋葬

谷歌翻译引擎提高了多少？

喝吧, 吃吧, 偶尔跑跑

妖术, 驱妖术：关于手机、摄影、手机摄影的闲谈

深邃美丽的亚细亚：传奇辑录

影像报道：劳特累克

1 BOOK 140 短书评

《新知》2016 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 每期 160 页, 全年 6 期, 零售单价 20 元, 全年定价 120 元。

2015 年珍藏礼盒, 合订本已上市。

2016 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阅: www.lifeweek.com.cn, 全年订阅 8 折优惠, 订阅年价 96 元。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阅: www.amazon.cn / www.JD.com





张艺谋导演的中美合拍魔幻电影《长城》剧照

张艺谋的好莱坞之路

记者 / 张星云

《长城》电影筹备初期，环球影业的高层问过传奇东方影业首席执行官罗异，张艺谋以前有没有拍过这么大的片子？罗异说有啊，对方问哪部戏，罗异说奥运会啊。

在中国摸爬滚打 20 年的罗异太了解中国电影了，因此，当《长城》作为传奇东方影业第一部中国背景的合拍好莱坞大片开始筹备之时，罗异找到了张艺谋。

罗异是中国电影圈里的老江湖。这位美国人 1995 年来到北京，代表滚石唱片先后联合投资制作了《爱情麻辣烫》《洗澡》《美丽新世界》《走到底》等电影，随后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娶了中国妻子，

成了美国经纪公司 CAA 中国区总经理。2011 年美国电影制作公司传奇影业成立中国区分公司传奇东方影业，第二年罗异成为其首席执行官。

而张艺谋对于中国和国际电影市场都无需多说，从《红高粱》赢得新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电影大奖，到《英雄》与《十面埋伏》作为中国商业电影的开端，再到北京奥运会与杭州 G20 晚会使其美学获得官方钦定，他被冠以国师的称号，曾经被政府、电影市场与民营企业争夺，现在被好莱坞看好。

传奇影业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老板是个怪兽迷，因此想拍一部在长城上打饕餮怪兽的电影。张艺谋接下了这个邀请，但要求对《长城》的电影剧本进行修改，加入更多中国元素。“拍这个片子很像搞国际关

系，而我是作为中国的代表。长城是中国精神的象征，我们在国歌里都唱了长城。长城上的军队是什么面貌的？他们的气质和形象，他们对牺牲的态度？”张艺谋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这样的电影可以传递中国形象和中国价值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能把它变成艺术电影、批判反思电影，那样电影就不卖钱了，只能借水行船，寓教于乐。”

在近几年经历了与张伟平分道扬镳，持 340 万股高调加盟乐视影业并随乐视网上市，缴清超生孩子所需 700 多万元罚款，操盘多年的《印象中国》被收购持股并变现 2.34 亿元后，如今 66 岁的张艺谋，延续着自己商业大电影和国家意志的逻辑。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和好莱坞与中国资本不断融合之际，这部投资成本超过 1.5 亿美元，由马特·达蒙、景甜、威廉·达福、刘德华、张涵予、彭于晏、鹿晗、王俊凯、黄轩、郑凯等一众明星出演的好莱坞大片《长城》，有可能会为他的逻辑提供更进一步的可能。

商业大片与国家意志

“中国从来不缺艺术片导演，每年大大小小都能得一些奖，真正缺的是训练有素的商业电影导演。”张艺谋对本刊表示，“正视消费文化的主流，有的放矢地融入你所要表达的思想含义和情感品味。我不管别人怎么看，美国商业类型片的元素，决定了《长城》寓教于乐的特点。”

不少人将《英雄》视为中国电影商业时代的开端和张艺谋视觉美学的极致体现。《英雄》那种视觉上的享受也与多年后奥运会和 G20 峰会的人海视觉效果有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张艺谋的工具言论，以及《英雄》在国际上获得的声望，都在帮助他更进一步地转变身份。这位拥有民族气质与国际头衔的导演身后，是国家希望展现给全世界的形象：大而恢弘的叙事风格，整齐划一的美学理念。

“我们的任务，就是用世界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这句话是当年张艺谋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解读，张艺谋同样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用在了今年 11 月 15 日《长城》电影发布会上。这也是罗异邀请张艺谋作为《长城》电影导演的原因，在中国没有谁比张艺谋的作品更有资格代表国家意志。

由张艺谋执导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曾被称为一场盛会。可能他自己都未必知道，那部著名的《张艺谋的 2008》，已经成为国内外很多大公司做项目管理培训的必备教材，也是不少咨询公司的必用案例。





电影《长城》剧照

至今张艺谋没有看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国内电视转播版本，开幕式时的恐慌和沮丧留下的阴影太重。

奥运会开幕式上，尽管现场坐了9万名观众，但张艺谋电影导演的身份让他更加注重电视转播的效果，因为电视机前有着十几亿观众。多年后，主演《长城》的好莱坞演员马特·达蒙依然对奥运会记忆犹新。“他对环境的设置太棒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时整个场地里的环境和人物都在移动和变化，他依然能用摄像机捕捉到最完美的画面。”马特·达蒙对本刊回忆道。

奥运会之后，张艺谋处于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上升期，从那时开始，他被冠以“国师”的称号，政府、电影市场和民营公司争先恐后地与他合作。随后数年，张艺谋先后执导国庆60周年晚会、APEC欢迎晚宴光影秀，以及今年9月份的G20峰会文艺晚会。

另一方面，从2004年开始，张艺谋与合伙人共同开始实景演出创作，制作包括《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岛》《印象大红袍》《印象普陀》《印象武隆》等“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以及《又见平遥》等情境体验剧，参与创作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歌剧《秦始皇》、上海世博会、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这些演出背后的制作公司“观印象”获益颇多。

根据官方介绍，观印象的主营业务为旅游文化演出的创作和版权运营，主要收入来源于演出项目制作服务的报酬及演出票房收入分成。截至2014年底，观印象所有剧目已累积演出超过1.5万场，观演人次逾3000万。2014年，公司营业总收入1.39亿元，净利润为7400多万元。2015年7月，经营房地产业务的三湘股份宣布以现金加股权的方式收购观印象100%的股权，总对价19亿元。

财富巨大的演出项目背后，是张艺谋在电影上的相对平淡。奥运会之后，两年没有拍片的张艺谋交出了新作品——《三枪拍案惊奇》。电影虽然获得2.9亿元票房，但却连他自己都承认因为剧本而导致电影“基本掉沟里了”。在《金陵十三钗》上映之后，张艺谋与老搭档张伟平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随后他高调加盟乐视。

资本的逻辑

近年来中国女演员们在好莱坞电影中“昙花一现”，如此做派是因为好莱坞片商希望以“合拍片”身份拿到43%的中国票房分账，如果仅仅是进口片，最终只能拿到25%，中国电影急速增长的票房让他们想要获取更多利润。

传奇东方影业就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制作合拍片而生，它在与华谊兄弟无疾而终之后，又与中影达成合作。而总公司传奇影业则在与华纳和NBC的合作间折返，直到今年初，被万达收购。于是有了传奇东方影业的最大规模中外合拍片《长城》。

万达和传奇影业当然清楚，这部投资高于1.5亿美元的大片必须取得远高于10亿元人民币票房的成绩才能回本，因此，《长城》在中国的成功是远远不够的。

传奇影业给《长城》定下的基调是“给全世界人看的电影”，原因也许来自他们的上一部电影《魔兽》的失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罗异对本刊回顾《魔兽》时的唯一评价。《魔兽》电影全球总票房达到了4.3亿美元，其中89%的票房来自美国之外的市场。中国是《魔兽》电影的最大票仓，收入达到2.21亿美元，超过总票房的一半，与此相反的是，《魔兽》在美国本土的票房仅有4660万美元。一部总成本为1.6亿美元的大片，在刨除各种其他相关费用以及利润分成之后，共计亏损大约1500万美元。

尽管失败了，但《魔兽》让众人明显地意识到世界电影市场的翻转和变化。“在全球，曾经70%是美国电影市场，如今美国可能也就占30%，以后中国市场也许占全球电影市场的70%。”罗异表示，如果《长城》失败了，可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就不会有如此规模的中外合拍片了。“我觉得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这部电影做准备。”

正因此，传奇影业将《长城》的市场地位指向全球市场，尤其希望它能在美国市场成功。尽管张艺谋在剧本中加入了更多中国元素，但美国制片方为了考虑全球市场也有所坚持，也经常对张艺谋提出“这段故事美国人看不懂”。法国高蒙公司曾经想请张艺谋拍《武则天》，张艺谋在两年时间里请了六位作家同时写武则天的剧本，但最后六个剧本都没成，高蒙公司对改编成电影没有信心而不了了之。

“没有一个导演可以随心所欲地拍电影，他一定会受到各种制约，在制约中寻找自己坚持的东西。”张艺谋对本刊说道。这次，制片方把《长城》的电影剧本翻译成中文给张艺谋看，张艺谋修改后又翻译成英文返还给制片方，来来回回，剧本修改了一年之久，最终成型。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为什么会说《长城》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走向世界？

张艺谋：之前所有走出国门的尝试，除了《卧虎藏龙》和《英雄》几部偶然红起来的电影之外，好像

之后就再也没什么声音了，而那也都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合拍片，实际在电影工业体系里都是轻工业。中国电影在全球得奖不难，但要在全球卖座才是最难的。而像《长城》这样以全球几千家几万家影院的规模去推广，还是头一次，所以这也算是中国电影第一次重工业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在中国，拍魔幻风格的电影是有风险的。

张艺谋：电影中的饕餮是中国远古传说，但它毕竟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一部分是魔幻的，是靠想象的。但我不想呈现像八仙过海那样玄幻的内容，我认为那样会走入误区，非常危险。所以我把整个电影的基调定义在现实主义上，是因为我觉得现实主义才可以给世界建立一个对中国形象的正确认知，真实可信。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中国电影市场和美国电影市场的区别在哪里？

张艺谋：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文化差异现象。这种文化差异长时间存在着，你在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在北京奥运会和外国团队合作时，比如设计开幕式上缶的形象，中国团队把自己觉得很有创意的设计提出来，人家外国团队摇头，觉得很落后；外国团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设计图纸，我一看，不就是直接复制了缶出土文物的图纸嘛，完全没有想象力啊。在我们这里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觉得毫无创意的东西，人家觉得代表着中国。而我们中国现在的设计喜欢加入很多想象力。这很微妙，两边就是你往外看我往里看。

我们的电影观众也是这样。外国人觉得最地道原生的中国文化，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太习以为常了，不满足。而很多充满奇幻想象的好莱坞电影其实在全球反响不怎么样，但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就觉得很洋气很酷炫，觉得好。中国和外国观众是在两个环境下成长的，见识的多少不同，不只是艺术，而是在方方面面都有这样的情况。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你看我稀罕我的俗套，我又稀罕你的俗套。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工业电影的流程会对你有限制吗？

张艺谋：我认为，对于导演来说，百分之百的创作自由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的导演均是如此。你面临着政治、经济和人事关系的种种压力，以及自身的限制。导演的工作就是去协调、坚持和妥协，它永远是集团作战，永远更关注公众的内容而不是孤芳自赏的内容，导演的工作是电影这个行业决定的。■

（参考资料：《张艺谋的作业》，张艺谋、方希著。实习生郑亚博、孙大卫对本文亦有贡献）



王久良拍摄的纪录片《塑料王国》小主角依依姐



塑料垃圾处理厂密集的村庄里到处堆满垃圾，焚烧现场浓烟滚滚

《塑料王国》 站在全世界的塑料垃圾上

记者 宋诗婷

在王久良的最新纪录片《塑料王国》中，小村庄里的两个家庭的命运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狭路相逢。环境污染与社会的不公再次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1年4月，王久良受邀到美国加州参加一个关于垃圾问题的学术会议。

“当时也是职业病发作，我提出去参观他们的垃圾回收厂。”在工厂经理的热情接待下，王久良见到了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垃圾回收体系。巨大的机器嗡嗡作响，传送带把垃圾送到分拣台，瓶子、玻璃、金属、纸张、塑料……“机器飞速地分拣，很粗糙。”

“快看！”经理招呼王久良，“是到中国的车，那是你们中国的车。”

王久良顺着经理的目光看过去，那是一辆集装箱车，垃圾经过简单分拣，就马不停蹄地运往奥克兰港口上船，20天后，这些洋垃圾就漂洋过海到了中国。

“我早就听说，河北文安是很多国家的废弃塑料

回收基地，但亲眼所见，还是觉得震撼。”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国后，王久良追踪着这些洋垃圾先后去了河北、山东、天津、江苏和广东。各地的情形大同小异，都同样的不堪。

最终，王久良选择驻扎在山东，“从自己的家乡着手，优先解决家乡的问题，再说语言上也没有障碍”。

走进塑料王国

当年拍摄《垃圾围城》时，王久良就曾和堆成山的垃圾打过交道，但第一次走进位于河北某地的塑料垃圾加工作坊密集的村庄，他还是后背发凉。

“上千户小作坊，车一开进去就是刺鼻的味道。

水泵不停地抽着地下水，据说，是每小时50吨的量。机器轰隆隆地转，一刻也不停。”王久良走进几家工厂，“塑料垃圾上贴着各种语言的商标，一家一台简陋的小机器，有个小炉子，烧煤，融化，一团团泥巴一样的东西被送进机器，再从另一端吐出‘面条’，最后这些‘面条’再被切成塑料颗粒。”

不久的将来，这些塑料颗粒会被卖到南方的工厂，用来生产玩具。玩具会再次漂洋过海，回到它们的故乡。

从探究塑料的来源、数量、加工方式、污染程度，到塑料成品最终的去向，整个调研阶段，王久良花掉了一年的时间。“走到哪儿都被盯着，有次去河北调研，刚到半小时，县里就来了好几个人，精准地找到了我们落脚的地方。”

到了拍摄阶段，王久良和整个团队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真是漫长的折磨，整整三个月，我们一家工厂都没进去，只能在外面打转转，里面究竟什么样，我们一无所知。”当时团队一共有四个人，王久良实在被逼疯了，就强行给大家分派了任务，“每个人盯住一个方向，都扔出去找突破口”。

摄影师找到一个拾荒的老太太，老人在这里捡了14年垃圾。录音师搭上了一个货场的看门老大爷，隔三差五拎着酒找人家闲聊，一来二去，货车的入货、出货时间就都摸清楚了。

负责外联的是个女孩，女生天然的亲和力让她很快得到了小女孩依姐的信任，依姐一家的故事也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塑料王国》纪录片的主线。

“当时，只能通过小女孩和她弟弟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离进工厂拍摄还远着呢。”王久良嘱咐外联女孩带些礼物给依姐一家，“不算讨好，起码的礼貌和同情心吧。”这些礼物最终也在纪录片里回馈了王久良的用心，他说：“你在片子里看到的那些字典、篮球、图画书，都是我们一年前送给孩子的。”

王久良留给自己的任务是——以生意人的身份与工厂老板交涉，进而打入内部。“我说要收你的货，你总不能不让我进门吧？”王久良专收带商标的塑料，给出的价格还不低，“带商标的最便宜，他们一听来了个傻子，专要带商标的，赶紧把我迎进去了。”

在成为“生意人”的那半年里，王久良左手买进塑料，右手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买得多了，就成了常客，偶尔不买货，也能进工厂串个门，“就这样，算是对工厂里面的事有个概念了”。

混在村子里的那段日子，王久良每天都提心吊胆。刚去时，村里人防着他，不是怕拍摄，是觉得这伙人

不像好人。“先觉得我们是贩毒的，又觉得我们是拐卖孩子的，都躲着我们。”

后来，大家渐渐发现，这伙人的出现貌似和塑料生意有关，就更提防了。为安全起见，王久良的团队也不断缩编，先是四个人，后来是两个，最后只剩下王久良一个人。“光车就换了好几辆。”刚开始拍摄时，王久良开一辆面包车，他说，“《垃圾围城》得到的一小笔奖金，5000欧元，买了辆最便宜的，那车跟了我好多年，出了大力气”。

面包车开了一年多，被当地人认出来了。车用不了了，制片方又出了七八万块钱，给王久良买了一辆捷达。捷达开了一年多，又被认出来了。“后来就我弟弟的车、朋友的车，大家帮我联系的各种车，不停换。”

不仅车要换，住的地方也要换。“租了三个房子，换着住，就算这样，最后还是被抄了两个住处。”

当时，王久良还租了一个大厂房，每月2000块，又买了八组货架，把买来的一些带商标的垃圾摆在货架上。“我想做一个装置作品，可以叫‘垃圾超市’，各个国家的垃圾，都堆在上面，挺有意思。”

后来，厂房被当地主管部门发现了，“有天一回去，屋子里干干净净，货架没了，塑料没了，什么都没了”。

纪录片的拍摄同样受到阻挠，“开始拍的不是小女孩的故事，是另外一户作坊，跟了一年，被发现，不让拍了，当时的感觉，真的是绝望”。

还好，小女孩一家的线索没有断。王久良从取得依姐一家的信任入手，渐渐得到工厂老板坤的信任，纪录片的拍摄终于找到了主线故事。

“拍摄的那一年多，我几乎都在坤家吃饭。”王久良几乎把自己变成了工厂一员，除了粉碎机太危险不敢碰，工厂里的活儿他几乎都干过，“是个交心的过程，你不能像一个侵略者，这点对于拍摄纪录片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足够亲近，王久良拍到了很多个人化的镜头。坤的爱慕虚荣，对金钱的欲望，依姐对上学的渴望，甚至坤的疾病。“这些自然流出的东西都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王久良说。

“看看你周围的世界”

《塑料王国》是王久良的第二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作品，在此之前，他曾以一组《垃圾围城》摄影作品受到关注，那组以北京周边大型垃圾场为拍摄对象

他的作品为他赢得“2009年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杰出艺术家金奖”——国内最权威的摄影奖项。

《塑料王国》几乎是从《垃圾围城》里延展出的议题。“当时已经对垃圾分拣有了粗略了解，分拣后会怎样？还有哪些问题？我想把这一部分也呈现出来。”王久良说。

无论是拍《垃圾围城》，还是《塑料王国》，王久良都要和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打交道，也要学会应对来自各方的阻挠。采访时，他拿出电脑给我看图片。“我只在电脑里存很少的资料，以避免被截获而带来的损失。”王久良边找资料边说，“虽然至今没出现过状况，但还是要有所防备。”

王久良的街头智慧和与乡民打交道的本事或许与他的出身有关。他从小在农村长大，25岁才考上大学。上大学之前，他开过影楼，帮朋友做过艺考培训，卖过手机。“混得最惨的时候还卖过菜，真是逼到绝路了。一个大小伙子，卖了整整一年的菜。那时候，艺术离我很遥远。”王久良回忆。

考上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对王久良来说是件改变命运的大事。他的毕业作品《鬼神信仰》得到艺术批评家鲍昆的关注，在他之后的创作中，鲍昆给了很多重要意见。

“也是拍《鬼神信仰》时，我开始关注到环境问题。”那组作品需要把设计好的人物、建筑模型放在坟地里拍照。王久良回到老家，想找一处干净、开阔的土地拍摄，“竟然找不到，到处都是垃圾，我一下子就迷茫了。”

或许也是年龄的关系，王久良突然觉得，自己的创作竟和现实没有半点关系，有种无力感。“痛苦，找不到方向，就去找鲍老师谈，希望得到指点。”

“久良，你该睁开眼睛看看你周围的世界，别沉浸在幻想里了。”这是鲍昆给他的指点。

那就从垃圾开始吧。

王久良按鲍昆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那些北京周边的垃圾场，从拍摄垃圾场到走进“塑料王国”，王久良在垃圾堆里钻研了近10年。

他有点轴，总希望作品能带来些实际意义。艺术不是目的本身，通过艺术影响社会才是王久良最终的目的。

那组《垃圾围城》因为得到了足够多的关注，新华社做了关于北京周边垃圾问题的内参，内参又得到了总理的批示。北京很快出台了文件——投入100亿元，集中治理垃圾问题。“2012年开始，我一直在回

访。”王久良几乎去到了每一个曾经的拍摄地，“效果还是显著的，那些堆成山的垃圾几乎都不见了，曾经的垃圾场上只剩下一个比房子还大的垃圾处理机器。”

在配合摄影记者拍照时，王久良曾站在那个比房子还大的垃圾处理机器上——以一个平和的维权者的姿态。

柔软的力量

2012年5月30日开机，2014年9月结束，两年半的时间，王久良攒下了300多个小时的拍摄素材。

“按我最初的想法，这个片子会剪得更硬一些，像《垃圾围城》一样，有更多关于整个产业的东西，不仅仅是坤和彭两个家庭的故事。”王久良说。

与拍《垃圾围城》时的孤军奋战相比，拍摄纪录片需要更长的周期和更大的资金投入，这个项目某种程度上是团队合作的产物，“适当的妥协是必需的”。

一开始，王久良的两个同学岳冠廷和熊伟帮忙出了启动资金，北京泰岳是这个项目最初的投资方。随着拍摄时间越来越长，投入也越来越大，王久良不得不再去其他途径找钱和资源。“这时候，CNEX就加入了。”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机构，这些年，CNEX帮助很多国内独立纪录片导演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纪录片制片、剪辑和发行体系，而这些正是那些有个性的艺术家们欠缺的。

“久良很有天赋。”《塑料王国》的制片人、CNEX执行长陈玲珍说，“虽然是纪录片创作，但他的影像很出色，构图很讲究，而且他很能坚持。”

CNEX看好王久良的项目，也希望能帮他走得更远。“这就涉及跨文化的理解问题。《塑料王国》的议题很重要，它不仅仅是国内的议题，必须要让外国人也能理解。”运作纪录片多年，陈玲珍有很多类似的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要拍‘高考’，中国人肯定一看就懂，但老外连高考、户籍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塑料王国》的最终成片里，观众看到的是两个困在塑料垃圾堆里的家庭的故事。塑料工厂老板坤是隔壁村的农民，很小就出来打工。坤爱财，但也能吃苦。他可以站在机器旁连续工作10个小时，生病了也不愿去医院。他踏实，但也虚荣，总是筹划着换一辆新车风光地回老家。儿子是他对未来的全部希望，他要儿子好好读书，到大城市改变命运。

依姐的父亲彭是个被生活击垮的男人，他按照彝族的习俗不停地生养子女，懒惰散漫，喝酒兴起时会



纪录片《塑料王国》导演王久良

手舞足蹈地唱毛歌。作为长女,9岁的依姐早熟、敏感,她照顾家里人,帮忙干活,偶尔会对捡来的画册着迷,内心渴望上学,却从不敢对父母提起。

两家人的故事通过层层推进,越来越撩动观众的情感,外国人也为之动容。在刚刚结束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塑料王国》拿到“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展映电影票早早售罄,主办方又破例加映一场。采访前一天,王久良又收到了新消息——《塑料王国》又入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世界纪录片单元。

“现在的纪录片,光议题重要已经行不通了,除了议题你还要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最后还要有美学上的独特之处。我总是鼓励大家,因为你的议题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拍好,剪辑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陈玲珍说,在这个问题上说服王久良,他们费了很多心思。

在荷兰颁奖时,王久良曾和陈玲珍开玩笑说:“我知道,你忍我很久了。”

《塑料王国》先后换过三个执行制片人,因为剪

辑理念上的分歧,王久良常常与执行制片争论。“有次,我和乐儿就在巴黎中央火车站吵起来了,人家还以为小两口吵架,乐儿气哭了,女人一哭我就没办法了。”程乐儿是《塑料王国》的第二任执行制片人,她和CNEX倾向于让片子讲一个更纯粹的故事,而王久良希望片子更硬朗,更直接地揭露整个塑料垃圾产业的内幕。

“我承认柔软的力量,但也相信坚硬在某些时候有直接的效果。”前者是与CNEX合作带给王久良的经验,后者是《垃圾围城》的直接反馈。

最终,王久良还是信任了制片方的判断,让《塑料王国》讲一个好故事,而关于这个产业的相关信息就通过图文报道和剪辑媒体版的方式披露。

前后耗时6年,王久良有时会心生疑虑:“如果按鲍昆老师的说法,以图文报道的方式快速做出来,而不是用6年时间熬出一个纪录片,结果又会怎样?”

在漫长的剪辑过程中,他也有过更新鲜的想法。他曾在塑料垃圾中捡到过通讯录、快递单、名片,“我完全可以按上面的地址找到垃圾的主人,站在一个韩

国整容医生面前，告诉他我在中国山东的小村子里找到了他的名片，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多有文化反思意义啊！”

但天马行空一番，王久良还是选了最直接有效的呈现方式。他找到美国一家垃圾回收工厂的经理，问他，知不知道垃圾在中国的处理情况。得到否定的回答后，王久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纪录片素材，现场放给经理看。镜头记录了经理惊异又尴尬的神情。

这个镜头没能出现在《塑料王国》的成片里，但王久良把它剪辑在了媒体版中。

公义和人情

虽然曾经拍过视频作品，但对王久良来说，《塑料王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要拍纪录片就要讲故事，要讲故事就要与人更深入地打交道。和底层老百姓相处，王久良驾轻就熟，但当“打交道”与披露产业阴暗面挂钩时，公义和人情的矛盾就让他纠结了。“可能每个这类纪录片创作者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王久良说。

《塑料王国》虽然有温情的一面，但更多的镜头都直面残酷。依姐带着弟弟在垃圾山上淘玩具，彭的老婆在塑料作坊边的菜地里露天生产，孩子们用机器里的脏水洗脸、洗头，把小河沟里捡来的死鱼炸了吃。

“你没告诉他们这鱼不能吃？”在阿姆斯特丹放映时，观众问。

“其实我也吃了。”王久良答。

如果在这类事情发生时，王久良出面干预，他与拍摄对象建立的信任和尊重就会瞬间瓦解。他不仅不能质疑，还要入乡随俗。

在《塑料王国》结尾，坤终于带着一家人去了北京，见到了母亲心心念念的天安门。在出租车上，他告诉儿子要好好学习，赚钱，进京，做上等人。

“我是不是把坤剖析得太残忍了？”这个问题王久良问过制片人，也问过我。

“没有，我不觉得片子里的他是坏人。”制片人陈玲珍回答他。

从阿姆斯特丹回来后，王久良接受了很多家媒体的采访，有些记者想要坤的联系方式。“不能给，我求大家不要打扰他的生活。”王久良一直担心，片子放出来会给坤惹麻烦，“直到他和我谈，把厂子卖了，不干了，我心里才稍微放松一些。”

王久良还担心另一种倾向，纪录片在荷兰得了奖，

还入围了圣丹斯，关注片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他怕纪录片里的主角知道后，心态发生变化。“我不要让坤把我们的电影当成一回事，在这个所谓的专业领域的成就都和他没有关系，和他现在的生活没有关系，我不要让他有那种‘生活更加美好了’的幻想，那样反而容易受伤。”

纪录片的素材永远拍不够，但终究是要下决心停下来。在拍摄计划中，王久良想看到两条线索的结局，一条是坤能不能买到他梦寐以求的新车，另一条是依姐什么时候能去上学。等了一年多，坤倾尽储蓄买了辆红色奇瑞，虽然是二手的。而依姐已经11岁了，上学还遥遥无期。

“我打电话和制片方说，片子就拍到这儿吧。依姐越来越大，再不上学就来不及了，别人就罢了，我和这一家子朝夕相处两三年，实在看不下去。”王久良找到一个契机，说服了坤，出钱把依姐一家送回了老家。“家里房子漏了、塌了，我们又筹了些钱，帮他们修房子。”

王久良尽可能保护、帮助他的拍摄对象，但有些亏欠让他至今无法心安。

在坤的工厂拍摄之前，王久良在另一个大叔的工厂里拍了一年。后来，拍摄被村委发现，他们对大叔下了封口令，只欠了结局的故事就永远也拍不完了。

在《塑料王国》成片完成前，王久良先做出了一个20多分钟的媒体版专题片，电视台还用他的素材做了一期近半小时的节目。素材打了马赛克，但大叔还是被村里人认出来了。“当天晚上就有人砸玻璃，大叔待不下去了，第二天就收拾细软走掉了。”

出事的那段时间，王久良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大叔打不通他的电话，没有邮件，也没有微信。“他不知从哪里听了谣言，说国家给了我很多钱。还有人误解他，说他也拿了钱。”

大叔心里憋屈。2015年春节，他骑着辆三轮摩托车，跑了两三百公里，去王久良老家找他。王久良透过QQ视频，听了大叔的经历，彼此澄清了误解。“内疚，心里难受，但我也要告诉他，给他造成伤害的根源是什么，是塑料，是当地的主管部门，他们没理由打人。”

说着说着，王久良突然想起那没能送出去的3000块钱。当时，王久良去看大叔，想留给他3000块钱表心意。“身上现金不够，打算回家转给他。转了几次，都有问题，没转成。”王久良挺直腰板，拍了下桌子，“今年过年，我再给他送去！”

（实习生肖楚舟对本文亦有贡献）



《西部世界》 机器和人性的现实思考

记者 / 张月寒

这一切纷繁复杂的人类观感所综合起来，产生出一新的东西，即我们“对于生存现状的共同思考”。

12月5日早晨，应HBO 鼎级剧场之邀，我去观看《西部世界》最后一集的放映。90分钟的超长内容，大家悄无声息地全部看完。看现场就有这样一个好处——你可以知道别人的笑点或惊悚点是什么，由此得知跟你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休息间隙，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时，我作为一个看剧个体的感觉是并不孤独的，各种迥异的媒体头脑在 Rosewood 酒店上空盘旋、碰撞，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观剧漩涡。

每个人看《西部世界》，几乎都得出每个人所不一样的东西。这是这部“烧脑神剧”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魅力。感性的人看见了爱情；科学的人看见了人机关系；爱好脑洞的人跌落剧中无数个谜团……整部作品编剧之缜密、《红楼梦》感草蛇灰线的台词以及不少演员信服感极强的演技，让我们有时分不清现实与虚幻、存在与虚无。

真实与虚幻是人类在很多作品中都喜欢探讨的一



类主题。弗洛伊德于19世纪开始提出有关“梦”的理论；《爱丽丝梦游仙境》提出镜子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1998年《楚门的世界》则首次利用大框架套小框架模式提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可能是假的”这一新颖理论。人类，已经无数次对自身所处的这个世界、对自身进行一种质疑，在《西部世界》中，这种质疑又被演变成一种更遥远的来自于日渐发达的人工智能的呼唤。

《西部世界》里饰演 Teddy(泰迪)的演员詹姆斯·麦



美剧《西部世界》剧照

斯登 (James Marsden) 说有一次他在现场，突然和饰演 Dolores (多洛瑞丝) 的演员埃文·蕾切尔·伍德 (Evan Rachel Wood) 相视惊异道：“我们不就是 host (剧中对人工智能的称呼) 吗？”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时常感到真实和虚无分不清的某一时刻，最集中表现就是他自己做的梦。

《西部世界》这部美剧，源起于 1973 年的同名电影。基本理念一致，即人类的科技高度发达，于是创造了主题乐园式的地方，内里全是机器人，供人类发

泄自己无限的私欲。在那里，人可以伤害机器人，可以对机器人做任何事，而机器人被“设定”为无法伤害人类。所不同的是，在 1973 年的电影中，主题乐园分为“西部世界”“罗马世界”“中世纪乐园”，集中的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三个时代场景。而这部翻拍美剧则集中于“西部世界”。正如詹姆斯·麦斯登对本刊所说，当一个牛仔，是一个美国男人太过经典的梦想。或许，这也是这部电视剧砍去旁枝、更集中于“西部”的原因吧。

《西部世界》无疑比1973年的电影更黑暗、更残酷，它所暴露的是将所有人性的“恶”放大到极致的一个世界。原来，只要可以“为所欲为”，所有人都有当杀人犯、强奸犯的潜质。

从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对于《西部世界》的影响深远。在“图灵测试”被提出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网络，科学家对机器的测试依赖裁判者和被测试者的主观判断，由此得出机器是否具有人的智能。而有了网络以后，“图灵测试”每天亿万次在搜索引擎上进行，具体形式为采用“人机对话”，搜索引擎也因为通过这种大量数据的积累变得越来越聪明。这和《西部世界》几乎每集都会重复出现的程序员与机器的对话极其相似，尤其是多洛瑞丝与伯纳德（Bernard）的对话，每一次对话，我们几乎都可以看见多洛瑞丝越来越聪明、离自由意志只差一层纸的那个过程。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经过第一集一番人机对话后，多洛瑞丝开始觉醒，用手拍死了脸上的苍蝇（人和机器人的一个重要区别标志就是剧中的机器人在未觉醒之前不会拍自己脸上的苍蝇）。

《西部世界》所隐含的另一深刻主题是，这世界上远有一种更宏大的关系在指引着我们。静静蛰伏于我们自负愚蠢的“自以为是”的意识边界之外。就像《西部世界》中大部分进乐园玩耍的人类，他们大都只是沉浸于一种肤浅的感官满足——性、杀戮等，却始终没有触及这个游戏的边界，去挑战一个更高的层次。包括剧中机器人对自身局限性的挣脱、摸索，也说明了这一点。多洛瑞丝无数次接近事情的真相，却最终被证明还是没有找到迷宫入口，却发现仍是寻找上一次“前觉醒时代”留下的记忆碎片的影子，30年间无数次重复自己已经历过的事。

人机关系代表着一种久远奴隶制于现代的延续。而全剧所探讨的“机器人的反抗”我觉得不过是人类又一次推翻奴隶制度的自我反省。机器或人工智能，是我们所发明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

机器或人工智能，是我们所发明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残酷地对待“它们”？这是本剧牵涉的一个人工智能领域常见的伦理问题。

残酷地对待“它们”？这是本剧牵涉的一个人工智能领域常见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众多人工智能题材的作品中多次探讨，甚至可以追溯到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那么《西部世界》于这个主题上探讨的新意体现在哪里？答案或许是找到了一种“中立”。

与软派机器人影视作品强调“人工智能是人类的朋友、应该友好相处”，硬派强调“人工智能威胁论”不同，《西部世界》是中立的。剧集将早期对机器人怀有同情思想的阿诺德设置为已经死亡，第十集中我们以为对机器人冷酷无情的福特其实对机器人有着更深的思考。最终我们发现，福特并不是一定站在机器人对立面的。

本剧主创乔纳森·诺兰也在采访中说，这部剧就是要走一种“反常规”。以往，拯救人机矛盾的那个人总是“人类”，人类是作为一种正面力量而存在的。但在这部剧里，他却非要将其扭转，让人类作为反派角色出场，机器人却代表了过往人类纯良中最好的一面。

乔纳森·诺兰是美国影视圈的著名编剧，之前我们熟悉的《星际穿越》《蝙蝠侠：黑暗骑士》以及热播美剧《疑犯追踪》都是出自他手。在《疑犯追踪》里我们已经窥见他深刻的对于人机关系的思索，而此次加入更加暗黑的《西部世界》，我觉得几乎达到了一种华丽的精彩。

放映结束，我采访了剧中泰迪的扮演者詹姆斯·麦斯登。这个被中国观众爱称为“麦登登”的帅气美国男子，虽然在剧中泰迪的角色不如多洛瑞丝、福特以及威廉那么出彩，但他仍是“西部世界”整体构成元素中不可忽略的一环。

英俊的陪衬、其他男人追随多洛瑞丝路上的一块强壮的绊脚石，是剧中对于泰迪这个机器人属性的设定。但是，詹姆斯·麦斯登本人认为，泰迪这个角色显然有着更多寓意。泰迪对多洛瑞丝的爱和忠诚，是这个机器人初始设置的“基石”，而麦登登认为即使去除了这个初始设置、泰迪获得了“自由意志”，他还是会继续爱多洛瑞丝。

本就出生于美国“西部”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麦斯登，成长环境虽然不是那种典型意义上的荒野西部之地，但他在采访中猜测，或许由于自己“中西部血液所产生的气质”，而使导演在选角的时候选中了他。事实上，麦斯登的形象一直给人一种“无害甜蜜的帅哥”之感，他属于那种美国经典意义里的邻家帅男孩形象，但这类形象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太易

模式化、难以被人记住。早年出演小成本电影，在《X战警》系列电影中获得较大成功，人气和地位一路飙升。此后出演的《超人归来》《发胶》《魔法奇缘》也似乎没有达到一种大火。除去电影，他还参演过大热美剧《摩登家庭》第二季以及蒂娜·菲的《我为喜剧狂》，但是，还是近来这部《西部世界》给观众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然而可以探讨的是，也许正是这种“帅又不具侵略性”的气质，才那么符合剧中泰迪本身的设置。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西部世界》和泰迪这个角色的自我理解是什么？

詹姆斯·麦斯登：其实，《西部世界》远不止一个西部片那么简单。它有如此多层面的尤其是哲学层面的意义。泰迪这个角色，是一个很正派的、试图做正确事情的角色，想和多洛瑞丝过一种美好的小日子。但是，随着剧情推进，你又可以看见这个角色的阴暗面，以及他对自己和多洛瑞丝未来的一种隐忧。不过，我认为这个人物的核心是他还是一个“好人”。演这个角色，最麻烦的部分是我要在不同“模式”间切换。比如“机器人自我检验”模式、“自我分析”模式等。而这些很多都是在我裸体演出的时候完成的。所以这时真的要抛开一切羞耻，让自己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不在乎身体是否裸露。

三联生活周刊：剧中的泰迪本身设置有“英雄救美”的那种属性。但接下来的很多剧情又完全跳脱了白马王子式的套路，你如何将这种跳脱和矛盾演绎好？

詹姆斯·麦斯登：这个角色最有趣的一点是，能够让观众误以为我是要去扮演某个特定的角色，而结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和《西部世界》所强调的主题“颠覆”非常契合，这种“颠覆”意味着诸多令你习以为常的事物都会面临土崩瓦解，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出演这种“表里不一”“似是而非”的角色非常吸引我。你可以在泰迪身上发现很多类似的特质。他表面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西部英雄，但随着越发深入的自我了解，真实的泰迪几乎和英雄毫不沾边。这种反差也为角色自身增加了不少魅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泰迪在第十集中出现的剧情转折？这会让泰迪这个角色发生很大的改变吗？

詹姆斯·麦斯登：我认为会。因为这是整季以来泰迪第一次明白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闪回到底是怎么



《西部世界》剧中泰迪扮演者詹姆斯·麦斯登在“HBO 鼎级剧场”活动现场

回事。这将成为他转向人类意识觉醒的重大一步——泰迪已经有意识地认清自我。但意识觉醒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可怕的噩梦或者说记忆的不断闪回，一旦他明白一切，他就彻底崩溃了，完全不相信他会是阴谋背后的工具。最难的一点是泰迪察觉到多洛瑞丝和自己过去曾是，或和未来将是的人完全不一样。对泰迪来说，这绝对是他迈出的一大步。泰迪一直是个老好人、英雄，和多洛瑞丝相爱，然后成为游客们的靶子，不断被杀掉之后又被重新清理干净，重新上场，循环往复。直到有一天他看到黑衣人拽走白帽子的一员时头脑中突然闪现了曾经多洛瑞丝被黑衣人拽走的情景。但这些都是第八集或第九集才出现的情节。而在最后一集中泰迪又一次被重置，最后重新出现在福特举办的酒会上。

当多洛瑞丝在他耳边耳语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经历了自己最大的噩梦——那些屠杀曾经发生，并且几乎将再次发生。第十集是他迈向觉醒的关键一步。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完第十集后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机器人已经开始具有自由意志。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詹姆斯·麦斯登：我觉得你的理解是正确的。机器人的自我意志觉醒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他们开始学会并理解。第十集的结尾留下了一个机器人起义可能会制造混乱的悬念，我们只能在结尾前的最后几分钟简单看上一眼，只有在下一季中才能揭晓。我也同意你的猜测，也许这些机器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发明创造，但他们渴望获得对自己世界的管辖权（jurisdiction），正如多洛瑞丝说的那样，西部世界是属于机器人的世界，他们要将人类赶走。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

三联生活周刊：在第一季，泰迪本来可以在西部世界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你认为他缺少了哪些特质？

詹姆斯·麦斯登：泰迪和怀特（Wyatt）的故事线不仅有意让观众感到困惑，也在某种程度上令我本人一头雾水。因为它在详细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即便我是扮演泰迪的演员，我对这条故事线也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我只知道它是在讲述某个不存在的传说故事，可能还算不上是传说，更像是曾经发生过的恐怖故事。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发生。你会发现别的机器人进化得要比泰迪快，但这只是第一季的故事，后面还会追加好几季的内容。我们才刚要敲碎泰迪的外壳。第二季肯定会更加精彩。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你是编剧，在第二季你会如何编写泰迪的故事？

詹姆斯·麦斯登：我虽然不太相信自己的写作能力，但对泰迪的故事线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西部世界》的观众，我非常欣赏 Evan 和 Thandie 的表演，喜欢看他们灵活穿插在不同的模式中，一会儿要扮演游戏世界中的机器人，一会儿又进入程序诊断模式，重新回想起曾经的痛苦记忆。我非常期待看到这些角色的成长，尤其是他们自我意识的成熟。从这一点来说，我也想看到泰迪的觉醒，我想看到他如何反抗天生“设置”于他身上的东西，他如何与多洛瑞丝相处，以及他的“基石”究竟是什么。不过我却希望，不论这些“新人种”的下一步会走向哪里，都不会再出现血腥的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拍这样一部电视剧是否也像一个解谜的过程，就跟剧中那些机器人寻找迷宫入口一样？

詹姆斯·麦斯登：是这样的。在这部剧中，演员的剧本是按集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出演某一集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整个第一季最终的故事或结局是什么。然后，当我们阅读完剧本后，通常会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时主创乔纳森·诺兰就会负责解答。所以，我对于这个剧的感受是一种片断性的，就是我只感受到了我这个角色或与之有对手戏的其他角色的场景、故事线，但我其实不像观众一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观感。比如刚刚播完的第十集，我自己第一次整体看完也觉得非常吃惊，超出我的意料。

三联生活周刊：在剧中你需要不断重复相同的台词，你会对这种重复性的工作感到厌烦吗？

詹姆斯·麦斯登：不会的，因为这些重复都是有目的的。我们每次都会身处不同的状态中重复这些台词，这些台词每次出现都会附着一层新的隐含意义。做演员的乐趣就在于不断找寻新的方式去诠释同样的台词、同样的动作，甚至我每次都会落得同样的死法，但每次死去都会有微小的差异。我曾经问过乔纳森（该剧编剧）：“我需要再说一遍这句台词吗？我还需要做同样的闪回吗？需要我尝试一些新的表达吗？对剧情而言，有必要每次都严格的一致吗？”他就会告诉我这些重复的意义和目的。可能对演员来说，这会有些奇怪，因为演员好像应该比较忌讳重复同样的角色，但为什么在《西部世界》中你却不断跨入同一条河流？有时确实会让你感觉有些死气沉沉，但是也激励你每次在表演中增加一些新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在《X战警》中饰演镭射眼，也是一个具有科幻性质的“变异人”，和这次在《西部世界》中扮演纯粹的机器人，你觉得这两者的表演有何不同？你的表演如何区分出这种层次？

詹姆斯·麦斯登：《X战警》中的镭射眼虽说是一个变异人，但他之前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镭射眼有着别人没有的超能力，被旁人视作异类、怪胎，甚至是对人类的威胁。在这一点上，两部作品可能有共同之处：不论是变种人还是机器人，人类都对他们胆战心惊，而变种人和机器人又都无视人类意愿，将自己看作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人类和X战警之间产生了决裂，而有一些像X博士这样的变种人仍然相信共存的可能。《西部世界》也有同样的主题。泰迪和镭射眼，二者都肩负着特定的责任，都有超越我们现

有人性的潜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葬礼上的死亡》中你以人类的身份赤裸，而在《西部世界》中你则是作为机器人赤裸，这两者在表演上有什么不同？

詹姆斯·麦斯登：生理上是没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身体，我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保持体型，让自己尽量在摄影机前更有视觉美感。但是情境是截然不同的。在《葬礼上的死亡》中，我扮演的角色误食致幻的药物，结果跑到了房顶上，和大树讲话。这个人物的表现会更具有“临床病态”一些。《西部世界》中我则是全裸地坐在安东尼·霍普金斯面前。《葬礼上的死亡》中的全裸和性感无关，只是一个可怜的男孩想要清醒过来。《西部世界》中出现的则是一个人造物，是被程序设定而已，只是技术性的，不带有任何情感。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1973年电影版《西部世界》和如今HBO的电视剧版有什么区别？

詹姆斯·麦斯登：1973年电影版的《西部世界》对于当时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堪称经典。但电视剧版和电影版不同的是，我们为角色提供了更多条线、更多种方式的叙述模式，使原来电影中没有时间细化的角色或情节，尽情细化。电影一般一次只

能演两个多小时，电视剧可以使更多隐藏在表象背后的事物得以深入挖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进入兔子洞更深”，不像电影那样只关注机器人如何杀死人类，而是更关注人何以为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现代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詹姆斯·麦斯登：我其实也不太清楚赋予AI（人工智能）以自由意志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恐慌，但我希望《西部世界》能够让人们思考人类在扮演上帝、创造人造人时的道德伦理责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权力。我也担心我们太过依赖技术，让机器人为我们做了太多事情，以至于让人类自身丧失了自己真正的能力、动手做一些事的能力。这可能让我有些担忧。科技使人们陷入狂热，一键发送信息、自动洗碗、自动驾驶都让人过于兴奋。一个全是自动的世界其实更吓人，但人们却为此激动不已。当机器人能够为人类完成一切事情时将会怎样？生活好像再也不会曲折了，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你会开始丧失价值观。可能很多重要的人或事会从你身边溜走。技术进步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但我希望我们能够更体面、更有担当地去面对技术的发展。✍

（感谢实习记者王琪的帮助）

《读书》2016年第十二期目录

刘东 进化与革命

商伟 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

家：“白话文”的历史
误会及其意义（下）

刘桂生 从文字误译到精神扭曲

短长书

本土化：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诉求
（王学典）·后殖民与全球化时代的
中国（金惠敏）·华语电影，谁的华语？

谁的电影？（李焕征）·送别（刘涛）

卜键 模棱首

邵菁 历史社会学的“现在时”

唐晓峰 从资本主义到拉铁摩尔

彭斌 谁统治“疯狂动物城”？

张振涛 钢琴与铁律

罗杨 在文明的“心史”之间

戴海斌 “出使日记”中的晚清外交

品书录

解读万历时期的财政改革（贾康）·“对象”的言说：“他者”与近代“中国”
认知（李建军）·时空穿越中的文化
中国认同（苏力）

曾艳兵 何为“卡夫卡式审判”？

孙柏 卡尔·施米特与《哈姆雷特》

刘增人 刘泉 路在脚下

高峰枫 《西奈抄本》的发现与收藏

张承志 轻轻地触碰（三）

洪再新 三十年“长”“远”之见



《读书》
生活需要读书，
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控烟大会，和烟草业斗争到底

记者 曹玲

到 2030 年，世界上超过 80% 和烟草相关的死亡将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抗击烟草业的最好武器。

来自烟草业的干扰

烟草业和控烟力量的斗争由来已久。11 月 7 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在印度德里的卫星城大诺伊达区举行。开幕当天早晨，会场安检门旁竟然出现一个叼着烟斗吞云吐雾的参会代表。这令人愕然，为什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控烟大会门口会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吸烟？

之前参加过缔约方会议的代表解释，控烟大会召开期间会见到各种来“捣乱”的人，比如混进政府代表团中的烟草业“卧底”、混进公众以及记者队伍又被大会“扔出来”的烟草业人员等等。

由于来自烟草业的人对控烟大会进行各种干扰，

以至于连记者也不能出席整个会议。根据现行的程序和规则，媒体属于“公众”类别，而公众里鱼龙混杂了一些烟草业人士。所以，除了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之外，记者只能参加每天的新闻发布会。

大会要求各缔约方排除来自烟草业的代表。公约秘书处负责人维拉·路易莎·达·科斯塔·席尔瓦（Vera Luiza da Costa e Silva）博士说：“烟草业十分关注缔约方会议，尽一切努力潜伏在代表与进程中。”

这给了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很大压力。比如，目前负责我国控烟履约的八部委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由工业与信息化部牵头，成员包括卫生部、外交部、财政部、国家烟草专卖局等部门。一直以来，中国代表团内都有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代表，本届也不例外，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代表以履约办公室成员的身份加入了中国代表团。

“中国是世界烟草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烟草企业。在中国，烟草业干扰控烟的情况更为严重，中国烟草总公司与政府主管部门国家烟草专卖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形



左图：2015年9月8日，法国巴黎烟商工会主席帕斯卡·蒙特雷东向记者展示香烟的包装。政府推行统一的烟盒包装招致烟草商强烈反对

右图：2015年6月3日，印度北方邦一家烟草工厂的质检工人在检查“Bidi”雪茄的质量

成了一个政企合一的行业利益共同体，对控烟非常不利。”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说。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他以观察员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此次大会。

而会场外则是另一番场景。开幕第一天，约500名烟民聚集在场外进行抗议活动。之前，烟草集团曾以书信和联名的方式游说印度政府，以保卫农民的利益为由，希望在官方代表团中安插农民席位，印度卫生部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11月11日，印度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斯坦时报》上，出现了印度农民协会联盟（FAIFA）半版的广告。一名包着头巾的老农，双手合十，向天祈祷，“保护我们的生计，救救数百万像我这样的烟农”。在德里市区到机场的途中，有很长一段路上挂着内容相同、数量诸多的广告牌。王克安说，这么多广告，背后是烟草公司在支持。

11月12日，会议最后一天，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席尔瓦博士在闭幕式上说：“我们有义务保护烟草生产链中的易受伤害的成员——农民。但是我们不会像

烟草业那样鼓励他们更多种植烟草，而是通过为农民们发展可靠的、可持续的替代方式，这些方式能够为农民及其家人提供更好的未来。”

烟草业想干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目前已经有180个缔约方。此次会议有134个缔约方国家以及5个非缔约方国家参加了会议，总计1300多名代表出席。

“《公约》是第一部国际公共卫生法律，也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受欢迎、获得最广泛接受的条约之一。”无烟草青少年行动法律顾问于秀艳说：“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所以很多国家加入了这个公约。”

目前，中国是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拥有3.16亿烟民，占全球烟民总数的30%，吸烟率达27.7%，其中男性吸烟率为52.1%。全国饱受二手烟危害的人数多达7亿多，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超过百万人。据专家估计，我国吸烟导致相关疾病带来的疾病负担，已超过当年我国烟草企业上缴国家利税的总和。

无烟草青少年行动总裁马修·梅尔斯（Matthew L. Myers）说，烟草业和其他行业有些不同，烟草公司明知道他们的产品上瘾，还要使用一切手段，合法以及非法地出售他们的致命产品。

梅尔斯介绍，烟草业在历史上曾采用了多种策略来塑造和影响烟草控制政策。烟草业通过其经济力量进行游说和营销，并操纵媒体，诋毁科学研究，影响政府，以宣传其产品和销售。此外，烟草行业持续为全社会进行大量的慈善捐款，创造一个积极的、有社会责任的公众形象。

烟草行业的目标是什么呢？英美烟草公司曾经发表过如此言论：“全球自由市场似乎正在下滑，我们不应该单纯感到沮丧。在市场中还有强劲增长的区域，特别是非洲和亚洲。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吸烟的人没有那么多。这些国家拥有大量年轻人口，有利于培养对卷烟的“忠诚度”；在其他一些已经形成了烟草消费习惯的国家，西式卷烟还未被当地了解和接受，比如有些地方更喜欢咀嚼烟草，也有些地方，女性市场还有待“开拓”。

“烟草行业使用各种策略吸引更多新的吸烟者，他们希望增加新用户并维持现有的用户。”梅尔斯说。烟草行业通过广告、促销和赞助，针对儿童、年轻人

和女性进行新产品创新，扩张新兴市场。到2030年，世界上超过80%和烟草相关的死亡将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梅尔斯说。而公约，则是抗击烟草业的最好武器。

烂肺、黄牙和骷髅

会议期间，加拿大癌症协会推出了关于烟草包装健康警示的第五份国际现状报告，报告按照烟盒警示标语的面积对20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排名。其中，152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健康警示，105个使用了警示图片。尼泊尔和瓦努阿图并列第一，这两个国家卷烟包装正反两面90%的面积印上了警示图片；印度和泰国并列第三，正反两面的警示图形面积均为85%。

目前，已有94个国家要求烟包的警示图形面积达到50%以上，而中国内地警示标语覆盖面积为35%，只有文字警示，排名第115位。“一张图抵得上万语千言。图形印在烟盒上，很多人就不会买烟了。”王克安说。

在印度机场免税店，一条条卷烟摆成一面墙，每条烟上都印着溃烂的喉咙，上面还写着“警告：吸烟导致喉癌”。有的柜台为了不那么让人“触目惊心”，把成条的烟横着摆放，侧面看起来只有商标。“这种烟，谁也不会拿来送礼。”王克安说，“烟草制品包装采用健康图形警示，被认为是最经济、最便捷、最有效的告知烟草危害措施，也是鼓励吸烟者戒烟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警示的有效性，随着图片面积的增大而提升。”

与国外烟盒上的烂肺、黄牙、骷髅等恐怖图片相比，国内地地的烟盒堪称精美。加拿大癌症协会高级政策分析师罗伯·卡宁汉（Rob Cunningham）说，中国内地是世界上烟盒最漂亮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大多数中国的烟盒上，除了简单的文字标识，还绘有产品商标图案，有些产品还用名山大川、历史古迹作为商标，对吸烟者有很大的吸引力。“过去几年，中国对增加烟盒包装上的警示标语面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可以做的仍旧很多。”卡宁汉说。

一些国家在控烟的路上走得更远。2012年底，澳大利亚率先使用平装烟包装，2016年5月20日，平装烟法令在英国和法国正式生效，匈牙利将于2018年生效。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新西兰、爱尔兰、挪威、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在内的14个国家即将进行平装烟，平装烟包已经成为国际烟草包装的最新趋势。

平装（Plain Packaging），也称无装饰包装或标

准化包装。它与图形警示不同的地方在于：通常的图形警示，除了表明吸烟导致的疾病后果的大幅图形和文字内容以外，还留出了一小部分给烟草公司印上五颜六色的商标和品牌的名称以及标识图形的。而平装则对烟草公司的品牌和标识的印制有了严格的限制，要求用统一的颜色、字体和字号；也就是说，不得有任何可能吸引人的装饰。

这一做法不啻为烟草业的当头一棒，遭到了烟草巨头的百般抵制。全球四大烟草公司日烟国际、英美烟草、菲莫国际和帝国烟草公司纷纷起诉澳大利亚及在英国法庭上对抗这项法律，最终均告失败。

会上，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席尔瓦赞扬了不断应对烟草业诉讼的国家，这些国家还包括肯尼亚、乌拉圭、斯里兰卡、泰国等。她表示，“我们的工作已经让烟草业忧心忡忡，希望我们的大会给烟草业带来更大的压力”。

电子烟：拯救者还是诱惑者？

“没想到，电子烟会成为大会上讨论最激烈的一个议题。”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的媒体官员王芳说，“会场上关于电子烟的管理办法，各国代表你来我往‘掐’了几个钟头，光是为是否把‘禁止’这个词放入管理办法中，就‘打’了两个小时，简直就是一场恶战。”对此，中国是持反对意见的，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几个国家对中国表示支持。

“看起来纠结的是‘禁止’这一个词，实际上博弈的是电子烟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把‘禁止’放进去，就是要把电子烟的管控留给各国自己决定。”王芳表示。

电子烟是一种模仿卷烟的电子产品，有着与卷烟类似的外观、烟雾、味道和感觉。它通过雾化等手段，将尼古丁溶液等物质变成蒸汽，让用户吸食，达到“吞云吐雾”的效果。电子烟在问世之初被认为是安全有效的卷烟替代品，商家以电子烟不含焦油、悬浮微粒等有害成分为卖点大肆推广。

2015年，电子烟的全球市场估计约100亿美元，比卷烟市场低1.5%。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电子烟的市场高度集中，美国销量占56%，英国占12%，另有21%由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分享（各占3%~5%）。

自电子烟诞生以来，围绕它产生的问题主要有：长期来看，电子烟对于使用者及使用者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电子烟是帮助烟民戒烟，还是起到相反作

用？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后，是否更容易成为使用普通香烟的烟民？

各国政府对电子烟的态度和政策一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国家认为其是一种消费品，有的国家则认为其是药物，还有些国家认为是烟草制品。因而，不同国家对电子烟的政策也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支持，有的国家禁止，有的国家则进行适当的管制，还有的国家至今未表态。

这个议题在前三届缔约方会议上都进行了讨论，每届都要求提供更多报告，因为目前关于电子烟的潜在风险和危害的证据并不是结论性的。

一般认为，电子烟产生的已知有毒物质的数量和含量，低于卷烟烟雾。但有人认为，电子烟会产生一些特有的新的有毒物质，消费者并未被告知电子烟中究竟有哪些化学物质，对每种化学物质摄入量也缺乏研究数据。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即使有毒物质的浓度较低或者非常低，复杂的混合物也可能产生毒性效应；电子烟产生的二手气溶胶可能会增加周围人的健康风险。

最终，本届大会对电子烟的态度没有太大进展，依然要求缔约国根据各国法律进行管制，由本国决定是否在禁烟场所禁止使用电子烟。

中国是电子烟的发明者和主要生产地，对其监管尚属空白。在我国，电子烟既不属于药品，也非保健品、医疗器械，更不是烟草，因而大多数电子烟处于“三无”状态，即无产品标准、无质量监管、无安全评价。

王克安称，国家烟草专卖法中，烟草制品并没有包括电子烟。有调查显示，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很想把电子烟作为烟草制品管起来，所以现在迫切希望大家承认电子烟是烟草产品，这样就可以由它管理。短期来看，卷烟更挣钱，国家烟草专卖局对电子烟还是打压政策；如果卷烟被打压得厉害，国家烟草专卖局就可以发展电子烟。

知情人士认为，电子烟是作为烟草制品、医药产品还是普通制品进行管控，在情况明朗之前，暂时不要下定论。

公共场所无烟立法

会议期间，上海传来禁烟的好消息。11月11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烟，机场、铁路客运站、港口客运站

等将取消吸烟室，扩大室外公共场所禁烟范围。新规将于明年3月1日起实施。

“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交通工具禁止吸烟，是《公约》第8条明确规定的內容，目的在于保护人群免受二手烟雾的危害。这条措施早已被缔约方及非缔约方国家广泛采用，而中国目前依然在这个问题上充满争议，至今尚无一部国家级别的法律对此做出规定。”王克安说。一些城市近年做出了颇有成效的尝试，比如北京、青岛、长春、唐山、鞍山等城市在全市范围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

梅尔斯给上海鼓掌，称赞上海政府的勇气。“作为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大胆的举措将减少一个城市2000多万人吸烟以及免受二手烟暴露。上海的决定会成为一个光辉的例子，世界上任何规模的城市都可以做到。”

缔约方会议结束后不久，11月2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说，全国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正在立法进程之中，有望今年公布实施。

根据国务院法制办今年10月公布的对“两会”提案的办理情况得知，在多次征集意见之后，卫计委提交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被删改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修改后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不仅删掉了将原送审稿中“烟盒包装使用警示图片、公共场所禁止烟草广告、促销、赞助”等内容，而且将“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全面禁烟，交通工具、机场、码头、候车室全面禁烟”的内容修改为：“中小学校、儿童福利机构、妇产医院等以未成年人、孕妇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室内外全面禁烟；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公交工具、商场等公众聚集的区域室内全面禁烟；同时，将工作场所的禁烟区域限定在共用区域，允许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住宿场所、机场航站楼等四类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域。”

多位控烟专家表示，这个范围离北京的现行条例相差太远。王克安认为，对工作场所只在共用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以及餐饮和娱乐等场所设置吸烟区的考虑是最不能接受的，前者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单人办公室允许吸烟，这将形成一种特权文化；而后者是公众和工作人员平时受到二手烟危害最严重的场所，也是《公约》强调的应该完全禁止吸烟，不设置吸烟区的场所。

2016年即将过去，《条例》年内能否出台，具体会是什么样，王克安说：“让我们拭目以待。”

宇宙中的新物理学

文 / 苗千

人类观测宇宙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对宇宙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

很多在地球上的实验室里难以实现的实验，却可以在太空中观测到，因此可以说整个宇宙正成为人类验证各种物理学前沿理论的新实验室，新物理学也可能从中诞生。

如果说探测到达地球的不同能量的光子相当于人类的视觉，那么在今年年初首次探测到的引力波，则相当于人类的听觉，人类第一次清晰地听到了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引力波是时空自身产生的振荡。1915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让人们首次认识到引力波存在的可能性，对于引力波的成功探测也就可以说是对广义相对论的最终验证。但是另一方面，一些物理学家也认为，这次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最终验证，可能也正说明广义相对论在某些极端条件下并不适用，人类有可能在最初探测到的几次引力波信号中，找到新物理学的可能性。

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到达黑洞附近，近距离研究这种奇异且危险的天体，但是引力波探测给了人类细致研究黑洞性质的绝佳机会。黑洞本身也是广义相对论的成果之一：一个致密的天体有可能在燃料耗尽之后发生引力塌缩形成黑洞，这是此前人们没有想到的。虽然黑洞听起来可怕，但是只要不进入它的“视界”，黑洞与其他天体并没有太大不同，周围的天体只会感受到它的引力作用。很多星系在中心都有一个超大型黑洞，由其巨大的引力作用维系着整个星系，就连银河系也不例外。

视界相当于黑洞的边界。一旦进入黑洞的视界以内，由于引力作用，任何物体都只能有去无回，面对最终被黑洞所吞噬的命运。但是根据广义相对论的描述，视界本身只是一个数学概念，物体在经过视界时并不会有任何特殊的事情发生。在理论上即使是一个人进入一个超大型黑洞的视界，仍然有可能生存很长一段时间。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却可能推导出完全不同的结

论。2012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几位物理学家从量子力学出发，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黑洞的视界可能聚集着大量的高能量粒子，犹如一个“火墙”守卫着黑洞。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经过黑洞视界的物体都会瞬间被这些高能粒子所摧毁。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于黑洞的性质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推论，这个黑洞火墙的悖论几年来在物理学界引发了各种争议，但是因为人类无法近距离观察黑洞，至今也没有结果，这个争议也就显得有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

LIGO（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的引力波探测给了人类了解黑洞性质的独特机会，或许人类可以从中找到解决黑洞火墙悖论的方法。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和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天体物理学家尼亚耶什·阿弗肖迪（Niayesh Afshordi）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黑洞到底有没有火墙，或许可以通过它们释放的引力波进行判断。目前人类已经探测到了几次由两个黑洞碰撞合并时所产生的引力波。阿弗肖迪认为，如果理论中的火墙真实存在，那么它可能在引力波中留下痕迹。黑洞的高能量火墙把时空隔绝为两个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当两个黑洞碰撞合并，其产生的引力波会因为火墙对于时空的隔绝而产生出某种“回声”。

出于这种想法，阿弗肖迪和同事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黑洞模型，假设黑洞在其视界处有某种镜面结构，然后模拟它们在碰撞合并过程中所产生的引力波，再与真实的探测结果进行对比。2016年12月，他们发表了论文预印本《来自深渊的回声：在黑洞视界普朗克尺度结构的证据》（*Echoes From the Abyss: Evidence For Planck-scale Structure at Black Hole Horizons*），讲述他们在已经探测到的几个引力波信号中发现了某种“回声”，这也可能是黑洞火墙真实存在的证据。而另一方面，如果黑洞火墙真的存在，则说明广义相对论在某些极端条件下会失效，人们必须发展出新物理学进行解释。

现在就断言广义相对论的失效当然还言之过早。阿弗肖迪所建立的黑洞“回声”模型还非常粗糙，而关于人类探测到的黑洞合并过程中发出的引力波信号是否包含了“回声”，也还需要更多清晰的证据。而

除了广义相对论之外，最近人们在对宇宙中一颗遥远的中子星的观测中，又验证了一个量子力学的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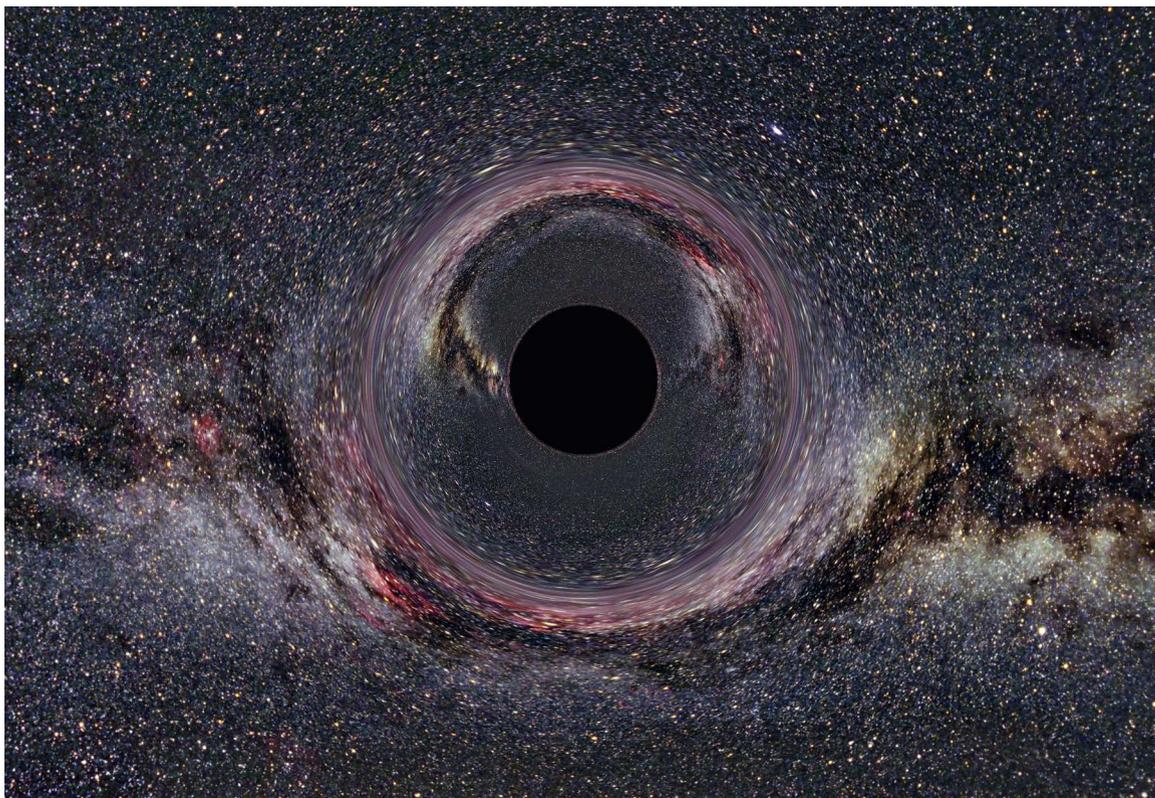
“量子”一词本来有极为微小的含义，但是难以想象的是，在宇宙中的大尺度观测中，也会看到某种量子效应的显现。米兰空间天体物理研究所的几位科学家在智利利用极大望远镜阵列观测一个距离地球400光年的名为“RX J1856.5-3754”的中子星时，发现它发出的光线存在明显的偏振，这证实了量子力学科学家们在80年前做出的一个推论。

光是一种电磁波，在垂直于其传播方向的平面上也存在着来回的振荡，如果电磁波朝着同一个方向振荡，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偏振（polarization）。我们见到的晶体的双折射现象就与光的偏振有关。在20世纪30年代，有物理学家根据量子力学提出预测，在真空中的强磁场会改变光的性质，使其出现偏振现象，这可以被称为“真空双折射”。在理论上，强磁场通过真空中的虚粒子对作用于光，改变其极化性质，但是这种现象极难观测到。

2000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物理学家尼尔·沙维夫（Nir Shaviv）提出预测，宇宙中中子星的强磁场也有可能造成宏观领域的真空双折射现象。中子星的磁场强度是地球的10万亿倍，这种强度可能改变周围空间的性质，对经过的光线造成影响。进行这样的探测并不容易，因为中子星的光线主要集中在X射线范围，可见光范围非常微弱。而进行观测的科学家们并没有探测X射线偏振的仪器，他们只能对微弱的可见光进行探测，其难度相当于在从地球到月球的一半距离之外观察一根蜡烛。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观测到了中子星光线存在着明显的偏振。

无论是对于黑洞引力波的探测还是对于中子星附近光线的探测，科学家们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更完整的理论，新物理学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人类来说，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宇宙变得前所未有的生动起来，这是科学带给我们的独特乐趣。☑

（本文写作参考了《科学》和《自然》杂志的报道）



银河系黑洞（示意图）

用舞动奇迹去忘记

文 / 张斌



罗斯福德与搭档参加“舞动奇迹”节目

“舞动奇迹”(Strictly Come Dancing)一定是个不错的节目，BBC苦心投入，收视长红，在中国火过两年，纠纷过后各台就不再跳了。此类节目在英国生命周期好长，好像可以穿越几代人的人生。这一季，英国奥运会跳远金牌得主罗斯福德泪别黑池，平添几点光芒，去留之间，人生甘苦自知。

罗斯福德，上月刚过而立之年，一头红发，在伦敦拿下奥运会金牌，在北京带走世锦赛冠军，无限接近大满贯。人生最得意的瞬间当属2012年8月4日，有幸成为“超级星期六”的缔造者之一，与法拉赫和恩尼斯一道在46分钟内，为英国连续赢下男子万米、跳远和七项全能三块金牌，伦敦碗带动着英伦三岛地动山摇。

人生总有波折，据罗斯福德自传《意外》披露，伦敦奥运会后，他过了一段荒唐的日子，终日流连在聚会和夜场，满足于各种形式的商业回报，清晨醒来，还要喝下一杯烈酒。好在醉生梦死的日子没有持续太长，沉迷在那个英国体育最大的夜晚日子久了，也会有空虚乏力之感，罗斯福德真切感知到，世人很快就能彻底忘掉他。放纵了三四个月之后，到了2012年底，罗斯福德终于做出决定，要重新做回一名可以自由蹦跳的运动员，在那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他心里只有一个声音：“训练和比赛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感觉自

己太累了。”

奥运会的荣耀让罗斯福德迁入繁华的伦敦，生活自此改变，一度在他眼中，生活只有两种，伦敦以及伦敦之外的差别。花花世界让成功者难以自持，罗斯福德没有学会对别人说不，轻易地就上了ITV的一档名人秀节目，镜头前智商几近归零，只知一味装扮明星派头，困得他父母一度不想见到各位老邻居。各种恶毒的讥讽随即扑向罗斯福德，因为家中犹太教信仰的管束，从小便过着单调苛责的日子，连圣诞和自己的生日都没有特别的庆祝，自闭幽怨，自然不知如何面对这纷乱的世界，因此日子一团糟。

罗斯福德总算艰难地回归到正常轨迹中，过去他默默无闻，也不知能否用运动改变命运，成功后，富足与苦楚交织而至，总要学会面对。2014年，罗斯福德喜得一子，北京世锦赛期间接受采访时，他显露出幸福爸爸的温暖与平静。越是接近里约，蝉联金牌的愿望愈加强烈，但怎能轻松如意，一块铜牌让罗斯福德深深跌入谷底，他不再训练，饮食方面的种种自律顷刻崩溃，被失败感彻头彻尾地笼罩。

4年间，罗斯福德没少参加电视娱乐节目，奥运会后各种邀约纷至沓来，其中就包括数顾茅庐的“舞动奇迹”。罗斯福德欣然受邀，他想用全心投入这档节目，让自己彻底忘却里约的缺憾。节目播至第九周，罗斯福德与舞伴要与英国奥运体操选手芙拉加帕尼组合一决高下，负者将退出竞赛。最终，裁判选择让体操明星留下，而让罗斯福德苦痛离场，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看到了奥运金牌得主潜然而下的泪水。

奥运金牌得主无一不是争强好胜，为了能摘下王冠，罗斯福德与搭档近来每天沉浸在练功房里10到12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将“灵魂交付给了舞蹈”。结果，失败感又一次将其淹没，好在里约在心理上又远了一程，甚至可以画上休止符。跳远又可以回到生活中来了，家中的院子里，跳远沙坑建好了，偶尔练习一下还是很方便的。当然，养狗始终是罗斯福德的最大爱好，10年间不断有爱犬相伴身边，让日子实实在在，通向东京的奥运会之路摇摇摆摆地就算启程了。

运动员的人生高度浓缩，几年间的经历就好像一生跌宕，逃避与忘却都是自然需求，能平稳走过，当属不易。我们身边的故事也有不少。☑

特朗普手里的“烫手山芋”是什么？

文 / 宋晓军

12月10日，当我看了三条有关叙利亚局势的新闻后，就想到了这个专栏的题目。这三条新闻是：1. 俄罗斯国防部称叙利亚政府已控制了阿勒颇93%的面积；2. 美国国务卿克里于巴黎呼吁俄罗斯在阿勒颇停火并允许平民和反对派武装安全撤离；3.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巴林表示将增派200名军人到叙利亚协助打击盟友在拉卡的极端组织。当然，除了这三条新闻之外，还有我记忆中一个多月前的一条新闻作为背景信息——10月25日特朗普说希拉里提出的叙利亚政策建议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10月25日，特朗普在一次竞选讲演中抨击希拉里要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的政策建议将会导致直接与叙利亚政府、俄罗斯和伊朗的对抗，而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这将有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从近一周阿勒颇战场的战况上看，特朗普一个多月前的对叙利亚战场上“力量结构”的预测似乎没错。12月4日，以色列情报网在一则题为《“叙利亚第五军团”是什叶派外籍军团》的报道中称，在11月15日俄、叙军队开始从东北方向攻打阿勒颇后，到12月2日攻占了东北重镇巴卜（al-Bab）后已控制了阿勒颇60%的面积。而在地面进攻中充当主力的，恰恰是由黎巴嫩真主党和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巴

基斯坦什叶派组成的所谓“什叶派外籍军团”。这个所谓的“第五军团”的军官来自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军人担任，并且很可能有来自俄罗斯的军事顾问。

那么按照特朗普之前的观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上任后任由叙利亚局势向着有利于俄罗斯和伊朗的趋势发展呢？有意思的是，就在阿勒颇局势急转直下之际的12月8日，叙前总理、反对派和谈领导机构总协调人希贾布（Riad Hijab）通过《华尔街日报》向特朗普喊话，希望特朗普领导的新政府能站出来“捍卫叙利亚人民的权利”。同时，一名前叙军将军、反对派武装领导人祖比（Hassan al-Zoubi）则对《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表示取消伊核协议就意味着伊朗杀死叙利亚人的权利也将被取消。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不仅取消了向叙反对派武装提供武器的限制，而且还联络盟国不断在安理会和联大对叙利亚局势施加政治压力。很显然，叙反对派和奥巴马政府正在试图逐渐将叙利亚打造为一个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烫手山芋”交到特朗普的手上。当然，特朗普似乎对此早有预感，他12月7日在一次讲演中说，美国未来将停止推翻那些我们一无所知、不应去干预的外国政权，而应致力于击败恐怖主义和摧毁“伊斯兰国”。由此可以判断，至少目前特朗普还没有做好接手叙利亚这个“烫手山芋”的想法。

现在的问题是，距离特朗普就任总统还有不到六周的时间，尽管在这期间叙利亚局势还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变量，但最终走向“政治解决”的希望仍然很大。只是这个“政治解决”结果里各方利益的分配比例目前尚难以得出准确的判定。值得注意的是，从12月5日至9日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先后访问了黎巴嫩和叙利亚，这期间中国还分别在安理会和联大就阿勒颇停火提案两次投下了反对票。对此，尽管美国知名国际记者林奇（Colum Lynch）12月8日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猜测中国在安理会投下反对票与特朗普的“电话门”有关，但我则认为中国更是想为未来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探索一个解决地区冲突的最佳模式。而特朗普上任后，会不会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才是一个“烫手山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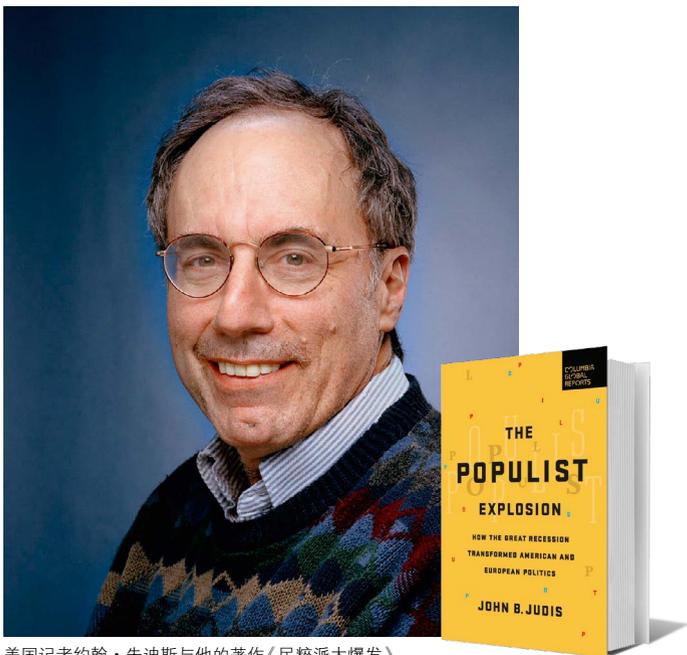


12月10日，在叙利亚拉卡省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士兵准备攻击“伊斯兰国”武装

民粹主义辨析

主笔 / 薛巍

“民粹主义把社会分为两个对抗性的阵营：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而且认为政治应该表达人民的公意。”



美国记者约翰·朱迪斯与他的著作《民粹派大爆发》

“民粹主义”还有意义吗？

12月8日，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美国迪堡大学演讲时说，他相信民粹主义不会终止全球化过程。他补充说：“我如此乐观，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毕竟，民粹主义的兴起使我丢掉了工作。”《卫报》的西蒙·詹金斯评论说：“卡梅伦不可能是民粹主义的牺牲品，因为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出版的《各种“主义”》一书中，可以查到民粹主义这个词条，对其解释是“民粹主义是一种诉诸人民而非精英的做法。在政治上，民粹主义跟煽动群众非常接近，而且它经常被人跟法

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和极右联系起来。然而，任何政党，不管它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处于什么位置，都有可能为了赢得选民而推行民粹主义的政策和倡议。”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扬·维尔纳·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中说，按照民粹派的定义，几乎所有人都是民粹派，毕竟所有的政治家都想诉诸民众。“许多人都在谈论民粹主义，今天对民主生活最敏锐的分析者保加利亚政治科学家称我们的时代为民粹主义时代，但我们用它在谈论什么并非显而易见。我们没有任何民粹主义理论，也没有判断某个政客是不是民粹派的一致标准。”

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参加了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关于民粹主义的会议，他提交的论文题为《人人都在谈论民粹主义，但没人能给它下个定义》。另一位参加会议的人识别出了民粹主义的24个核心特征。

《牛津大学意识形态手册》中说：“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中争论最激烈的概念之一。在1969年出版的《民粹主义：它的含义与民族性》一书中，不同的作者分别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场运动或者一种症状。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会把民粹主义等同于各种不同的现象，或者把它跟各种不同的现象合并到一起。比如，在欧洲民粹主义通常指反对移民和排外，而在拉美，民粹主义经常被用来暗指裙带主义或经济上的管理不善。民粹主义之所以会引起混乱，部分是因为很少会有民众或者组织称自己为民粹派。相反，它大多被归到他人头上，而且通常是带有贬义的一个标签。”

美国记者约翰·朱迪斯在《民粹派大爆发》一书中说：“对于被称作民粹主义的运动、政党或人物，没有专有的定义它们的特征，不管是俄国的民粹派、美国的休伊·郎，还是法国的马琳·勒庞、美国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各种被称作民粹派的人和政党相互之间拥有家族类似，但是不具有专有的特征。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思考政治的方式。”

《当代民粹主义》一书中说：“民粹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家族，它以理性合法的精神为代价，强调本

能和情绪。它推销一种简化的对抗性的社会观，被统治的人民遭到了统治阶层的背叛。”

荷兰学者卡斯·穆德认为，虽然也许永远得不出民粹主义共识性的定义，但还是可以提出一个定义，准确地把握过去和现在的民粹主义宣言的核心。他说：“有人认为，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太混乱了，它在社会科学中已经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了。但这个词对欧洲和美国的政治辩论来说太核心了，不能轻易地废除它。”他给出的定义是：民粹主义总是涉及对当权者的批判和对普通民众的奉承。

精英主义认为民众是危险的、不诚实的、粗俗的，精英认为自己不仅品德更高，而且在文化和智识上也更高级。因此精英主义者希望政治完全或主要是精英们的事务。他们要么像希特勒、皮诺切特一样彻底拒绝民主，要么像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或经济学家熊彼特一样支持有限的代表制民主。

民粹派不仅反精英，而且反对多元论。多元论跟民粹派和精英主义的单一视角相反，认为社会被分为各种有着不同观念和利益的相互重叠的社会群体。在多元论者看来，社会应该有着多个权力和政治中心，通过妥协来反映各种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因此权力应该分布到整个社会，以免某个群体能够强行施加他们的意志。民粹派声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人民。在朱迪斯看来，民粹派的逻辑是，任何不支持民粹派政党的人都不是人民的正当组成部分。民粹派声称，存在着大众的意志，并且只有他们能体现这种意志。因此民粹主义永远是代表制民主的影子，一直与民主相伴。

民粹主义的形态

民粹主义有右翼的、左翼的和中间派的。左翼民粹派拥护人民，反对精英或当权者，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下层和中间阶层联合对抗上层。右翼民粹派拥护人民，反对被他们指责迁就第三方群体的精英，第三方可以是移民或各种激进分子。左翼民粹主义是二元的。右翼民粹主义是三元的；它向上看，但也向下盯着一个外来群体。

卡斯·穆德指出，虽然民粹主义主要跟欧洲和美洲有关，但它可能存在于世界各地。政治学文献一般区分出至少三种类型的民粹主义：俄国和美国在 19 世纪之交的农民民粹主义；拉美在 20 世纪中叶的社会经济民粹主义；欧洲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排外民粹主义。

关于俄国的民粹主义，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民粹主义》一文中说：“俄国民粹主义既非政党之名，亦非某一连贯学说之号，而是 19 世纪中期俄国一股广泛的激进运动称呼。这运动不过是彼此独立的小群谋反者及其同情人士的松懈聚集，时或联合而共同行动，时或分立而各自行事。关于目的与手段，这些团体也往往互异。不过，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信念。他们视他们的国家政府与社会机构为一大道德与政治巨怪——过时、野蛮、愚昧、可憎，因而致力于将其整个摧毁。当时俄国的所谓受压迫者，主要仍指位居人口最下层、以国有或私有农奴为主体的农业工人。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受压迫者是未受腐化的质朴美德的体现，认其社会组织为重建俄国未来社会所必用的天然基础。”

如果民粹主义是反对精英的，一个富豪、一个经济精英怎么会成为民粹派的领袖呢？穆德解释说：“大部分民粹派不仅憎恨政治当权者，也会批判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媒体精英。这些精英都被描绘为同样的违背民意的腐败的群体。精英首先是根据权力定义的，包括大部分在政治、经济、媒体和艺术领域掌权的人。但这显然要把掌权的民粹派以及那些领域内同情民粹派的人排除在外。”

由于民粹派的立场是反对当权者，许多学者提出，民粹派按照定义在上台后就无以为继了，他们总不能反对自己。为什么一些人掌权之后仍然是民粹派呢？首先，人民和精英的区别主要是道德品质上的，而不是地位上的；其次，一些民粹派的领袖非常足智多谋。比如查韦斯等人，在掌权时仍然能够继续其反当权者的言论，他部分是通过精英重新加以定义。他们会说，真正的权力不是掌握在民选领袖即民粹派手里，而是掌握在仍然持有非法权力的黑暗势力手中。✍

性别关乎灵魂

文 / 维舟



英国作家简·莫里斯与她的著作《她他》

世上第一个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性是谁？对于这个问题，你一般能查到的答案是：日本登山家田部井淳子，1975年登顶。不过，在此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英国记者简·莫里斯——只是当“她”于1953年登顶时，还是“他”，直至1972年才通过手术变成了“她”，名字也随之由 James Morris 改成了 Jan Morris。

即便在那个西方年轻一辈寻求完全解放自我的年代里，这也是个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一个曾以其独家报道而被《经济学家》杂志誉为“我们这一代的首席记者”、撰写许多出色游记散文的杰出公众人物、五个孩子的父亲，竟在46岁之际变性成了女人，这无疑在许多街头小报不容错过的话题。数十年后，简·莫里斯还不无微词地说，在那之后，她“收到无数封来信和络绎不绝的邀请——一半生辛勤劳作为我赢得的声誉似乎都抵不过一个‘变性’”。

当然，她并不希望人们只是因为这个而记住自己，毕竟，经历变性过程的人多的是，但简·莫里斯只有一个。她写下这本薄薄自传的用意，当然也不是为了满足一些公众庸俗的好奇心，倒不如说是为了驱散人们对这一群体的一个最常见的误解：以为变性涉及的是“性”，但信不信由你，她坚持认为，那只关乎灵魂。她不厌其烦地一再声明，“我不认为这里面有淫

秽成分，我首先看成既不是肉体的也不是头脑的，而是灵魂上的难解之谜”，那“涉及的不是我的生殖系统，而是我的自我”。

所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今人们似乎越来越接受这样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雌雄混合体，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过也有一些人较为特殊，或是在生理上或是在心理上，他们感觉自己很难被清晰地划归入两性之一，又或更糟地，发现自己的灵魂寄宿在一个错误的身体内。简·莫里斯之所以反对人们过多聚焦在变性过程的“性”这一点上，大概正是因为类似的心理冲突，如果是涉及性别，那只会被视为一种戏剧性的内在认同矛盾，甚至是小说和戏剧的绝佳题材——按他的叙述，一个人身为男人但认为自己是女人，跟有些人身为黑人却觉得自己应该是白人，大概并无本质的差别。

这可能有几分过甚其词（毕竟内分泌科医生会反驳说，大量案例都绝不只关乎心理认同而已），但的确可能是问题更关键的所在，那涉及一个现代人的共同处境：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他/她自己的事。因此，试图从这本自传中猎奇的人是会失望的，因为它讨论的其实是并不轻松的话题，甚至上升到了哲学意义的层次；其中所蕴含的也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

那就是：面对真实的自我是极其重要的事。

现代英雄往往是出入于两个以上不同世界的人，当代艺术家、作家等文艺群体中之所以有高得不成比例的流亡者，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不同经历既折磨了他们，但也丰富了他们。就像最繁盛的鱼群出现在寒流与暖流交汇处，思想的复杂深刻常常也出现在某些不相协调的矛盾冲突之间。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的人只能扮演一个角色，而必须全力压制自己身上的其他冲动，那么现代人常常会发现越来越难完成这一点。我们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角色冲突，连宫西达也的儿童绘本也会讲述一只从小被当作和平善良的植食恐龙抚养长大的小恐龙，长大后却发现自己其实是凶残的霸王龙而内心挣扎不已。按照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的洞见，每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前台”）和真实自我（“后台”）之间都难免有某种紧张关系。简·莫里斯的特殊之处只不过在于，他前半生的“前台”是男性而“后台”是女性，直至后半生因统一为女性而获得了自在。

尽管简·莫里斯在自传中不断地谈到自己受苦于这种内在的认同冲突，但毫无疑问，她又是极其幸运的：他成长的家庭环境“从不强求顺从一致这种品质”、上学时在牛津享受相当宽松自由的环境（那里“除了不宽容之外一切都能宽容”）、从军时在骑兵团感受到的也更多是同胞的友好；至于此后的记者生涯，他自己也承认“再没有那么有趣的生活了”，供职的《卫报》“心平气和，富于人情，有慈爱心肠，以慈母般的眼光对待各处的失败者……尤其对我客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家人：孩子们没有让她为难，妻子伊丽莎白则极其善解人意，两人关系完全如平等的知交，在他终于决心要变成“她”之后，“我最放不下心的是我的子女会不会因为我而感到羞耻：即令他们是如此，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来，而伊丽莎白则明说她终于成为我的同伴只能是一种解脱”。这确实是个自由主义的好时代，人们发现被鼓励着“做自己就好了”，一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回忆自己上世纪60年代末所求学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氛围：“它是如此完全自觉地不循传统，在那里，除了反同性恋者以外没有人会感到不自在。”在很大程度上，与大部分现代知识

分子一样，他只是与自我为敌——“我在世上的剪影虽然别人看来是无害的，我自己却深恶痛绝”。

要说有什么苦恼，除了社会规则所带来的无形压力（那一定程度上可能又与他心灵的敏感成正比）之外，更多的倒似是他自己给自己施加的：那种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的敏感、自我怀疑（“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妄想”），到最后成为习惯的困惑，以及总感到自己是不完整的那种心态，加上某种双重归属感。当她是“他”的时候，从未感到真正自在，因为那时的自己是一个灵魂矛盾的复合体。然而，这也赋予她一种从小养成的敏感，因为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这种特殊认同本身就促使她不断出入于两个边界。在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骑兵团里，“他”感到的是一种“在那个男性社会里的观光”，那是在自己之外观察自己和他人的本领，也正是这培养了他分析和观察的本领，并最终运用到了自己的写作中去。也是这份从非主流的边缘位置出发的敏感，使她进而反思主流社会的话语霸权的力量与问题所在：她意识到英国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两性话语，以及那种主流人群不可避免的误解，使得“连我朋友中那些最敏锐的人，完全出于善意关切我的生活进程的人，对于我的性生理的兴趣也普遍地比对我的心理状况的兴趣大得多”。

这确实不是她一个人的困境，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只有现代社会才那么鼓励每个人去成为“真实的自我”，并为这个特殊的自我认同而努力，因为实现自我是最高价值（“我不愿做世上任何别人，只愿意做我自己”）；也只是在这样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理念的逻辑下，人们确信，只要不妨碍他人就有绝对权利做任何事，而其他入不应仅仅由于对别人的“怪胎”抱有条件反射式的不舒服就去限制其选择自由，那会被视为罪大恶极；但也正因人们有了如此多相互冲突的需求，反而使得社会共同规范变得更重要了。这种特殊的念头有时被称之为“梦想”，激励着人们去做更好、更真实的自己，有时它也被正确地看作虚妄而不切实际的，但正如有人曾戏谑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何况，幻想如果不破灭，那它就和真实没什么区别。■

【《她他》[英]简·莫里斯(Jan Morris)著，郁飞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在未来的童年里，故事仍然重要吗？

主笔 / 陈赛



VR 技术构建一个世界的的能力，对童书而言，开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是，它到底会如何改变故事？

《玫瑰与我》

我正漂浮在半空。

一个奇怪的宇宙。古怪的星体在我四周漂浮。在星体之上，却是明黄的星星在闪耀，而我的脚下是万丈虚空。

然后，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像破铁罐一样的小星球，往外扑扑冒了点烟，又停了。

莫非这就是 B-612 星球？我一边想，一边继续在无边无际的星际空间里晾着。

然后，音乐响起。一个小人从那个小星球上冒了出来。一株小幼苗悄悄地冒出绿色的嫩芽。小人开始拿一个小铁壶给幼苗浇水。幼苗逐渐开出花朵，是一朵鲜红的玫瑰。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体验。当渐渐习惯了头盔的压迫感之后，周围环境就开始以强大的力量召唤你对

它们的关注。我注意到 B-612 星球上斑驳的铁锈、空气中微妙的色彩变化、小王子的表情……

时间突然慢下来了，变得很慢很慢，几乎要静止下来，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小王子与玫瑰，并肩坐在宇宙里看夕阳，原来就是这样的。

我心中一动，突然想起了十几年前看《魔戒》的最后一战。看到最后一幕，死魂灵大军如潮水般席卷帕兰诺平原，那种被瞬间淹没的感觉，与如今我眼前小王子与玫瑰的小小背影所唤醒的是一样的——新技术的魔法瞬间。

这个 VR 短片叫《玫瑰与我》，由一家名叫 Penrose 的美国公司创作，Penrose 号称是“VR 界的皮克斯”。Penrose 以当世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爵士的名字命名，这里有一种奇妙的反讽意味——罗杰·彭罗斯有一本著名的书叫《通往现实之路》，描述当代对宇宙的认识，而 Penrose 工作室则想方设法要让人们离开现实。

从根本来说，“虚拟现实”就是欺骗你的大脑——更具体地说，是侵入你的视觉 / 听觉系统，蒙住你的眼睛 / 耳朵，灌输给你一系列模拟的刺激，让你相信自己身处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

在所有生灵中，人类可能是唯一一种自觉自愿欺骗自己大脑的物种。对动物来说，为了在险恶的生存游戏中求生，必须竭尽所能应对外界的真实压力，摆脱令人烦恼的幻想和渴望。但人类不同。我们一方面渴望真实——出于生存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渴望从中逃离——人在地球上的一生，实在被设置了太多的限制，你只被赋予一个身体，一种性别、一个种族、一个现实，以及一小段的时间。所以，无论酒精、故事、魔法、艺术、摩天大楼、购物大厦、郊区、迪士尼主题乐园以及虚拟现实，归根结底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逃避自然与社会强加的种种限制与不确定性的努力。

VR/AR 技术给童书带来的可能性

但是，现实毕竟是我们的命运。一摘下头盔，我

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我正身处北京 798 艺术区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里，沉闷、乏味，今天中午厨房的下水道出了点问题，整个办公室里都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这家公司名叫“未来有趣”，成立不过半年时间，是无数随着 VR 热潮诞生的小公司之一。我是经阮凌女士的推介，来这里体验虚拟现实技术在儿童内容领域的最新应用的。

阮凌是安徽出版集团旗下一个叫“时代漫游”的子公司的负责人。他们从 2008 年开始，就在自主研发儿童的新媒体内容，试图将童书与玩具、App 结合起来，在童书市场开创一种新的“物种”。她对 VR 技术尤其怀着特殊浓厚的兴趣，而且，她的兴趣不在于“沉浸感”“720 度视角”等单纯的感官体验上，而是它对整个儿童文学的叙事可能产生的变革。

在她看来，VR 技术构建一个世界的的能力，对童书而言，开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比如多年前，她曾经看过一套德国绘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四册绘本分别讲述同一场景在不同季节中不同的人类活动。她被其中多视角多线条的叙述方式深深打动——书中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小孩子要一遍又一遍地从头看，每次盯着一个主角看叙事。

“想象一下，这种多线条、多视角的叙事，如果能在同一个 VR 世界里展开，几乎就是还原了现实生活本身。同一个时空里，你在打电话，旁边的人在追一只猫，后面的人帽子被风吹跑了……故事，或者说生活，就在人与人之间不断的交集和分离中发生、展开。”她说，“而且，无论魔幻、奇幻、童话，小孩子因为没有思维的界限，成人经验的障碍，在穿梭于这些情境的过程中也更加自由和自然。”

但是，就目前而言，童书的 VR 产品还非常少，对设备依赖太高，而且父母对于孩子视力的忧虑很多。

在《玫瑰与我》之前，我已经体验了一批所谓儿童 VR 产品，大都是针对手机端最原始层面的“改编”，比如在三只小猪的故事基础上，加入一点交互缓解，加上二维贴出来的 360 度全景效果。

“主要还是题材选得不好。”一直在旁边帮我调试设备的一位技术员告诉我，“我们更喜欢那些科幻类、幻想类的 IP。”

他指的“幻想类 IP”是《爱丽丝漫游奇境》《纳尼亚传奇》之类的故事，有着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宏大奇幻场景。事实上，目前大多数的虚拟现实作品都

在探索极限场景，比如让你置身于海底或山顶，或者带你进入外太空或迷幻的心理世界。

“有一本童书叫《云朵面包》。”他告诉我，“如果那本书开发成 VR 一定非常震撼。我们可以带小孩子一路飞上天空，追赶父亲的公交车，感受整个城市风雨飘摇的感觉……”

《小蚂蚁班的田野冒险》是他们与“时代漫游”合作开发的第一个儿童 VR 产品。一群小蚂蚁跟着老师探索自然的故事，被设计成一个虚拟现实的游戏。虽然原创设计和故事都一般般，甚至可以说相当简陋，但可贵之处在于可以让孩子真正以蚂蚁的视角体验这个世界。

蚂蚁的世界里，树根绵延如群山沟壑，一小滩水就像汪洋大海，一片叶子就是一艘小船，蜻蜓、蚯蚓这种比小蚂蚁身形更大的昆虫，一个个像庞然大物。屎壳郎推着粪球经过小蚂蚁身边，仿佛火车轰隆而过。事实上，自然界每一处细小的声响，在这里都是地动山摇。

“孩子们真的可以像小蚂蚁一样钻洞入地，以 720 度视角观察蚁穴、蜂巢的所有细节。这种沉浸式的冒险经历是之前所有儿童产品里都无法提供的。”阮凌告诉我。

其实，谈起儿童与新技术，成年人常常陷入非常矛盾的两难之中。一方面，我们对新技术有着天然的警惕，怀疑这些新技术会破坏孩子的视力、智力、天真。美国一家叫 NPD 的分析机构的报告显示，67% 的家长都对新技术有所担心，认为 iPad、电视等会让孩子变得懒惰和被动。

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孩子生活在一个技术无所不在的世界里，而且他们对新技术有着天然的好奇与热情，作为成年人，我们其实无法真正阻止。

几年前，我曾经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儿童编程软件 Scratch 采访过一些小朋友，他们是真正的数字原住民，从两三岁开始就在一切能拿到的屏幕上玩《愤怒的小鸟》《植物大战僵尸》。其中一个小朋友的父亲本身就是计算机工程师，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很快就学会了怎么创建角色、挑选舞台背景，他知道按什么键，就可以触发一个事件，碰到某个物体，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还懂得了一些对小孩子来说很抽象的概念，比如坐标、方位、条件、重复执行、分支处理，甚至还知道广播和处理事件。

对此，他的父亲又惊讶又欣喜：“‘重复执行’这种概念，如果用语言跟他解释，可能解释 100 次也说

不明白。但他拖一个‘重复执行’的命令到脚本区，就能看到他的角色——一只黄色的小猫从走一步的状态切换到一直走的状态，立刻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Scratch 的开发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米奇·莱斯尼克（Mitch Resnick）教授。这位教授有一个信仰，认为一个人最好的学习体验来自于参与某种形式的设计、创造、发明或自我表达，尤其当他所创造的东西对于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某种特殊意义时。

现在，全世界的儿童玩具行业似乎都在追随米奇·莱斯尼克教授的理念。他们开发的各种智能儿童玩具，都打着“培养下一代工程师、科学家”的口号，自称有助于培养 21 世纪新新人类所需的那些思维能力与技术素养——包括工程、解决问题、空间技巧等。“编程，或者被编程”，是这个时代的箴言。

对于未来的童年，我们能期待什么呢？小孩子为自己设计和编程机器人？操控漫天飞来飞去的无人机？用 3D 打印机打印自己设计的恐龙？AR/VR 以及越来越多的 App 又会如何改变童年的阅读体验，甚至我们整个讲故事的方式？或者说，在未来童年的版图中，故事仍然重要吗？有多重要？

故事仍然重要吗？

两年前，我在《加州周日杂志》上读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最后的媒介》，探讨 VR 技术会对人类讲故事的方式产生什么样的变革。

作者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说，虚拟现实是一种终极媒介，因为它彻底消灭了时间与空间，使人得以在时空中自由往来。就这一点而言，它具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叙事方式的潜力。但是，这种媒介如此之新，任何试图用它来讲故事的尝试，都是在参与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传统的叙述方式，比如电影中的框架、剪切、特写、缩放，都不再有意义。一个导演曾经用来引导观众注意力，或者推动情节进展的方法也都不再有效。连观众的角色也变得非常令人困惑，你到底应该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参与者？

“我们之所以需要故事，是因为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混乱的、不可预知的世界，从看似无序、无意义的生活中整理出意义。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信息，故事会适应媒介的变化。关于虚拟现实的故事，最终将是一个关于故事，以及我们如何与故事共同进

化的故事。”

在世界范围内，电影导演、动画师、视觉艺术家、记者都在试验用这种媒介创作短片、纪录片、艺术项目。

在所有的媒介中，童书一直是最抗拒新技术的，但我们仍然看到了星星点点的尝试。在国内的童书业界，变化已经在悄悄发生。从去年年底开始，中信出版社陆续推出了 AR 科普童书《科学跑出来》系列，包括恐龙、太阳系、机器人、海底怪物、冰河世纪等科普主题。

增强现实（AR）与虚拟现实（VR）的不同之处在于——VR 是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离，让人沉浸在计算机生成的模拟世界里；而 AR 则是将虚拟世界带入日常现实——你仍然身在现实空间，只不过这个现实空间的场景中叠加了各种各样的虚拟元素。

以《恐龙跑出来》为例，只要在 iPhone/iPad/Android 下载一个 App，用 iPad 对准书中的页面扫码，就能看到一只 3D 的恐龙从《侏罗纪世纪》中走出来，在你的桌上走来走去，不时发出震耳的怒吼。暴龙的动作、姿态、表情，都与电影无异，而且，你可以通过 iPad 控制和引导它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或者奔跑，可以让它走到你的手上拍张合影。

“我对这些新技术还是比较谨慎的。”蒲公英童书馆的总编辑颜小鹏女士告诉我，“现在很多新技术都处于卖概念的阶段。”

在国内童书界，蒲公英童书馆以出版科普童书著名，他们在多年前从美国引进的《神奇的校车》系列至今仍然是国内最为畅销的科普童书系列之一。颜小鹏告诉我，三年前就有人找她谈把《神奇的校车》做成 VR 产品的可能性。

《神奇的校车》的大致内容是一个古怪热情的女老师带着一群好奇心旺盛的小学生，坐一辆神奇的校车四处探险，从火山到南极，从海底到太阳系，从花心到蜂巢，穿越飓风，漫游人体，甚至穿越时间。可以想象，这套书如果能以 VR 的形式呈现出来，会是一种非常震撼的体验。

“投资是上亿级别的，而且美国版权方对这种授权也非常谨慎。”颜小鹏告诉我，“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这些新技术对于童书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个人觉得，阅读和 VR/AR 毕竟不同，阅读是安静的事情，而 VR/AR 是比较闹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这些技术真正聪明的应用，能呈现传统童书所无法呈现的东西。”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度十种好书



我们的中国（一函四册）
李零 著



从历史中醒来
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孙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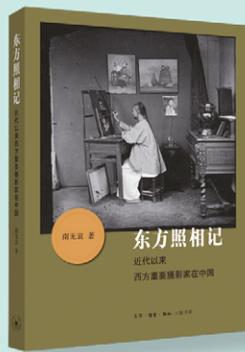
一百年漂泊
台湾的故事
杨渡 著



鲁迅藏浮世绘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人歌人哭大旗前
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
[日] 木山英雄 著 赵京华 译



东方照相记
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
南无哀 著



阅读好书



百年旧痕
赵珩谈北京
赵珩 口述 李昶伟 采写



北上
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刘统 著



我的精神自传
钱理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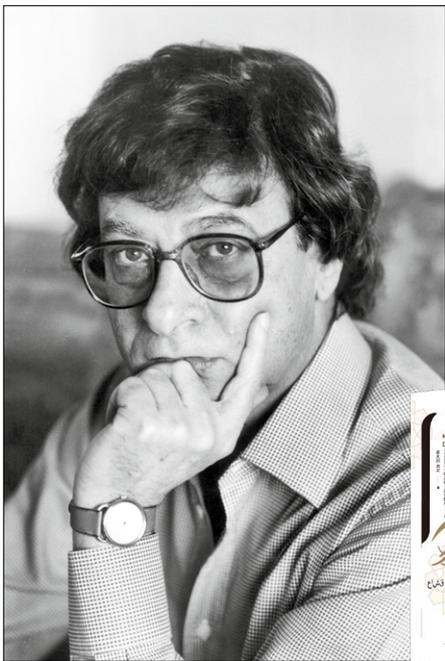
大都无城
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许宏 著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

记者 孙若茜

诗歌，“它可以 / 用姑娘的双乳点亮黑夜…… / 它可以，用栀子花的呐喊， / 令祖国回归！”——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与他的诗作《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



“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议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别强调我们是来看望达尔维什的，阿拉法特指着达尔维什开玩笑说‘他是我们的老板’。”2002年春天，作为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中的一员，诗人北岛在巴黎参与公布包含35个国家、500多个作家发起的“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后，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行8人，应被围困的诗人达尔维什之邀，抵达巴勒斯坦。当时，围困之中的阿拉法特在他的办公室兼会客厅里接见了他们，美国作家罗素·班克斯与之对话的一幕，就这样被北岛写入了《午夜之门》。

这一段足以说明达尔维什在巴勒斯坦以及世界文

坛中的地位——他是巴勒斯坦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同样也是国际文坛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很多诗被谱曲成歌，在阿拉伯民众中广为传唱。据说，他在巴勒斯坦各地举行的朗诵会每每座无虚席，朗诵时现场总是鸦雀无声，即便有些诗作晦涩得使听众似懂非懂，他们也依然听得泪流满面。在阿拉伯读者眼中，达尔维什就是巴勒斯坦的情人乃至圣徒。

如今，凡到拉姆安拉，人们必去的两个参观之处，一是阿拉法特墓，另一个就是达尔维什之墓——2008年8月9日，达尔维什在美国接受心脏手术意外失败后，遗体由专机运回拉姆安拉安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举国哀悼3天，为其举行国葬。并在悼词中说，达尔维什是“用笔为争取巴勒斯坦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是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代表和象征”。

北京奥运会刚刚开幕，达尔维什的辞世因此并未在中文世界引起太多关注，只有北岛在香港和几位诗人与诗歌爱好者举行了追思会。当时，关于他诗歌的译介也只是零星之作。直到前不久，《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出版，诗人一生的写作首次在中文世界被呈现为较为系统的译介，我们才终于与达尔维什正式地“会面”。

达尔维什1941年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村庄比尔瓦。7岁那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炮火响起，其全家逃往黎巴嫩避难。一年后，家乡变为废墟，他因此被迫迁居海法，并在那儿读完中学。毕业后，他加入了同情巴勒斯坦事业的以色列共产党，并担任该党机关报的编辑。1961到1969年，他被指控从事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政治活动，先后5次被捕入狱。也正是那时，他的诗歌生涯开始了。

从1960年出版诗集《无翼鸟》起，到后来的《橄榄叶》（1964）、《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1966）等等达尔维什最初的10年写作中，很多作品都是在狱中完成的。诗中的反抗情绪或因此尤其饱满和直接，诗人内心的痛苦更多地呈现为悲愤，并可见其对回归家园所充满的信心。从那时起，“抵抗”，这个贯穿于巴勒斯坦文学的核心，就不可回避地驻扎在达尔维什的诗中。

1970年，达尔维什开始了长达25年的居无定所。开始的10余年里，他到过莫斯科、开罗、贝鲁特，后

又被迫辗转于叙利亚、突尼斯、约旦。在流亡的主题下，客居他乡的痛苦更加凸显出诗人对于祖国的思念。车站、码头、机场，这些流落者频繁出入之地，成了诗里集中出现的意象。而接下来的近10年，受阿拉法特的委托，达尔维什前往巴黎主编文化刊物《迦密山》，并在那里断断续续地生活。

诗歌的主题依然是祖国和流亡，但达尔维什认为，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在巴黎，他的诗歌才完成了真正的诞生。“远离祖国的距离感，使他能够以‘旁观者’姿态冷静地审视祖国、阿拉伯民族乃至世界，并从一个新的高度思考诗歌和人生。他开始思索：自己来自一个个体缺乏自由、群体未获解放、国家没有依托的国度，这一背景必定要让自己的创作受到制约，还是有可能使之变得更为丰富、深刻和独特？”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学院院长薛庆国认为，虽然主题没有改变，但诗人处理的角度和高度有了变化，他在其中贯注了更多人性的、情感的、美学的乃至神秘主义的元素。并且，诗人在这一阶段的诗中开始大量加入具有中东文化特色的神话历史意象，开创了一种秉承文化遗产的现代神话结构。

之于写作的创新与变化，从某种角度，可以解读为达尔维什对于被看待成“被压迫民族的代言人”的警惕，“他致力于通过诗歌提高祖国人民的个体自觉和审美情操，又不愿牺牲诗歌的艺术性降格以求”。作为巴勒斯坦诗人，他在世界文坛中拥有天然的特殊性，这种身份是对诗人的成就，但同时也向他提出了特殊的难题——“他必须同时兼顾内心和外界，同时实现诗歌的美学和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抵抗”从一开始就是达尔维什写作的核心，以色列的占领对巴勒斯坦人民所造成的苦难是诗歌内容的主体，但是，在他的诗作中，从未出现源于种族主义的仇恨。“他抵抗的是压迫，无论这压迫来自阿拉伯暴君或以色列占领者。”在他的笔下，“大地就是流放地，/历史便是一场悲剧，它始于该隐和亚伯的/家庭之争。”“通过将冲突根源追溯至人之初、历史之初的策略，诗人一方面传达了对于巴以两个民族兄弟阋墙、相争相残的讽刺和嗟叹，另一方面也让巴以冲突成为人类无休止冲突的一个隐喻，巴勒斯坦的悲剧，也就有了更为深广的普世意义。”这或许正是达尔维什不仅深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爱戴，同时也受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尊重乃至仰慕的原因之一。

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成立自治政府后，达尔维什决定回国，也因此遭遇了以色列对拉姆安拉的3年围

困。“虽然回归祖国，但他对巴解组织同以色列达成的《奥斯陆协议》深感失望，也无法认同巴勒斯坦政治人物乃至民众的许多行为和观念。”薛庆国分析，“归国后，现实中的巴勒斯坦与诗人理想中的祖国相去甚远，因此，他在无奈中写下‘巴勒斯坦远得没有边’，‘此刻，在流亡地，是的，在家中’这样的诗句。诗人感受的，是‘在场的缺席’的悖论：地理意义的在场，却难以消除心理层面、思想层面的疏离和缺席。”

他开始反思，并且将反思由巴勒斯坦的政治和人民，扩展至阿拉伯文化传统的范围，包括保守宗教观，习惯将政治、文化、宗教混为一谈等等，诗作《从现在起，你不再是你》《从现在起，你就是你》《如果我们想要》都是凝结这些反思的代表作。

进入晚年的达尔维什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巴以双方的冲突进入了无解的恶性循环，不论是政治还是现实，巴勒斯坦人的梦想或终将无法实现。因此，他在思辨中表达出的悲伤转向了失落和无奈，而不再是愤慨。“抵抗”，在此时由政治上的、行为上的抵抗，转向一种美学抵抗，他在诗中写道：“每一首美丽的诗篇……都是一种抵抗。”“捍卫生命的诗歌，是一种本质上的抵抗。”

“达尔维什抵抗观的这一嬗变，与当代巴勒斯坦事业的演变态势无疑有着直接的关系。摆在诗人和无数巴勒斯坦人面前的一个残酷现实是：由于巴以双方的力量对比日益悬殊，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解放的道路不仅越走越窄，而且会让巴勒斯坦人民在遭受巨大牺牲的同时，还蒙受被污名化、被妖魔化的严重后果。”薛庆国认为，达尔维什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当他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性同时，还意识到作为个体的人以及整个民族，都终究要生存下去。然而，从事政治和武装斗争是极其危险的做法，会将原本正义的事业引向反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做的就是通过诗歌给巴勒斯坦人民正名，通过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和对生活细节之美的挖掘，让世界认识到巴勒斯坦人也像其他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情感，也会对美有所追求，而并非完全与恐怖主义画上等号，由此恢复他们的名义和尊严。

达尔维什曾这样写道：“巴勒斯坦人并非一份职业或一句口号。他首先是一个存在的人。他热爱生活，为杏花而欣喜，在初秋雨落时感到寒战；他响应身体的自然欲望，而不是别的号召做爱……他繁衍子嗣，为的是保存种姓、延续生命，而不是求死，除非到后来他变得生不如死！这意味着，长期的占领未能抹杀我们的人类本性，未能如愿以偿地征服我们的语言和情感，令其在围困之中枯竭。”

陈村：那就和自己好好玩一场（5）

文 / 朱伟

《鲜花和》是陈村的第三部长篇。1983年写完《从前》与《住读生》，直到1995年我准备接手做《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他才开始写《鲜花和》。这十二年，他经历离婚，脱了束缚，回到自由放荡，尚未奉子成婚。1986年后，他越来越多地贩卖机智，给各类报刊写一泄即成的专栏短文。我视《鲜花和》是这十二年五味杂陈的“反刍”——在“出城”又“进城”的过程中，思考婚姻、男女、父女本质之关系。他用十年时间学鲁迅，磨砺出刻薄的嬉笑怒骂随笔手段，来写这部长篇的一个个章节，从中能看到驾驭文字的能力已经如何之了得。

陈村的长篇小说，篇幅都不长。《从前》与《住读生》都只有十多万字。《鲜花和》勉强写到二十万字，后面的气力就明显不如前面。篇幅不长，不给读者以压力，是好处。但换一个角度，将本应厚的东西都消解成轻，又不好。陈村的小说中，到处是智与会，知有所合，时时能引人相会一笑，却就难看到拙。人生其实是处处因拙而尴尬的，在陈村的小说里，这尴尬都被巧舌如簧包装起来，反唇相讥用得多了，就让人觉得轻薄了。

这部长篇的每一章都由一篇篇短文联结而成，六章总共有七十多篇，应该说，大部分都是精妙随笔，处处梦笔生花。所谓“鲜花和”，是省略了“牛粪”。“鲜花和牛粪”是小说中女一号“级级”的说法。她戏称自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陈村这部小说的“白相”方法是戏谑这关系，他用这种方法得心应手。小说中有一个“书信”的章节，男一号“杨色”以“写信”方式，这样调侃“级级”：“你要是长在树上就非常好，可惜长在了我的碗里。你要是开放在枝头就非常美，可惜插在了牛粪上。”“长”在碗里，就只好因“提前做成了和煮烂的绿豆为伍”的“糖桂花”而不甘。“牛粪”呢？“你年轻就插在了牛粪上，牛粪就坐立不安自惭形秽自卑得一塌糊涂。好端端的一块牛粪插了个幌子，就不能过牛粪庸常的幸福日子了。”

这部小说里处处都是这样过分的戏谑。比如“级级”这样反唇相讥“杨色”：“现在的男人连几只放在眼皮底下也看不见的精子也要和女人算账了。送也送给女

人了，送的时候倒是慷慨得很，结果一送完算起账来一五一十的。你们请客却要女人买单。”“杨色”针对“级级”的“精神领袖”，女权主义者小雷子“级级对你有性虐待吗”的提问，答是“我想问一问，上了床不算不算性的虐待？不了解性的构造，不学习性的技术，不营造性的气氛，干扰与破坏自家男人的性企图，算是虐待吗？”这样的语言，也只有陈村才写得出来。

小说中的“级级”与“杨色”“毛阿”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最终也不是“杨色”的妻。无婚姻契约，却又成了“碗里”的——“杨色”责怪她的上级要随时把她叫走，“深夜一点钟放回来，清晨三点钟叫走”。责怪她以工作弃家庭，戏谑说“我胸前乳房也没有，却要给孩子喂食”。可“毛阿”本不是“级级”生的，“毛阿”妈本就是缺失的，抚养本是“杨色”自己的责任。没有契约，却又有实际的彼此管束。“杨色”与别朵“鲜花”私通，要警惕“级级”监控，有负罪感。“杨色”当然也监控“级级”，担心“袋鼠过去了，还有鳄鱼”。这就是“鲜花”和“牛粪”因果的本质——“你做了，就欠了”，即使不是婚姻，也有“债权”关系。

陈村说，这部小说的腔调，很多女人不喜欢。我倒是觉得，女人都应该耐心读读这部小说，也许会对男女关系，各自在家庭中的角色，会有一点反思。

这部小说里，写得最直率的是性，男人的性要求、性能力。其中多次粗俗地写到“级级”“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在浪费男人”。“杨色”这样哀叹：“上帝造男人构造那么精巧，你却当他们废料。”书中有“洗澡”一节，写“级级”面对“杨色”的企图，先冷冷地问“你洗手了吗”，再疲惫地说，“洗好到现在也有时间了，再去洗一遍吧”。洗完了，“级级”叹气说：“累得简直太累了，你怎么胃口那么好？”“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黄色！你二话不说就动手动脚，真是一点教养没有！好吧，你找点东西给我看看，不然怎么做得起来？”等到可怜的“杨色”找到“东西”，“级级”就已经鼾声四起了。这大约是婚姻男女中很典型的桥段吧？性别差异，女性往往并不认为，尊重对方的性要求是最基本的义务。小说中的“杨色”因此而牢骚自己有“产权”，使用却还需要一个Yes。



陈村的《鲜花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定价11.60元



作家陈村和女儿（1993年11月于上海）

陈村在这部小说里直率到极点，就会说，性是生命之基础，人的强健本就构成了人的无耻。男人女人，本就在带着自己的生殖系统谈话，所以，爱情的“爱”是动词，是做爱愿望的包装。若包装成了目的，“纯粹没了，爱情会冻死或晒死”。家庭的本质是房子和床，是口粮，所以，偷情往往是因口粮不足，饥饿所为。小说中，“小雷子”在“女权”一节中抨击“那个臭蛋就是你们的原罪”当然对。问题是，多少女人能意识到，这“原罪”恰是生无法挣脱，需要关怀的？欲本是折磨，要不然，叔本华为何要七十多岁才长叹一声“我终于没有性欲了”？

也许这部小说让女人不喜欢，就因是从动物本性，来为性求正名。如“洗澡”一节，“杨色”内心对“级级”不屑说：“洗是一种掩饰自己动物性气味的行为，我就是动物，怎么能掩饰成不是动物呢？”从“本是动物”出发，“杨色”就会感叹，现在的女人迷恋于包装，“使我们丧失了动物的忘形能力”。“忘形能力”是什么呢？做了就是愉悦，彼此就都没有负担。“杨色”的认识，“性是一个杂种，它什么都能表示，所以什么都不表示。”其实，即使动物，只要性交，就亦会有因果负担，否则就不会有占有与决斗了。况且人之为“高级动物”，总需要衣服的。不饰形，人类社会便无以维系。所以，尊重人欲本性与尊重“衣服”，恰是男女关系中无法

回避的彼此因果问题。从女人的角度，“衣服”也许就比性本身更重要。陈村当然非不知动物性与人性之区别，他只不过选择了这样一种调侃男女可怜的办法，用这种表述来掩藏真相。作家都要用虚构来掩藏真相，蛊惑读者好奇的。读者的能力，就要从他的虚构中学会辨别真相。

《鲜花和》里的悲凉感，说到底还是生命因彼此冷落而彼此饥渴，以各自方式取暖的可怜。陈村在后记中说，以它“纪念我们的日常生活”。他大约想提醒每一生命都要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归根结底都是可怜见的生命体吧。小说结尾，不愿意用“自己来敷衍自己的”的“杨色”，只能在电脑的“脱衣扑克”中，“以无害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欲望了。这样以“无害”构成的日常生活，自然就把本来生活给埋葬了。

最终，“杨色”茫然四顾——“那么多的心肺，那么多的生殖器都在路上飘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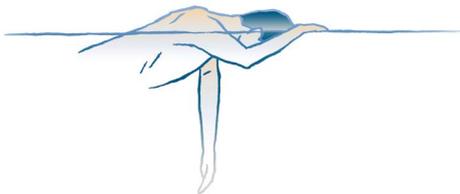
这个陈村真行。小说中他有诗一样的语言——

我们是穿着衣服爱上的我们就要穿着衣服把欲望埋葬。

我爱你啊我的姑娘，我在你的面前唱着歌儿穿起我宿命的衣裳废黜了我的阳物。这是我的更深的爱虽说有点不伦不类。我捧着你的脸吻你这是开始也是结束。☑（待续）

臣叔的忧郁

文 / 玥超（三亚） 图 / 陈曦



每次看到新闻里说又有某要人因为得了所谓的“抑郁症”自杀的时候，心里总不自觉地就会想起臣叔。臣叔是黑孩爷的独子，就住在我家老院的东南角。因为是世交，两家又住得近，放学的时候如果从当街走，顺着李家过道回家的时候，我还会专门从他家的矮院墙上翻一下，好抄个近路。有时候口渴了或者好玩，还会在他家的压水井上哐当哐当地轧上几下，抽些拔凉的地下水出来喝几口再洒着玩几下。

可能是因为臣叔比我大了那么几岁的缘故，我跟他的交集并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某次从他家的小院子穿过的时候，忽然闻到很大的油漆味儿，下意识地往他家堂屋里一瞅，只见臣叔正站在一个大红的立柜前，手里拿着一支毛笔一动不动地若有所思。跑进去一看，原来是臣叔正在上面作花草草的画。他竟然会画画，还是用油漆！这下可大大刺激了我的好奇心！一问才知道原来臣叔已经辍学了好大一阵子，跟村里的老漆匠学油漆也一两个月了。那时候村子里各家各户用的柜子、木床、凳子等家具甚至拉东西的板车等，基本都是用自家的老树或者家藏多年的老木料，就近请木匠师傅们在家里打造的，打完了自然就轮到漆匠上场了；讲究些的，漆好了还得添上两幅喜气的图案。当我又是佩服又是羡慕地打量着臣叔的时候，只见他抹了抹手上的以及不慎弄到脸上的红漆，憨憨地还会有些不好意思地嘿嘿笑起来。臣叔憨笑的样子，没想到竟成了绝唱，就这样一直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臣叔，而且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

我所知道的是，后来臣叔像村里许多人一样，去了陌生的天南地北讲着各种各样语言的城市里去打工，就是那一大批如我一样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我的农民兄弟，他们用粗糙的双手垒起了一

幢幢的高楼大厦，换来的却是殃及子孙的所谓文明的城里人的纯属找抽的鄙夷。老实却也聪慧的臣叔在城里务工的日子，据说也挣了些钱，没几年就把原先的老瓦屋拆掉盖成了三层的小楼房。按说，他家日子该“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天地会好起来了。至少，黑孩爷老两口儿也可以安度晚年了。然而，为什么生活中总是会有那么多的该死的“然而”，总是让人不得安生。然而，臣叔却忽然心有千千结地作起了某个大难。我想，始作俑的应该是那个洋气的小楼房的一干花费问题，应该是臣叔忽然间发现小楼盖起来以后，手里干干的再没了余钱。然而，又是这该诅咒的“然而”。然而，臣叔发现手里没了余钱，再三地考虑起自己年龄大了越来越力不从心出去也快干不动了，而自己上有爹娘得养老送终，下有幼子嗷嗷待哺需要长大成人；如此三番，甚是觉得无以为继乃至绝望，实在是不知接下来如何是好，就索性在自家的小楼上喝农药自杀了。

村里人惋惜地说，臣叔是想事太多、操心太多愁死了。而我知道，这才是传说中的真正的抑郁症。那些电视里、报纸上，甚至小道消息里，号称因为抑郁症而以各种各样方式在人间消失的一干僚吏，想想他们可有可无并不接地气儿的所谓抑郁，若是与臣叔在那个无声无息的小村子里发自内心不知如何过得活得忧郁比较起来，真的是屁都不是！更惨的是黑孩爷，幼年失怙失恃，孤苦半生，劳累半生，老了老了以为日子总算有个盼头儿了，竟然还得白发人送黑发人。实在令人唏嘘。■

| 本栏目投稿邮箱 mensula@sina.com |